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上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上　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陈 叔 平 译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上 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48-8/D·27

1989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84千

印数 2,600 册　　印张 8 3/4 插页 4

定价: 4.2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译者说明

本书是论述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及其理论学说的基本著作。作者菲·邦纳罗蒂是平等派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巴贝夫主义的忠诚的捍卫者。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实际上是邦纳罗蒂的回忆录，作者在这卷里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力求忠实地追述了平等派密谋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下卷开头部分是作者对这次密谋案件的审判过程所作的详尽的记述，接着是作者长年累月苦心收集到的有关这次密谋的珍贵资料，一共30个文件，占了这卷绝大部分篇幅，因此这卷基本上是一部文献集。本书初版于1828年，这个中译本是根据法国社会出版社1957年的法文原本翻译的。原书中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和让·多特里编的书目，也一并译出，供读者参考；原书正文中凡由勒费弗尔在一系列人名后用括号附加的真名实姓，考虑到下卷中已附有人物化名还原表，为保留原书面貌，予以删略。

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俄译本和英译本，并根据苏联1963年出版的俄译本，补译和收编了以下材料：

（一）邦纳罗蒂在原书中声明没有找到的两个文件，即《对于我们的两个宪法的意见》和《法国人民反对其压迫者的呼声》；

（二）“第十四号文件”中原被删节的段落；

（三）邦纳罗蒂和巴贝夫的传略;

（四）苏联史学家达林所作的注释(以〔 〕号表示,附于书后)。

至于作为俄译本序言、由沃尔金写的«“平等派”运动及其社会思想»这篇重要文章，已由本人在多年前译出，现已编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因此本书不再收编。

本书上卷全部和下卷大部系本人所译，端木美翻译了下卷第十二号至廿七号文件（除第十四号文件中根据俄译本补译的段落外)，校阅了下卷中有关密谋审判案的译稿，并且作了一个书目补编。全书最后由本人统一校订。

上卷的部份译稿在定稿前曾蒙湖南省委党校李志逵教授审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商务印书馆郭一民、陈森、狄玉明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和编辑加工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的问世是难以想像的，在这里也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陈 叔 平

一九八五，二，二十

目　　录

乔治·勒费弗尔的序言

邦纳罗蒂这部著作于1828年在布鲁塞尔问世，此后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在我国，它重新唤起人们对平等派密谋的回忆，并且对以布朗基的名字为标志的革命观点起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部名著却很少再版，因此可以预料本版将会受到欢迎。邦纳罗蒂在本书中对法国革命作了简略的回顾，从中揭示出平等派与革命的密切联系；同时，他在书中所作的叙述和他所公布的文献，展示出平等派描绘未来社会的若干方面的起义计划的轮廓。总之，读者似乎会得出巴贝夫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这样的结论。

I

1789年，第三等级压倒了贵族阶级，废除了领主的权力与种种特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布：法国人从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那些随即获得无套裤汉这个称号的人们，很快就发现：新秩序保留着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且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主宰权，从而不能使他们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在这种阶级的冲突中，邦纳罗蒂和巴贝夫投身于人民的事业。不过，资产阶级当中的一部分人，即山岳派和雅各宾派，在跟勾结外国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时，依靠无套裤汉的帮助取得了政权，因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同盟者的共同愿望。邦纳罗

蒂念念不忘地提到救国委员会保障了革命的胜利，他所关注的正是其著作的社会影响；他把革命的胜利归功于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而认为热月九日中断了共和国的民主发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对那位不可腐蚀者的缅怀竟达到肃然起敬的地步，以致使读者以为罗伯斯比尔派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没有看到罗伯斯比尔派跟他们的同僚们联合起来镇压忿激派和通常被称为艾贝尔派的那些人民领袖，并不惜为此牺牲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力量。

这种对共和二年的传统的眷念之情，至少可以说明它对平等派密谋的感染之深。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惜跟热月九日政变后失势的国民公会成员进行合作，以便联合起来重整人民阵线，当然在这样做时并非毫无嫌恶之感；他们象革命时期的组织者那样组织起秘密社团，以准备起义；他们采用了同样的宣传手段：报纸，小册子，俱乐部；他们试图争取军队的力量，如同人们在 1789 年中所成功地做到那样；为了吸引群众，他们决定一旦革命成功，第一项工作就是把国民公会曾经允诺的价值十亿法郎的国家财产分配给祖国的保卫者，并实施关于把嫌疑犯的财产分配给贫民的风月法令。由于主要着眼于分配，他们的共产主义显示出共和二年经济制度的特点：课税、征用和配给制。

II

然而，无论这种传统的渊源是何等明显，超越之处还是不少的。罗伯斯比尔派和他们以前的其他革命派，都曾渴望有产者大量涌现，因为在他们看来，财产不仅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且是社会和平与资产阶级的安谧生活的保障。热月九日以后，邦纳罗蒂和

巴贝夫则把这点看作是明显的失败，此外，他们把有产者人数的增加看成不过是养痈成患而已：社会的不平等是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继承的结果。日益深重的灾难，使他们感到除求助于公有制外，别无良策。

作为理论家，他们必须一马当先鼓吹这种制度。在18世纪，卢梭、摩莱里、马布利等就曾赞美过这种制度，而他们的先驱者则可追溯到古代。但是，这些人在描绘乌托邦的同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一项把所描绘的东西付诸实现的行动计划。1789年以后，资产阶级很害怕“土地法”。“土地法”一词取自罗马史，当时罗马共和国曾多次把它通过征服和没收所得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贫苦公民；而如今受到人们谴责的土地法已大不相同，它是要把私有财产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分配。国民公会宣称要对宣传这种作法的人处以极刑。直到1848年，以至更晚一些，社会主义者还把“瓜分者”这个绰号视为莫大的嘲弄。在1792年的时候，不能排除巴贝夫具有“瓜分者”的思想倾向；但是到共和四年，他却否定了土地法，原因是鉴于实行瓜分以后，不平等现象还会通过各种途径立即重新出现。这样，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并借助于革命的经验，共产主义便俨然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然而，平等派并不满足于对乌托邦进行新的描绘，他们制订了一个执行计划，从而使共产主义得以第一次列入历史事件。

III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主要兴趣在于平等派为实现自己的方案所设想的措施的新颖之处。平等派一致认为，大多数人对于

使他们受苦受难的制度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永恒的，所以他们不会自己起来争取一种新的制度，或者，至少对未来的革命抱犹豫不决的态度。在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前，最好是先实行改革，让他们有时间去认识这种改革的好处。因此，平等派决定建立自己的专政。他们没有否定选举的民主，而是推迟发挥这种民主的正常职能：巴黎起义者选出一个代表会议，由每个省派一名代表参加，这些代表的候选人由平等派的委员会提名。在一切地方，官员完全从革命者当中选拔。在未来，只有那些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公社和参加公有制的人，才能取得公民的资格，其余的人则一律被斥为外国人。外国人是赋税的唯一担负者，如果他们受到怀疑，便随时可能被拘捕。不难看到，这也就超越了像雅各宾派和罗伯斯比尔本人所设想的那种政治民主，另外，人们从这些方案中可以看出未来社会的萌芽。在1848年的时候，布朗基主张推迟选举并建立临时的革命专政。如果人们认为平等派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就错了；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无套裤汉，是包括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和已有不动产的农民在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邦纳罗蒂这本书是否就没有给列宁——正像给布朗基那样——提供构思的主题。

我们已经看到，平等派预定要对顽抗者采取强制的办法。但是，他们没有摆脱机会主义；邦纳罗蒂没有忽略分配答应给祖国保卫者的国家财产和风月法令所针对的嫌疑犯的财产，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制造新的有产者，从而跟建立共产主义相抵触。然而，他们的对策是取消继承权，并在安排好现状的情况下，准备实现一种循序渐进的演变。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他们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对社

会结构实行一种全面的和匆促的突变;这样一种前景,迎合了那些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改善自己日常生活的人的心理。然而,平等派深谋远虑地要发挥的是一种示范和说服,尤其是对青年进行教育的作用。

IV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邦纳罗蒂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简直充满着空想和争端。人们对于他在劳动组织上所持的见解暗暗吃惊,并倾向于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公社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并在用益权的名义下,把生产资料留在迄今使用它们的那些人手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农民会停止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上进行个体耕作,或是手工业者会离开他们的作坊而到工厂去。这不是一种生产的共产主义。然而,所有生产者都要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交给公共仓库,以便在消费者当中进行分配,而行政官员则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保证每个人享受一种富足而又朴实的生活。邦纳罗蒂所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分配的共产主义,它既带有共和二年对生活必需品局部地实行国有化的痕迹,又带有在平等派准备活动时期人民大众阶层所遭受的物价高昂和食品匮缺的烙印。总的说来可归结为:他们对时局感到关切,而没有对经济发展的步骤进行分析;他们对企业主的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深恶痛绝,但没有估计到后者在追求经济集中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因为这种集中组织起了共同劳动,从而使生产的共产主义成为可以想象的东西;因为这种集中对生产的共产主义进行合理规划,实行机械化,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这种生产将使分配的共产主义摆脱定量配给的

局限方面。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共产主义一再被人们作为一种纯粹的农业共产主义来介绍,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他们津津乐道对"土地果实"的分配;邦纳罗蒂还期望在新社会里,城市失去其重要性以至消失。但是,实际上,他们对手工业者和农民一视同仁,并请科学家发明机器,他们认为机器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对劳动者是危险的,因为它加剧了失业现象,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则有助于减轻他们的劳动。

更有理由强调指出他们对知识分子所持的怀疑态度——除非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立即发挥作用。邦纳罗蒂并不排除文学和艺术的实践,但他只不过把它们看作闲逸之举。对于他和巴贝夫来说,体力劳动是人人应尽的义务,那些特别繁重和令人厌烦的活儿也应毫无例外地由每个人轮流担任。巴贝夫在他的报纸《人民护民官报》上表露出对知识分子的公开敌视,他谴责"才能的神话",并提出"没有任何东西证明高于个人需求的报酬是正当的",因为胃的需求对于人人都是一样的。《平等派宣言》的提法则更为激进:"如果必要的话,让一切工艺都消灭吧,只要把真正的平等留给我们就行了"。有时,甚至连科学研究也莫明其妙地遭到蔑视:在承认"不平等有时能够帮助有用的工艺取得进步"以后,邦纳罗蒂宣称,这种不平等可以毫无妨害地消失,因为"在今天,新的进步无补于所有人的真正幸福"。这就等于摒弃了知识分子为控制自然力并使之服务于人类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态度也是令人惊讶不置的。

平等派的共产主义的专制和集中的性质,同样是值得探讨的。在每个公社里,行政官员将根据上级政府的委员会的指令来摊派

任务和进行分配；这些委员会把估计可供调拨的剩余产品从富足的地区调往贫瘠地区，并对运输作出安排；跟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也操在这些委员会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表明，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参加管理。从这个意义上看，选举的民主将对经济起支配作用：人民选出自己的行政官员，却要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他们。然而，但愿人们不要仅仅对平等派提出责难，因为这是一个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和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难题。

V

最后，对于史学家来说，不要忽略在这部著作的论述中所难免的某些失实之处。邦纳罗蒂预先向我们说明，他并没有掌握全部的原始材料：密谋者的大部分材料在巴贝夫家里被抄走，藏在档案馆里的材料，在1828年的时候还不能利用，当时留在邦纳罗蒂和其他幸存者的手里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一部分材料；邦纳罗蒂不否认在他的著述中回忆录占了很大的位置。然而，在以后的30年间，他始终是各种秘密社团的热情鼓舞者，正如阿尔芒多·赛义德和阿历山德罗·加兰特、罗加纳最近为他撰写的传记中所记述的那样。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可能要问，在他写作的时候，他的思想是否还跟其他平等派完全一致。看来，在有关巴贝夫的介绍上有一点出入很大。在热月9日政变后的第二天，巴贝夫跟热月党人唱一个调子，并跟他们一样地诋毁罗伯斯比尔，这点邦纳罗蒂是不会忘记的。巴贝夫很快就转变过来，然而，如果说他也成为罗伯斯比尔的崇拜者的话，那他的感情也完全不如邦纳罗蒂，这种感情看来既没有妨碍他对忿激派和芽月受审者保持某种友好之情，也没

有使他沾染上自然神论的唯灵主义；而邦纳罗蒂却始终是信奉神明的。因此，在邦纳罗蒂那里，共产主义保持着乌托邦文献中所惯用的那种伦理主义的痕迹。卢梭和罗伯斯比尔都把道德感看成是民主制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实现共产主义中，邦纳罗蒂则用“良好风尚”来体现同样的作用。很可能，巴贝夫由于关注体力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而宁可更多地为无产者的利益进行呼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倾向于认为他跟马克思更为相近。由此可见，关于平等派密谋，还没有作出最后定论。

乔治·勒费弗尔

作者原序

在我们被宣判之前的瞬间[1]，巴贝夫和达尔蒂①在旺多姆最高法庭被告席上和贵族分子的斧钺之下，得到了我给他们许下的诺言，我答应把当时被党派情绪弄得面目全非的我们的共同目标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以此来替他们伸冤昭雪。如今我已到垂暮之年，对于这个过去几次三番因故未能及早履行的诺言，现在是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由于要履行另一些义务，由于长期的和严酷的监禁，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法国三个不同的边远地区的为期更长而且往往使人极端苦恼的警察监视，我长期以来没有可能跟一些目击者就那次革命的一些伟大事件的原因交换意见，没有可能去寻找为了说明某些我想公诸于世的事实所必要的文献。然而，如果我不是因为担心给敌意行动和迫害提供新的口实的话，那么这部著作早就可以问世了。如今在岁月的催迫下，我决定发表这部著作，同时也感到有更大的把握这样做。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物几乎已经不在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的政治学说跟法国共和四年那个时候的民主派所宣传的比较起来，已经相差不知道有多远，因此再也不必担心人们进行危险的对比了。何况，使人们最终了解一个民主党派的真相，又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① 他们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我跟热尔明[2]、莫鲁阿、卡森、布恩、曼涅斯埃、勃朗多则被判流放。

由于我所追述的是一件极其豪迈的业绩，所以我必须交代清楚，我们是怎样投身到这个事业中去的。我认为，只有当我回想起当时革命所处的形势，回想起革命在那种形势中不断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回想起据我们看来曾对革命起过一定影响的好事和坏事的时候，我才能够作到这点。因此，在我的叙述中，首先是简单地回顾一下那次革命，一直追溯到我所要介绍的事件发生时为止。我并不想写一部历史，只是想把那次革命给我们留的印象记录下来。

要完成我给自己提出的这项任务，仅仅叙述一下巴贝夫和他的朋友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打算做什么事情，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介绍清楚，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怎样表明自己的目标是正义的和必要的。因此，我必须把事件的过程跟他们的学说和方案的发展过程同时加以叙述。

我叙述这次密谋所能利用的资料，有我本人的回忆录，有这次密谋参加者所写的东西，有法庭对他们的审讯材料，以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的若干片断材料[3]。

并不是全部文件都被警察搜获。不在巴贝夫身边的文件，有一部分被一些过分谨慎的朋友销毁了，其余的文件被我找到了，现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文件按照他们原来交给我的那样，原封不动地加以发表。

我并不是不知道，我所要介绍的那些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一定会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这不足以成为不公布这些原则的理由。何况，在人们想像中的某些谬误，已经成为颠扑不灭的真理

了。难道不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被文明社会表面的浮华现象和那些以指导社会舆论自命的人们所鼓吹的制度弄得眼花缭乱吗？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原则是重要的，但对于那些坚信这些原则的正义性、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树立这些原则、最后并以自己的鲜血去凝固这些原则的英勇的公民们，却抱着某种遗憾心情来追忆他们。

就我来说，由于跟这些英勇的公民们的见解一致，因此牢牢地跟他们联结在一起。我支持他们的信念和努力，如果说我们是错了的话，那么这种错误至少是严重的：因为他们把它带进坟墓里去了。至于我，从那时候起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始终坚信他们所珍视的那种平等制度，乃是能够满足一切真正的需求，能够给予有益的激情以良好的诱导，对危险的情欲实行约束，能够使社会自由、幸福、和睦与长存的唯一的制度。

菲力浦·邦纳罗蒂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法国革命时期各政党及其性质

在那些使法国革命如此丰富多彩的党派中，只有一个政党值得学者加以重视。因为这个政党一贯秉承自我牺牲的精神致力于人类真正的解放。

野心、嫉妒、贪婪以及标新立异的癖好，促使人与人之间展开一场可悲的斗争：一些人为旧王朝的复辟而战，另一些人为新王朝在法国的登基而战，还有一些人则为了把政权从一个等级转到另一个等级的手里而战。所有这些人，他们一心一意所追求的只是权势和来源于权势的种种生活享受。正当这个时候，一个公民阶级在渐渐地形成，这个阶级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则，也希望发生一个巨大的政治变革，然而，这样一种变革，是跟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野心家们的观点和感情大相径庭的。

力图在法国建立起新的统治形式的政派[4]，我们看到确实很不少，然而，愿意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彻底改革社会的人，却寥寥无几。

因此，登上革命舞台的许多人物，只是努力使一种统治形式压倒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对于那些任何合法统治都必须为他们谋利益的人们的命运，却漠不关心；也就是因为这样，许多所谓立法者认为：他们判决了一个国王[5]，并用几个人的权力来代替一个人

的权力，仅仅这样就算是把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利益的不同和原则的不同，是我们在革命时期意见分歧的原因。一些人捍卫某种制度，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制度是好的；另一些人——他们在人数上要多得多——则钻进一个政派里去，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派更有利于他们升官发财的打算。前一种人坚定不移地按着他们既定的道路前进，后一种人则根据形势和人们的情绪而随时看风使舵。

要想弄清楚每一个政派的特性，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许多政派，当他们不得不反对一个共同敌人时，表面上看来都是同心同德地在行动着。然而在改革的道路上每迈出一步，都会出现新的反对派，他们力图保存这一改革所针对的那些弊病。

譬如，在革命初期，制宪议会中的某些贵族[6]看来好像是按照人民的利益行事，可是，一等到第一批真正平等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走上相反的道路。再如，过去一些人所以起来反对王室，他们的意图是让另一个王室来代替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所以等到恢复任何王朝的指望都落空时，他们便都站到保王派的旗帜之下了。又如，有一些神父以前也赞成改革家们旨在反对上层僧侣违法侵权而从事的活动，然而一等到国家拒绝供给一切宗教经费时，他们就变成宗教狂热的最卖力的传播者了；还有一些曾希望利用君主立宪制来遂其私利的人，把自己打扮成共和派，但是，只要人民要求把共和国变成人人所享有的东西时，他们便转而公开地反对起最激进的共和派来了。

在由于那么多成份不同的人的结合而势必引起的风暴中，那些从革命一开始起就希望在法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正义王国的人

士，抓紧在这种汹涌澎湃的风暴中经常出现的机会，来启发他们的同胞们去考虑自己的权利，并逐步地使他们产生推翻一切阻碍他们享受这种权利的万恶制度的愿望。

在革命时期执行着最高权力的议会，可以说是代表着使法国人在各个方面受到感染的情绪：这种情绪要么是有益的，要么是危险的。在这些议会中，最卑劣的恶习和最崇高的美德同时在发展。在这里，人们发出了多次战斗的信号；在这里，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物利用各种机会，不然就制造这种机会来使自己的体系和利益占上风。

始终忠于人民事业的那一派曾经目睹，每隔一定的时期就有一些集团从他们这里分裂出去，并自趋灭亡。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只有在还没有跟那些集团所固有的观点发生矛盾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它们的协助，从而取得成功。

当法国还存在君主制的时候，共和派的人数多如牛毛，虽然在当时这些站在共和制旗帜下的人们之间早就暴露出严重的分歧。在1792年8月10日，有一大帮人为反对王室而战，但随后即四分五裂，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维护国王的利益。

在那些为反对王权而斗争和为这一斗争的胜利而欢呼的人们当中，有一些人内心充满嫉妒和怨恨，还有一些人则因估计到有出现摄政制度或改朝换代的可能而满怀飞黄腾达的希望。然而，总的情况不能不使人认为，大多数人在当时是的确希望建立起一个共和制度的，虽然在他们之间，无论在对这个制度的理解上或是在实现这个制度的动机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都成为国民公会中引起纷争

的缘由。一些人大肆宣扬那个享受财富和教育特权的阶级的绝对权力;另一些人则认为,人人都参加行使主权是使社会永远幸福和安宁的基本条件。前者追求雅典式的财富、奢侈和虚荣,后者则要求像斯巴达全盛时期那样的节俭、朴素和谦逊。

然而,要弄清楚这些纷争的实质,仅仅把它们和古代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是不行的,还必需从我们的风尚和我们对自然法的认识中去探索。

据我看来,法国紧接在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便是在下面这两种人之间所爆发的持久不息的纷争:一方是财富和等级的维护者,另一方是平等之友亦即人数众多的劳动者阶级的朋友。

利己主义的制度

如果追溯得更远一些,人们就会发现,当代所发生的争论,其根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①的理论,另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让·雅·卢梭、马布利[7]、以及当代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

我们记得,许多作者把一些民族兴盛的原因,归结为它们有大量的需求,归结为它们在物质享受方面的不断扩大,归结为拥有庞大的工业和广泛的贸易,归结为金属货币的迅速流通,最后,还归结为公民的永不知足的贪欲②。有人倾向让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人则主张增加小土地所有者的数目;一些人认为,从事生产

① 我所指的是那些希望对工业和商业实行某种限制的作者和执政者,以及另外一些主张给予它们最广泛的自由的人。

② 人们往往难以就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达成协议。我们的先辈,曾以多余物品的交易和制造奢侈品的艺术,在不采取暴力的情况下从封建制度的宠儿那里攫取一部分财产。这样对于奴隶主子来说成为必要的奴隶,就削弱了其主人的实力。以恶治恶,竟被当作至善,以至对许多人说来,自由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无限制的牟利的本事。

的那部分居民的贫困和愚昧，是使整个社会富足和安宁所必要的；另一些人则建议给予工商业以无限的自由，作为摆脱已经形成的不平等状况的手段，但他们的建议却同时为新的腐化堕落和新的不平等开辟道路。

从人们把财富看作是社会的幸福和力量的时候起，凡是不能够用自己的财产来保证自己效忠于那个被誉为尽善尽美的制度的人们，其政治权利就势必被剥夺。

在一切类似的社会制度中，绝大多数公民经常受繁重劳动的折磨，事实上永远摆脱不了贫困、愚昧和奴役①。

平 等 的 制 度

卢梭宣布天赋人权，他主张一切人都没有差别；他认为，社会的繁荣在于其每个成员的幸福，社会的力量在于人人奉公守法。据他看来，社会的财富在于公民的劳动和节俭，社会的自由在于最高统治者即全体人民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每个成员，由于在生活必需品上可以得到公平的分配，并且享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就能够对社会生活起必要的影响作用。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个人行动和私有财产服从于人民的意志；鼓励发展那些对大家有用的行业，取缔那些只为取悦少数人而设

① 大量雇佣工人和一小撮雇主的并存，势必使前者陷于贫困。愚昧无知，对于劳动负担过重的人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把自己的担子甩给前者的人们来说，却成为一种防患的手段。贫困和愚昧，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奴役制，凡是在人们不能够或不懂得表达其意志的地方，都存在这种制度。

不值一提的是，一些经济学家终于找到了消除困苦的办法，他们认为这种困苦是由于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过多。他们建议工人不要生那么多小孩。(Risum teneatis！不要发笑！)

置的行业；每个人的智力都可以得到发展，而不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贪婪的心理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对祖国和荣誉的热爱；全体公民结合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每个人都服从全体的意志，而再也没有人屈从于某一个人的意志。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是古往今来那些真正的圣贤之士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它在各个时代里都有一些知名的捍卫者。这些人士，在古代有如米诺斯、柏拉图、莱喀古士以及基督教的倡导者；而在近代则有托马斯·莫尔、孟德斯鸠① 和马布利②。〔8〕

人们把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那种制度称为利己主义制度或贵族制度③，而把卢梭所宣扬的那种制度称为平等制度④。

一旦活跃在革命舞台上的各个政治派别的意图可以被捉摸到的时候，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便趋附于利己主义制度的倡导者，至于那些心地纯洁的人，在正直思想指引下，必然地要致力于追求平等制度的彻底胜利。

---

① 《论法的精神》，第4卷，第6章。

② 在《论立法原则》〔9〕及其他论著中的许多地方，马布利都认为，财产共有制是符合于使人人都能永远幸福的社会真正目的的唯一的制度。据他看来，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贪婪和野心所造成的。因此，对策便在于采取一种手段来卓有成效地把这些恶念压制下去。贪心只靠财产共有制来制服，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摧毁私有制，同时削弱权势对人们的吸引力。此外，共有制还是阻挡野心的一道堤坝；但野心同时还必须靠道德和机构的力量来加以抑制。

③ 其所以称为贵族制度，是为了使大家懂得，在这种制度下，那种跟共同幸福毫不相干的纯个人利益，成为支配公民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动力。

④ 平等——这种思想是社交的基础，是对不幸的人们的慰藉。而在那些热中于财富和权势的人们的心目中，平等只不过是想入非非的念头而已。

撇开一切制度和一切情欲，还有什么人不承认其他任何一个人是跟自己平等的呢？同样，又有什么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而他自己如果也陷于同样处境的话，能无动于衷呢？

平等制度的假朋友

然而，在拥护那种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制度的人们当中，除了那些由于旧的偏见而趋附于该制度的人以外，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的是想保住特殊的生活享受和特权地位，有的则是想争取这种享受和地位。这些寡廉鲜耻的人们，只要他们自以为能

这种从我们的初步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感情得到了理性的验证。理性告诉我们，自然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可是，自然怎样使人人平等？这种平等究竟又表现何在呢？这是值得很好地探讨的。

主张社会不平等的人硬说，这种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据他们看来——这种不平等起源于自然给人与人之间造成的不平等。

他们说，人生来性别不同、身材不同、肤色不同、脸型不同、年龄不同、精力不同，因而人与人之间既不可能在权力上平等，也不可能在财富上平等。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然的平等或是社会的平等，只不过是一种想像而已。

可是，能不能因为实际存在着上述的差别，而就认为势必要存在不平等的制度呢？如果认为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说，财富和权势永远跟一个人的精力、仪表、美貌结下不解之缘了。然而这种看法是极不正确的。

主张不平等的人宣称，在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天生的差别，这种差别势必导致人们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这就是智力的差别。他们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颅骨的突出与否，乃是判断我们的爱好和情感的准确无误的标志。

但是，一种潜在的感情仿佛在启示我们说，自然的创造者并不是这样地来安排事物的。如果人们生活在正确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那么即使他们并不具备同等的智力，可是他们在智力上的这种差别，受他们的体质差别的影响也要比受他们环境差别的影响小得多。许多没有教养的人，如果有良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的话，就不再会是不学无术的人，这难道还有谁会怀疑吗？一个最粗俗不过的农夫，在他的本行的业务中或者是在探讨使他感到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表现出一种跟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同样深邃的智慧吗？一切都决定于我们把注意力投放在什么对象上。

况且，即使像有些人所断言那样，智力的不平等是天生的话，那么也不能把这种不平等看作是社会中所存在的财产状况和权势不平等的源泉。因为，把财富和权势照例看成是知识和智慧所应瓜分的东西，这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在上面提到了一切有关的特点呢？绝对不是。我们所指的天然平等，说的是我们天生具有一模一样的需要和感觉。这种需要和感觉，从我们一开始运用自己的智力和感官时起，就在不断地发展。

够阻碍平等制度的建立，并能够利用他们自己所挑起的大动乱来遂其私利，他们就自我标榜热爱这种制度，并装出一副爱戴那些忠心拥护这种制度的朋友们的样子。

平等派的努力及其成就

从革命一开始起，平等制度的朋友，即正义的朋友，就为平等制度的胜利而努力奋斗，他们早就起来反对敌视这种制度的党派的观点。在制宪议会存在时期，他们反对把公民不合理地划分为

需要食物、需要生殖、自爱、怜悯心、感受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了解其他人的思想的能力、使自己的行动合乎规矩的能力、痛恨强制、爱好自由——凡此种种，对于所有的健全的人来说，都几乎是同样具备的。这就是自然法则，从这种法则中引申出人人都具有的同样的自然权利。

每一个承认自己是由自然的两种不同实体所构成的人，全都从思维原则的精神自然中引申出有利于自然平等的新的论据。这种把人类的"我"包罗无遗的思维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无条件的，而且永远是来自同一源泉的，它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同样的。

毫无疑问，体力的不平等，是不足以妨碍人们享受自然平等的，这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如此。看来，以前人们为了防患起见，便求助于签订契约，从而建立起公民社会。

由于缺乏预见，人们遭到的不幸，比他们想要防止的更为严重。在社会里，自然所建立并为理智所承认的平等，竟被原是为了保障这种平等而签订的一连串的契约所破坏、由于体力不平等而引起的暂时的困难，被一些更为有害、更为持久、更难避免的困难所代替，这些困难是由于契约的签订而引起的财产状况和权势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这样一来，由于一种令人惊讶的畸形发展，少数最愚蠢、最恶劣、最虚弱的人，便把沉重的义务强加给大多数最强壮、最善良和最有教养的人，并剥夺掉后者的天赋的自由。

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平等，引起了种种混乱。这些混乱状态，使得文明国家十分之九的居民发出了合理的抱怨。因为他们的贫困、痛苦、屈辱和受奴役，就是由此产生的。教育的不平等，也是由此产生的。然而，在自私自利的动机的支配下，人们把教育的不平等错误地归结为被夸大了的智力的不平等。

因此，一个真正的社会的各种机构，应当设法严格限制权力的办法是，一切公民都同样地服从由大家所制订的法律；限制财富的办法是，足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但不使任何人有富余。这就是本著中所要论述的平等。

在现阶段，这种平等实际上几乎完全被归结财富的平等。目前，财富几乎被看作是权力的唯一的代价，这无论在指挥别人或是俯首听命的人们的心目中，都是如此。

能动公民和被动公民，反对把财产资格作为选举国民代表的条件[10]，反对国王的否决权，反对特别军事法庭。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开暴露出来的保王分子和那些戴着爱国主义假面具的人；他们建议实行累进税，并且在国王从瓦伦[11]被强行弄回来以后，反对恢复国王的名誉；他们使爱国主义者在马尔斯教场大屠杀[12]以后重新鼓起了行将消失的勇气，并且揭露了贵族们不怀好意地要求成立共和国的阴谋[13]。在第一届立法议会时期，他们还揭穿了企图撵走在军队中服役的爱国者的把戏，拆穿了对奥地利宣战[14]的骗局；他们让人们给夏托维尔[15]的瑞士士兵授奖，揭露了王室的伪装、大臣的罪行、纳尔榜[16]的叛卖行为以及吉伦特党人的鬼祟行径；并且保护了那些权贵富豪们企图通过污蔑和迫害来加以扑灭的神圣之火。

主要是在1792年8月10日以后，上述这些人开始产生种种最美好的希望，并为了确保其崇高事业的胜利而倍加努力。他们把让·雅克的思想贡献跟把这种思想用于一个25,000,000人的社会的这种勇气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平等制度的朋友跟利己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日益趋于明朗和激烈。那种以共和国为幌子、实则按照君主制度来组织国家的管理方案，竟受到公开的支持。那些害怕在政治危机中丧失其种种享受的人们，都赞成这个方案；这些人正是出于当初使他们趋附于保王主义的同样的顾虑，起来指挥这个共和国的头头们① 阴谋复辟帝制。

① 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人确实是忠于君权的，还有一些人则对一切制度都可以同样相适应，只要这些制度能够保持自己的声誉和势力；这些人在国王被交给国民公会审判的时候，都想要保存国王的性命，这点对于确定他们的保王主义的罪状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等派的胜利

平等制度的忠实朋友，在还没有死于贵族的屠刀之前，可谓人多势众；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过上好日子的群众是如此积极；希望爬上旧日显贵的地位，因而伪装成自己所痛恨的平等制度的信徒之辈也拥有相当大的力量。这就使那些利己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受到打击、挫败并不得不销声匿迹。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引起了1793 年 5 月 31 日以前在国民公会中的分歧和紧接着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而出现的内战。

8 月 10 日的胜利，立即使人民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王室被推翻以后不久，全体公民很快就享有政治权利。宣布所有的人都可以被选举担任公职，并庄严地确认：任何宪法如未经人民同意，都不得强加给人民。同时，婚姻也从法律上摆脱了那种使人绝望的、不可解脱的桎梏，这种桎梏往往是既违背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又使道德和自由受到危害。一个民族在保卫革命事业中所发挥的力量的大小，决定于法律究竟是促进平等还是反对平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个被如此不公正地蔑视的劳动阶级，却表现出奇迹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品质。而几乎所有其他的人，一直只是在阻碍社会的复兴。

1793 年 5 月 31 日以前国民公会中的贵族

毫无疑问，利己主义制度即贵族制度[1]，在国民公会中有许多

[1] 贵族制度就是一部分国民对全体国民实行统治的权力，它是利己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

老奸巨猾的支持者。这可以从维尼奥、加代、拉波、布里索、哥尔萨、孔多塞、朗热内、卢韦、巴巴鲁[17]以及其他许多同一类型的人们所发表的居心险恶的演说和作品中得到证明；可以从这些人跟王室所进行的勾结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对一切平等之友进行不断的攻击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对8月10日起义的真正领导人怀着刻骨仇恨这件事情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和纳尔榜、迪穆里埃[18]、屈斯丁[19]等叛国将军的联系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一贯反对建立累进税制①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对交给国民法庭审判的国王所表现的关怀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对民主制的捍卫者所采取的敌对措施中得到证明；可以从他们极力恐吓有钱人和腐化者这件事上得到证明；此外，还可以从他们在整个法国煽起纷争以及千方百计地要想使他们的反人民的原则②合法化这种行径中得到证明。

问题的症结在于要替诞生中的共和国制订宪法；人们普遍感到需要有一个正规的权力机关，并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妥善地分配权力，就足以保障人民所希望的平等与自由。

平等之友反对制订宪法

然而，平等之友当中最有见识的人士，并不赞同上述想法。不

① 累进税制跟比例税制的不同点在于：在实行比例税制的情况下，税额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论收入有多大——始终维持不变；而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情况下，税率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增的。累进税可以约束大产业并照顾小产业。

② 一个民族的自由来自：(1) 由法律赋与公民在其生活条件和享受方面的平等；(2) 他们能够最广泛地行使其政治权利。国民公会的第一届制宪委员会（几乎完全由吉伦特人组成）的方案，完全忽略了前一个条件，并且看来是由于它对第二个条件作了任意的解释，于是便把人民交给有钱人、懒汉和阴谋家去摆布。

管人们怎么说，国民公会中的贵族人士，总是比平等之友更急于制订宪法。平等之友的人数比较少，他们感到，如果不出现某种足以威慑其敌手的事件的话，那就不仅不能够改造社会的内部成份，而且也无法建立一个以政治权利平等为基础的组织。由此可见，贵族人士所表现的那种热心，只不过是他们反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大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为了使寥寥无几的忠诚人士所作的努力能够取得成效，就必须先把策划这个阴谋的主谋[①]除掉。

① 这一派人被称为吉伦特党人，因为他们在立法议会或是在国民公会中的公认的领袖，几乎都是吉伦特郡的代表。

当制宪议会宣布第一个人权宣言的时候，那些被伪科学迷了心窍并被文明的罪恶所腐蚀的人，就对公开地、全部地实现宣言上部分地加以规定的自然正义原则心怀不满。从那时候起，他们就策划如何能够甩开这些原则，但同时又装出拥护这些原则的样子。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派别，这些派别在头三次国民议会上就力图阻挠法国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掀起的运动，力图把革命限制在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发泄他们的感情和最符合于他们的学说的政治体制的框框内。他们给自由事业带来的危害，要比特权等级所采取的公开反对的态度严重得多，因为他们借用爱国主义的词藻来蒙骗人民。

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期，这些派别的思想在这个机构中占了上风，至于那个始终忠于公共事业的党派，如果不是由于它提出坚决的主张而引人注目的话，那将会是默然无闻的。制宪议会的倒行逆施和它的自相矛盾的行径，正是由于前者的思想引起的。

尽管法令规定权利平等，但千百万公民却被剥夺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由于人民的困苦和立法议会的两面三刀的行径而引起的种种抱怨，则用一道血腥的法令来对付。立法议会不顾国民的合理要求和意愿，顽固地把保护宪法的权力交给那个在不久前公开宣布与立法议会为敌的国王，这种作法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扩大了国王的权力。结果使那些反对作出这一决定的公民在马尔斯教场上洒下鲜血。立法议会迫使人民采取暴力手段来伸张正义，而这点本来可以通过一道法令来和平地加以解决的；立法议会侵犯集会的权利，想把国家永远纳入贵族制度的轨道。

对人民群众的真正的蔑视，才促使制宪议会采取上述瞻前顾后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它对王权的打击软弱无力，充其量只想把它削弱，而同时则又想把它变成自己反对民主风潮的壁垒。也正是这个缘故，制宪议会并没有利用人民的高昂情绪和王室的错误来消灭君主制度，或是把该制度钳制在几乎能够使它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框框内。

1793年5月31日的密谋

这次密谋旨在反对混入共和国主要权力机关的大群阴谋家。它是为了保卫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反对给人类带来不幸的骄

这就是人们对拉美特[20]、对拉法叶特[21]、对贵族少数派以及对第三等级的若干知名人物表示怀疑的原因。以上的种种观点，还得到大名鼎鼎的米拉波的支持，这个人由于思想腐化堕落到极点，以至不惜为了白花花的银币而摇身一变成为他不久以前所反对的君主制度的卫道士[22]。

然而，爱慕奢华、渴望黄金、喜欢出人头地和发号施令，这不仅仅是贵族所特有的东西。介乎贵族和广大劳动者阶级之间，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庶民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由于拥有财富、彬彬有礼、善于思考、擅长辞令、豪放不羁和不信神明而出人头地。这个阶级也同样蔑视群众，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是治理民众的，他们自居为民族的精英，他们想取代贵族的地位，并且给贵族的恶劣品质添加了投机取巧和嫉妒这两样东西。

这个阶级很大一部分是由下列人组成：律师、检察官、医师、银行家、富商、富裕市民，还有那些把科学当作可以贩卖的商品和向上爬的手段的文人。由于贪婪、虚荣和不甘寂寞，这个阶级参加了早期的革命运动，并且让由于生活贫困和没有文化而不得不听它指使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这个阶级的人物，在许多场合下都把持了讲坛，掌握了指挥权，他们依靠他们的支持者的票数而钻进了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并在这些机构中形成了吉伦特派的核心。

总的说来，吉伦特派并不想要已经是丑态百出的旧制度。但是他们也同样地反对新制度把事情弄到那种地步，使他们跟被自己称为群氓的人平起平坐，并被剥夺掉那种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有利的特权地位。事实上，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他们及其亲友能够照旧掌握和支配来自权势的财富，法国究竟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是无所谓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应景而发明出来的字眼，其用意是为了保证使人民就范于他们所杜撰并实施的法律。

因此在立法议会时期，他们时而起来反对路易十六的个人利益，时而又起来维护这种利益，这决定于路易十六究竟是打算按照他的旧臣的计划行事，还是愿意遵循这一派人的意见行事。这一派人的头头们在跟国王进行密谈中以及就如何巩固国王的统治而向后者殷勤地献策中所表露出来的私见[23]，不仅有文件为证，而且还有人证。在党内享有盛誉的吉伦特党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毫无顾忌地承认他们忠于君主制度，承认他们想在该制度不复存在的时候重新把它恢复起来。

据我看来，把吉伦特党人当作是自由的真正朋友和真诚的共和派，乃是莫大的错误。如果他们真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诽谤和攻击八月十日的巴黎公社[24]，难道这一天的胜利不是主要应当归功于它吗？他们为什么要在斗争还在

傲和贪婪而举行的。当国民公会里的贵族们发出信号，表示要普遍地驱逐被他们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之友的时候，巴黎人民便对这些背信弃义的代表们施加恐怖压力，并迫使他们把策划这

进行的时刻，就心怀叵测地以恢复秩序为名来向人民的革命热情泼冷水，难道人民的这种热情不值得大力加以支持和发扬吗？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热中于反对9月2日和3日[25]的可怕的、但却是不可减免的行刑，难道决定采取这种行刑不正是明显地为了巩固革命吗？难道这种作法不是自由的死敌的公开和隐蔽的敌对活动、以及当时威胁着法国人民的严重而紧迫的危险所引起的可悲的后果吗？他们为什么要把法庭变为对别人进行疯狂的、污蔑性的攻击的角斗场所，难道那些被他们攻击的人不正是最善于鼓舞人民的斗志吗？他们为什么要恐吓富人、散布不和，并大谈特谈要在法国实行联邦制[26]，难道当时法国不正是需要高度的团结来对付国王们的武装同盟吗？他们为什么甚至在被驱逐出国民公会以后，还要唱对台戏，挑起内战，并设法武装外省来反对巴黎公社，难道这不正主要地是国外敌人所要施加给公社的东西吗？最后，为什么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巩固革命和永远奠定自由、幸福、和平的唯一手段，难道不正是给人民以帮助，满足千千万万受压迫者的内心的愿望，让社会的福泽平等地普施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吗？

祸国殃民的吉伦特派！人们还指控你们图谋恢复王室，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里昂的吉伦特党人，是在一名王党军官指挥之下进行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的，他们吸收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分子以及那些大量涌入这个叛乱城市的分子参加他们的队伍，难道在这些吉伦特党人当中，不是有相当数量的保王分子吗？还有，在那些把土伦出卖给敌人并且当天就在那里建立起王党政府的吉伦特党人当中，不是也有保王分子吗？[27]

吉伦特派的奴颜婢膝的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们所顽固地坚持的一个建议中，那就是要求对路易的宣判必须得到初级会议的批准。他们想把这种作法说成是为了尊重民权，这是枉费心机的，因为这事情所涉及的是司法行为，而跟立法毫不相干。他们一方面要赋予被囚禁的国王以一种崭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吹嘘自己在法国人的心灵中铭刻下一种使共和国奠定其上的对王室的仇恨，这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毫无顾忌地把法国推入足以把自由葬送掉的因循苟且和内部纠纷之中呢？难道对被砸烂的王室采取的这样一种动摇不定、畏缩不前和卑躬屈节的态度，会有助于巩固公民内心中对粉碎革命敌人的暴力和阴谋如此必要的勇气和美德吗？难道靠花言巧语就能够增强骨气吗？难道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把束缚民族的枷锁挣断吗？如果还有人不顾一切地愿意把吉伦特派看作是共和派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承认：这种共和派的行径是荒谬绝伦的，即使他们也要共和制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使人民不堪荷负、使他们很快就对先前的奴役制缅怀不已的共和制。

祸国殃民的吉伦特派！由于受自己虚荣心的作弄，你们既不能成为公开的保王派，

次阴谋的头子们交给人民公审①。国民公会的自由受到侵犯，可是这是为了挽救人民的自由；代表们的权力受到限制，可是这是为了迫使人们尊重人民的最高权力，因为这种权力被大多数代表无耻地变为玩弄的对象。

虽然我们没有掌握足以说明这次密谋的真相的书面材料、口头演说和种种事实，可是只要看一看几乎所有的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 1793 年 5 月 31 日革命，以及在这次密谋以后民主真理得到迅速的传播，就不难猜测到这次密谋的情况了。

法国的民主制是什么

不要以为法国革命家所追求的民主制就是要求实现古人的民主思想。在法国，没有任何人打算号召全体人民去讨论政府的活动。

据法国革命家看来，民主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平等和美德使人民能够卓有成效地行使立法权。

又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共和派。你们用爱国主义和温和的外表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你们竟使那种起初挽救了共和国，继而则给不断瓦解和破坏共和国的人帮了大忙的严酷行为成为迫切需要。你们越是这样做，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祸国殃民的吉伦特派！你们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人为敌，你们把这些不能自卫的人出卖给坏分子，而后者则在热月 9 日杀害了他们。紧接在这个时期之后，你们只不过轻信了报复私仇的建议，便不惜挑起杀害共和派的事件。你们的贵族思想创制了共和三年的宪法[28]，由于这个宪法，我们才领略了主要是由你们一手炮制出来的波拿巴专制制度的滋味。让别人去把吉伦特派的花言巧语捧上天吧！我们是绝不会去歌颂他们的，因为我们坚决认为，他们所起的影响，乃是使革命失败、共和国瓦解和自由毁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① 在 1793 年 5 月 31 日和以后几天。

国民公会中少数忠于平等制度的朋友

我认为，后来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民主派在国民公会中的人数一向是不多的。5月31日起义远远不是让平等制度的忠诚朋友独一无二地赢得最高的威望：那些自私自利、假装维护平等的人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些为了私利而不惜积极地从事破坏的人，在事物必须顺应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造的形势下，却又拼命往他们先前所反对的那个制度里面钻。

在革命舞台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当中，有一些人从一开始起就是为求得法国人民的真正解放的。马拉、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光荣地被列入平等制度维护者的名册。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对制宪议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反人民的制度进行了迎头痛击，他们在8月10日前后领导了爱国者的运动。他们进入国民公会以后，使利己主义那派人惊惶失措，从而成为该派所痛恨和诽谤的对象；他们在审判国王的时期登上了哲理的顶峰；他们还积极地参加了5月31日事件和以后的历次事件①，然而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有利影响，最后却被平等制度的假朋友给败坏了。

---

① 继这些事件之后所出现的明智和大胆的政策，赋与法国以普遍的和英勇的热情，由于这种热情，才使法国得以在短时间内打垮了国内的叛乱分子和为反对自由而联合起来的各国国王的军队。对于这些国内外敌人来说，吉伦特派的贵族的观点和两面三刀的态度，为帮助它们取得肯定的胜利作了准备。

以上便是在国民公会中跟吉伦特派对立的山岳派的一个英勇和坚定的行动。这个时期，在山岳党中既有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也有一些出于个人打算而侈谈平等原则的人。

罗伯斯比尔所宣布的权利宣言

在吉伦特派还没有垮台以前，罗伯斯比尔认为，国民公会在这派人的把持下，是不可能产生好的法律的。他同时还认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人民代表首先应当关心的事情，是消灭威胁着共和国生存的大量的国内外敌人。可是，当他看到吉伦特派正在忙于使他们的贵族原则合法化，他便提出那个充分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的权利宣言，来跟吉伦特派的方案相抗衡。只要接触到在这个文件中以及在罗伯斯比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作的演说中包含的政治思想，体会到他当时所表现出的纯洁的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体会到他的勇敢、谦虚和罕见的无私的品德，就使人不由得对如此崇高的圣哲风范肃然起敬，同时不得不对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并对策划和动手杀害罗伯斯比尔的那伙人的莫名其妙的盲目行动感到悲愤①。

① 这位为平等而牺牲的光荣烈士竟受到那么多的诽谤，以至使每一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到有责任拿起笔来替他昭雪。在这方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便是在这里转录他的权利宣言的草案，因为正是这个杰出的作品，才以无比灿烂的光辉照耀着在这位著名的立法者死后人们向自己提出的、并以如此炽热的感情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目标[29]。使人赞叹不已的是它给财产权所下的定义，也就是这个权利已不再列为基本权利，而退居在保障生存的权利之后了；对财产权作了种种限制；规定累进税制；主张人人参与制订法律；消灭贫困；保证全体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规定反对压迫的权利——对这种权利所作的规定，足以使它百无一失地防止公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和法律本身的滥施暴虐。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
提出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30]

聚会于国民公会的法国人民代表们，认识到跟正义的永恒法律毫无渊源关系的那些人为法律，不过是愚昧无知与反人类之专制制度的罪过；他们深信，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忽略和蔑视乃是世上的罪恶和不幸的唯一原因，因而决定在这个庄严的宣言中阐明这些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便使全体公民能够不断地把政府的行为跟整个

1793年宪法

可是，紧接在5月31日起义之后由当时称为山岳党的那部分国民公会代表所拟定的宪法，并不完全符合人类之友的心意。遗憾的是，在这个宪法里还可以找到陈腐的、令人失望的关于财产权

社会制度的目的进行对比，使自己永远不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欺凌；从而使人民心目中永远保持其自由与幸福的基准，使公职人员的心目中永远保持其义务的尺度，使立法者的心目中永远保持其使命的目标。

因此，国民公会在全世界面前，在不朽的立法者的眼中，宣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如下。

第一条 一切政治组织的目的，都在于维护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和发展人的一切才能。

第二条 人的基本权利是生存权与自由权。

第三条 以上两项权利同等地属于一切人，不论他们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如何。权利平等是自然规定的。社会绝不能侵害这种平等，而只能保障它，防止它被滥用的权力弄得有名无实。

第四条 自由是一种人所共有的按其心愿来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的权力；自由以正义为其规范，以尊重他人权利为其界限，以自然为其原则，以法律为其保障。

第五条 和平集会的权利和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无论在报刊上或是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是人的自由原则的必然产物，其所以有必要宣布这一点，是由于目前还存在着专制制度，或是对这种制度记忆犹新。

第六条 财产权是每个公民随意享受和支配法律为其所保障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

第七条 财产权跟其他一切权利一样，必须以尊重他人的权利为界限。

第八条 这项权利不得危害其他人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

第九条 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交易，实质上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

第十条 社会有责任保障其全体成员的生活，给他们工作，或是给不能工作的人以保障其生活的手段。

第十一条 给予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以不可缺少的帮助，是一切拥有富余生活必需品的人的义务。法律应当规定履行这项义务的办法。

第十二条 凡收入不超过其必要生活费用的公民，免予担负社会支出；至于其他的人，则应根据其财产的多寡，按累进办法负担该项支出。

第十三条 社会应尽一切努力来促进社会理智的进步，并使教育普及于全体公民。

的观点[31]。然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在这里却得到明确的规定和牢固的保障; 普及教育也被置于社会义务之列。这个宪法很容易作有利于人民的修改;关于人民行使最高权力,也在宪法中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这部宪法采用了一种拐弯抹角的表达手法,代表们——平等之友不得不用一块面纱来掩盖自己的长远观点,这究竟是因为针

第十四条 人民是主人;政府由人民创立并属于人民;公职人员是人民的仆从。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更换政府和罢免代表。

第十五条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的、庄严的体现。

第十六条 法律应保护人人平等。

第十七条 法律不可保护有害于社会的事物;法律只能作出有利于社会的规定。

第十八条 任何侵犯人的不可分割的权利的法律,实质上都是非正义和暴虐的。这种法律不再成其为法律。

第十九条 在一切自由国家里,法律首先要保障社会和个人的自由,使其不受管理者的权力的侵犯。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想不到人民是善良的,而官员则是会腐化变质的,那么这种制度是有弊病的。

第二十条 任何一部分人民,都无权行使属于全体人民的权力。然而,他们所表达的意愿,则应作为部分人民的意愿加以尊重。这种意愿应当有助于全民意志的形成。当一部分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在一起集会时,他们应当完全享有自由表达其意志的权利,他们实质上不受任何权力机关的约束,他们完全有权自行管理并作出自己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一切公民都可以担任任何公职。在这方面,除了德与才的限制外,没有其他任何限制;除了人民的信任以外,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第二十二条 一切公民在参与委任人民代表和制订法律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为了使上述权利不至化为泡影,为了使平等不至流为空想,社会应当给公职人员支付薪俸,并且作出安排,使依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公民,能够参加法律要求他们参加的人民会议,而不至于影响其本人和家庭的生活。

第二十四条 每个公民都应当诚心诚意地听命于公职人员和政府代表,只要他们还是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

第二十五条 除了法律规定的场合和方式以外,任何反对一个人的自由、安全和财产的法令,不管是什么人实施的,甚至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都是专断的和无效的。对于法律的尊重,正好排斥了对于这种法令的服从。如果有人企图用暴力来实施这种法令的话,那么就完全可以用实力来回击他。

第二十六条 每一个人都有向社会当权者请愿的权利。对于被吁请的人来说,应

对被吉伦特党人煽动起来的有钱人所抱的敌对态度而作出明智的考虑呢？还是因为国民公会的讨论受到了利己主义者的影响呢？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宣布了人民有讨论法律的权利，规定了人民代表必须服从人民的指示，而且1793年宪法几乎是被一致地通过的[32]，这就使这个宪法① 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法兰西自由的帕拉斯②。

革命政府的由来及其动机

然而，在参加制订这部当时就被爱国人士称为民主宪法的人

当就请愿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而没有权力对请愿进行禁止、限制或谴责。

第二十七条 对压迫进行反抗，来源于人和公民的另一些权利。

第二十八条 对社会组织的一个成员的压迫，就是对整个社会组织的压迫。

对整个社会组织的压迫，也就是对其每一个成员的压迫。

第二十九条 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那么起义对于人民以及每一部分人民来说，乃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必要的义务。

第三十条 当一个公民失去社会保障时，他拥有捍卫自己的一切权利的自然权。

第三十一条 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合法的形式来使反抗屈服于压迫，乃是最巧妙的专制办法。

第三十二条 不应把公职视为荣耀或当作奖赏，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社会义务。

第三十三条 对于人民代表所犯的罪行，应当从严惩治，不容拖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比其他公民享受更多的特权。

第三十四条 人民有权了解其代表的一切活动；人民代表应当向人民如实地报告自己的活动，并恭敬地听从人民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 世界各国人民都是兄弟；不同的民族应当像同一个国家的公民那样尽力互相帮助。

第三十六条 凡是对一个民族进行压迫的人，便是一切民族的公敌。

第三十七条 对于为了阻碍自由的进步和消灭人的权利而向人民宣战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应当把他们视为普通的敌人，而应当把他们当作叛匪和凶杀犯来通缉。

第三十八条 国王、贵族和暴君，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过是一些叛逆的奴隶，他们背叛大地的主人——人类，他们背叛宇宙的立法者——自然。

① 这个宪法见第一号文件。

② 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和战争的女神。——译者

们当中，有一些人感到，仅仅靠这部宪法，并不能够给法国人带来他们所要求的幸福。他们认为，要享受自由，必须先移风易俗。他们懂得，在把最高权力交给人民之前，就必须使人人崇尚美德；必须用无私和谦虚来代替贪婪、虚荣和野心，因为后者在公民之间挑起持久不息的战争；必须消灭由于我们的制度所造成的、存在于人的生活需要和他们爱好独立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同时必须剥夺掉平等制度的真正敌人进行欺诈、恐吓和分裂的手段。他们知道，为实现这种幸福的和伟大的变革所需要的强制的和非常的措施，是跟一种常规的组织所采取的种种方式不相容的；最后，他们还懂得——而且事后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在上述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时候，建立立宪选举制度就等于把权力交给那些无恶不作的人，并永远失去保障公共幸福的机会①。

因此，在八千名人民使者的请求下，他们决定在和平局面还没有实现之前，用这样一种形式的权力来代替1793年宪法，这种权力使得那些开始实现那个伟大事业的人，有可能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同时还使他们避免跟国内的自由之敌进行公开的战争，而是采取一些迅速的和合法的手段来使敌人无能为力。这种形式的权力便称为**革命政府**，它的领导人是救国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几乎向全人类普施再造的恩泽。

---

① 在客观事物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最自由的政治形式只不过对那些能够不事劳动的人们有利。人民群众由于贫困而不得不从事繁重的、无间歇的劳动。因此，他们便无法过问公共事务，无法参加讨论这些事务的会议。同时，人民群众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依附于有钱人，于是这些会议便被有钱人所把持，而那些欺骗成性的政府却巧妙地把这些会议打扮成代表民意的会议。难道可以设想，那些老老实实的人会忘掉自己的利益？如果代表民意就是要求人民贬低自己的话，那又算是什么东西呢？

革命政府的奇迹

凡是真诚的人，都不可能不对那种高深的智慧感到折服。依靠这种智慧，法兰西民族得以进入在平等条件下生活并和平地享受自由宪法的境地。令人赞叹不置的是那样的一种深谋远虑，它使得杰出的立法者能够巧妙地利用失败和胜利的场合，向广大人民灌输无比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教育他们唾弃财富、蔑视安逸、视死如归，并引导他们宣布：人人对土地和工业的产品享有平等的权利。

有谁能够从历史的记载上勾掉这种惊人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许多在不久以前还是醉生梦死、贪心不足、轻率浮躁以及目空一切的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千百种不正当的享受，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多余的东西献上祖国的祭坛，成群结队地向王党军队猛扑，而为此所要求的只是面包、武器和平等。

这些事实，可以从无数的宣言、报告、法令、公共记录以及法国年鉴中得到证明，可以从贵族阶级的心有余悸的状态以及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得到证明。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驳斥那些极力想给法国这段光辉历史抹黑的人的造谣、污蔑和诡辩。像这样一个能够培育起如此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民，将会肩负何等崇高的使命啊！根据那些领导如此伟大而惊人的事业的人们的意见，在法国和全世界将会产生何等明智的制度啊！

从1793年宪法和建立革命政府的法令公布以来，这种政权和立法便日益深入人心。法国人民充满着神圣的、前所未闻的热情；犹如施展魔术一样，无数的军队涌现出来；共和国顿时成为一座规

模庞大的兵工厂；青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都在比赛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敢精神；短时期内，凶恶的敌人被赶出了他们侵占的或由于叛变而奉送给他们的国土。

在国内，叛乱集团被镇压下去；每天都出现了立法措施，其目的在于重新燃起那个人数众多的贫民阶级的希望，在于鼓励美德和重建平等。剩余的物品被用来分配给穷人和供国防的需要。通过征用食品和商品的办法，通过强制举债的办法，通过革命的限价的办法，以及通过善良的公民的极端慷慨的捐献，一百四十万名的军民的生活便得到了保障，而有钱人还指望利用饥饿来压制他们的共和主义的魄力呢！

贮备品仓库的建立，反对投机囤积的法令的颁布，生活必需品归人民所有的原则的宣布，关于消灭乞丐的法令和分配国家救济品的法令的公布，以及当时实际上在法国普遍盛行的公社制度，——这一切都是建立一个新制度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个制度的方案，在救国委员会的著名报告中，而且主要是在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在人民讲坛上发表的那些报告中，已经用不可磨灭的言辞加以描述①。

① 罗伯斯比尔共和二年雨月 18 日报告[33]："我们要求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法律将束缚一切卑鄙和残暴的欲望，唤起一切高尚和善良的意念；在这种制度下，野心将化为争取荣誉和为祖国服务的愿望；在这种制度下，差别只能从平等本身产生；公民将服从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服从人民，而人民则服从正义；在这种制度下，祖国将保证每个人的幸福，而每个人则以自豪的心情分享祖国的昌盛和繁荣；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通过不断地交流共和主义的思想感情，并出于对维护一个伟大民族的声誉的关切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情操；在这种制度下，艺术是使其欣欣向荣的自由的装饰；商业成为社会富裕的源泉，而不再是几家豪门攫取巨利的手段。

"我们要求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私将为道义所取代；功名将为廉洁所取代；惯例将为原则所取代；情面将为义务所取代；时髦的肆虐将为理智的统治所取代；蔑视贫贱将

有利于平等和国民风尚的立法措施

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法兰西共和国革命政府，就必须摆脱革命前那些政治体制所散播的偏见，那些体制在任何时候都给人间带来不幸和罪恶。革命政府在筹建一个分配财富和分担义务的新制度方面所表现的英明，是不可能被正直的人士所忽略的。这些人士不仅看到，把土地按照诺言分配给祖国的保卫者，以及法令规定把应被驱逐出境的革命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乃是民意的体现。他们还看到，没收被判决的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并不是一项充裕国库的措施，而是一个改革家的宏伟的计划。当他们注意到博爱和友善的感情是在怎样的关怀下得到传播，我们的幸福观是如

为蔑视邪恶所取代；傲慢将为自豪所取代；虚荣将为崇高所取代；贪图金钱将为热爱荣誉所取代；酒肉之交将为良师益友所取代；阴谋将为功勋所取代；能说会道将为真才实学所取代；假象将为真实所取代；无聊的行乐将为美好的幸福所取代；大人物的渺小将为普通人的伟大所取代；卑躬、孱弱而又可怜的人民，将为高尚、强大而又幸福的人民所取代。换句话说，君主制的一切弊病和荒唐，将为共和制的种种美德和奇迹所取代。

"一句话，我们要体现自然的意志，要完成人类的事业，要实践哲学所提出的诺言，要使造物摆脱罪恶和暴政的长期统治。但愿法国这个一度以受奴役著称的国家，这个沾辱了迄今存在的一切自由国家的荣誉的国家，能够成为一切民族的楷模，成为对压迫者的威慑，成为被压迫者的慰藉，成为世界的光彩。但愿在用自己的鲜血巩固我们的基业以后，我们至少能够看到普遍幸福的曙光。"

罗伯斯比尔共和二年牧月7日的讲话："共和国的实质并不在于冠冕堂皇的称号，并不在于胜利、财富以及一时的热情，而在于法律的明智，特别是良好的道德，在于统治基础的纯洁和稳定。"

圣茹斯特共和二年风月8日的报告："财富掌握在为数颇众的革命敌人的手里；贫困迫使劳动人民依附于其敌人。当公民的关系达到跟现存的统治制度相矛盾的地步，难道可以想像帝国还能存在吗？那些使革命半途而废的人，只不过替自己挖掘坟墓而已。革命使我们确认这样的原则，那就是任何成为祖国敌人的人，都不能在国内拥有财产。为了挽救我们，还必须进行若干次机智的打击。

"难道说，人民在前线流血牺牲，家家户户为其子弟送葬，就是为了保障暴君们的

何巧妙地获得转变，以及在人们的心中是何等理智地燃起保卫祖国和自由的高贵热情；当他们回想起纯朴而善良的道德是怎样地受到尊重，占有品和剩余品是如何地被取消；当他们回想起声势浩大的人民集会、公共教育的方案、马尔斯教场以及人民的节日；当他们追忆起一种最高的信仰的建立，这种信仰使祖国的法令和神明的训诫融合为一，从而赋予立法者以双倍的力量，赋予他们以短时期内消灭一切迷信和实现平等的种种奇迹的手段；当他们回忆起共和国把对外贸易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砍断了无止境的贪欲的恶根，截断了无穷无尽的人为需要的泉源；当他们考虑到共和国通过征用的办法支配了大部分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而粮食和贸易已经构成了社会管理的两大部门；——当他们想起这一切，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高呼：通过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制度来保证所有人的

享乐吗？

“你们将会承认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有对祖国解放起过促进作用的人，才能够在我们祖国享有权利。

“必须消灭行乞现象，因为这是自由国家的耻辱。爱国者的财产是神圣的；至于阴谋家的财产，则应当分给一切穷人。穷人是大地的生产力；他们完全有权利对蔑视他们的政府发号施令。”

这个讲演的结尾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把那伙叛乱分子消灭掉！巩固自由，替那些被阴谋害死的爱国者报仇！把健康思想和谦虚朴素提上日程！绝不容许国内有一个不幸的人或穷人！只有用这种代价，你们才能够完成真正的革命和建立真正的共和国。”

圣茹斯特风月13日报告：“让欧洲了解：你们不愿意在法国领土上再有一个不幸的人和一个压迫者；这个范例将在大地上开花结果；它将在那里传播对美德和幸福的热爱。在欧洲，幸福是一个新的思想。”

圣茹斯特共和二年风月23日报告：“如果人民崇尚美德和俭朴；如果人们不再厚颜无耻；如果城市恢复了圣洁；如果反革命分子、温和派以及骗子手被消灭；如果对革命敌人实行恐怖，而对爱国者备加爱戴和体贴；如果坐在办公室里的公职人员不求名位而只求做好事，并且只用自己的良心作为见证；如果你们把土地分给一切穷人；如果你们剥夺掉所有坏蛋的土地；那时候我就认为，你们完成了革命”。

幸福和自由，这已是指日可待了！

在维护人民的最高权力上制造恐慌的派别——阿贝尔派

可是，命运却作出另一种决定，从来没有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的平等事业，在一切反社会的思想感情的联合作用之下，重新遭到了挫折。

那些秉着可贵的胆略来从事这项光荣事业的人们，同时还必须反对那些意志薄弱之辈走上邪路，反对最后使他们遭到毒手的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的阴谋诡计。

某些人认为——有的人则是故作此想：在革命政府下，由于一部分公民暂时还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因而这个政府实质上便威胁了民族的自由。后一种人通过诡辩来把许多善良的公民引入歧途而给祖国造成的危害，比他们设置种种圈套来陷害改革的主要领导人而给祖国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不幸的是，那些笃信自由与和平社会制度学说的人们，对于一种必须采取的非常权力的实质，往往很不理解。然而这种权力却可以使一个民族获得完全的自由，尽管这个民族由于过去受奴役而受到腐蚀，而且领教过国内外敌人为了对付它而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所采取的种种敌意行动。

跟前者狼狈为奸、杀害平等之友、野心勃勃的利己主义者派别——丹东派

平等的假朋友——为了伺机满足自己的贪欲才去宣传平等原则的人，当看到一切都要服从于同一个水准、一切都要受道德约束的一天已经来到，不禁仓皇失色。一些人滥用他们在外省和军队中所享有的广泛权力，另一些人想把财富转移到他们想使其变为一个新特权阶级的革命者的手里，还有一些人则被指控为从事罪恶的阴谋活动以换取外国的金钱①。

---

① 阿贝尔和丹东的名字，给两个派别命了名。虽然这两个派别都同样敌视它们曾促其成立的那个革命政府，然而它们无论在所追求的目的上或是在它们的成员的性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阿贝尔派行列里，往往是一些从事劳动的人，他们正直、坦率、勇敢，但不好学，跟政治理论无缘，他们生性爱好自由，热情追求平等并急不可待地要求享受平等。这些人在一个获得巩固的人民共和国里不失为善良的公民，但在共和国建立之前的那段暴风骤雨时期却是拙劣的舵手，他们是不难被人煽惑起来反对革命机构的存在，只要人们把革命机构在他们的心目中描绘为侵犯人民最高权力的罪恶东西。同样地，人们也不难使他们相信，要永远消灭迷信和僧侣势力，就必须驱除一切宗教思想。实际上，为了取得平等制度的明智的朋友所追求的同样结果，这些人宁可采取突击的办法来解决困难，而不愿意对政治危机的有利方面和后果作合情合理的估计。况且，跟前者不同，阿贝尔派对于采取什么机构来取得平等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来走向平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34]。由此可见，不能让这些人对他们所属的那个派别一手制造的惨痛的分裂和不幸负责。像这样严重的责任，应当完全由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来担负。因为后者假借为公众谋福利的名义，向他们散布不公正的怀疑，但是，后者的令人遗憾的盲从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丹东派则没有权利获得这样的免罪符。因为这个派别的主要特点，乃是集虚荣阴险、无耻、欺诈、出卖灵魂和腐化堕落之大成。被这派人奉为领袖的人，公开宣扬一些跟纯洁的道德背道而驰的准则，而当时的法兰西政府正打算把共和国建立在这种纯洁的道德的基础之上。这些人卑躬屈膝地模仿革命前的贵族和特权阶级所特有的那种伤风败俗的行为，他们进行反对旧贵族的斗争，是为了取代后者的地位；他们起来

这一派还曾经阴谋反对那些鼓吹民主制度的人们。他们遭到了失败，并眼看着自己的若干领袖送了命。然而，那些残留下来的人，便一面附和使他们感到威胁的公正的民意，一面讨好那些由于轻信人民的最高权力有丧失之虞而受蒙蔽的爱国者们所支持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他们巧妙地煽起对功名的嫉妒心，然后便把人们对美德所表现的自愿的尊重宣布为专制制度的不可容忍的特征。他们依靠荒谬透顶的污蔑，得以在共和二年热月九日杀害了人民的代表，而法国人民在争取其权利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应当归功于这些代表①。

反对宗教，不是为了使人们摆脱偏见和迷信的束缚，也不是为了铲除专制制度的这个最可怕的帮凶，而是为了使自己从思想上不受法度的约束，从而能够更加自由自在地放纵自己的卑劣情欲，并使正义、纯洁和美德等美好思想从人们的心灵中消灭。丹东派把革命看成是一场赌博，谁更狡猾和奸诈，谁便能获胜。他们怀着怜悯的心情嘲笑那些宣扬无私、美德、平等的言论，他们公然主张，在旧制度下贵族们所享有的一切财富和权势，归根到底要归革命者所有。此外，许多参加他们的行列的人，为了榨取财富和掌握哪怕是虚有其表的权力，甚至不惜采用种种色彩来替一切专制制度涂脂抹粉并卷入到最卑鄙的阴谋中去。

这些派别的头子们处心积虑、图谋不轨，因此革命政府指控他们跟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外国政府配合行动，并不是没有重要根据的。

姑且不论这些头子们有什么样的秘密勾结，但千真万确的是这两个派别都极力在捣乱，它们欢迎热月九日的悲剧事件，并曾促进这些事件的发生。可是，它们两者的出发点却截然不同：丹东派希望摆脱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平等和使他们感到束缚的共和制的严峻；而阿贝尔派则颠三倒四地认为，平等和共和国只有那样才能获得解放和巩固。后者的错误并没有持续很久，他们在幡然悔悟以后，便很快地跟不久前被他们指责的那些人站在一起，并且跟一切正直的人们一样地受到那个卑鄙龌龊的派系的迫害，该派系由于道德极度沦丧而千方百计地跟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同流合污。

① 一些在行使其职权时贪污舞弊、劣迹昭彰的国民公会成员，正是挑起这个令人悲痛的日子的元凶[35]。这些被惩治叛乱分子和政府严明的法规弄得惊惶不安的人，轻而易举地恐吓那些跟他们差不多的人，并用自己的咆哮来重新鼓起平等制度的敌人的信心和胆量。

从自私、嫉妒、虚荣、贵族政治和复仇心理中产生的千百种不同的动机，加深了这一天落在共和国头上的灾难。从人们的荒谬绝伦的指控中，从控告人的自相矛盾中，

美德被称为邪恶和专制

从那时候起，一切都覆灭了。策动那一天的事件的人们，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行，不得不在其指控书的主要条款中，对他们的受害人的原则、行为以及美德进行歪曲。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宣扬民主制的人，跟贵族制度的旧信徒沆瀣一气。提醒人们回想起平等制度的原则和机构的冷落的呼声，被看作是鼓吹无政府状态、掠夺行为和恐怖主义的无耻叫嚣。过去那些理所当然地受到管制的人掌握了权力。为了洗雪自己被贬低的耻辱，他们除了对平等制度

以及从一切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共和主义者罗伯斯比尔的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中，可以识别这些动机。

那些迫害他的家伙们的不可告人的意图，是用施行暴政这种含糊不清的指控来掩盖的。可是，难道可以证明，有这样一个没有财富、没有士兵而只是跟反对暴君的人们交朋友的暴君吗？这个暴君不仅不去卑躬屈膝地奉承众人、迁就众人，反而时常有勇气——不怕引起众人的不满——规劝他们不要接受别人向他们提出的诱人的计划。据说，这就是舆论所指控的暴君……天呀！为了打击，竟然作了判决……由此可见，罗伯斯比尔的暴政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他的卓见的力量和他的美德的影响……他对于坏人来说才是暴君。

无论你们怎样证明他是一个暴君，可是你们这些人在他死后只会懂得，你们是在互相攻讦并给我们带来危害。当一些人指控他杀害丹东的时候，另一些人却指责他企图挽救丹东；一些人在前一天还把他称为法国的伽图，或是把他比拟为开导野蛮人的奥菲士，而现在却提出指控他的法令；人们时而把某些代表在外出视察时所犯的错误推在他的身上，时而又抱怨他对这些代表进行迫害。你们宣称他有数百万的家产，但法国至今仍把他称为**不可腐蚀者**；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人们从他那里搜查出来的东西，卖掉以后总共还不到460个利弗(livre，法国古货币名——译者)。你们断言他缺乏知识和健全的理智，但同时却又宣称他使你们服从于他的统治达15个月之久。你们把他叫作无情的人，而另一些人则指责他延缓了73个被监禁的吉伦特党人的死期[36]。你们还一再说他利欲薰心，但你们一点也没有跟被你们蒙骗的人们谈起，如果不是由于他的果敢的劝告的话，那么那些领导大多数市区和炮兵人员的巴黎行政长官们，就会给你们以罪有应得的教训。好像一群学生起哄反对自己的老师一样，你们在他的灵床旁边大肆辱骂，并让人用尖刀去刺入他的血淋淋的伤口。

的真诚的朋友进行长期的、血腥的迫害以外，还对于那些出于个人私利而鼓吹平等的人，甚至对于那些由于背叛、嫉妒或盲从而积极参加了热月九日反革命事件的人，也进行了同样的迫害。

革命政府变成社会的灾殃

革命政府自从落到利己主义者的手里以后，便成为社会的真正的灾殃。这个政府所进行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和令人心惊胆战的活动，过去只是靠它的领导人的品德和他们的贯穿着彻底民主精神的意图，才成为合法的。如今，这种活动无论从其目的和形式来

一些委员会[37]竟仿效古罗马的最狂热的贵族的榜样，用无与伦比的狂暴情绪鼓动人民起来反对其保卫者，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把这些人民卫士描绘成争权夺利的人，说他们正在阴谋恢复王位，以便自己登基。这些委员会在热月10日竟大言不惭地向国民公会宣称，说什么国民公会的胜利应归功于他们用来迷惑安东区的善良敦厚的居民的那些谎言。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的报告人说道，"就在反革命分子曾经召集过会议的公社办公楼里，发现了一个刻有百合花的新的印记，而这一天晚上有两个人来到坦普尔，以便要求那里的居民们……我应当在这里指出一个足以说明公众情绪的特征：这些秘密使者们想要腐蚀安东区的居民；但是，当人民代表一提到在公社楼房内发现了标志着王权的印记时，共和主义市区便响起了愤怒的呼声。"

罗伯斯比尔想对污蔑他的人进行揭露，可是他的嘴被堵住了；圣茹斯特刚一发言便被人制止，并被投入监狱；库东[38]也由于企图反抗这种不义之举而被捕；勒巴[39]仅仅由于声明自己不愿意分担那个不公正的法令的耻辱而受到了迫害；罗伯斯比尔的弟弟[40]试图保护罗伯斯比尔，也在一道逮捕令下而被捕。第二天，所有这些人都死于非刑；而那位曾经向罗伯斯比尔说过"我与君共饮毒酒"的大卫[41]，在监牢中遭到长时期的折磨，只是由于他的艺术家的声誉，才幸免一死。

你们为了尽可能快地把他们置于死地，便不惜利用公社的不安情绪以及他们出席公社最后几次会议这一机会。姑且把你们布置罗网、陷他们入狱的这种嫌疑撇开不谈，只要看一看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你们的意图又是什么，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你们所做的又是什么；只要看一看，在他们死前那段时间里，幸福在向我们招手，而在他们死了以后，灾祸则接踵而来；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神圣的起义，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坚决的抵抗。

看，只不过是可怕的专制行为而已。这种活动把一切东西都败坏无遗；它重新带来了奢侈之风、轻浮之风和盗窃之风。它挥霍了公共财产，歪曲了革命的原则，把一切真诚地、无私地捍卫革命的人交给革命的敌人去宰割。

这时候，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政党的努力，明显地只是为了维持不平等和建立起贵族制度。在毁灭了人民对建立正义的法律秩序所抱的希望并使他们丧失信心、意志消沉之后，这个党还企图剥夺掉人民最后剩下的一点点权力。

平等之友要求1793年宪法并遭到失败

平等之友在热月9日以前是多么地希望完美无缺地保持革命政府的纯洁性①，而在热月9日以后，他们却同样地希望这个政府

① 为了使人民抛弃一切有关改革的想法，为了使他们不再想享受自己的权利，为了使他们痛恨自己的真诚的朋友，那些新贵族和旧贵族们，首先夸大热月9日以前革命政府进行逮捕和判决的数字，以此来对人民施加影响；他们把革命政府的这些措施说成是对社会一切阶级的毫无例外的威胁；随后他们又把那些仅仅在非常时期所不得不忍痛采取的办法比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极力使人民相信，平等制度只不过是无穷无尽的暴力、屠杀、肉刑、仇恨和报复的行径而已。

其实，只须具有普通的识别能力，就足以识破那个散布这种无稽之谈的党派的狰狞面目。人们只要不带偏见地判断一下，就不会不同意：平等之友是在经过长久的和极端痛苦的忍耐以后，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才决定对他们的怙恶不悛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措施的。

只要承认革命机构是正义的和必要的，那么问题便不在于追究该机构所行使的权力究竟严厉到什么程度，而重要的只是了解这种权力的运用是否跟确立这种权力的目的相符。这种权力应当确立起平等和法律的统治，而它直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为止，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它一方面改造道德和法律精神，另一方面消除在实现这样一种崇高的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出现的重重障碍。

这些障碍包括武装反抗、欺骗、以及层出不穷的叛乱阴谋。这一切都是那伙宁可玩火自焚、而骄横地不向平等低头并不愿抛弃自己的恶习的人所策划的。对于这样的敌人，不是应予惩罚，而是应予消灭。

垮台，以便用贵族阶级曾经蓄谋反对过的那个1793年宪法来代替它。在失去对平等制度的胜利所抱的希望以后，他们希望至少让人民掌握自己的政治权利。

这就是共和三年芽月12日运动和牧月1日巴黎起义〔42〕的动机。这些举事的失败，使自由的敌人倍加疯狂，使那些填满了监狱、

应当记住，从革命一开始起，贵族反对人民政权的阴谋是何等迅速地接连出现；从宣布共和制时起，特别是在5月31日起义以后，在反对派当中出现了如此强烈的、普遍的和富有特征的激动情绪，以致根据这些人的举止、表现和观点，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断定他们是改革的敌人。

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即当社会的危险迫近眉睫时，人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他们原先所畏惧的阶级实行打击。政府以人民的名义来做人民有权利做的事情，而且做得远为有效。事情已经弄到这种地步，即究竟是消灭几个反对派还是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对于这样一个目标应加以考虑的是：它是否正确？诚然，为达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严厉手段是一种令人痛心的义务，但是，由于不能指望采取其他办法来弥合那种受到刺激的骄傲情绪，这种义务就尤其必要。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有许多人的爱好和企求跟其他一切人的福利和权利水火不容，那么希望不通过严厉的手段来使这个民族走向正义和平等，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和自欺欺人的想法。要实行相应的改革而缺乏这种改革所要求的坚忍不拔的意志，那就意味着自己缺乏远见，意味着为了少数人的恶习而牺牲公共的利益，意味着没有勇气。

在古时候，莱喀古士难道因为若干拉栖第梦贵族之死而被安上什么罪名吗？布鲁士斯难道因为判决自己的孩子而受到责难吗？摩西亲自采取一种极其严厉的革命手段来无情镇压一切反对他所建立的制度的成就的人们，难道就为人们所唾弃吗？那些奴役着世界的人们，在强迫人民忍受贫困而弄得民怨沸腾的同时，难道不是对这些备受煎熬的人民的鲜血仍然贪得无厌吗？

革命是长年积累下来的不公正行为的必然结果；革命是对世世代代所犯的罪行进行刹那间的清算。可是，为什么那些害怕革命的人，却不断地引起新的革命的出现呢？为什么那些喜欢夸大被他们称为法国革命的过火行为的人，却不肯自动地放弃自己的种种奢求——这是革命的唯一原因，以预防革命的发生呢？

在大规模逮捕嫌疑犯和简化对那些被控谋叛的人的审判程序的问题上，有不少人大作文章。

在这方面应当看到，在那个时候，叛乱阴谋是从许多有势力、有手腕的人普遍怀有的强烈不满情绪中产生的，他们很容易不露马脚地策划阴谋，因此，社会危险就突然地变得明显起来，而在可能找到针对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物证之前，一场熊熊烈火便会在

并在共和国各地惨遭杀戮的善良公民的数目大为激增。①

巴黎的监狱——为平等而密谋的策源地

追求自由的朋友大量地被关进监狱，而且他们经常被从一个监狱转押到另一个监狱，这就使他们有机会更好地相互结识并进行更密切的联系。当时，巴黎的监狱，特别是普列西和四国这两个监狱，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的策源地。

我打算记述的那个密谋事件的主要人物，都在那里聚会了。共和三年花月，拘禁在普列西监狱的有：比东②、洛让·德·多里麦尔、

全国燃烧起来。在这种一切迹象都表明危险临头的情况下，严厉惩治那些从感情上、习惯上和利益上都跟人民的党派格格不入的人，从而使人民避免内战的可能，这难道不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作法吗？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所有的人，便取决于是否对若干怙恶不悛之徒迅速予以打击，从而使坏人闻风丧胆。也许，只要再采取一个严厉的措施，人类的事业就会在法国取得彻底的、永恒的胜利。

难道还需绞尽脑汁地为维护共和二年热月9日以前的那个革命政府的思想和行动寻找论据吗？不幸的热月9日事件的策划者们已经通过他们带给法国人民的重重灾难而全部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心劳日拙地搬出已经被他们沾污了的人道原则，他们用暴力制止了一次已经接近目标的救世行动，以便开始另一种有利于贵族、王权和不义的行动，这种行动要比前者残忍和可怕一千倍。

① 芽月12日运动，是为了对原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的委员——巴雷尔，比约·瓦伦，科洛·德布瓦以及瓦迪埃[43]等人实行迫害而掀起的，这是出于对这些人在镇压革命敌人的时候所采取的坚决态度的痛恨。人们谴责他们的那些法令，其实所有这些法令都是国民公会在他们的说服之下通过和颁布的。然而，当时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的贵族们，在盛怒之下，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国民公会不顾上述这些人的辩护，不考虑他们曾不幸地参与了热月事件，同时也不敢在巴黎人民面前审判他们，就专断地把他们判处流放。

在牧月里，那些忠于罗伯斯比尔的政治制度的公民们，以及那些为了维护人民最高权力而受到恶意恐吓的人们，都联合在他们过去一致地要求立即实施的1793年宪法周围。

② 本书中凡加着重号的人名，都是我认为还活着的人，因此，没有用他们的真名实姓，而是根据他们的姓名编出来的[44]。

贝特兰(前里昂市长)、封登涅尔、费伊昂、甘纳克、西蒙·杜布雷依,索姆波、克洛德·费盖、马雷萨尔、布恩、莫鲁阿、辛特拉尔、格拉图、拉·提尔姆、维洛尔、哥尔斯坎、里瓦格尔、尤利安、德赞尔姆[43]、莱尔·德·拉·涅特尔、巴贝夫、热尔明、邦纳罗蒂,奥朗日的人民委员会委员们,阿腊斯、坎布雷、安热尔、伦勒、布勒斯特等地革命法庭的成员们,巴黎、南特、涅维尔、木兰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以及全国各省的其他许多民主人士。

从这两个苦难的场所里,一再迸发出使新的专制制度心惊胆战的电花。我确切地知道,共和三年牧月一日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拘禁在普列西的一些公民策划的。在这些人当中,主要有勒布兰——后来是圣多明各执政府的委员——和克罗德·费盖。①

如果把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跟那个作为革命信号而印刷出来

① 1793年宪法和面包——这是当时有理由为自己的权利和生存感到不安的巴黎人民的重整旗鼓的口号。就权利而言,它们所遇到的危险是再也现实不过了。因为当时在国民公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政党,明显地把力量放在取消1793年的宪法上(不久他们就取消了这个宪法)。

至于谈到生活资料,巴黎人从来没有经受过那么严重的饥饿。当时,农村却是一派美好的丰收景象。那么,这种使大批公民遭殃的可怕的饥饿究竟从何而来呢?这是国民公会开倒车的结果,是贵族的奸诈和富人的贪婪所造成的。

长期以来,为了粉碎那些由于贪婪所促成的种种罪恶阴谋,国民公会不得不对食品实行限价,强迫那些囤积粮食的人去供应市场的需要,并且采取严厉措施来使纸币的行市与其票面价值相符。热月九日以后,征用和限价政策立即被废止,纸币则任凭商人们用来进行自由投机买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此猛涨,以致最后弄到只有用硬币才能买到食品;依靠工资生活的群众由于没有硬币,他们即使在市场上食品绰绰有余的情况下,也不能买到任何东西。

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执政者却一再声明粮食供应是有保证的。看来他们许诺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他们要求人民百依百顺而付出的代价。要看一些制度及其创制者的意图好坏,只能从它们所造成的局势来判断。

的法令、起义者的要求以及支持他们的代表们①的政治面目联系起来，那就足以把那个不幸日子的主谋人的保王主义污点给洗刷掉。就连一些爱国作家也对他们进行污蔑，其目的在于保全受到最残酷迫害的平等之友的生命②。这种迫害是如此普遍和疯狂，以致在被投入巴黎监狱的数以千计的公民中，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被指控为其成员的那个党派的胜利，抱着漠不关心甚至是反对的态度。

被囚禁的爱国者的精神状态和日常作业

当时，在这些监狱里呈现出一派动人的新景象。这些被贵族投入监狱的人们，生活简朴、精诚团结，他们为自己的镣铐和困苦感到自豪，这是他们坚贞的爱国精神的结果。他们专心致志于劳动和学习，彼此间所交谈的无非是关于祖国的灾难及其解救的办法。每到黄昏，他们齐声合唱世俗歌曲，歌声响彻云霄，把成群的公民吸引到这个苦难场所的周围，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心而来，有的人则出于跟囚犯有同病相怜之感。

这些经过千锤百炼、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人们，在迫害之下更加斗志昂扬，他们互相间经过长期的、经常的交往，越发巩固了他们共同的感情。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寻找一切办法来重新发动革

① 即古戎、罗姆、苏布兰尼、杜鲁瓦、杜肯努阿、布尔博特、普利耶尔（马恩省）、比沙尔、霍勒斯蒂埃、阿尔毕特等人[46]。前六个人，在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盛怒之下被残害。这些正人君子一再想把自己的权势建立在社会自由的废墟之上，而不惜使人民血流成河。

② 对于这些起义的性质，我们同时代的人是绝对不会弄错的。可是我们的后代没有亲眼见过这些起义，当他们读到有关这些事件的材料时，应当注意到，每当共和派的举事失败的时候，那些爱国作家和爱国人士，总要借助于这种狡计。

命，最后达到自己的坚定不移的目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监狱，便成为共和三年和四年期间出现的民主密谋的摇篮。

共和三年——即 1795 年的宪法

人民的法律，终于被那个装模作样地指定为实施该法律的委员会所扼杀。该委员会于共和三年获月向国民公会提出的宪法草案，成为被囚禁的爱国者们的苦心思索的一个大课题；他们对该宪法的全部条文所进行的讨论，要比先前的任何一次会议都更为成熟。以下是他们在讨论中所形成的意见。

平等之友对该宪法的意见

他们说，如果所提出的那个宪法本身还使人对于该宪法制订者的精神捉摸不定的话，那么在这个宪法前面的那个报告[47]却把人们的疑团完全打消了。这个精神用一句话就可以包罗无遗：贫富现象维持不变。因此，这个作品可以看作是那个利己主义集团的阴谋的最终成果。

除了规定地产是当选国民代表的条件和任何先前未担任低级职务的人不得担任高级职务这两个条款以外，这个委员会的草案被通过了，而且，直到共和八年雾月 18 日[48]为止，它一直是法国人民的根本法。

只要极其粗略地考察一下，就足以相信：贫富现象维持不变的原则，是这个宪法的所有条款的基础。

首先，为了压制人民的一切要求和永远地堵塞有利于人民的种种革新的道路，就剥夺或限制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法律是在没有

人民参加、同时人民也没有可能提出任何批评的情况下制订的。这个宪法永远束缚着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手脚，因为人民是被禁止对宪法进行任何修改的。宪法乐得称人民为主人，然而在宪法里，人民所发表的任何议论都被宣布为图谋不轨。宪法在含含糊糊地提到权利平等以后，便剥夺掉许多公民的公民权，至于担任国家要职的权利，那绝对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最后，为了永远保持这种万恶的不平等现象，亦即保持种种不道德、不公正和压迫现象的根源，这个宪法的制订者对于一切足以启发全民觉悟的机构、足以培养起共和主义青年的机构、足以减轻由于贪婪和野心所引起的种种破坏的机构、足以纠正舆论、提高道德的机构以及足以把人民群众从生活奢侈、野心勃勃的有钱人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机构，都千方百计地从宪法中加以取消①。

这种骇人听闻地破坏公共权利和蔑视人民立法者的基本职责的事实，已经由安东尼尔[49]在他所著的《对公民权的考察》中，由费利克斯·勒佩尔蒂埃[50]在他所著的《共和三年宪法的意见说明》中，向法国人民进行了揭露。

当时的当权人物竟敢违反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庄严意志和背弃他们自己在不久前许下的诺言，② 他们的胆大妄为不是引起

① 由于我们的官老爷们的不可救药的骄傲自大，人们很快就对这个宪法感到遗憾。这个宪法尽管具有严重的缺点，但如果进行若干修正，还是有可能和平等之友达成和解的。可是贵族们所需要的是黄金和显赫的官爵，他们宁可为此而拜倒在一个蛮横无礼和背信弃义的丘八的铁杖之下，而不愿意跟人民一道生活在自由和平等之中；他们利用这个宪法来实现一种君主制的革命统治。

② 共和三年芽月，出现了一道所谓"关于国家安全"的恐怖法令，这个法令把各地为反对政府的反革命行径而提出的抗议谴责为图谋不轨。但为了尽可能快地平息公愤，这个法令同时假惺惺地扬言要把一切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反对1793年宪法的人驱逐出境。国民公会在同年牧月2日曾经答应过要很快地实施该宪法。

人们的惊奇，而是引起人们的愤怒。

1793年宪法遭到无耻的污蔑，至于有关平等的学说，则成为那些不久前还把它称为正义的学说的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他们采取的是形形色色的诡辩手法①。

平等之友的抗议

那些被监禁的民主人士们，给初级会议提出许多抗议，反对国民公会所通过的草案，可是他们的榜样，并没有为当时所有那些自诩为民主派的人士所一致效法。

在牧月事件以后，被投入监狱的除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外，还有一些随遇而安和胆小怕事的人，这些人为了赎取自由而不惜卑

① 为制订1793年宪法的组织法而成立的那个委员会，其唯一关心的事情是废除该宪法，而代之以更符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集团的意图的宪法。

在滔滔不绝地反对人民最神圣的一项权利——人民对支配着他们的生活的法律的批准权——以后，这个委员会的发言人列举了一些据说是委员会所发现的空白点。他声称，1793年宪法对于行政等级制、将军和大使委任办法，以及宣战和议和的权力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还补充说，单从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曾参与制订这个宪法这一点来看，这个宪法法案就应该废除。其实，上面所提到的各点，在该宪法第54、55、69、70、83、107、118和119各款中，都已作了明文规定。

另一方面，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个委员会引证了种种暴力、腐化和恐怖的事例，据它看来，这些事例正是在它所要废除的那个宪法通过的时候才盛行起来的。但是谁会相信，通过这个宪法的四百万人民，竟能够被收买或受到胁迫？难道还有谁不知道，在通过这个宪法的时候，并没有采取那种事后大家认识到是必要的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平等制度的敌人，因此这些人能够自由自在地干预初级会议的工作，甚至公然在会上主张恢复王室！尽管有人为了掩盖真理而施展种种诡计，然而还留下相当多的破绽，使人们在严厉批判之下有朝一日会认识到：法国人民几乎一致地支持5月31日起义，而反对这次起义的，只不过是这次起义根据国民意志而必须把锋芒指向他们的那一些人。长期以来，这种国民意志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军队里都有所表现，一直到人民由于被自己的代表所出卖，由于自己的希望破灭，以及由于自己的忠诚捍卫者遭到监禁和杀害，因而陷入彷徨、颓唐的境地，并且对公共事务不再有任何兴趣的时候为止。

躬屈节地顺从贵族的意志：他们接受了新的宪法。另外有一些人，由于对民主制度的胜利失去信心并把昔日的革命政府看作是莫大的祸害，于是抱着这样一种奢望，即宪法制度的广泛发展可能会带来某种对人民有利的变革，他们把所提出的那个宪法当作防止据他们看来已是迫近眉睫的君主制度复辟的唯一解救办法，他们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和迫害尤其感到害怕，这些人也同样地接受了贵族的法律。但是，他们并不能使那样一些人动摇，这些人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背弃正义事业，牺牲公共权利，而跟平等制度的敌人实行妥协。

关于人民通过共和三年宪法的谎言

国民公会宣布新宪法已经被人民通过。但是，统计票数是在极端混乱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通过这种办法并其他一些假公济私的手段，在场的投票人非常之少，许多公民从会场中被赶走。于是，只有那些以利己主义著称和一再被指控为阴谋复辟王权的人，才兴高采烈地通过了那个宪法。

不要忘记，利己主义者可分为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两类，这种划分是非常现实的。后一种人直到共和二年热月 9 日为止，几乎一直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平等之友走；因此招致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当时自称为爱国者的那些国民公会成员，几乎完全属于这类人。

清洗国民公会的成员

仇视革命的情绪迟到这样的地步：原先只对革命的大公无私

的朋友进行清洗，最后就连挑动这场清洗的那些人本身，那些新近所犯下的罪行并不能使人忘却其昔日的虚有其表的善行的人，也都不能幸免。要知道那些正人君子，那些出身好的人，那些善良敦厚的市民，是不齿于跟剥夺贵族的旧恐怖分子坐在一起的。

所有那些被指控为采取恐怖手段或是纵容这种手段的国民公会成员，在革命敌人的盛怒之下，一律成为牺牲品。如果说有个别人例外的话，那就是那些一贯维护贵人的特权并反对被他们称为无赖汉的穷人们的非份之求的人。

革命的敌人的希望

看来，新宪法的付诸实施和新立法议会的建立，使革命的敌人心中燃起了参政的希望，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帝制卷土重来。每当最高权力离开了平等的道路，而在利己主义——一切专制制度的原因和后果——的歧途上徘徊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希望便油然而生。

用更换三分之一代表的办法来束缚人民

为了巩固新宪法的精神，这个宪法的制订者想出了每年只更换立法议会的三分之一的代表的办法，并通过选举机关把国民公会三分之二的代表① 弄进第一届立法议会。

这种由某些有罪的立法者因为瞻前顾后、惊惶不安而授意采

① 凡是仍然忠于1793年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的那些代表，都已经通过逮捕和处决的办法被清洗出国民公会。

取的措施，这种旨在于把人民永远束缚起来的措施，特别迎合国民公会代表的心意。

在国民公会代表中，那些醉心于权力的人，那些由于滥用职权而担心被追究的人，那些害怕平等的人和那些一想起民主原则就吓得心惊胆战的人，都巴不得赶紧采纳这项措施①。在国民公会中，那些既为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不齿、又为保皇党人所痛恨的假平等之友，成为这种更换代表的办法的最热烈的支持者。

他们采取一种惯用的伎俩，也就是把那些反抗他们的、而在当时情况下恰好也是经常地反对人民制度的人，指控为阴谋复辟帝制。

那种唯恐会促使保王党人成功的担心，那些贪婪之徒的私利，以及平等制度的真诚朋友不得不在两个同样罪恶的政党之间进行必要的选择，这一切都对舆论起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结果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尽管这些票数跟居民的人数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统计上是极其混乱的，但却被国民公会的不法之徒作为借口，使其更换代表的法令在法律上生效。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把这种法令提交人民核准，实鉴于民情沸腾之故。

平等之友保护国民公会的不法成员

这个法令的公布引起了骚动、混乱，终于导致了共和四年葡月

① 这项措施受到在拟定共和三年宪法时起主导作用的那种贵族精神的支配，这个措施的制订者，想利用它来把旧保王党人和真正的平等之友从新的立法议会中撵出去，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受自己的希望的欺骗，由于时而害怕君主制度，时而害怕人民，他们在互相矛盾的动机推动下一再扼杀国民代表制。共和八年雾月18日，在痛恨平等制度的情绪的推动下，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对国民代表制进行了最后一次打击。

13日[51]巴黎市区的武装暴乱。在那一天，国民公会的大多数成员，如果不是由于那些不久之前被他们出卖给穷凶极恶的自由敌人的人们的英勇牺牲的话，就势必丧命无疑。出于对面临被彻底奴役的祖国的热爱，同时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这种一触即发的冲突会给他们所珍视的事业创造一种有利的局面，一小群共和主义者下定决心跟人数众多的市区军队作斗争，从而保护了他们不久以前的敌人。

有人认为，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是由于跟一班无耻之徒为伍而使革命变了质，他们只要宣布自己反对那些人，就势必会跟民主派靠拢，并且不得不迁就民主派的要求。

这样一种想法促使那些最坚定的和最有见识的人拿起武器来，一些立志复仇和希望重新夺权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跟国民公会代表一样受到威胁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这种联合中组成了一个称为1789年爱国者营队的武装团体①。

这个团体的命名是非常独特的。它表明，在共和二年热月9日以后，社会舆论是何等不济；它还表明国民公会代表的极端堕落。这些代表们几乎不敢把自己称为共和派，他们向平等之友求

① 人们对于在1789年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几乎一致的团结大吹大擂。据我看来，把这种团结现象誉为公共美德的那些人，对这次革命的性质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想象得到，有那么几个野心勃勃的阶层，它们骑在人民头上，极力想攀上最高一层阶梯。可是盘踞在这个阶梯顶头的贵族阶层，堵住它们的一切通路。因此，它们所有的人都必然对最初几次革命运动所指向的推翻贵族阶层表示欢迎。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什么美德，而是那些居于贵族和人民之间的阶层，出于嫉妒而不甘寂寞，从而造成一种表面上的团结。此外，由于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把劳动者阶级几乎看得一钱不值，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1789年的著名的爱国人士几乎无所例外地对一切为非作歹的现象——除了世袭贵族所干的以外——抱着宽容的态度。

助，但同时又唯恐招致跟后者实行妥协之嫌。①

国民公会代表的新的叛变行为

在葡月13日战斗以后，那些基于对平等的热爱才赢得胜利的人们，催促葡月13日的头头们履行他们的关于恢复人民的权利的诺言。但这是徒然之举。当这些头头们建议采取一种极端慎重的办法的时候，从他们的语气中就完全可以看清楚，那种仅仅出于畏惧才承担下来的义务，是没有指望得到履行的。

正当国民公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在寻找借口来摆脱平等之友的要求时，那些还被囚禁的代表们，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动他们的获得自由的伙伴们利用胜利果实来为民主服务。

他们说：目前正是好人当权，而那些心有余悸的议员们又是多亏这些好人才得以保全生命；如果错过眼前这个时机，那么鲜血就会白流。他们希望断然地要求国民公会废除最近的选举，取消新宪法，并立即实现1793年宪法。

人们已经打算要求废除选举[52]，那个经过大家签署的请愿书本来是可以提出来的，可是那些参加热月政变的代表们跟那些被5月31日国民裁判吓得心惊胆战的人勾结起来，在签署该请愿书的大多数人当中制造分裂，因为他们害怕人民法律甚于害怕王权。请愿书因此没有被提出来。

由于巴拉斯[53]的报告揭发了叛乱者的庞大计划，这个叛乱计

① 在头几响枪声刚一传出来的时候，政府的委员会便建议国民公会解除为保卫后者而拿起武器的共和主义者的武装，并把他们重新投入监狱。

划甚至在国民公会中也有其同谋者，于是便建立救国委员会。对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所作的种种揣测曾经一度点燃共和主义者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消失了。人们满以为那个委员会准备建议废除最近的选举；但是，不知道是由于对这个委员会估计过高，还是由于这个委员会在蒂博多[54]的尖刻批评下变得缩手缩脚，它仅仅提出一些无济于事的治标方案。共和三年宪法随即被国民公会代表付诸实施，这些代表们重新煽起对平等的仇恨，把平等称为恐怖和无政府状态。

爱国者恢复自由

从葡月 13 日战斗到雾月 4 日大赦[55]这段期间，仍然囚禁在监狱中的那些爱国人士全都被释放。他们之所以获得自由，并不是由于人民事业获得胜利，而是由于他们的敌人的懦弱政策：他们从那些使他们体会到人民的一切深重苦难的监狱中出来以后，便成为刚刚给他们打开镣铐的卖国贼的威胁。

他们的错误

在这个时期，一些坚定不移的平等之友，深为那种甚至渗到大批革命者的观点中去的腐化堕落的东西感到不安，因为这些东西使民主学说有永远被遗忘的危险。总的说来，大多数的爱国者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行动的，他们因葡月的胜利而沾沾自喜。他们把巴拉斯和卡尔诺[56]进入督政府引

为革命的幸事，他们用一种企求名位和恩赐的思想来使自己安于长年的不幸。似乎可以说，他们忘记了自己曾为之奋斗的那个事业，他们无动于衷地看着人民的权利被夺走，他们把拯救祖国归结为减轻自己的痛苦。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这种观点。如果说，我们所讲的这种人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新宪法的改革必须待以时日，并在必须筹备这种改革的幌子下巧妙地占据社会公职；那么，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为新政府的巩固与共和主义热情的逐渐消失而使专制原则得到加强深感不安，因而认为真正的平等之友有责任敲起警钟并引导人民去恢复自己的权利。

他 们 的 分 裂

共和派内部的这种意见分歧引起了如下的结果：那些为了个人的好处而经常放弃正义原则的人，获得1789年爱国者的称号；而那些在保卫民主的事业中表现坚定不移的人，便称为平等派。

平等派的最初几次会议

在爱国人士特别是平等派获得释放以后，基于对自由的命运的担心，他们力求联合起来，争取步调一致，以便建立起一道强大的堤坝来堵塞新的专制制度的发展。他们经常在咖啡馆、公园和广场聚会。但是，由于在那些地方所讨论的一切，都必须在极端谨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那种对局势所进行的泛泛的讨论，并不能

很快地给共同事业带来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效果。

在共和四年雾月初，巴贝夫①、达尔蒂、洛让·德·杜瓦梅尔

① 格拉古·巴贝夫于1762年[57]生于埃纳省圣康坦。他富于同情心，很有教养，十分勤勉，他有一个敏于观察和明辨是非的头脑，他写的东西条理清晰，热情洋溢，富有说服力。

在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巴贝夫正处于青年时代。年轻的巴贝夫好学不倦，生活简朴，他痛恨专制制度，探索如何能使不幸的同胞摆脱压迫的途径。从早年起，他就感到有必要献身于社会自由的事业。

在革命初期，巴贝夫毫无顾忌地写文章抨击封建制度和税收制度，因而招致迫害，那道逮捕他的法令，只是在马拉的强烈呼吁之下才没有生效。不久，他被聘请到一个区的行政机关当秘书，在那里，他不断发表同情人民的演说和文章，因而树立了大量的敌人。后者利用自己相当大的势力来对他进行迫害，指控他伪造公文。然而，对他的判决被国民公会撤销了，国民公会庄严地宣称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随后，巴贝夫在巴黎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英勇的共和人士。

在热月9日的不幸事件以后，巴贝夫曾经有一个时期对纵容革命敌人的作法表示欢迎。但是，他的这种错误并没有持续多久，凡是以格拉古兄弟作为自己的榜样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到，再也没有人比热月政变以后的统治者更不像这一对杰出的罗马人了。比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更为主要的是，巴贝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主张把权利还给人民，撕下那些使他受骗的人们的假面具，并且如此奋不顾身地投入争取民主的事业，以致那些统治着共和国的贵族们毫不犹豫地把他投入监狱。

他起初被关在普列西监狱，后来转押到阿腊斯监狱。正是在阿腊斯监狱里，他结识了纳尔榜的骠骑兵队长热尔明（本书中还要经常提到这个人）和加来海峡省的许多共和人士[58]。巴贝夫在这些人当中孜孜不倦地宣传人民的制度，他激发起他们对新的暴君的仇恨，向他们灌输了在财产所有权方面进行一次大革命的思想，使他们决心去建立一个平民的旺代[59]，以便用强力夺回那些看来已经不可能依靠请愿来得到的东西。

在共和三年牧月起义以后，巴贝夫回到普列西监狱。从那时候起，他便专心致志地草拟自己的方案，他经常跟拘禁在狱中的几位公民交谈，这有助于他把这些方案考虑成熟。在那里，他结识了德邦（遗憾的是，我不能道出他的真实姓名），后者毕生致力于探求社会灾难的原因，并且比任何人都更透彻地掌握罗伯斯比尔的观点。

以后我们将会讲到，巴贝夫的思想是怎样地发展起来的，他在那个跟他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密谋中起了何等重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的非凡人物，是正义事业的坚贞的朋友，他毫不利己，一贫如洗；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丈夫，而且是一个和蔼的父亲，因而为全家所爱戴。他当着审判官的面攻击那些要他的脑袋的强权人物，他把贵族阶级为他安排的死亡视为光荣，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愈益衬托出这位平等制度的不朽烈士的光辉品格和爱国主义业绩。

和封登涅尔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使四分五裂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的领导中心，以便为了共同事业而采取一致的行动。在为此而举行的各次会议上，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一些人希望，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都应当加入一个像共济会那种类型的组织，按组织领导人的命令行事；另一些人则坚决主张由大家签署一道法令，立即成立起义委员会。由于在这些会议上，人们的观点既不一致，又缺乏为取得有效的结果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相互信任，以致无法达成协议，所以很快就停止举行这种会议了。

然而，人们并没有放弃联合爱国者和推翻专制制度这两个提案，因为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坚定不移的要求。所以，不久以后，人们又企图为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制度而聚会。第一次会议在布恩家里举行，在与会者当中有达尔蒂①、热尔明、邦纳罗蒂、

① 奥古斯丹—亚历山大·达尔蒂生于加来海峡省的圣保罗。他是一位博学、正直、勇敢、刚强、活跃和坚毅的人。他善于讲明事理，善于以自己的观点来感染周围的人。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巴黎攻读法律。当他一看到革命的光芒，便以一个奋不顾身地捍卫真理的人所固有的热忱投入了革命。

1789年，在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达尔蒂参加了解救法兰西近卫军战士的工作，并在战斗中受伤而成了终身残废。另外他还参加了围困文新炮台的战役。后来，他任本省的督政府成员，并以这种身份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共和国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从而获得卫国有功的特令嘉奖。随后，他被擢升为阿腊斯和康布雷两地的革命法庭的公诉人，当时这条边界得以保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两个革命法庭的严厉。达尔蒂在这里表现出自己是共和国的一位廉洁的官吏和无畏的战士。

他也没有能够幸免在热月所掀起的迫害，这种迫害使他陷于一种光荣的赤贫境地。达尔蒂很早就具有罗伯斯比尔的信念，并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罗伯斯比尔对于他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因此，平等制度的敌人对达尔蒂恨之入骨。

达尔蒂把他的渊博的学识和渴望真正的正义的热情跟一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和一颗富于同情的心结合起来。在旺多姆最高法庭受审的时候，他坚决不承认该法庭并拒绝为自己辩护。他被宣判死刑，为祖国尽忠到最后停止呼吸为止。[61]

马雷萨尔、封登涅尔、里皮、洛让·德·杜瓦美尔·贝特兰①、提斯米奥、辛特拉尔、沙佩尔[60]、吕索里隆、拉贡搏、勒夫、茹拉仁诺、布恩和索姆波。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聚会，由于一连串的不幸而几乎熄灭的希望又一次在人们心中燃起；人们立誓要继续团结一致，促进平等制度的胜利。

这次集会把注意力放在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巴黎各市区内建立若干个组织，是否要比仅仅有一个组织更为有利。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决定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有更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来解决。这个会议被安排在一个警察监视比较松的地方举行，它是在原来圣热涅维埃修道院的花园里一所不大的房子里举行的。

① 贝特兰原籍里昂，在1793年5月29日叛乱爆发以前，以及在里昂公社根据共和国法律被恢复以后，任该公社的社长。

贝特兰曾为革命献出大笔财产。他为人正直、忠厚老实、慷慨大方，并且既富有胆略又对人和蔼可亲。他生活俭朴，一望而知为心地纯洁的人。

里昂的富人们曾经为贝特兰安排了跟他的朋友沙利叶[62]一样的命运，可是他们却枉费心机：人民以高声痛哭和祝福来回答贝特兰的呼吁，因为他使他们回忆起他所作的牺牲和他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所作的贡献，因此，那些本来要把他处死的法官们，不得不一再延期宣判，并把他送回狱中。在公社长期被围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就在热月9日这一天，发布了逮捕贝特兰和其他许多里昂民主人士和把他们押赴巴黎的命令。然而，他们的清白和坚定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他们在共和四年葡月13日以后立即获释。

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和热爱自由的贝特兰，这位平等制度的坚定的捍卫者，这位平易近人和廉洁的清官，这位赤子和良友，在格雷涅尔营大屠杀[63]以后被坦普尔军事委员会所杀害。他是正在睡觉的时候被押赴刑场的。

这位善良而正直的公民，是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并且是在远离格雷涅尔营的地方被捕的。如果不是督政府事先急忙通知委员会要把他处死的话，那么根据报告人所作的结论，它充其量不过应判徒刑或流放。发萨克·拉·图尔将军由于看到贝特兰及其难友的上诉书中的证明材料，曾暂缓执行他们的死刑判决。但是当他向督政府请示以后，便立即收到按原判执行的命令。这些人被无辜处决……几个月以后，上诉法庭便撤销了对他们全体的判决。

新政府的意图

正当民主派的残存者设法联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根据共和三年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不断地为他从成立时起就一贯遵循的那种政治制度奠定基础。国民公会那一派人利用了不幸的热月 9 日事件，在牧月突然袭击民主派，而在葡月又借民主派之力取得胜利，他们的意图完全为组成督政府的那些人所接受。这种意图可归结为：保全并占有财富和权力；一方面压制保王党人和高官显贵，另一方面压制平等之友。

从督政府五巨头就位时起，他们便极力让原先的保王派跟民主派发生冲突，以便每当其中一派占上风并成为对它威胁时，得以假另一派之手把它打下去。

政府赞成爱国人士的集会

当爱国人士试图组成社团的时候，政府表现出一副赞成他们的想法的样子。政府感到还有威慑葡月暴乱者的必要，并希望通过恐吓手段来迫使有钱人赞助采取整顿共和国的混乱不堪的财政状况的措施，因此，便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去鼓励爱国人士召开会议。然而当爱国人士一表现出希望恢复民主原则的意图时，政府便十分坚决地阻止他们继续举行会议。

爱国人士和人民的情绪

这个骗局并没有逃过爱国者的锐利眼光，他们看到，在葡月13

日事件中流的鲜血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们确信，从新政府那里得不到任何真正有用的东西。

民主派的人数是不多的，而那群意志薄弱的爱国者仍然惊魂未定，他们在一次新的迫害行动刚有一点点露头的时候，就准备再次退缩。

至于巴黎人民，由于希望的破灭并且受了保王党人和外国人的造谣污蔑和阴谋诡计的迷惑，他们抛弃了民主派，在浑浑噩噩中消沉下去。一部分人甚至责怪革命使他们遭受无穷无尽的苦难。

平等派的慎重态度

在圣热涅维埃夫礼拜堂花园中集会的那些公民们感到，由于政府惯用两面手法，因而有人凭一时热情而敢于过早地对这个篡夺民权的政权进行正面攻击，那是危险的。他们说，首先必须改变许多爱国人士的观点，使他们重新赢得民心，让人民像过去那样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而在人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打击和消灭政府以前，还必须利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甚至依靠政府的保护。依据这些原则，人们决定建立新的协会。鉴于有必要维护和统一这个协会的宗旨，于是不得不拒绝关于把这个协会分为若干个分会的建议。尽管那种作法更便于摆脱警察的监视，但它却有容易背离组织计划，并使这些分会沦为阴谋家和共和国敌人的手中玩物之弊。

这个独一无二的协会准备只吸收那些无可指责的人参加，并且亲切地教育他们具有该协会的奠基人所采取的那种慎重态度。

先贤祠协会的建立

协会立即在圣热涅维埃夫修道院的原来的饭厅里成立。这个饭厅的使用权是由当时租赁了这个修道院的部分场地的爱国人士卡尔迪诺免费提供的。当这个饭厅后来改为供其他性质的集会使用时，协会便搬到该修道院的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里。在那里，惨淡的烛光，嘈杂的人声，以及人们的不舒服的姿态——他们或是站着，或是席地而坐——都提醒与会者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与艰险，以及所需要的勇气和警惕。由于这个地方距离先贤祠很近，于是协会便以该祠命名。在协会成立以后，许多爱国者由于得到邀请或是在这个组织的吸引下纷纷参加进来。跟这些人一道入会的，还有一些卑躬地效忠于政府成员的人，他们把自由之友的全部义务归结为支持现政权进行反对保王党人的斗争。

协会的组织情况

协会首先着手进行自己的组织工作。但是，由于大多数会员过分谨慎和软弱，以致开展这项工作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他们担心这个协会在某些方面跟以往的社团有雷同之处，并且过高地估计了新宪法在集会权方面所设置的障碍。在他们看来，拥有章程、主席、秘书、会议记录、以及按照一定的手续吸收会员，这一套跟雅各宾派太相像了，这会招致新的迫害。

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协会通过了一个章程。这个章程规

定不要名单和会议记录，规定吸收会员的唯一条件是，两名会员作介绍。这就使得几乎无法履行任何手续，从而为许多可疑的人钻进协会大开方便之门，这些人往往歪曲协会的宗旨，在协会内部挑起危险的争论。主席的职务由一个讲演人担任，秘书的责任则由助讲人担任。协会的必要开支依靠会员的自愿捐助。

先贤祠协会会员的意见分歧

不久，先贤祠协会便有会员二千余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和协会采用那样一个章程的情况下，要把所有不配留在平等派队伍中的人开除出去，是不够慎重的，而且也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许多犯有某种错误的爱国人士，特别是那些试图通过攫取社会公职来恢复民主制的人们，是难免要被接受入会的。

这个协会中存在着不同成份的人物，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平等派的表现是热情地启发人民并唤起人们对平等原则的尊重；1789年的爱国者则为了自己的安逸和利益而力图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这两派各有占上风的时候，这使得协会不得不采取相互矛盾的步骤。

后一种人经常怂恿协会去替他们所亲近的公民谋取一官半职；前一种人则一再向协会刻划出舆论的堕落以及自由的敌人力图用错误观点来迷惑人民的图景，他们向协会指出，平等制度的胜利就是协会真正要达到的唯一目标，他们提议采取适当措施，重新鼓起大多数人行将消失的勇气，重新激发起他们曾借以一再战胜各种各样专制制度的神圣热情。

协会跟人民的联系

协会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具体工作程序和与人民联系的方便的方法。那几篇题为《1789年爱国者告诉人民的真理》的公告，很快就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国家大事上来，但同时并没有对统治者进行直接攻击，因为那样做将招致他们的报复，因而是不明智的。这些文告的效果首先表现在把大量的劳动者吸收到这个新的协会里来。这些重新抱着希望的劳动者满腔热忱地到处传播他们在这个协会中所听到的许多真理①。

人民法令

这个协会的组织者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尽快地减轻人民的痛苦，以此博得人民的信任，以便随后能够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恢复人民的权利。因此，委员会建议争取实现两个法令：一个是答应从国家财产中拨出10亿巨款分赠给祖国的保卫者的法令；另一个是在共和二年已经颁布过的消灭赤贫的法令。由于反革命思想的作祟，这两个法令的内容已被人遗忘了。

对巴贝夫的迫害

正当先贤祠协会在稳步地重新确立民主的原则，其他秉着同

① 参看所附第二号文件，这是上述公告中的一篇，其中叙述了热月9日以后法兰西共和国的情况，并且反映了平等派在先贤祠协会中所必须采取的谨慎态度。

一宗旨的协会也纷纷在巴黎的许多地点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贵族阶级的作家们便发出警告，要反对所谓恐怖分子的新阴谋。这时候，巴贝夫勇敢地在他创办的《人民护民官报》上揭露了共和国的统治人物的种种罪行，指出1793年宪法的好处和合法性，同时毫不犹豫地宣布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这种勇气招来了对他的新的迫害。幸亏他在几个民主人士那里找到了躲藏的地方，才避免了这场迫害①。

设在阿马尔[64]家里的委员会

当时，在克累里街阿马尔的家里也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其目的是要策划一次反对那个日益加紧使用铁腕来压制法国人民的专制制度的暴动。最早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阿马尔、达尔蒂、邦纳罗蒂、马雷萨尔、热尔明等人，随后比东、舒安、菲力浦·勒·雷克塞尔、克利曼[66]和马尔桑[67]等人也相继加入。

由于深深地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自由之友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对付那令人深恶痛绝的压迫人民的枷锁。深明大义的民主派认为，对他们来说，参加这项工作是义不容辞的。

委员会对共和三年政府的看法

在阿尔马家里聚会的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那个根据共

① 巴贝夫在当时得以获得自由，还应当感谢市场的几个搬运工人。一个法院差役曾到安诺莱郊区路29号巴贝夫的家里，以他发表蛊惑人心的文章为由而向他提出传票。巴贝夫在跟他展开长时间的斗争后伺机逃脱。法院差役尾追不舍，并且大叫"捉贼！"市场的搬运工人曾两次逮住巴贝夫，但每次一听到这位捍卫人民权利的作家的名字，就马上把他放掉。迪第埃[65]和达尔蒂把他隐藏在原来的圣母升天堂里。

和三年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就其来源来说是非法的，就其精神来说是欺压人民的，就其意图来说是专制的。他们一致认为，要拯救共和国和自由，就非把它消灭掉不可。

然而，在研究消灭它的办法之前，不仅要让每个人深信该事业的正义性，而且还应该对用以取代那个他们所要消灭的制度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人们衷心地希望人民能够得到幸福，并且感到如果凭感情冲动而冒然行事的话，那将会违背人民的真正利益，因为它可能在现有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导致新的专制制度的建立，导致新的特权的出现，并有利于新的野心的滋长。

委员会首先是一个政治学校，在那里，人们在探索了使各国人民遭受灾难的原因以后，就可以精确地制定出最适合于使他们摆脱这种灾难并防止其重演的社会组织原则。

私有制——奴役制的根源

大家认为，人民从未达到为享受其政治权利所必要的教育水平和自立程度，而政治权利对他们的自由、自卫与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就连最明智的民族也拥有奴隶，而奴隶则不断地使这些民族陷于危险之中；而且，除了秘鲁人、巴拉圭人以及若干很少有人知道的部族以外，人类社会还从来没有从自己内部消除那部分被财富观念弄得愤愤不平和十分不幸的人，这些人被剥夺掉财富，并且时刻想到其他的人占有着财富。在所有地方，人民大众都在专制制度或特权阶层的鞭子下忍辱偷生。那末，接着再看一看法国人民，可以看到他们也在勾心斗角的个人主义者要弄

阴谋以及财主们和暴发户狼狈为奸的情况下备受奴役。

至于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原因，大家认为是财产和条件的不平等，归根到底，是私有制，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所有制，才使那些最狡猾和最走运的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能够不断地盘剥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繁重的劳动；他们营养不良、衣着褴褛、居住条件恶劣；他们得不到任何享受，却眼看着别人有着无穷尽的享受；贫困、愚昧、嫉妒和绝望侵蚀掉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力量；他们只能把社会看作敌人，他们被剥夺掉一切，直到被剥夺掉拥有祖国这种可能。

法国革命的历史可以作为该委员会的这种见解的论证。这个委员会看到，在这次革命中，那个原先富有的阶级，还有那个在革命中发财致富的阶级，是怎样千方百计地试图保证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它还看到，在这次革命中，企求名位是怎样地跟仇视劳动和渴望财富结下不解之缘的；人民对公民权利的忠诚信念，是怎样随着那些有利于平等的制度遭受打击和整个贵族政治的影响而渐趋淡薄的。贵族政治在于使劳动者阶级陷于贫困、使它分裂、使它产生厌世之感、对它进行恐吓和压制，同时把它的要求说成是社会堕落的最起作用的原因。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说，使各国人民遭受奴役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完全在于不平等，而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于那些被我们的文明降低人格的许许多多的人来说，行使他们的权利就几乎是一种幻想。

由此可见，消灭这种不平等，乃是一个有德行的立法者的任务——这也就是从委员会的见解中引申出来的原则。怎样才能实现

这一原则呢？这个问题便成为新的探讨对象。

阿马尔看到国民公会曾经采取对商品实行限价、征收革命捐税、征用富人物资等办法解决了祖国的急需，便宣扬说，那种作法能够把堆得满山满谷的剩余物资征收来分配给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们。另一些人则分别提出了分配土地、颁布反奢侈法以及实行累进税制的建议。

土地法和反奢侈法的缺陷

比东、达尔蒂、菲力浦·勒·雷克塞尔和邦纳罗蒂指出，立法者为了想减轻不平等所引起的破坏作用，便求助于分配土地和反奢侈法，这样一来，便把工作和财富的分配放在贪婪和竞争的支配之下。这不啻是为了阻挡洪峰而只修建一些摇摇欲坠的堤坝，这些堤坝经常被贪婪和傲慢行动的浪涛冲塌。对于这种行动的体现者来说，保持财产权就能够始终为他们提供数以千计的手段来逾越一切障碍。

他们说，采取征用、限价和革命捐税的办法，对于解决一时的急需和挫败富人的阴谋是有效的。然而，如果要把它们变成社会日常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势必危害社会的生存：这不仅是因为采取上述措施不可能不使生活必需品有被剥夺之虞，而且会使再生产的源泉有严重的和不可挽救的枯竭之弊。这是由于负责农业耕作的业主们会失去享受其收益的那种鼓励。况且，上述办法还不足以防止人们暗中积攒金钱，而这是一切唯利是图、投机倒把之徒趋之若鹜的商业所带来的必然后

果①。

社会的最终目的——劳动平等和享受平等

自然法规定生产依赖于劳动，根据这个法规，劳动显然是每一个公民缔结社会契约的首要条件；由于每一个人到社会里来，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一份东西（他的能力和手段的总和）。因此，义务、产品和收益，就必须进行平均分配。此外，大家还注意到，社会的目的实际上在于防止天然的不平等所起的作用；即使说，享受的不平等确实曾促进真正有用的工艺取得进步的话，而今天，这种新的进步对所有的人的真正幸福无济于事。因此，这种不平等必须消除。他们还指出，社会的奠基人通过他们纯朴的良知所启示的平等，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长和对于不平等所带来的种种祸害的日常感受，已经使我们愈益强烈地感到非加以接受不可。

人们经过以上这番探讨以后，认为财产与劳动的共有。即平等分配义务与享受，乃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目标和完美的体现，只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才能够永远消灭压迫，才能够制止野心与贪婪所起的危害作用，才能够保证全体公民尽可能地享受最大的幸福。比东写了一本书，其中论述了财产权的不公正，阐明了这种权利所必然带来的一系列祸害。

---

① 累进税本来可以成为分散地产，阻止财富积累，以及消灭游手好闲和穷奢极欲的有效方法，如果不是因为这种税制所要求的精确估计财产数额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话。不动产的收入额是可以精确地确定的；但是对于那些易于逃避外人耳目的资本数额，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这种课税办法充其量只能作为行善的一条途径。对于罪恶，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阿马尔仿佛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在对上述制度进行初步探讨以后，他就成为这种制度的热情的捍卫者；由于他一心一意只想如何证明这种制度的正义性和传播它的原则，他的火一般的热情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使他公然成为这种制度的狂热的辩护者那样一种程度。

在委员会里大家承认，如果不对财产制度实行根本改造，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就永远不会得到有效的和持久的运用。大家一致认为，爱国者只有公开成为那种显然能够保证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同样的好处的政治制度的鼓吹者，才不致于在人民心目中成为唯恐天下不乱的自私自利的阴谋家。

罗伯斯比尔是这种平等制度的朋友

在发展这种思想的时候，大家经常谈论哲学，特别还谈到那些承认这种思想是正义的革命人物。在这些人物当中有罗伯斯比尔及其牺牲了的同伴，他们——据那些我要在这里阐述他们的主义的人们看来——显然是要求平均分配义务和享受的[68]。在热月九日，阿马尔是对罗伯斯比尔进行疯狂迫害的干将之一，后来当他一听到罗伯斯比尔的名字，便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表白了自己的痛悔之心，而又一味地替自己的错误辩解，理由不外乎是他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受他污蔑和遭他毒手的人的善良观点。

建立平等制度的障碍

然而，真理和正义的道路，是很难让群众看清楚的。对于群众

来说，那种可以使惯于思考的人们信服的道理，是不足以说服他们的。那些希望自己的受奴役的、不幸的和愚昧的同胞们得到幸福的圣哲们，往往被平等制度的诡计多端、冥顽不化的敌人卑鄙地诬告为觊觎名位，从而得到死亡的报偿①。

委员会没有回避热月 9 日惨祸和随之而来的悲惨事件对公共事业和良好风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它知道，在热月 9 日以后，有许多公民从事最无耻的掠夺；它也同样知道，许多小业主又重新抓住他们不久以前准备放弃的财产不放，因为他们深信立法已经失去任何为公共谋福利的思想，而从今以后它将受最猖狂的利己主义的支配。因此，委员会感到，要想一举取消奠定在财产基础上的立法，并立即代之以奠定在财富与劳动平等基础之上的、前者无法与之相比的更加温和和公平的立法，那是相当困难的。

1793年宪法是通向平等的道路

但是，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象共和三年法典所奠定的社会制度那样远地背离平等了，这种制度的巩固，势必剥夺掉人民行使自然

① 如果不让群众有亲身体验，那就很难使他们相信革新的好处，而这种体验只有在革新以后才会有。因此，古代的一些最明智的立法者便借助于宗教上的虚构来吓唬那些他们无法说服的群众。然而，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对于那些我不知道是幸而还是不幸树立起下面这种哲理的人民来说，它是不会奏效的。这种哲理是：要想做成什么事情，只能靠引诱或者强迫。

如果基督教教义不是被那些靠欺骗来奴役别人的人弄得面目全非，它本来可以给予那些希望造福自己的同胞的立法者以巨大帮助。纯净的耶稣教义，亦即那种源于自然宗教并跟这种宗教毫无二致的耶稣教义，是可以成为明智的改革的支柱和真正的社会风尚的源泉的。[69] 这些社会风尚是跟唯物主义不相容的。因为唯物主义使许多人堕落到他们的行动只听从自己的直接利益的支配，而把一切美德弃之不顾的地步。

权的权利。据委员会看来，为了引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暗中响往、但由于缺乏教育和没有好的领导而始终未能达到的那个永恒目标，必须从恢复人民的集会，让他们探讨和思考自己的权利，并使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入手。他们认为，1793年宪法是通向最美好的前景的道路；由于这一点，加之对宪法中所包含的法国人民自由而庄严的意志怀有肃然起敬之感，这就决定了委员会把该宪法作为爱国者和人民之间联系的一个起点。

这个宪法的缺点

人们不隐讳这个宪法的缺点。大家认为这些缺点主要反映在权利宣言的条文中，这些条文在确定财产权时，竟把这个权利阐述到令人望而生畏的程度。然而，大家承认，从来还没有一个类似的作品能够像这个宪法那样接近于完美；这个宪法的条款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它大有进行种种改善的余地。

另一方面，大家还考虑到，支持这个宪法的有平等派，有比较安分守己的民主人士，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此，只要平等精神得到发扬，那么一切变化都是不难实现的；但是，在这个极待联合一切力量来成功地打击强大的敌人的时刻，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险。

共和派实行联合的要点

经过反复和郑重的探讨以后，委员会把人民之友的职责归结

为以下两个基本要点:

(1)重新恢复人民所赞同的1793年宪法,因为他是一个公开宣扬由人民行使其权力的法律,是迅速地达到平等的一个手段,是推翻那个被公认为专制制度的现政权的一个必要的联结点。

(2)为建立真正的平等制度而作长期准备,向人民指出这种制度是能够永远根除一切社会灾难的唯一手段。

用以取代共和三年政府的政权

由于这个在策划中的革命应以消灭共和三年宪法作为开端。委员会便很自然地探讨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手段和突然地用以代替那个应被推翻的政府的管理形式。显而易见,无论从形势的需要和事业的成就来看,都要求在贵族政权的崩溃和人民宪政的最终确立之间有一段间歇时期。

大家建议,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对那个篡夺民权的政府实行进攻;而要指望人民的力量发生作用,则只有靠真理的影响,靠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压迫的痛恨。

对于密谋者打算突然地用来代替共和三年立宪制度的那个临时政权,我在以后还要回过来谈谈,因此,在这里我仅限于简单地叙述一下委员会中存在的几种不同意见。

一些人认为国民公会仍然是有权利存在的,因而主张召集残留下来的国民公会成员;另一些人则希望把共和国的临时管理权委交给由起义的巴黎人民所指定的机构;最后,还有一些人则坚持这样一种意见,那就是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把最高权力和有关建立

共和国的事宜委交给一个称为独裁者或调节者的人手中。

以后我们还有机会了解上述每一种意见所持的理由，而现在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大家倾向于由起义者指定临时政权机构，而不赞同阿马尔所提出的召开国民公会和比东所提出的建立独裁制度的意见。

在委员会孜孜不倦地考虑自己的方案的时候，先贤祠协会和巴贝夫的著作便成为它所策划的运动的杠杆。委员会打算把该协会的鼓动家们组成起义的基本核心，因而，为了以上述的杠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它便教育这些鼓动家们要注意防止过早地暴发起义的热情，但同时也不要让这种热情消失，并且鼓励巴贝夫用加倍的热忱去反对压迫者，去号召人民起来争取自己的全部权利。

委员会还打算分设几个支部，以便为起义作准备，为起义后的临时立法奠定基础，并最后确定平等的组织机构。然而，不信任的情绪阻止了委员会工作的开展，委员会也就随即解散。

委员会的解散

阿马尔成为大家所担忧的对象。他既为许多平等之友所痛恨，又为贵族制度的拥护者所痛恨；后者指责他参与迫害吉伦特党人，指责他对共和国的敌人采取严酷的态度；前者则指责他是对热月9日受难者进行最疯狂的迫害的一个人，他们说他当时表现出可怕的残忍；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爱好虚荣、生性鲁莽、惯弄权术和喜欢报复的人。然而，他却博得了达尔蒂和马雷萨尔的信任，并通过他们跟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取得联系。他们跟阿马尔接近，

是由于他表现了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热望，并且认为他所表现的热情是真诚的；可是，他所勾起的惨痛的回忆，他那种拥护平等制度的热忱本身，以及担心他会叛变的那种过虑，又使他们跟他疏远。

在委员会里，原为国民公会所属公安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艾隆[70]，对阿马尔抱着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在他病重垂危的时候，当他知道共和派对阿马尔产生某种信任，便赶紧把菲力浦·勒·雷克塞尔找来，以祖国的名义恳请他让共和派跟阿马尔疏远，并且把后者的为人描绘得阴森可怖。艾隆的愿望得到实现；为慎重起见而刚刚把自己的会址改在新平等路的委员会，便立即宣告解散①。

其他类似的团体

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不是密谋家或是准备成为密谋家的；所有的人都迫切地感到需要联合起来，需要步调一致以达到摧毁专制制度的目的。因此在上述的委员会解散以后，在巴黎的许多地方都成立起其他一些类似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出头露角的有达尔蒂、邦纳罗蒂、马雷萨尔、布恩、艾里迪、安东尼尔、热尔明、德·诺姆贝、辛特拉尔、列迪、提斯米奥、杜弗尔和沙佩尔等人。

这些新的协会并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一则由于警察的监视，再则由于一种潜在的影响作用——人们希望把共和派的力量跟另

① 阿马尔为民主主义密谋捐了一些钱，他始终间接地参加这个密谋，一直到这次密谋的策划人被指控时他也被株连为止。

一个中心联系起来，这些协会只好很快地停止活动。而在这些协会停止活动之前，它们也恰好制订了一个方案：把所有的爱国人士划分为若干不引人注目的小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代表应当组成各个区的协会，这些协会则从属于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应由少数久经考验的民主人士组成，他们负责使整个组织具有统一的动力。

先贤祠协会所表现的民主精神

在先贤祠，人们好不容易才使这个会员越来越多的协会克制住它反对共和三年宪法所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冲动的情绪。在读过各党派的报纸后所进行的热烈讨论，以及就人们提出的建议——建议实施关于从国家财产中拨出十亿款项来赠给祖国保卫者的法令和关于给贫苦公民以足够的帮助的法令——而展开的更为生动激烈的争论，使先贤祠协会重新获得昔日的民主力量，并使政府了解到有这样一批最忠贞和最雄辩的民主原则的拥护者。

这个协会的宣传家们的困难处境

虽然在先贤祠协会的会员当中普遍承认，保持明智的含蓄乃是有利于实现他们的愿望的一种必要的谨慎态度，但是，他们不能阻止人们相互传播放肆的言论，甚至有时不能阻止在协会的讲台上发表这些言论——这有时候是由于过于热情，有时候则出于一种阴谋，即力图挑动别人来消灭这个有益的组织。此外，如果不向

人民讲清楚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不可能把他们鼓动起来。在有必要给予讨论以某种自由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应有的谨慎，以免过早地惊动专制制度；这使先贤祠协会的宣传家们既要照顾到公共利益，又要照顾到维持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从而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民主原则在人民当中重新确立

协会引起了平等制度的朋友和敌人的密切注意；爱国者的报纸登载并评介了协会的讨论，而反革命作者则对这种讨论进行歪曲、非难和污蔑；老民主人士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这个协会。与此同时，巴黎人民也逐渐地摆脱了他们由于长期不幸而陷入的对事物漠不关心的状态；在所有省份里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协会，这些协会通过他们的参加先贤祠协会的会员，跟首都这个协会进行秘密联系。

先贤祠协会的活动

先贤祠协会的活动可归结如下：

读报；

传达会员的通讯；

替贫苦的爱国人士募捐；

设法营救那些被贵族制度投入监狱的人士。

然后是对立法机构和政府的表现展开讨论，向当局提出建议

并审查这些建议。在热烈辩论的过程中，那些希望把全部权力归还给人民的人，往往表现出崇高的感情，而一些希望使协会成为进行卑鄙统治的阶梯的人，则表露出自私和狭隘的观点。

在这个协会内出现的杰出事件中，下面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

从国家财产中拨出10亿分给祖国的保卫者

在共和二年热月 9 日之前，已经拟订了两道法令，准备对全国的财富分配进行重大改革。

第一道法令答应从国家财产中拨出10亿分配给祖国保卫者。

第二道法令规定把革命敌人的财产分给贫困的爱国人士。①

先贤祠协会的成员几乎全体都把实施第一个法令看作是一种酬谢的表示；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对平等事业的忠诚表现，莫过于为实现第二道法令而迈出第一步，并使全国熟知这样一个原则——把财产支配权交到自主的人民手里；他们同时还感到，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才能够唤起人民发挥那种屡创奇迹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为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因此，要求真正地分配十亿款项的建议，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那个包含着这项要求的呼吁书，一开始也就不经修改地通过了。然而，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在一些政府代理人的影响下，这个呼吁书的呈送便茫茫无期了，因为这些代理人使协会的大多数

① 共和二年风月 8 日和 14 日法令[71]。

会员重新陷入他们刚刚摆脱的恐惧之中①。

协会对巴贝夫的关怀

巴贝夫在他的«人民护民官报»上对现行宪法和政府成员进行抨击时所表现的那种勇气，是使先贤祠协会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对他严守缄默的原因。一些赞同«人民护民官报»的观点的人，担心会由于鲁莽从事而毁掉一切；一些胆小怕事的人则害怕连累自己；至于巴贝夫学说的敌人，则唯恐提高巴贝夫的威望。

共和四年风月初对巴贝夫进行的迫害，竟然波及他的妻子。[72]她因散发她丈夫的文章而被捕，实际上，这种作法只是想从她那里知道巴贝夫的秘密寓所。当在先贤祠协会中宣布了这一暴行时，愤怒的呼声便不绝于耳；平等之友高呼要保护英勇的巴贝夫；他们终于使协会提出要求释放巴贝夫的妻子的申请，并给狱中的巴贝夫以金钱援助。

---

① 最初准备用来清偿国家的旧债（表现为公债利息）和新债（表现为众所周知的称为指券的那种纸币）的国家财产，在热月9日以后遭到惊人的盗窃。这时候，这些财产既不通过公开的拍卖，也不出告示，而只凭书面申请即可购买；这些财产的价款，几乎完全以不值钱的纸币、按从前以硬币所作的估价来支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且由于那些发军饷的人们进行盗窃，才出现了腰缠万贯和穷奢极欲的现象，这种现象后来是那样有力地促使共和国彻底崩溃。

先贤祠协会的会员们在其呼吁书中指出，如果这种混乱状态继续下去，在支付祖国保卫者的报酬方面，将连一个阿尔潘（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译者）的土地也没有。罗伯斯比尔在他最后几次讲演中，就已经责怪对富有的食利者坑害穷人的现象所抱的宽容态度，他特别指责财政委员会竟然容许削减用以造福人民的国家财产总额。

先贤祠协会的分裂

人民希望重新接受他们不久以前那样光荣地捍卫过的真理的迫切心情，平等精神在法国的重新传播，追求民主制度的新的热潮，尤其是先贤祠协会的许多成员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品格，凡此种种都引起一切反人民作家起来反对协会，跟他们一道的还有五百人委员会的许多演说家。起初，政府对协会表示欢迎，指望靠它来恐吓保王派，如今，它已经开始对协会的影响感到畏惧了。专制制度的秘密代理人，利用那些软弱的人的不坚定性，在协会中散布恐怖情绪，借以使协会的力量陷于瘫痪；他们时而向协会指出，手执武器的贵族匪徒正准备向它袭击；时而又向它透露，说它的所谓过于放肆的言论激起了政府的狂怒。根据他们的建议，出路只有向现制度屈服并向它表示忠诚。

在诸如此类的意见的影响下，协会向督政府呈送了一封充满低三下四的奉承词句的信，在信里它不得不宣誓忠于共和三年宪法。这封信受到强烈的抨击，然而它是被大多数人通过的。就是这封信成为下面两种人公开分裂的缘由：一种是在信上签字的人；另一种人是宁可冒遭受新的迫害的危险而不愿卑怯地背弃自己信念的人。这种精彩的结局，使一切感情暴露无遗；而那个篡夺民权的政权，也就更加确切地认识到那些最使它害怕的坚持原则和强硬态度的公民们的本色。

指券、出版自由、陪审员

协会在其活动过程中，曾经把注意力放在指券的支付能力、出版自由和建立陪审团上面。

当时，指券很快地贬值，以致出现工资与食品价格脱节的现象，后者在朝夕之间就上涨一倍。凡是靠劳动生活，别无其他谋生途径的人，都只好出卖家俱和破旧衣服，他们受尽贫困折磨，在饥饿中死去。先贤祠协会会员们在一份请愿书中，曾提请立法议会注意这种严重的不正常情况。

在另一份请愿书里，他们驳斥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在立法议会内煽动限制出版自由的诡辩言论，据他们说，限制出版自由是为了镇压民主派的放肆行为。这些新贵族别有用心地把民主派和保王派混为一谈。

根据新的立法，凡是不能缴纳选举保证金的人，就被剥夺掉列入陪审员名单的权利。这样一来，贫苦阶级在法庭中也就失去这项权利所给予的保障。因此，法庭对于它们是严酷的，而对于特权阶级则是偏袒的。协会把这种危险的、令人愤慨的胡作非为向人民和立法议会进行了揭露，但立法议会对此保持沉默。

协会所持的谨慎态度

那些从一开始起就主张把先贤祠协会变为恢复民主制度的据点的人们，一贯注意唤起人民的力量，但是，在社会舆论还没有变

到可以使人们畅所欲言，在压迫者的力量还没有削弱到不起作用之前，他们同时也就对目前的宪政抱容忍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们希望大家仅仅对人权和人民的权利进行探讨，而不想直接用这些权利来对付目前的暴君。正是根据他们的意见，协会一贯反对一些人所表现的轻率急躁、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热情，这些人在协会中猛烈抨击督政府的成员，并宣称要举行起义。

排斥国民公会成员

基于同样的慎重考虑，人们拒绝接受被驱逐的山岳党人参加协会，后者被政府毫无根据地看作是危险的谋叛者。被接受入协会的，只有德鲁埃一人①。[73]

共和四年雨月，人民当中有许多人纷纷加入先贤祠协会，巴黎许多地区有组织的小型民主协会表现出健康的思想，人民在恢复其权利当中得到了切身利益，这些使得先贤祠协会的奠基人看到，他们的愿望已经开始实现，现在是为他们的努力开辟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的时候了。

在这以前，他们只限于联合和鼓动最积极的革命人士；而如今他们感到，向巴黎人民施加这种影响的时候已经来到。

旬 日 节

由于极力想使一些必须公开召集的会议不致跟警察条例发生

① 德鲁埃曾下令在瓦伦逮捕那个在逃的叛君，他在国民公会中站在民主旗帜之下；在莫贝日被围时，由于舍身忘我而被捕。在不幸的热月事件期间，他正在奥地利狱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抵触，特别是使它们能够跟出于谨慎而作的安排结合起来，他们产生一种想法：既然他们的政治理论是根据自然法推理出来的最精确的结论，那它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和很容易地被奉为神的法典，即作为自然宗教的信奉对象。

实际上，把上帝当作平等制度的缔造者、立法者和庇护者来膜拜的宗教仪式，[74]对于那些仅仅由于尊崇基督教的道德才信奉该教的人、那些反对无神论的人和痛恨迷信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何况这种宗教仪式还以人类所尊崇的圣贤人物的见解以及无法驳倒的论据为基础；它一旦掌握在改革者的手里，就可以成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强有力的杠杆；它是向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进行宣传的唯一的合法工具。

因此，人们决定以自然神的膜拜者的身份在公共庙宇里露面，把自然道德作为唯一的教义来布讲。

同时鉴于让群众习惯于用另一种宗教仪式来代替天主教仪式有好处，而且当时政府也通过提倡旬日节[75]来设法实现这一点，于是人们便决定公开庆祝这种节日，并为此向督政府申请拨给一座宽敞的庙宇。

督政府猜到了这项申请的目的，它害怕这件事可能引起的后果，于是便以它自己也在准备庆祝这种节日为借口，拒绝了上述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协会里把话讲清楚，有必要把一些本来不宜向协会和盘托出的秘密意图部分地告诉给它。人们希望让协会下决心以宗教形式为掩护，利用法律为一切教派所保障的公开场合和庙宇来从事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并为此开了好几次会。提出上述方案的人，不得不跟那些力图阻碍实现这一方案的人展开争论，后者时而劝告跟政府打交道要慎重，时而又坚持认为一切宗教形式都是制造迷信的新根源。

一切障碍终于被扫除了。协会决定"它要利用旬日节，通过布讲自然法来公开敬神"，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租赁庙宇，制订教义和新教规。

政府对先贤祠协会会员的仇视

当时督政府对先贤祠协会感到畏惧，后者所进行的讨论使首都许多利己主义者惶恐不安。从那时候起，警察便集中全副精力来监视该协会的宣传家们的一言一行，但后者的公开表现并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招来迫害的把柄。然而，这个协会是注定要被消灭掉的。人们只是伺机找一个借口来取缔这个当时已经被人称为强盗窝的协会。

协会会员的热情

共和四年风月初，先贤祠协会会员开始脱离原先的冬眠状态，普遍地起来争取民主制度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应当激发热情，而是应当克制这种热情，否则便会后患无穷。

那些潜入协会的政府的暗探们，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唾弃，再也不可能欺骗人了，于是，他们便一变而为卑鄙的告密者。

朗读巴贝夫的作品，协会被取缔

政府所要找的那种借口，由达尔蒂给它提供了。为了试探协会的情绪，达尔蒂在协会中朗诵了一期《人民护民官报》，这期报纸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督政府成员和其他一些代表，并且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他们的欺压人民的宪法和暴戾的法律。这次朗诵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不久以后①，督政府便下令取缔先贤祠协会，这道命令是由波拿巴将军亲自执行的②。

---

① 共和四年风月9日。

② 当时统辖国内军队的波拿巴[76]，是这项措施的真正的决策人。他通过许多暗探弄清楚先贤祠协会会员的秘密意图以后，便以此来恐吓督政府，从而弄到一纸取缔该协会的命令。他亲自出马执行这个命令，吩咐别人把协会在那里开会的大厅的钥匙交给他。

对于这位早在攻占土伦和葡月13日事件中就已驰名于世的将军，新兴贵族从他的性格的许多特点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朝一日能够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给予他们以切实支持的人物；而他之所以在共和八年雾月18日起来帮助这伙被民主精神的迅速重现吓破了胆的人，也可以从他的自命不凡的性格和贵族观点中得到说明。由于那个给革命带来共和二年热月9日这一灾难性时期的倒退运动，波拿巴取得了最高权力。在热月9日以后，那个支撑着共和国残骸的政权，已经脱离人民，它势必要不停地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保王党人，另一方面反对遭受创伤的民主派。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政权在共和三年牧月对共和派展开斗争，在共和四年葡月打击了保王党人，同年花月和果月又驱逐了共和派，共和五年果月剿捕保王党人，而在共和六年牧月则破坏人民选举[77]。在共和七年最后几个月，民众风潮空前高涨，敌人的军队更具有威胁性，国家主权的篡夺者便感到自己处在旧制度实行报复和人民申张正义的夹攻之中。然而，作为平等制度的极其凶恶的敌人，他们宁可听任军事专制制度的种种摆布，而不愿意轻易地向人民派投降。他们在共和八年雾月18日把法兰西共和国置于一个狂妄自大的军人的极权统治之下，但同时却妄想遏制后者的野心和专横。

也正是由于那个在共和二年热月9日占了上风的政策的结果，那些主宰法国命运的人们，不惜把侵略战争看作是转移全国人民视线、使他们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的有力手段，看作是不断地从军队中排除民主情绪、败坏公民道德以及满足将军们的野心的有力手段。如果不是这样，便很难解释他们在意大利和瑞士的表现，特别是对埃

政府的背信弃义

如同一切贵族政府一样，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对于个人专权和人民权力都秉着同样敌视的精神。但是，由于不久以前大多数国民是那样满腔热情地接受关于人民享有最高权力的理论，当时就连一些新兴贵族的奠基人也鼓吹起这种理论来，这使得贵族阶级如果想用这种理论来治民主派的罪的话，就非得歪曲后者的真面目不可。因此，它便把他们说成是戴着假面具的保王党人，说他们阴谋通过无政府主义（贵族阶级故意把这种主义跟民主原则混为一谈）来曲折迂回地在国内恢复君主制度，企图以此煽动公众仇视这些民主派。

这种政治欺骗可以从新政权对人民派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中看出。可以作为证据的是督政府在下令查封先贤祠协会的同时，还查封许多保王党人的协会，可是后者几乎是马上就恢复了活动。此外还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关于这些证据，我将在介绍那个著名的芽月 27 日法令时谈到①[78]。

及所进行的失策的、罪恶的远征。

由此可见，执政制和帝国既是那个使波拿巴一举成名的掠夺战争的后果，又是国内政策的后果。这两个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那就是害死罗伯斯比尔的那个阴谋。

性格刚强和战功显赫的波拿巴，本来是可以成为使法国重新获得自由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庸俗的野心家，他宁可给自由事业以彻底打击。整个欧洲的幸福掌握在他的手中，然而，他却成为欧洲的祸星，这是由于他经常对欧洲实行压迫，并且为一种更为可怕的压迫准备了条件，这种压迫在他倒台以后，同样是以自由为幌子，使地球这一部分土地上那么多的人民遭殃。

人民越是回顾这一连串的事件，就越会相信，反革命是从热月 9 日开始的。

① 见本书第 122 页以次。

这些穷凶极恶的人，为了消灭被他们引为心腹之患的对手，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在世人面前，把那些大公无私的平等之友说成是大坏蛋和大野心家，说什么这些人不惜采取暴力和诽谤手段来维持一个使他们这批不久以前的穷光蛋摇身一变为大富豪的政权。督政府也把类似的罪状强加给先贤祠协会会员，指控他们公开要求实行1793年宪法和专政。关于要求实行专政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谈过的。至于1793年宪法，虽然它为协会每个会员所怀念，但由于会员们一贯采取慎重态度，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在协会讲坛上谈论起它。

对爱国者的新的迫害

这种为非作歹的行径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就连那些对自由事业不那么关心的人也不例外。这是进行新的迫害的信号。许多担任公职的爱国人士被革职；革命活动受到查究；人民作家普遍遭受迫害。

所有的人——从最热情的平等之友到最温和的爱国人士——都对督政府的行径和马耶关于人民社团的报告[79]表示愤慨，因为他们对共和三年宪法留给人民的非常有限的集会权利还要进行侵犯。专制制度因而进一步暴露出其狰狞面目，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各种色彩的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它，一致希望它早日崩溃。被暴力驱散的先贤祠协会的会员起先在共和派经营的咖啡馆里集会，后来随着天气转暖，便到广场上集会。

有一些作家起来大力反对督政府的上述行径，另一些则效法

巴贝夫，利用这个时机来空前响亮地号召人民去恢复自己的权利。

这时期在巴黎流传的作品中，有菲力浦·勒·雷克塞尔执笔的以《士兵，站下来读一读吧！》为题的公告①，以及由安东尼尔匿名写的《跟法国人谈谈公民的集会》②。

巴贝夫由于敢作敢为而树敌众多

巴贝夫继续孜孜不倦地在他的《人民护民官报》上宣传真正平等的学说，谴责新政府的奠基人及其执政人篡夺权力。他的锋利的语言，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人，并引起一些公民对他的不满。后者有一部分人支持那些达官贵人，因为他们曾受过那些人的好处或是期望得到他们的恩赐；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对现政权表示支持是一种上策，因为这样做便于在以后更容易地消灭它，他们指责巴贝夫轻率地宣泄那种他们称其为共和派的机密的东西。

这些公民们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他们当中一些人决定要把这位英勇的公民干掉。他们极力想煽起人民派对他的不满，为此，他们一方面夸大他跟热月罪行的主谋人的旧关系，另一方面恶意地提起他的反对革命政府的若干成员的作品。

然而，平等之友却感到，只有依靠跟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原则，才能够保持并发挥人民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贵族们力图加以压制的。他们看到巴贝夫的才干和勇气对公共事业所能作的贡

① 见第三号文件。

② 这篇作品我没有找到。

献，于是便公开站起来保卫巴贝夫，从而促进巴贝夫计划的开展。

巴贝夫酝酿解放人民的方案

长期以来，巴贝夫一直把教育自己的同胞这种热望跟积极帮助他们恢复自己的权利的热望结合起来。秉着这种目的，他们把民主制度的热情捍卫者吸收到自己方面来。他设法了解在阿马尔家里、在巴比昂路、德尼郊区以及其他地方集会的民主人士所从事的活动，并尽力加以指导。菲力浦·勒·雷克塞尔的寓所，艾里的寓所，克雷塞尔的寓所，一个接一个地成为巴贝夫的藏身之处。在这些地方，他在安东尼尔、邦纳罗蒂、西蒙·杜布雷依、达尔蒂、艾里迪、热尔明、西尔文·马雷萨尔[80]和索姆波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周密地策划自己的事业。

我即将在下面谈到的那个起义组织，只是在共和四年芽月月初才成立起来的。在这以前，巴贝夫跟菲力浦·勒·雷克塞尔和西尔文·马雷萨尔达成一个协议，其目的起初仅仅是为了使他们的政治作品的内容和基调能够协调一致。毫无疑问，极力想把运动集中起来的巴贝夫，依靠他的朋友的影响，对上面我们所介绍的那些协会的解散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协会的许多观点，可以在那个新起义机关的法令中重新找到。

一个秘密的救国督政府的成立

在芽月最初几天，巴贝夫、安东尼尔、西尔文·马雷萨尔和菲

力浦·勒·雷克塞尔组成一个秘密的救国督政府，并通过一个很好的决议，即决定把散乱的民主派线索拧成一股绳，对它们进行统一的指挥，以恢复人民的最高权力①。

代表们及有关他们的指令

这个督政府首先所关心的，便是把一切维护自由的朋友搜罗在自己下面，估计他们的力量，并从有利于整个教育和解放事业出发来布署这种力量，同时要防止由于叛变和泄露行为而使事业本身及其参加者蒙受危害。秘密督政府对此采取了措施，它颁布一项组织决议②，规定在巴黎 12 个区的每一个区内设置一名革命总代表和若干联络代表，后者负责保持秘密督政府与革命代表之间的联系。上述法令还随附一个指令，在这个指令里，秘密督政府向代表们宣布了采取这种措施的动机和正确性，同时向他们指出为了保证事业的成功而应当遵循的道路③。

在联络代表中，再也没有比艾里迪更为得力的了。他热情、积极、机灵、谨慎，他的这些品德永远高于任何的夸奖。虽然根据既定章程，这位代表既不应认识秘密督政府的成员，又不应了解他们的活动，然而他的纯真的爱国主义，他的明智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博得了他们的完全信任。这种信任是无限的，艾里迪利用这种信

① 见第四号文件。
② 见第五号文件。
③ 见第六号文件。

任使秘密督政府成员决定吸收了达尔蒂和邦纳罗蒂，后者又设法把比东吸收进来。

秘密督政府成员及其政治学说

由此可见，共和四年芽月10日，以恢复人民权利为宗旨的秘密救国督政府，已经在巴黎存在了；参加这个督政府的有安东尼尔、巴贝夫、比东、邦纳罗蒂、达尔蒂、菲力浦·勒·雷克塞尔和西尔文·马雷萨尔[①]。督政府会议在克雷塞尔的寓所里进行，当时巴贝夫正隐藏在那里。

他们对于在阿马尔的家里讨论过的那种政治学说并不存在任何分歧；完全一致的见解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所有的人都把劳动和享受的平等看成是每一个真正的公民所应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且把这看作是举行起义的唯一合法的动机。

他们的理论对于社会进步、对于法国革命的荣誉以及对于了解秘密督政府的意图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必要在本书所附的文件中收录一个足以代表他们的理论精华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根据秘密督政府的命令颁布的，它的标题是：《对由于讲真话而受督政府迫害的护民官巴贝夫理论的剖析》[②]。

---

① 西尔文·马雷萨尔草拟了一个杰出的平等派宣言，但秘密督政府不愿意把它发表，因为它不同意宣言中这样一段话："如果必要的话，让一切工艺都消灭吧！只要把真正的平等留给我们就行了！"；还有另一段话："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令人厌恶的划分终于消失吧！"该宣言见第七号文件。

② 见第八号文件。

密谋家的最终目的

不受限制的平等，人人可能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及确保这种幸福永远不会被剥夺，这便是秘密救国督政府要保证让法国人民得到的好处。这个督政府想重整在被热月 9 日葬送的事业，并追随这个不幸日子的牺牲者的先例，希望用一种无比正义的革命来补充那种权利与权力的革命，这种正义的革命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公平地分配财产和享受教育。

人民，秘密督政府的目标和手段

尽管秘密督政府知道，明智与权威的结合乃是它获得成功的保障，然而它也完全相信，一个最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权，如果对人民缺乏基本信心，因而得不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这个政权就不能自以为会获得彻底和持久的胜利。

法国革命使全世界看到千百万人用自己的鲜血来宣布和巩固真理这一前所未有的场面，在这以前，真理只被寥寥无几的明哲之士所洞察，当时想仅仅依靠真理的力量来唤起人民，只能是幻想而已。可是在秘密督政府建立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的问题，与其说是要创造一种新观点，毋宁说是要把那些被谣言和迫害弄得七零八碎、有失真谛的观点恢复原貌。

在革命期间，有一个时期仿佛平等制度实现在望，使得广大人民从内心响往新的社会制度；在热月 9 日以后，由于希望破灭了，

人民群众对自己所蒙受的牺牲悔恨不置，认为别人答应给他们带来的幸福不过是一场骗局，于是开始对革命及其捍卫者产生反感。这种思想情绪使保王党人得以趁机诋毁共和制度，使贵族得以趁机散布对改革的恐惧思想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绪。

另一方面，迫害使坚定的民主人士的队伍大为缩小。他们当中幸存的人，或是被强行驱散，或是被谣言所中伤，不再博得人们的信任，而过去他们正是依靠这种信任来引导人民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想为了人民的利益并依靠人民的力量来从事活动的秘密督政府，不得不感到它首先需要启发那些受蒙蔽的人，鼓舞那些脆弱的人，让群众看到自己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给英勇的民主卫士提出统一的行动计划，给所有的人提供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

秘密督政府的成员根本不像罪恶的阴谋家那样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他们只不过从公理的进步和真理的光芒中期待自己的事业的胜利。

那个只不过由先贤祠协会开个头的事业，由秘密督政府负责来完成。后者跟前者比较起来，具有双重的优越性，也就是它比较不那么引人注目，而且能够比较周密地考虑并遵循自己的计划。先贤祠协会被强行解散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对于增强秘密督政府关于自身力量的信念是不无少补的。

秘密督政府希望确立 1793 年宪法

给予人民以真正的平等制度是正义的和必要的，这是革命应

达到的真正的和理所应当的目标。除此以外，使人民注意到一种足以保存这种平等制度的管理形式，也同样是重要的。

有鉴于此，秘密督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考察了当时看来为共和国的一切真正朋友所赞同的1793年宪法；由于秘密督政府同时在探讨借以建立平等制度的机构的问题，它也就更能够发现该宪法的缺陷并弄清楚它所需要的补充。

秘密督政府对该宪法的意见

跟在阿马尔家里集会的那个委员会的见解一样，我们的密谋家认为这个宪法的真正的缺陷是权利宣言中有关财产的条款。至于宪法本身，他们认为它既不足以保障人民防止立法议会的违法侵权，又不足以使人民避免他们自己可能犯的错误。在本书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打算通过什么样的附加条文来防止这些危险。

尽管有这些缺点，秘密督政府仍然决心保持共和派对这个宪法所持的尊重态度，其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该宪法几乎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通过；其二，该宪法规定人民享有讨论法律的权利。秘密督政府认为后面这一点是1793年宪法的特性，而其他一切部分，几乎都是细则而已。

因此，大家商定把这个宪法作为联合的基点，并建议把这个宪法确立起来，作为实现美好的平等制度的手段，同时大家将不断地论证这种制度的正义性，要求实现这个制度，并详细阐述它的基本法则。

真理是人民起义的原动力

秘密督政府企图摧毁那个违法侵权的政府，它不想依靠一小撮出于自私动机而蠢动的暴乱者，也不想依靠丧失理智的狂热；除了真理的力量以外，它并不想借助于其他任何动力。

坦率地和全面地阐述人民的权利和揭露压迫者的罪行，这是秘密督政府试图用来唤起巴黎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唯一手段。它想在人们的不满情绪加剧和普遍蔓延的时候，举起义旗发出起义的信号。

人民协会在巴黎大量建立

因此，秘密督政府首先所关心的，是从事说服和吸引民众的工作。它既不辞费尽唇舌，又不吝惜笔墨。为了能够广泛地展开卓有成效的宣传，它在巴黎建立了一大批互不联系的协会；所有这些协会都由民主派领导，而这些民主派则接受十二位革命代表的指挥。

救国督政府为了极力防范民主派的轻举妄动和叛变而给革命代表发出的有关注意事项的指令，是值得一读的。

从一开始起，革命代表就预定要起一种杠杆作用，也就是通过他们的作用来唤起巴黎人民向暴君冲击；而在眼前，他们负责组织协会，领导人民进行讨论，分发书面材料，向秘密督政府报告争取舆论的进展情况，向它告发贵族阶级的阴谋，并向它汇报民主派的人数、能力和毅力。

我们的密谋家的措施主要是针对巴黎，这是不足为怪的。应当对贵族制度的心脏进行打击。这个公社的广大市民的运动，是很容易为整个共和国的民主人士所接受的。

12 名革命代表的选拔

选拔革命代表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像革命代表这种重要职务只能委托给那些既有对平等制度的持久热爱、久经考验的谨慎作风以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又有高度的积极性和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人。秘密督政府在仔细地审查了提出每一个代表人选所持的理由以后，便以多数票任命了这些代表①。

① 革命代表名单

区	区段	代表姓名	提名人
第一区	土伊勒里，皮克，香榭丽舍，共和国。	罗曼科尔塞尔	巴贝夫
第二区	勒佩尔蒂埃，比休特—德—慕兰，蒙布兰，蒙马特尔郊区。	德诺姆贝	达尔蒂
第三区	布吕图，社会契约，美尔，鱼市。	曼涅斯埃	比东
第四区	粮食市场，博物馆，法国自卫军，市场。	布恩	邦纳罗蒂
第五区	邦迪，邦—诺维埃，北站，邦—康塞。	勒·依姆	热尔明
第六区	格拉维耶，伦巴地人，坦普尔，祖国之友	克洛德·费兰	热尔明
第七区	集会，武士，人权，阿尔西。	巴黎	达尔蒂
第八区	盲人院，不可分割，波宾库尔，蒙特雷依。	卡森	巴贝夫
第九区	忠诚，博爱，兵工厂，斯德岛。	阿德里	达尔蒂
第十区	格雷涅尔喷泉，西站，残废军人院，统一。	雷尔皮诺	布恩
第十一区	法兰西剧院，卢森堡，新桥，提尔姆。	索姆波	巴贝夫和邦纳罗蒂
第十二区	先贤祠，菲尼斯特尔，植物园，天文台。	莫鲁阿	比东

自从最高权力机关背离正义的道路以后，它的法令便不再为舆论所支持并失去人民的爱戴。而且，越是在过去非常容易地迅速得到贯彻的法令，越是在后来受到冷遇和引起人们的反抗。这时候，它便不得不用暴力手段来代替人民的爱戴，不得不出于对人民义愤的恐惧而对他们进行恐吓。

贵族制度的领导人把那帮革命的敌人笼络在自己周围，后来他们很快发现后者的卑鄙龌龊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但他们懂得，自己的安全只能靠他们的这些傀儡们手中摆弄的刺刀来保障。在保障社会安宁的借口下，他们把国民代表的集会场所，从一个不久以前还以公民们的忠诚作为其唯一保障的地方，变为危害公民的自由和生活的军营。

驻扎在巴黎周围和市内的那支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曾帮助自由的敌人建立其统治的军队，后来被立宪政府保留下来并加以扩充。在这支军队的将领中，可以看到旧贵族和共和二年时期的囚犯，可以普遍看到那些对人民最高权力抱公开敌视态度的人。

一方面是人数众多、效忠于专制制度的军队，相形之下，另一方面是在解除保王党人和恐怖分子的武装的借口之下被弄得手无寸铁的人民，这种情况，势必使人民大众的锐气受到挫折，使他们在小小冲突面前也惊慌不置。

秘密督政府把军队的阻力，甚至把这一事实可能使人民产生的思想，都列为足以妨碍它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障碍。因此，它早就在考虑：为了使上述阻力化为乌有，就必须唤起士兵对民主制度的热爱，让他们回想起他们曾为之洒过鲜血的伟大利益，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摆脱暴君们向他们灌输的那种把奴隶般地服从长官视为天

职的思想。密谋家们同样想通过真理的力量在军队中燃起对贵族政府的仇恨，以便把人民和军队的力量汇合为一股怒潮。

军事代表

为此目的，秘密督政府除了委派市区代表以外，还逐步地补充了军事代表，让他们负责驻扎在巴黎市内和郊区的营队中的类似的工作。秘密督政府委任下列人员：

菲昂——负责残废军人宫。

热尔明——负责警备团。

萨谢米——负责驻扎在弗兰斯亚德的部队。

万涅克[81]——负责一般部队。

乔治·格里泽尔——负责格雷涅尔营。

考虑到格里泽尔在这次密谋的结局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详细地介绍使他得以接近平等制度的主要捍卫者的情况和理由。

除了上述的文职代表和军事代表以外，秘密督政府还设置了监察员，负责检查代表们的行为，纠正他们的做法并赋予他们的活动以新的力量。

这项重大的责任由达尔蒂和热尔明担当起来。这两个人在当时都给平等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秘密督政府正是通过他们才详细地了解到集会的情况；它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他们，而他们也就勇敢地和严格地完成这些任务，这表明他们具有充分的信心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

不知疲倦和无所畏惧的达尔蒂，善于用自己思想的火焰来熔炼其听众的思想，善于克制人们过激的情绪并调和各种不同的见解；他极力鼓舞和联合平等之友，从他们当中发掘能够最好地对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正是抱着这个目的，他才经常出入每天都有许多民主人士光顾的名为"中国浴池"的咖啡馆，在那里他结识了格里泽尔，后者原籍阿贝城，当时是驻扎在巴黎附近格雷涅尔平原的第38混合旅第三营的营长。

格里泽尔

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格里泽尔把革命看作是个人飞黄腾达的有利机会，因此，他设法跟爱国人士结识。他摹仿他们的语言，把自己打扮成他们当中的一位热情的革命人士。然后，他轻易地博得若干民主人士的赏识，后者把他当作一位对他们的党十分有用的人物而推荐给达尔蒂。这些推荐人轻率地对格里泽尔备加推崇，加之格里泽尔能说会道，并且表达出有诚意在部队中散布秘密督政府的文告——在这方面，他本人还编了一本旨在煽动军队的叛逆情绪的武装起义小册子①——，这一切都使过于轻信的达尔蒂认为格里泽尔的意图是真诚的，并且决定把他推荐给秘密督政府，后者当时正需要在格雷涅尔营物色一位军事代表。于是，格里泽尔被任命为军事代表，芽月26日，达尔蒂把委任指令交给他②。

① 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自由法兰克人给他的朋友恐怖者的信》。见第九号文件。

② 这些指令见第十号文件。

民主主义的论著

当上述代表制度的组织工作圆满完成以后，秘密督政府便马上不遗余力地宣传那些旨在启发人民觉悟的论著，因为重要的是应当向人民证明：它的最高权力已被现政权篡夺；1793 年宪法是唯一合法的宪法；普遍幸福只能从真正平等中产生；人民所遭受的不幸，并非和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是由于革命的过错，而完全是由于革命没有达到目的。

民主人士全都动笔写作。巴贝夫在他的《人民护民官报》上详细地阐发了起义组织的思想。西蒙·杜布雷依通过一份名为《侦察兵》的小刊物，在最劳苦的阶级当中宣传同样的理论。主持《自由人报》[82]的那些共和主义者，也给民主制度作出重大贡献。他们敢于开展关于统治形式和伟大的平等制度的讨论；他们事先提出一些反面意见，然后针对这些意见作出无可辩驳的答覆，以此论证平等制度的正义性。

秘密督政府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言之有理地向人民指出他们借以实行联合的要点。它通过《巴贝夫学说剖析》来进行这项工作。这篇论著在芽月 20 日就已经大量散发和张贴。尽管政府力图不让人民看到这篇东西，然而，它是那样地震动人心，以致贵族们也把它当作一篇大胆和惊人的杰作而在他们的报刊上转载，至于爱国人士，则把它作为他们的话题并寄以厚望。

芽月 23 日，发表了《对于我们的两个宪法的意见》①； 24 日，

① 这个文件已遗失。

发表了《自由法兰克人给他的朋友恐怖者的信》；25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应不应该服从 1795 年宪法？》① 的文章；27 日，散发了《护民官告内地军人书》②；29 日，散发了《给 M. V. 的复信》③；花月 1 日，公布了《法国人民反对其压迫者的呼声》④。

人民的贫困

大批爱国人士继续遭受迫害，劳动人民日益陷入贫困，这给秘密督政府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当时，在指券不断贬值而不得不削减食品供应的情况下，工人只好取消自己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或是变卖自己仅有的衣物⑤。

这种贫困境况，加上秘密督政府的揭示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和指出彻底消除这种贫困的办法的宣传品，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和普遍的骚动，秘密团体所散布的不满情绪很快就公开爆发出来，共和四年芽月中旬，在巴黎的街道上、广场上和桥头上举行了许许多多的集会。

到那时候，人民主权的篡夺者才确切地了解到他们的敌手已

① 见第十一号文件。

② 见第十二号文件。

③ 见第十三号文件。

④ 这个文件没有找到。

（在本注和上页注①里提到的两个遗失的文件已被苏联学者发现，收在本书俄译本中，我们已转译过来，编入本书下卷附录中。——译者）

⑤ 对劳动阶级的苦不堪言的物质状况实行这种令人愤慨的侵犯，乃是取消以下两项措施的结果：食品限价和对富人征用实物——热月 9 日以前防止滥发指券的两种办法。热月 9 日以后，居民的粮食供应掌握在贪婪的财主和商人手里，这些人大都敌视有利于人民的改革。于是，穷人丧失了生活必需品，富人则更加穷侈极欲。

经联合为一股力量；了解到人民在追求平等制度和民主宪法的同时，为在共和二年热月和三年牧月期间成为贪赃枉法和贵族制度的牺牲品的人士感到痛惜。

起义精神的发展

在巴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居民和士兵的意见、言谈和讨论，每天都通过代表的报告和身为秘密督政府成员的监察员的口头汇报上达秘密督政府。秘密督政府还从许多巧妙地打入政府警察机关的民主人士那里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

秘密督政府立刻就发现自己的影响超过了原先的期望，它感到有必要采取它所能借助的一切手段，来促进和指导这个已经出现了种种征兆的人民运动，从而使这个运动变得大有可为。

秘密督政府的活动

密谋家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巴贝夫的秘密住所举行会议。巴贝夫身边经常隐藏有关密谋的主要文件和印鉴。印鉴的一角刻有“救国”字样，革命代表是凭这个印鉴来识别秘密督政府所发布的命令的。

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有：

代表们的报告和批复这些报告的文稿；

付印前的文件；

关于起义方式的建议；

起义后应当立即颁布的法令;

共和国的机构和组织。

凡在秘密督政府中经多数通过的决议,都加以登录,作为进行通讯和密谋家们分头做准备工作的依据。所有这些决议都不经签署。所有的信件和指令,几乎完全是由当时在迫害之下而不得不隐蔽起来的巴贝夫执笔的;这些公文由一位秘书负责送发,凡是发给革命代表的公文,都由艾里迪负责转达。

用以代替现政权的权力机关

在决定要把人民的行动引向反对现政府并确立1793年宪法以后,秘密督政府势必要解决一个由于局势关系而变得异常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权来突然地代替那个要被摧毁的政权。

人们坚信:要立即召开初级会议来任命一个立法议会并成立符合1793年宪法精神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危险的。首先,显而易见,从举行起义到建立新的宪政,需要有一段时间;同样也很清楚,使国民陷于无领导的状态,即使是片刻,那也是极不明智的。秘密督政府还基于其他一些理由而断定:那一段时间要比仅仅举行选举和新代表上任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秘密督政府所持的理由,是值得进一步介绍的。

在立宪制度建立之前所需要的政权

改变社会管理的形式并非密谋家所追求的唯一目的,他们还

希望使法国拥有良好和持久的法律，这是他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抱负。虽然秘密督政府知道，颁布和执行法律的方式能够对有待建立的制度起一定的影响作用，然而，法国革命的历史和经验使它了解到，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是：公民之间的分裂，对立利益的出现，敌对情绪的产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变得愚昧、轻信并成为过度劳动的牺牲品，因而受一小撮有过教养的老奸巨滑之徒的统治，后者滥用他们所占有的特权，一心一意只想保持和巩固仅仅对他们有利的财富分配制度和特权地位。秘密督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对自然制度如此陌生的人民，是完全不能够进行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的；他们需要借助一种非常的手段来使自己重新处于一种能够名符其实而不是虚有其表地行使其全部最高权力的地位。

从这种想法中产生了用一个临时的革命政权来代替现政府的方案。这个临时革命政权的组织方式，应当可以使人民永远摆脱平等制度的真正敌人的影响，并且赋与他们以建立共和制度所必需的统一意志。

这将是一种什么政权呢？秘密督政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过去在阿马尔家里开会的时候提出过的三个建议，又重新搬了出来：第一个建议是召集部分国民公会代表；第二个建议是建立专政；第三个建议是建立新的机关，责成它把革命进行到完满的结局①。

① 据我看来，法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国民公会时期的动乱和变化足以说明：在不平等制度和专制制度下形成其观点的人民，在一个新兴的革命的初期，是没有什么能力通过选举来指派足以领导并完成这场革命的人物的。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由一些英明和果敢的公民来完成。这些公民对祖国和人类具有高度的热爱，长期以来就在探索社会疾苦的原因，从而摆脱一般的偏见和通病，他们比同时代人先知先觉，视富贵

召集国民公会

在最早那个委员会中，阿马尔曾提议召开国民公会。他说，这个机构只能被一个合乎人民心意的政权所代替，尽管国民公会所赖以存在的宪法与法律跟最高民意相悖，但它仍不失为唯一合法的政权。另一方面，——阿马尔继续说——，法令是否合法，须视代表是否享有自由，而这种自由的保障，表现在对这些代表可能提出的任何严重指控，都要遵循既定的诉讼程序。然而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国民公会的一些代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手续，便横遭逮捕、流放以及被剥夺掉政治权利。由此可见，国民公会在这些暴行出现以后所进行的活动，是无效的；共和三年宪法的修订，应当认为是不算数的；人民的真正代表，仍旧是那些没有参与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或是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品的人。

反对意见

根据以上的论断，阿马尔建议让那样一些国民公会成员来重新行使最高权力：这些成员或是被国民公会宣布为丧失代表资格，或是被开除出立法议会，因而没有参与违法侵权行为。

荣华如粪土，把为保证平等制度的胜利而使自己永垂不朽引为幸福。也许在一场政治革命开始的时候，也正是出于对人民的最高权力的真正尊重，所应当做的与其是收集国民的选票，毋宁是如何保证在尽可能避免专横的情况下使最高权力落到英明和坚定的革命者手里。

其实，就在这样一些国民公会成员中，也有许多人被指责为参与热月9日的罪行：他们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等等幌子下对民主派进行迫害；查封民众会社；把七十三名吉伦特党人弄进国民公会；释放一切贵族分子；还有，由于他们的软弱而使自己的许多同僚罹难；他们对篡改宪法的建议保持沉默；他们迷恋于争权夺利，他们有些人已经发财致富，他们在捍卫人民的权利方面畏缩不前①。

那些深深地意识到只能把祖国的命运托付给最明智、最果敢的人士的人们，能否下决心让那些在位时就已经弄得如此声名狼藉的人来重新掌握最高权力呢？

秘密督政府认为，它应当更为重视那些具有充分根据的理由，而不应当贪图那种疑点重重、徒有合法的外表的好处。人们曾希望借助于这种貌似合法的东西来缓和旧恨并消灭反抗。

于是，它提出相反的考虑：由于把自己的计划的实现完全寄托在整个共和国的民主派的影响作用上，并有一切根据认为全国的民主派一定会支持巴黎民主派的发难，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把一切模棱两可的手段抛在一边，而要优先考虑一种最为可靠的途径来防止掌权人物犯错误和软弱无能。

由巴黎起义者任命的临时权力机关

在否定了召集国民公会这种意见以后，秘密督政府便停留在

---

① 尽管秘密督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由对这些国民公会成员中的许多人表示不信任，但是它同样地也对他们当中许多人给予应有的尊敬。

这样一种想法上：由举行起义的巴黎人民任命一个临时权力机关，委托它来管理国家大事。事实上，在不可能马上举行由全体法国人民亲自参加的选举的情况下，这种作法是使人民的最高权力受到尽可能的尊重的唯一方法。除了这个优点以外，这种作法还有这样一个好处：使那些在维护新的革命事业中表现英勇，因而进一步证明他们对这个革命的原则忠心耿耿的人们，有更大的中选机会。

这种制度完全跟人民的最高权力协调一致

秘密督政府预见到，平等制度的凶险敌人必定会设法煽动外省居民反对巴黎强盗篡夺人民的最高权力——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一心一意要按正义来行事的秘密督政府，研究了这种反面论调。它是这样来驳斥这种论调的：

“只要存在着专制制度，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尽一切力量来消灭这种制度。但是，在一个广袤的共和国里，全体人民是不可能为此目的而同时向应被推翻的政权冲击的；因此，离那个政权比较近的人们，应当首先拿起武器；由于马上用新政权代替旧政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起义者理所当然要关心这件事情。

此外，由于推翻专制政权的权利自然而然地要由离这个政权比较近的那部分人民来行使，因此，这部分人民也就享有其他任何一部分人民所不能享有的这样一种权利——用一种尽可能符合人民享有最高权力的原则的管理形式来临时地代替旧政权。”

接着，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应当建议起义的巴黎人民采取什么

样的临时管理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秘密督政府的一些成员主张实行个人执政，另一些人则希望建立一个由少数经过考验的民主派组成的新机关。后面的这种意见占了上风。

专政被否定

主张实行专政的比东和达尔蒂，是把专政这个字眼跟委托一个人来掌握非常权力这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具有双重任务：第一，向人民推荐一种能够保证他们平等并真正地行使其最高权力的简明的立法；第二，临时地实施一些准备措施，使人民能够接受这种立法。据他们看来，象这样一项重大而又豪迈、并且只有在思想和行动完全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够很好地完成的任务，应当由一个人来策划和执行。为了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他们援引了古代民族的事例，并且提醒人们注意多头制的极其有害的后果。他们认为，不久以前在救国委员会中所出现的分歧，便是这种后果的证明。

据他们看来，在实行上述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滥用职权的危险，是可以很容易地避免的，只要大家很好地了解这个掌权人物的品质，根据法律清楚地阐明这个政权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且事先规定出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限。

在这方面，秘密督政府的任务可归结为：把改革的目标草拟成为数不多的几个条款；规定新的政权机关的任期；发掘品质最好的共和国公民；以及使起义的巴黎人接受自己的方

案①。

然而，秘密督政府并不这样考虑。这并不是它认识不到那些主张专政的理由的正确性。人选的困难，对滥用职权的顾虑，这种管理制度在表面上跟君主制政权的雷同，更主要的是那种不可克服的普遍成见，凡此种种，促使他愿意要一个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机关。对这个机关可以委以同样的权力，但可以不担上述种种风险，并且不需要克服那么多的障碍。

应向起义的巴黎人民推荐的由每省选派一名民主人士组成的机关

这次重要的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在推翻专制制度以后，建议巴黎人民成立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这个机构由每省选派一名民主人士组成②；而秘密督政府则对所选派的民主人士进行仔细的审查。在革命以后，秘密督政府将不停止自己的活动，它将对新的国民议会的行动实行监督。

在密谋家们磋商这些重大问题的同时，他们留心地体察了人民的种种思想情绪：他们不忽略任何能够保证他们在起义的日子——可能是战斗的日子——取得胜利的东西。事实上，有理由认

① 只要理智地想一想，法国的民主和自由的丧失，如果不把它归诸于国民公会中意见分歧、利益对立、道德沦丧、缺乏团结和不够坚定的话，还能归罪于什么呢？据我看来，其所以需要一个坚定不移的政权，不是为了保卫平等制度，而是为了在一个堕落的民族当中建立起这种制度。可以设想，如果在共和二年或三年人们能够那样地明智，也就是把比东和达尔蒂所建议的那种专政托付给象罗伯斯比尔这种品质的人的话，那么革命就会达到它的真正目的。

② 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划分为97省。

为，军队会投到民众运动方面来；但是，如果不把坏公民即军官对那些愚昧和盲从的士兵所起的影响估计在内的话，那是极不慎重的。

秘密督政府为使人民变得比军队更为强大而采取的办法

在加紧努力把政府的军人吸引到人民事业方面来的同时，秘密督政府设法使民主派的力量比这些军人的力量更为强大，以便为有朝一日进行较量作好准备。秘密督政府试图及时地建立起一支人民军，为此，它收集有关民主派的人数、素质和能力的资料，以及关于敌人的力量和人民可以取得武器弹药的地点。它在巴黎替响应号召而从法国各地前来支援自由之友的共和党人准备住处，并且密切注意粮食仓库，为的是在伟大的赎罪日到来的时候，人民不会像共和三年牧月那样受饥饿所迫而离开战场。

里昂的共和派

在外省的爱国人士当中，里昂人特别受到秘密督政府的重视。在客居巴黎的里昂人当中，有一些人还是罗伯斯比尔的心腹；至于那些留在里昂的人，从他们的表现来看，是足以肩负最重大的使命的。秘密督政府授命贝特兰——该市原市长负责团结这些人士，并且以起义组织的思想来领导他们。

巴黎的大骚动

共和四年芽月20日，在巴黎人民当中出现了一次强烈的骚动，那些罪恶的派别极力想利用这种情况来牟取私利，他们跟民主派展开斗争。

政府中的两派

从那时起，政府中存在着两个主要派别。那些打着平等的旗号而巧妙地掌握着财富和权柄的人，也就是被我称为平等制度的假朋友或野心勃勃的利己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派别，这一派的公认领袖有巴拉斯、塔利昂、勒让德尔、弗雷隆、梅兰·德·提翁维尔、勒贝尔等等[83]。另一派则由旧的不平等制度的朋友们组成，当我用保守派利己主义者或旧贵族这个名称时，所指的就是这些人。这一派所联合的人有：残余的吉伦特党人；新宪法的制订人；以及一些保王党人——他们想利用这一派的舆论影响或是任何具有消灭平等制度的倾向的东西来取得若干好处。属于这一派的人物有：布瓦西·丹格拉、拉里维埃、蒂博多、杜莫拉尔、卡米尔·若尔当、拉雷韦伊埃-莱波、朗热内、波塔利斯、巴斯托雷、西梅翁等人[84]。

第一个派别仅仅是在宪法能够帮助自己占上风的时候才承认宪法；第二个派别则期待通过一丝不苟地执行宪法来为自己取得新的成就。前一派人数较少，但进取心较强并敢作敢为，他们企图

采取暴力行动来对付另一派，指责后者蓄谋恢复君主制度；后一派人数较多，但比较虚伪和胆怯，他们想依靠宪政的武器来制服自己的对手。不论哪一种贵族制度，除了反对平等制度以外，还反对它唯恐成为自己的劲敌的其他任何一种贵族制度；在消灭自己的敌手方面，它是不择手段的。由于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行动不轨和贪心不足这种罪名更能够败坏社会活动家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旧贵族便力图利用诸如此类的指责来煽起人民对平等制度的真朋友和假朋友的不满。对于平等制度的假朋友来说，人民对他们的这种不满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平等制度的假朋友想把旧贵族分子排挤出政权机关

对于上述的攻击，那些野心勃勃的利己主义者把所有多多少少参加过革命的人全都抬出来进行抵挡。他们巧妙地把一切批评他们的罪行的人一律说成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用帝制行将复辟的危险来恐吓各式各样的共和派；他们硬说，为了反对保王党人的阴谋，就必须忘掉人民的权利，并且扬言只有他们才能够压制保王党人的气焰；最后，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来使自己成为人民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运动正在临近。

从这一派人的计划来看，他们想把起义操纵在自己手里，而起义的唯一目的，便是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人，例如布瓦西·丹格拉、伊纳尔、卡德鲁瓦、罗维尔、拉里维埃等人[85]，从立法议会和政府

中清洗出去①。

他们试图把爱国者和人民笼络在自己周围

为此目的，人们在立法议会上针对不久前在法国南部发生的屠杀事件慷慨陈词。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当中，有几个人被指控为这些屠杀事件[86]的挑动者，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人的敌手，长期以来在挑起这些屠杀事件。

那些背叛自己信念的伪君子，星罗棋布地占据着社会公职，他们对保王党阴谋家的人数和图谋大肆进行渲染，以转移人民对平等制度的假朋友所犯的罪行的注意力，并且极力使他们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

这样一来，那些眼光比较短浅的共和派既受背信弃义的革命家的花言巧语的影响，又受名符其实的民主派的忠告的影响。

这种双重影响给秘密督政府的活动造成了危险的障碍，秘密督政府很快就感到必须克服这种障碍。

秘密督政府捣毁了这个陷阱

秘密督政府仍然是从真理中探索补救的方法；它发现了这个

① 从这样一些线索中，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在共和五年果月18日事件中占了上风的一派和在这次事件中一败涂地的另一派。这个事件由于共和派的坚定态度而被推迟。共和派跟上述两派都是对立的，从而迫使这两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民主制。

陷井，把它捣毁。在一期《人民护民官报》① 上专门揭露了混入人民党派当中的变节分子的罪行，使得这些变节分子的密使们感到狼狈不堪。可以确凿地说，他们在诚心诚意参加革命的人们当中，连一个支持者都没有。尽快地推翻共和三年宪法所确立的专制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愿望。

由被排挤的国民公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当时，秘密督政府了解到：里科尔、阿里诺热、欧杜沙、阿马尔、雨盖和雅沃格②[87]——所有这些人都是国民公会中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受到排挤的山岳派——已经商量好要领导他们所预期的起义，以恢复国民公会，进而恢复 1793 年宪法。这种意图——当时人们毫无根据地认为是巴雷尔和瓦迪埃的打算——引起秘密督政府的高度重视，它认为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讨论。

秘密督政府使该委员会的努力徒劳无功

应不应当把位子让给被排挤的山岳党人？要不要设法跟他们联合？要不要反对他们的意图？这就是秘密督政府内部在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

其所以对山岳派委员会抱否定态度，除了跟反对召开国民公会所持的同样理由以外，还基于这样的认识：该委员会的成员有的

① 见第十四号文件。

② 雨盖和雅沃格两人在格雷涅尔营大屠杀时被坦普尔军事委员会所杀害。

缺乏民主观点，有的过于软弱。但是，由于大家承认这些人曾经替共和国出过力，因此，对他们仅限于采取这种办法：责成革命代表启发人民不要去相信可能在这些山岳党人煽动之下而采取的步骤。同时，革命代表还负责关心山岳党人的安全，并负责把政府准备迫害他们的措施事先透露给他们；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是由警务部的几个主要代表每天向秘密督政府报告的。

平等制度的假朋友跟旧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民主派

当初站在共和国政权方面的一切罪恶的派别，由于面临同样的危险，便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反对民主派。

民主原则以那样快的速度重新获得传播；政论文章是那样大胆地号召人们去发动一次新的救世革命；为把篡夺权力的人们的罪行公诸于世和理直气壮地要求实现 1793 年宪法而召集的集会是如此之多；人们的意志是如此协调一致，它表明一个广泛的计划正在展开，但这个计划的主谋人却又如此难以令人捉摸；还有民众的急不可待的情绪和密谋家的胆略惊人的表现，这些都在平等制度的敌人的队伍中引起一片恐慌。他们感到有必要停止内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对付那些不可救药的通俗理论宣传家。

督政府的反对民主派的文告

就在这时候，一切反对社会改造的人都因督政府所发表的一

个文告而趾高气扬。这个文告对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污蔑，并且主张通过法令来把他们判处徒刑和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用来替强行查封先贤祠协会的行径进行辩护的那种伪善言论，更为阴险地露出其恶毒的锋芒。

为了激起人们对民主派的公愤，政府指控他们想把国家推进可怖的无政府状态，仿佛他们这种企图具有双重目的：企图重新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并且趁火打劫以便发财致富①。

通过诸如此类的责难，那个在热月事件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公会，得以把新贵族制度的枷锁套在法国身上。然而，把那些虽然担任过许多财源滚滚的职位、但革命后仍然两袖清风的人指控为贪赃枉法，难道合乎常理吗？那些在热月 9 日以后犯了累累暴行的人，竟然指控那些归根到底只不过要求实施人民所批准的法律的人为无政府主义者，这难道讲得通吗？据民主人士看来，那种侵犯人民的自然权利，从而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混乱状态或是垂死的

① 正是通过同样虚伪的手法，所有那些用来铲除君主制度和战胜外国敌人的伟大措施的思想，都被说成是君主制度和外国敌人的思想；那些以大公无私的行为证明自己对平等和自由事业高度忠诚的人们，则被贬为伪装的保王党人。首先采取这种手法的是吉伦特党人，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在审判国王期间的行为和自己对共和国的真正奠基人所抱的仇视态度进行辩解。后来，这种手法又为一些政治庸人所进一步完善；这些人没有能力进行旨在拯救和振兴民族的那种高尚行为的运动，他们只能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为了出这口气，他们采取卑鄙的阴谋诡计——这是他们的全部政治学识——去贬低伟大的人物，后者的品质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听信这些人的话，革命运动的首倡者和领导者，都是那些主要在这个运动中蒙受损失的人；要求宣判路易十六的，是那些跟他称兄道弟的人；在 9 月 2 日和 3 日丧命的保王党人，是他们的朋友的深谋远虑的政策的牺牲品；而那种把法国从敌寇入侵危险中拯救出来的人民热情，却是那些希望祖国被入侵的人们一手炮制的！……毫无疑问，欧洲贵族策划了不少阴谋来反对法国革命，但是，依我看来，如果把这些阴谋的迹象看成对革命有那么严重的危害的话，那是荒谬绝伦的。

昏沉状态的所谓法律，才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无政府主义。民主人士的一贯的行动表现和他们要求建立真正的共和国的坚定意志，就足以回答隐蔽的保王派所提出的指控，已经没有任何人再相信这个保王派了。保王党人却欢迎这种骗人勾当，因为它使他们摆脱了最可怕的敌人，并且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奢望——把原来的死敌变为自己的帮手。

象这样一些有充分根据的理由，并没有使厚颜无耻的督政府感到腼腆。这个靠侵犯人民权利起家的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消灭人民的权利，这种卑劣的意图，使它不知天下有任何羞耻事。它认为，只要坚持造谣污蔑，就能够扑灭真理，它满以为只要不断地用最恐怖的色彩来描绘自己的敌人，就可以把社会的一切阶级笼络在自己的周围。

但是，在这个毫无信义的文告里，毕竟还包含一个真理，一个使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吓得面无人色的真理，那就是：它证实了一个主张推翻新的立宪专制制度的大无畏社团的存在。

违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

当时，代表们是如此腐化堕落和懦弱无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公开地维护人民的权利。五百人院的全体成员，除了十二个人以外，连忙在共和四年芽月 27 日和 28 日通过了为害非浅的法律[88]；他们在另一个院里的高贵的同僚们，在同一天也全体一致地批准了这些法律。

这些法令根本不配称为法律，它们是对社会自由的侵犯。根据

这些法令的规定，公民的一切和平集会，都可以当作纠众滋事而被驱散；凡是敢于探讨政治制度的优劣利弊的人，都可能被判处死刑；对国家宪法的任何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已经被剥夺掉讨论法律和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的法国人民，还被剥夺掉对国家大事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

对民主派进行新的迫害

从那时候起，专制制度的喽啰们，变本加厉地对民主派的演说家、作家以及替民主派散发书刊文件的人进行攻击。微不足道的议论和一丝一毫的怨言，都变为煽动叛乱、从而成为随时把最优秀的公民投入监狱的借口；为祖国的灾难而忧伤的和平人士，为了想从友情倾诉中寻找若干慰藉而时常出没于公共场所，竟受到武力的对待。

自由之友的愤慨

一切真正的自由之友都怀着满腔义愤，他们下定决心反抗压迫；他们公开表示实现如下誓言的时刻已经来到：不自由，毋宁死。

秘密督政府使他们不能忍耐的心情平静下来

可是，处于知己知彼地位的救国督政府，认为战斗的时机尚未成熟。它担心，一次没有经过很好准备的草率行动，会象过去那

样给贵族政权的建立帮大忙，同时，它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关系到民主制度存亡的最后一次努力，因此，在它看来为取得起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因素还没有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以前，它不能够下决心发出进攻的信号。

尽管秘密督政府的领导人为掩护起见而改名换姓，但是，关于他们的社团和他们活动的事迹，是一切民主派都知道的；这就增强了民主派的希望，使他们易于接受革命代表或是《人民护民官报》和《侦察兵报》所提出的意见。

一系列的风波曲折，终于使大家懂得，真正的共和制要想得到拯救，只有靠一切共和朋友的协助。共和朋友信任那个人数不多的领导集团所拟定并秘密地加以执行的计划，这个领导集团的人物是如此坚强，他们不会由于自己的事业屡遭迫害以至几乎濒于覆灭而悲观失望。

依靠人民的这种信任，秘密督政府得以制止芽月 27 日和 28 日法令可能挑起的为时过早的暴动；就连最温和的人，也会把这些法令跟以往的军事法令相提并论。秘密督政府一方面制止人们危险地发泄其愤怒情绪，另一方面则连忙把一切能够使它很快地收拾局面并牢靠地取得胜利的线索都收拢在一起。据它看来，迟疑不决的态度会助长敌人的威风，分化自己的朋友和挫伤他们的锐气，因此，这种态度的危险性并不亚于轻举妄动。秘密督政府下定决心尽可能快地拯救自由，否则便与自由同归于尽。于是，它敦促革命代表加紧进行活动，加倍努力地设法把它感到把握不大的军队吸收到自己方面来，而它自己则孜孜不倦地研究起义的方式并且拟定起义以后所要颁布的法令。

有关起义的若干措施

自然而然地要提出来讨论的首要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来瓦解那些非法的权力机构，以及怎样使它们的成员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办法来反对平等制度。秘密督政府的一致打算是，通过一种伟大的司法范例来达到上述的双重目的，这既能够使叛逆者慑服，又能够使那些未来为人民所信任的人受到尊重。

两院和督政府的成员，显然犯了如下罪行：以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方式进行叛变和明目张胆地违法侵权。他们沾满了优秀公民的鲜血，他们剥夺掉人民的主权，并且不惜为了满足一小撮贪得无厌和野心勃勃的有钱人的要求而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严厉的惩罚将会是必要的，然而，在正义的、以救世为宗旨的恐怖日子过去以后，就要继而采取宽大为怀和不究已往的态度，从而使那个恐怖日子留给人们的回忆，只不过是一次后发制人和合乎法制的激烈行动而已。

大部分不满的、激动的和不幸的巴黎人，都把眼光放在过去，并且为热月 9 日以前的那些日子感到惋惜。为了推翻暴君，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大无畏的共和派的领导，而后者则只是在等待我们的密谋家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密谋家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是使劳动人民摆脱现政府的影响，使他们完全置于民主派的影响之下。因此，他们决定：在起义的那天，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切现存联系都将断绝；秘密督政府把旗帜交给它所选拔出来的人们，而人民将站在这些

旗帜之下；在这一天，凡代表专制政权发布任何命令或执行其命令者，均以叛国论罪，就地正法。

起义法令

为了使它所策划的那个伟大运动能够井井有条地进行，秘密督政府认为有必要公开宣布自己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并且以这种身份向人民指出：他们应当提出什么要求，应当沿着什么道路前进，应当克服哪些困难，应当揭穿什么样的阴谋诡计。

为此目的，经过长时间和慎重的讨论以后，他们通过了著名的起义法令。这个法令的公布，就是发动一次新的革命的信号①。

在这道法令中，除了跟推翻专制制度直接有关的指示以外，还包含许多立法措施的萌芽。这些旨在向人民证实秘密督政府的良好意图和它的事业的合法性的措施，有以下几条：

把叛逃者、谋反者以及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祖国保卫者和穷人；

立即让穷人迁入谋反者的住宅；

无偿地发还人民典押在当铺中的物品；

凡在起义中牺牲的公民。其妻子、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其他必须依靠他们生活的人，都由人民负责赡养。

---

① 见第十五号文件。

起义法令中关于分配财产的规定旨在导致公有制

如果认为，广泛分配财产这种诺言是跟人们所要实现的公有制度的精神有所抵触，那是不正确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取得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通过起义法令的秘密督政府，感到它不应当表现得过于谨小慎微，以免使自己真正的朋友感到失望，同时也不应当过于冒进，以免树立过多的敌人。

由于许下分配财产的诺言，秘密督政府受到了劳工阶级的注意，使该阶级对它寄以厚望，同时，也并没有引起那些虽然痛恨新的贵族制度、但却也不喜欢真正的平等制度的人们的不满。分配财产不等于瓜分地产，因为真正的财产不是土地，而是土地所产生的果实。所以，只要分配这种果实，上述诺言就完全得到实现，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正是秘密督政府想要做的。

巴黎人民在推翻专制制度以后的集会

在推翻专制制度以后，巴黎人民应当马上在革命广场上举行大会。在会上，秘密督政府要向巴黎人民报告自己的活动；要向他们指出，他们所抱怨的一切不幸，都是不平等的结果；要提醒他们想到他们有权利期待 1793 年宪法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且提请他们通过起义法令。接着，要建议起义人民当场成立临时政府。这个政府负责把革命完成，并负责管理国家大事，直到人民机关开始进行活动为止。

新的国民议会

为了使胜利的人民能够颁布真正地符合于他们的法令，秘密督政府打算把它认为最值得信任的民主人士的名单提请人民表决通过。由此产主新的国民议会，应当向上天起誓要全心全意地为所有的人谋幸福，并且要忠诚地执行下面的法令所规定让他们执行的命令。

应当提请起义的巴黎人民批准的法令

“推翻了专制制度和享有自然所赋予的权利的巴黎人民，承认并向法国人民宣布:

“财富分配和劳动分担的不平等，是奴役制度和社会灾难的永恒的根源;

“人人劳动是社会公约的主要条件;

“法国的全部财富的所有权，实质上属于唯一能够创立这种财富并改变其分配办法的法国人民;

“巴黎人民命令那个代表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并以全体法国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国民议会负责修改1793年宪法，为迅速实施这个宪法进行准备，并且通过建立在上述公认的真理基础之上的合理机构来确保法兰西共和国享有永恒的平等、自由和幸福;

“巴黎人民责成上述国民议会至迟要在一年以内向全国人民报告其执行本法令的情况;

"最后，巴黎人民应当教育人们尊重这个国民议会作出的跟上述指示的精神相符合的各项决议，同时对国民议会的渎职人员，应当作为叛国者来惩处。"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秘密督政府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法令来决定共和国的命运，而首先，我们应当追溯一下密谋发展的过程，因为了解这个事件的一切细节，是很重要的。

警备团的起义

当我们的督政府在不动声色地周密考虑其伟大事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它的影响作用开始在驻扎在巴黎及其郊区的部队、特别是在警备团[89]和守卫立法议会的榴弹兵当中表现出来。

没有任何东西更能比这种对抗情绪使政府恐惶不安了，因为这种情绪的许多迹象，已经可以在军人当中看到；这在政府看来，不啻是失去其对付人民的怒火的唯一支柱。因此，在对警备团用尽一切诱惑手段以后，它只好下令把这支部队的最不听话的两个营调出巴黎，虽然按照规章制度，这支部队只能在市内服役。这道命令是在花月 9 日签署的，在它颁布以后，继而出现的是正式违抗命令的行为，这种行为直接引起人民的愈益激烈的骚动；看来，清算专制制度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虽然这个团的反抗事件并不是由秘密督政府直接策动的，然而，秘密督政府所孜孜不倦地宣扬的原则，促使了这一事件的爆发。秘密督政府还认为，胜利的时机在望；如果它有把握在警备团中找到足够的力量来抵挡住政府的初步进逼、从而使人民的信心

得到加强的话，那么，尽管它还没有掌握一切必要的情报，但是会下决心发出起义信号的。

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支撑点，它使用了一切手段，并在刹那间燃起一种希望，即使内地军①普遍起义。革命代表有的分布在军队中，有的则随时在准备发动人民；在警备团中很快建立起来的委员会，由于热尔明的在其中发挥作用，已经跟秘密督政府取得联系；警备团的告人民书和密谋家以人民名义撰写的答复文件②，都向善良的巴黎市民指出了他们所应当完成的任务；民主派已经全付武装起来；一切都已经开始行动，然而，由于起义的营队出人意料地投降，便使运动中止了，因为人们担心会给祖国带来难以复原的打击。

警备团的解散

关于解散该团的法令扼杀了处于胚胎时期的起义。可是该团相当多的士兵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道法令；这使人有理由相信：许多士兵其所以进行反抗，其真正原因在于害怕被送上前线。而这种现象却被具有共和主义情绪的士兵轻率地看成是大无畏的爱国主义。

爱国人士收容该团士兵

不管上述违抗命令的原因是什么——也许这些原因还弄不太

① 指在热月9日以后为了恐吓自由之友而驻扎在巴黎周围的军队。

② 见第十六号文件。

清楚，民主派可以说已经从这个事件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不仅收容了该团具有明确认识的士兵，而且还几乎收容了全部服从政府命令的士兵。由这一大批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军队，秘密督政府打算使这支军队成为起义军的先锋。这个鼓舞人心的事件更使人民急不可待。人民日益滋长的急躁情绪不啻是对秘密督政府的一种警告：如果这次密谋仍然迟迟不摊牌的话，那是极其危险的。局部的、显然毫无收获的行动即将发生；另一方面，折损一定数量的警备团士兵也是在所难免的，他们将会因唆使其伙伴进行反抗而被捕；应当防止错误的步骤，必须粉碎暴君的武装。这种情况促使秘密督政府把起义的时间提前。当时已经是花月10日。

据我们这些密谋家来看，有两种事情是不可缺少的：一是谨慎，这点做不到的话，就没有成功可言；二是勇敢，它能够克服任何人所无法预见的障碍。他们以前者作为指导，并一贯把后者看作自己的义务。他们希望早日把事件结束；在发动巴黎市民方面，他们依靠的是民主派的力量，后者了解人民的迫不及待的心情，对军队的情绪有充分的把握，同时还掌握了离队的警备团士兵。有鉴于此，密谋家们打算把自己的力量最妥善地组织起来。也正是为了做到这点，他们认为有必要把那些既热爱民主制度，又熟悉军事的公民联合在自己的周围，花月11日下午，秘密督政府召见菲昂、热尔明、罗西诺尔[90]、马雷萨尔和格里泽尔——所有这些人都是军官和将领。其所以把格里泽尔也召到那里去，是由于人们认为他在格雷涅尔营有影响作用。

共和四年花月 11 日召开的军政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巴贝夫、邦纳罗蒂、比东，达尔蒂、马雷萨尔、艾里迪以及上述五位军人①，秘密督政府首先向这五位军人介绍了自己活动的目的；告诉他们哪些目标已经达到，哪些还有待努力；然后，向他们介绍了起义法令，他们表示赞同；最后，还请他们一道讨论应当采取什么手段来保证人民取得胜利。

作出的决定是：秘密督政府在保留一切措施的创制权和对运动的最高领导权的情况下，把进攻和防御的事宜委托给一个军事委员会，并把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和计划交给后者。

上述五位军人被任命为这个新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定于第二天在艾里的寓所(蒙布兰路)召开。

在我们刚提到的秘密督政府扩大会议上，热尔明表现为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马雷萨尔不改其在阿马尔家里所显示的本色，格里泽尔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角色，菲昂和罗西诺尔赞成秘密督政府的意图，但同时对没有若干前国民公会委员——山岳党人参加这次会议表示遗憾。

在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巴贝夫的藏身之所和秘密督政府的会址便迁移到蒙马特尔郊区乌勒克尔的家里，隐藏在这个地方的还有《人民侦察兵》报的编辑，后者当时已经了解这次密谋的部分

① 秘密督政府召开这次会议，是违反其组织章程第三条的规定的，这个错误是导致它的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否则的话，格里泽尔是不会认识这次密谋的领导人物的。

情况，并且参加了其中一部分工作。

军事委员会

热尔明是这个新委员会和秘密督政府之间的唯一联络人。这个委员会在几天以后，便从艾里的寓所迁到谷物市场附近克雷塞尔家里，它很快就熟悉了托付给它的事情，并在15日向秘密督政府报告了它的考察结果。

关于利用保王党人来协助民主派的事业的建议

在密谋家从各方面收到的许许多多的建议中，有两个建议特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个建议是要他们在推翻政府的时候灵活地利用对政府抱敌视态度的保王党人的力量，这些保王党人只是在起义的真正目的宣布以后，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这个建议被否决了，因为大家认为先把武装交给那些人，而事后又势必要跟他们作斗争，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大家还感到，只要保王党人出现在起义者的队伍中，就会使共和派心灰意懒，使他们对秘密督政府的措施丧失信心①。

关于行刺督政府成员的建议

第二个建议是由警备团的两位军官②提出的，他们建议在当

① 见第十七号文件。

② 指佩施和斯蒂夫。

天晚上行刺督政府的成员。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管辖一队爱国士兵，担任督政府的警卫工作。他们请求派一支由民主派组成的队伍来支援他们，以便举行起义。为了便于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还把自己的口令通知秘密督政府。这个建议也同样被拒绝了，理由是：在一切措施没有同时发生作用，从而胜利还没有十分把握以前，是不应当进行任何尝试的。

实际上，当时主要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了；立法方案每日都取得进展；积极的爱国人士已为人所知并已分别集合起来；起义法令和人民所必须遵循的指令已经印好并且已经发给代表们；人民的迫不及待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

但是军事委员会还没有能够就采取什么方法来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发起这次伟大的人民暴动提出自己的意见；除此以外，秘密督政府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保障那些对事业十分有用、然而身无分文的人们的生活；它甚至无法保证必须供应给起义者的火药。

密谋家蔑视金钱

资金极度枯竭，这可能是我们这次密谋的最显著的特点；在密谋家看来，爱财是一种罪行，秘密督政府通常只是为了印刷其宣传品和供养为其效劳的贫穷的民主人士，才向爱国人士募捐一点绝对必要的资金。而实际上，要想收买专制制度的一些代理人，要想使民主人士能够把受蒙蔽的士兵吸引过来和觉醒起来，也是同样需要花钱的。为了取得资金，曾经采取了若干步骤；但是秘密督政府最多只有二百四十法郎的现钞可供它支配，这笔款是由一个联

邦共和国的使节寄来的。花月 21 日警察闯进了密谋者的房间,没收了这笔款项。

仅仅依靠理智所承认的资财来行善,是何等困难呀!对于一个一丝不苟的共和主义者来说,要背弃理智所规定的义务,都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不至于看到自己的计划破产和自己不至于成为新的灾难的目击者而已!从军事委员会成立起,秘密督政府的成员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

罗西诺尔和菲昂主张让山岳党人参加秘密督政府

热尔明很快就觉察到,罗西诺尔和菲昂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接受秘密督政府的行动方式的。由于对山岳派代表有强烈的好感,他们痛心地看到山岳党人没有参加到秘密督政府里来。这种思想很快就完全支配了他们,这使人有根据怀疑,如果他们这种想法得不到赞同的话,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忠诚。

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山岳党人,是那些在热月 9 日以后被驱逐的国民公会代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曾经组成一个以恢复 1793 年宪法为宗旨的委员会;秘密督政府认为有必要制止他们的活动。

据菲昂和罗西诺尔看来,把这些山岳党人排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事情要重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似乎相信,只要这些旧日的立法者一出现,就会产生魔术般的功效,就会消除共和派之间的争端,就会很快地推动起义,并战胜外省的一

切反抗。

这种见解得到许多公民的支持；即使菲昂和罗西诺尔没有追随者，他们那种受到殷勤接待的情况，以及由于他们的威望(主要是罗西诺尔对安东区居民的影响作用）而使人们对他们的贡献的期待，也会使秘密督政府不得不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的意见。

山岳党人试图控制起义

正当那个时候，我们的督政府得到消息说，山岳党人委员会——罗贝尔-兰代[91]也刚参加该委员会——绝不放弃其成立时所追求的目标，并且打算借助于民主派所策划的运动来实现这个目的。它想控制这个运动，为此，它让自己的成员加入起义者的行列，并且把这些人描绘成人民的唯一代表。

德鲁埃跟密谋家取得联系

另一方面，以忠勇著称的德鲁埃知道了巴贝夫的计划，他跟达尔蒂过从甚密，并且也希望发动一次有利于平等制度的革命。秘密督政府打算把他们的威信变为起义的杠杆。然而，德鲁埃对于他的过去的山岳党人伙伴们的活动完全不感到生疏，看来，他倾向于把两个密谋合并为一。

秘密督政府举棋不定

热尔明终于使秘密督政府的困惑达到极点。他对菲昂和罗西

诺尔的打算感到极度不安，并对由于山岳党人的野心所造成的障碍表示震惊。关于山岳党人的意图，是里科尔和阿里诺热通知他的，他们还正式向他提出跟山岳党人实行联合的建议。热尔明毫不怀疑，这两个人是跟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军事委员会委员有联系的。

比东——这个一贯积极地参加秘密督政府的活动的人，不能够冷静地倾听关于让山岳党人加入秘密督政府的建议，他认为，这些山岳党人是应当对法国所蒙受的苦难负责的。他厉声疾呼道："你们请求那些由于野心勃勃，爱好虚荣，妒忌猜疑和愚昧无知而断送了自由事业的人来参加拯救自由这种光荣事业，难道不是玷污了你们高尚的事业吗？在这些人当中，难道不是有人在热月9日杀害了最坚定的爱国人士，恢复贵族阶级已经失去的权力，并且使保王党人的希望死灰复燃吗？难道你们能够忘记，最初就是他们唆使反革命分子去杀害平等之友吗？要当心！不要让他们获得一点点的势力，否则他们便会利用这种势力来欺骗和分化共和派。你们不是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来谈起罗伯斯比尔和跟他一道牺牲的伙伴吗？然而他们却慷慨地送给你们这样一些外号：极端分子、吸血鬼、独裁者和专制制度的喽啰。你们不是尊奉善行、道德和圣洁吗？然而他们却把你们称为宗教狂热者、苦行僧和诡辩家。你们不是向人民提出理智的忠告吗？然而他们却要大言不惭地说，只有他们能够预见一切和领导一切……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们所得到的只是对抗和不和。有人告诉你们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时糊涂而已；我认为，就连他们也决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可以不追究他们的过错，但是一定要强迫他们永远闭上嘴，因为要跟他们一道走真理和正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据比东看来，要想通过任何方式来促使这些山岳党人在重振公共事业方面助以一臂之力，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倾向于这样一种想法：宁可完全不采取行动，也不要所提议的那种联合。这种放弃密谋的想法使秘密督政府感到不悦，其中一个成员对这种思想大为震怒，以致脱口而出地指责比东胆小怕事。随之出现的一场争吵，虽然很快就平息下来，然而引起这场争吵的意见分歧，却深深地印在密谋家的脑海中；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切地感到：为了使优秀的民主人士不至于在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或甚至于让人民遭到更为沉重的压迫的情况下就牺牲掉，他们应当非常谨慎地从事。

毋庸讳言：跟山岳党人实行联合势必会出现一种比目前更不利于改革的局面；但是，山岳党人的胆大妄为，特别是菲昂和罗西诺尔的观点，看来足以成为阻止密谋的全盘计划的实现的障碍。

山岳党人所犯的错误和由于这些错误而引起的可怕灾难，不断地在密谋家的脑海中盘旋；他们清楚地了解到：从这些前国民公会代表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决定中，是不能指望建立起称心如意的、永恒的平等制度的。

在放弃这种平等的情况下，坚持从事密谋，等于承认自己见异思迁和心怀叵测；而在一切迹象表明成功在望的情况下，切断密谋的一切线索，则又会使自己成为爱国者和子孙后代心目中的罪人。由此可见，应当坚持最初的决定，并利用局势来给人民事业带来最大的好处。

秘密督政府决定跟山岳党人联合

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以后，秘密督政府同意实行联合的建议，同时决定采取重大的预防措施来遏止山岳党人的野心，并迫使他们协同实现本督政府的意图。

在同意实行这种联合的时候，有人作了一些说明，根据这些说明，秘密督政府应当恢复国民公会。这里指的是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被阿马尔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和仍然有权利存在的那一部分。如果这种见解原封不动地付诸实现，法国就会受到那些民愤很大的人们的摆布。为了避免那么大的不幸，秘密督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公会与否，须视山岳党人事先是否同意下列条件而定。

联合的条件

1. 国民公会只能由原先被驱逐的代表组成，此外，应由每省增派民主派人士一名参加国民公会，民主派的代表由秘密督政府提名，并由起义人民任命。

2. 立即无保留地执行起义法令第十八条的规定。

3. 服从巴黎人民在起义那天所颁布的各项法令。

在上述决定通知以后的第二天，热尔明便奉命把山岳党人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带到秘密督政府去。随后，秘密督政府立即转移到格兰德——特吕安德里路（蒂索的家），在这以前，它曾经在那里召开过几次会议。

山岳党人的使者谒见秘密督政府

花月15日早晨，热尔明把山岳党人派来的代表——里科尔带到秘密督政府去。在那里，人们跟这位代表进行谈话[①]，在谈话里向他介绍了一般情况，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过去根本不考虑跟他的委托人实行联合，而以后为什么又同意实行这种联合。人们还让这位山岳党人代表了解了起义法令的内容，接着便开始就修改有关成立临时政府的条款进行讨论。没费周折便达成了协议：同意让那些被驱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参加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人们同时也让这位代表了解到，如果山岳党人不能对顺从民意这点作出可靠保证的话，那么跟他们所进行的一切谈判都将宣告中断。跟山岳党人代表的谈话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人们还告诉他，大家对他的委托人——那些曾受到严重指责的人缺乏信心。

里科尔不可能为他的全体伙伴进行申辩，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是不值得人民咒骂的。人们向他宣读了上述的三项条件，并且在大家一致同意之下，补充了下面两条：

1. 废除共和二年热月9日以后所颁布的一切法律和决议。
2. 驱逐一切回国的叛逃者。

山岳党人的拒绝

里科尔同意这一切，但是表示要得到他的伙伴们的批准；第二

① 见第十八号文件。

天他跑来通知说:他的伙伴们不同意这一切。

按照山岳党人委员会的想法,起义的直接的和唯一的后果,是让大约六十名被驱逐的国民公会代表恢复原职,而以后所制定的一切措施,都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提请他们审批。

由每省推举一名民主派代表来跟山岳党人共事这个条件,被他们看作侵犯人民的最高权力而加以拒绝,他们自视为这种权力的独一无二的体现者。至于应当由起义者向他们颁布命令,则被他们看作侵犯法国人民的权利,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代表法国人民。他们同意起义法令所许诺的把住房和财物分配给人民,但是,他们却把这理解为对一种施舍活动实行策略上的让步,而完全不把它看作是执行命令或承认权利。最后,他们建议让秘密督政府的成员进入他们打算成立的执行委员会。

秘密督政府的答复

毫无疑问,读一读那份交给山岳党人代表的复件,是很痛快的。复件内容如下:

"我们所以协助一部分国民公会代表暂时恢复原职,仅仅是为了替人民服务。我们希望得到的唯一报酬,是平等制度的彻底胜利。我们将为恢复人民的全部权利而斗争,并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使我们难以想像的是,居然有人对整个局势的主宰者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如果你们真正希望跟我们一道为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的话,那就请你们不要提出那些足以使你们的意图受到怀疑的建议。

“你们的许多同僚已经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但是，如果我们纵容他们的欲望和弱点，同意让人民再一次蒙受牺牲，那我们就比他们更值得人唾骂。为了恢复人民的最高权力而竟要采取曾经断送这种权力的手段，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那些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人，人民才授权他们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

“我们要消灭专制政府，但并不是为了让另一个同样暴戾的政府来代替它。宽恕别人的错误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再把祖国的命运托付给那些由于他们的错误而曾使祖国覆灭的人，那就愚不可及了。

“我们宁可死在因我们碌碌无为而感到气愤、因而可能指责我们胆怯和叛变的爱国者的手里，我们也宁愿死在可能最终识破我们的意图的政府手里，但绝不愿意让人民受那些在热月 9 日断送了他们的最优秀的伙伴、随后又懦弱地让共和派受到迫害并让民主制度受到摧残的人们的摆布。”

里科尔在临走时宣称，他将把他的委托人的最后决定通知秘密督政府。

爱国人士感到不安

正当这一切在秘密督政府和山岳党人委员会之间进行的时候，恶毒的谣言不胫而走，弄得爱国人士惶惶不安，意气沮丧。参加密谋的主要人物受到怀疑和污蔑，而继这一场轩然大波之后所出现的平静，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新的不祥之兆。人们所怀的这种不吉的预感，不知不觉地为当时受命防止人们过早地发泄热情，

以便赢得时间来采取一致行动的革命代表所觉察；这使革命代表也开始感到不知所措。于是，他们便通知秘密督政府，如果它再迟迟不动，那就会失去那些准备拿起武器的最坚决的人士的拥护。

为了消除所有这些不安的情绪，秘密督政府决定把它的处境和它的前进障碍通知革命代表①。但是，准备发给这些代表们的通告信还没有写好，秘密督政府就得到消息说，山岳党人准备接受它的建议。

秘密督政府跟山岳党人委员会的联合

事实上，花月 18 日晚上，达尔蒂向秘密督政府报告：在他参加的一次山岳党人委员会会议上，经过热烈的争论以后，人们同意由每省推举一位民主派代表来共事，同意采取有利于贫苦阶级的措施，同意施行那个准备提请起义的巴黎人民批准的法令。同时他还说：里科尔所转达的那些反对意见，在会上被阿马尔，特别是罗贝尔·兰代成功地驳倒了。兰代认为秘密督政府表示不信任是有道理的，他滔滔不绝地论述必须使革命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否则——用他的话来说——，革命只会成为党派的玩物。人们把这个消息马上转告给革命代表，从那时候起，大家只想更快地发动这次密谋。

关于起义的若干问题

秘密督政府在跟山岳党人委员会举行谈判的同时，跟军事委

① 见第十九号文件。

员会进行了极为频繁的联系。它们达成协议如下：

起义在白天举行；

军事将领们根据秘密督政府的命令，领导人民反对他们的敌人；

起义者应以区为单位，在区内应以区段为单位；

区由区负责人领导，区段由其助手负责领导；

在任何场合下不准听命于现政权，违者立即处死。

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并在所有主要行动人物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为了使一切要采取的措施都能与这个刚结成的联盟的原则协调一致，秘密督政府和上述两个委员会决定于19日晚上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在德鲁埃的家里——皮克广场附近——举行。

格里泽尔的叛变

在这些如此英勇地维护人权的人士当中，有一个卑鄙的伪君子。这个人为了毁灭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便诡谲地借用他们的原则和语言。这个坏蛋就是乔治·格里泽尔。

格里泽尔可能是在获悉密谋家的计划以后，发现他的整个发财的希望落空了，因而想替自己开辟一条生财之道；也可能是想直接替专制制度服务；但是无论怎样，他一直在极力博得民主派的信任。他在设法从达尔蒂手里得到军事代表委任令以后，便千方百计地保持人们对他的好评。后来，他参加了秘密督政府的一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这些场合里，他是以最极端、最

激进的民主派的姿态出现的。他巴不得了解所有的事情①，其目的只不过是要帮助专制制度一劳永逸地把一切平等之友清洗掉，并且揭发民主派的全部图谋。

格里泽尔的告密

在格里泽尔终于知道密谋的主要人物的姓名并且了解到他们的局部计划以后，他便在花月15日向政府告密，并且答应政府把这些人物连同密谋的文件一块出卖给它[92]。

从那时起，格里泽尔每天都以新的叛变行为来补充上述的背信弃义的行径。他在军事委员会中卖力工作，鞭策他的轻信的伙伴，排除种种困难，提出新的措施，而且从不忘记夸大和渲染格雷涅尔营对民主制的忠诚，以此增强周围人们的勇气。

按照格里泽尔所提供的情报，当局发出了18日逮捕密谋家们的命令，因为据估计这一天他们会在里科尔家里开会；可是，那天谁也没有在那里，于是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即在第二天包围德鲁埃的寓所，因为叛徒得知密谋家们要在那里开会。

密谋家在德鲁埃家里开会

实际上，这次会议从8点30分一直开到10点45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巴贝夫、邦纳罗蒂、达尔蒂、艾里迪、菲昂、马萨尔、罗西诺尔、罗贝尔·兰代、德鲁埃、里科尔、阿里诺热和雅沃格。格里

① 见格里泽尔给起义督政府的信(第二十、二十一号文件)。

泽尔也在场，这个叛徒！他其所以在那里出现，是为了把自己的同志出卖给专制制度；他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刽子手的光临，然而，他却拥抱他们，向他们致意，并且毫不羞愧地向他们表示最真诚的友谊。

在德鲁埃家里开会的密谋家们认为自己是绝对安全的；他们的奔放的感情和他们事业的圣洁，使他们排除了任何猜疑。格里泽尔的诺言和他的谈笑风生的举止，使大家对他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

秘密督政府的报告

秘密督政府通过它的一位成员向大家阐述了它为什么要成为民主派反对新的专制制度的中心。这位发言人说道："请记住你们的誓言，请记住那些由于背弃你们发誓要以自己的鲜血来巩固的原则而引起的灾难。履行你们的义务的时刻已经来到，该投入战斗了。为了那个最崇高的事业的胜利，为了法国人民的自由，为了不辜负法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为了打退敌人的凶恶气焰以及为了你们自身的安全，你们应当把这看作你们的刻不容缓的义务。

"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密谋比这一次更为名正言顺；事情绝不是为了选择新的统治者；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想追求财富和权势；卖国贼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为了我们同胞的自由与幸福，我们所秘密召集的解放者军队，只待我们一声令下，就向一小撮压迫人民的暴君猛扑过去。

"直到目前为止，一切仍然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在葡月13

日那次有名无实的胜利以后，贵族制度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许多对争取自由感到绝望的民主派，跟那些吸吮你们朋友的鲜血的万恶独裁者实行妥协。

“在我们号召之下，重新产生了希望，重新显示出往昔的力量；由于那么多的英勇的共和派孜孜不倦地努力，急不可待的人民群众高声要求发出战斗的信号。

“我们认识所有的好人；坏人在发抖。在你们指定的那一天，专制制度枉费心机地想从你们手里夺走的武装，将掌握在我们弟兄们的手里。你们希望我们所策动的革命能够获得成功，你们也希望人民不再满足于虚幻的自由和可笑的平等。

“真正的和合法的平等，这就是使你们的崇高事业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事业的伟大的特性。

“一切困难都克服了；对祖国的热爱使我们联合起来。有一天将成为国民代表的人们商订了条件，人们一致通过了起义法令的条款，这些事情本身将向人民宣告他们的起义是正义的和有利的，并为此作出保障。

“时间紧迫；人民已忍无可忍；不要再继续拖延，以致错过一个也可能是一去不复返的时机。

“我们要求你们：

“除了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外，请再提出一些你们认为必要的措施；

“请指定起义的时间。

“我们就要在战斗中死去，要么就使这次漫长的和流血的革命以胜利与平等而告终。”

罗贝尔—兰代阐明了起义的正义性，他为召开国民公会进行辩护，并且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坚持论证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平等，以便使未来的革命具有独特的和绝对的人民性。

“至于我”，格里泽尔说；“我向你们担保我的勇敢的格雷涅尔营同伴忠诚可靠；同时，为了让你们了解我是何等地关心神圣的平等的胜利，我要告诉你们，我已经设法从我的那位贵族舅父那里弄到一万利弗，这笔钱我是准备用来给起义士兵购置粮饷的。”

山岳党人再一次表示赞同

新的起义法令再一次为国民公会代表所通过，他们答应在起义那一天跟他们的伙伴们一道前往秘密督政府所指定的地点，以成立国民公会；他们还答应要真诚地协同执行既定的措施和起义人民所宣布的法令。

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马雷萨尔代表军事委员会报告了进攻计划的要点，他认为，这个计划最符合秘密督政府的见解。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巴黎十二个区的人马应当合并为三个师，并在三位将领的率领下，分头开往立法议会、督政府和内地军参谋部。先头部队应由最坚决果敢的民主人士组成。民众的心情是那样地急不可待，以致大家都认为：在革命代表和积极的平等之友的号召之下把全体劳动人民都发动起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委员会还补充说，为了便于确定起义

日期，它需要进一步了解一些材料，诸如民主派的人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能力，以及在起义开始时必须夺取的武器和弹药的存放地点等等。

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会议的决定

“秘密督政府应当加紧发动密谋；它应当根据军事委员会的计划向代表们发出相应的指示；它应当在两天以后开会，以便最后一次听取关于形势的报告，并决定行动的日期。”

警察包围德鲁埃的寓所

会议刚散，一位警长便率领一队步兵和骑兵，不顾法律规定①，强行闯进德鲁埃的寓所。这位警长原想在这里当场抓住密谋家们，不意仅仅碰到德鲁埃和达尔蒂。他们认为，逮捕这两个人是不明智的。由此可见，因为一道考虑欠周或签发不当的命令，遂使当权的专制制度的罪恶阴谋暂时没有得逞。

格里泽尔宽慰密谋家们

然而，这次事件非但没有引起密谋家们的猜疑，反而使他们更加麻痹大意。已经博得了密谋家们信任的格里泽尔，消除了他们

① 当时宪法明文规定禁止夜间搜查民宅。

的疑虑，并且让他们相信实行任何新的戒备都是多余的。

起初，秘密督政府把它所遭到的危险归诸于一种叛变行为，它急忙进行了调查，以查明谁是祸首。在调查中，它曾一度对一位人民事业的最忠诚的朋友产生怀疑。热尔明没有出席在德鲁埃家里召开的那次会议。他的这次缺席，在当时对他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受到人们的责难，使他受了一些委屈。但是，当大家回想起他的品德、他的为人、他所蒙受的牺牲和他的忠诚的时候，很快就消除了对他的怀疑。人们的其他一切疑虑，都由于格里泽尔向达尔蒂提出的那个判断而消除得一干二净。格里泽尔说，如果在密谋家当中有叛徒的话，那么这个叛徒就会在我们昨晚开会的时候把警察带到德鲁埃家里，因为当时我们所有十一个人都在那里，而且密谋的文件也藏匿在那里[①]。然而并没有发生那种情况，可见，不存在叛变的行为；至于警察所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猜疑和他们所固有的过分警觉而产生的结果。经过他那么一说，一切顾虑也就打消了。秘密督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戒备措施，而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本来是可以帮助它轻易地避免它在不久以后所遭到的不幸的。

代表们在马雷萨尔家里召开的会议

为了执行秘密督政府的指示，20日晚上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达尔蒂、艾里迪、热尔明、菲昂、马雷萨尔、罗西诺尔、格里泽尔以及全体区代表。这次在马雷萨尔家里召开的

① 格里泽尔后来在法庭上宣称，他没有记清楚当时十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开会。

会议，其目的在于向这些富有经验的公民逐一征求意见，以便釆取最适当的方法在同一时刻举行起义并保证起义的成功。此外，还必须向每一个革命代表了解他的人力、武器、弹药和士气的确切情况。

代表们的建议

第六区代表克洛德·菲盖建议在安东郊区修筑街垒，以便掩护驻扎在文森的部队的解散（当这些部队表现出善意的时候），或是阻止它们进入市区（当它们表现出恶意的时候）。

第七区的代表巴黎介绍了一位将领所提出的进攻计划，因为秘密督政府曾委托他跟那位将领商量。巴黎谈到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逮捕督政府的成员，他建议秘密督政府掌握卢森堡宫的地道，因为督政府的成员可能会利用这条地道逃脱法网。

第三区的代表卡森建议架设一道浮桥来保持安东郊区和马尔索郊区之间的交通；并且从一开始就夺取蒙马特尔高地，因为这个高地既有利于歼灭胆敢反抗的贵族分子，又可以在失利的情况下作为集合的场所。

第十一区的代表索姆波表示希望把起义日期定在一个既是旬日节、又是星期天的日子，这是为了既便于召集那些仍然做礼拜的工人，又便于召集那些摒弃了宗教礼仪的工人。他建议利用妇女和孩子们来瓦解士兵的队伍，使他们跟民众混在一起。

至于公众的情绪，在这个方面，革命代表们重复了他们过去向秘密督政府报告过的那些看法。他们宣称：人们急不可待的情绪

带有普遍性，而且已经达到极点；只要士兵决定不跟人民作对，专制制度是肯定会土崩瓦解的。在这方面，他们所依据的是民主派的人数和勇气，再加上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协调一致的军事部署。

军事委员会要求代表们提供新的情报

然而，据军事委员会看来，代表们所提供的情报是不够充分的。该委员会要求更为精确的情报，要求跟那些将在起义中起重大作用的公民交换意见，以免对他们的意图产生任何误解。这些新的情报必须交给马雷萨尔，由他向大会报告，这次会议预定第二天在鱼市郊区杜弗尔家里举行。

当时，人民日益激昂的情绪，处处预示着一场暴动已迫近眉睫。秘密督政府暗暗地计算它所能纠集的力量，对这些力量进行部署，并且考虑它想藉以达到革命的伟大目标——平均分配财富和劳动——的计划。

民主派的力量

秘密督政府环顾周围看到自己在领导着一支由如下成分组成的军队：为追求一个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而且迫不及待地要跟专制制度势力实行较量的人数众多、斗志昂扬的革命朋友；热月 9 日以前的执政人物；以具有民主情绪著称的巴黎炮兵；被革职的官吏；为响应号召或是为了躲避迫害而前来巴黎的外省爱国者；由于有爱国心和违抗命令而被投入监狱的军人；立法议会的榴弹兵；几

乎全部的警备团和老残军人院的全体军人。①

人民的不满和急不可待的情绪

此外，秘密督政府还觉察到，驻守在巴黎周围的士兵的情绪有强烈的波动。它还听到劳动群众怨声载道，他们无论在秘密集会上，或是在每天举行的露天的群众集会上，都毫不隐讳地发泄其不满情绪。

此外，大家还相信，作为平等制度的唯一支柱的无产者，当他们从起义一开始就看到那些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境遇、但一再被拖延的措施行将实现的时候，一定会倍加热情奋发。当代表们向秘密督政府介绍了人民的激昂情绪，并且大胆地要求它发出起义信号的时候，秘密督政府对于它本派的力量更是感到满有把握①。

专制制度的力量

除了本身的力量以外，秘密督政府还看到专制制度可能用来

①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当时在巴黎的准备首义的人数，达到17,000人，其中还不包括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他们到处流露出不满和急不可待的情绪。下面这份清单是秘密督政府下决心的依据。

革命者	4,000
旧政权机关的官员	1,500
炮兵	1,000
被革职的官员	500
外省革命者	1,000
立法议会的榴弹兵	1,500
被监禁的军人	500
警备团	6,000
老残军人院的军人	1,000
合计	17,000

跟它对抗的力量。秘密督政府知道：专制制度的武装队伍，无论多么软弱，也都可能成为人民运动的道路上的障碍；保王党人为了摆脱平等法令的束缚，很可能起来保卫他们所厌恶的政府，因为他们痛恨前者甚于后者；大多数有钱人——他们完全控制着国民自卫军——看到民主制度的胜利将会感到痛心；上述这些人的头子们已经拥有武器，而国家则可能向他们其余的人提供武器。

人民的能量

另一方面，密谋家们自己也掌握有立法议会的榴弹兵和警备团士兵所配备的武器和弹药；此外，他们还打算夺取存放在市中心区——杜伊勒里宫、裴扬俱乐部、老残军人院等区——的军械厂中的武器，在这方面要依靠最勇敢的公民的帮助和那些负责看守军械厂仓库的人们的合作。他们还可以借助忠于他们的文森营的大炮。他们希望军队跟人民联合起来，希望广大人民的突然发动能够使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吓得目瞪口呆，希望政府所倚重的那些幸运儿的天生胆怯无能能够大大地有助于人民的举事。

督政府成员巴拉斯表示愿为密谋家效劳

不知道是为了逃避人民的义愤还是为了帮助密谋家们，或者是为了认识他们以便于杀害他们，督政府的成员巴拉斯在芽月30日跟秘密督政府指派的代表热尔明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巴拉斯试图向热尔明刺探人民骚动的原因。花月20日晚

上，他通过罗西诺尔和鲁艾尔向密谋的主要人物表示：他和他的总参谋部愿意领导起义，也愿意到安东郊区来充当人质。想在这些事实上替督政府成员巴拉斯辩解的人应当解释清楚：既然巴拉斯在花月 20 日对密谋家们表现出这样的同情和信任，那么他为什么不把有人在花月 15 日向督政府告发他们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呢①？

在清楚地估计到巴黎民主派的力量，了解到最开明的爱国者的观点，以及听取了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以后，秘密督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制定这样一种起义方式，它既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都指引向同一个目标，又可以使事业不至于因不够慎重而一败涂地。历史的准确性要求人们在这里运用经过秘密督政府同意的一切条款，除了那些必须适应客观形势而改变者外。

起 义 命 令

很久以来大家就已经承认，最好是在起义一开始的时候，就由起义督政府公开宣布起义，而所有的人都将联合在这个督政府的周围并听从它的指挥。

---

① 在我们的密谋结束以后发生的一个事件好象揭开了这个谜。在秘密督政府被强行解散和它的许多成员被关进监狱以后，剩下来的民主派人士决心要搭救他们并继承他们的事业。这时候，督政府成员巴拉斯的两个朋友[93]钻到他们身边，让他们相信巴拉斯赞成他们的想法并愿意在行动上促成此举。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建议下制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民主派跟格雷涅尔营的官兵进行联欢，然后他们一道前往督政府，以实现他们所要求的变革。以巴拉斯的名义由他的两位朋友所许下的诺言，他们所散发的为数约 24,000 法郎的款项，以及格雷涅尔营的几个军官所作的保证，都促使民主派人士果真成群结队、赤手空拳地前往格雷涅尔营，他们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可是，他们在那里得到的不是什么联欢，而是死亡。是谁布下这个圈套呢？是谁想把民主派一网打尽呢？

公开宣布起义，就是公布与山岳党人委员会共同通过的起义法令①。

在这个法令以及准备在起义期间和起义以后公布的法令里，秘密督政府给自己取了起义救国委员会这个名称，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跟热月9日事件以前的为平等制度作准备的那些组织形式相近，避免跟贵族阶级所建立的那些组织形式有任何雷同之处。

把起义军划分为三个师的决定获得通过。这三个师由三个将领负责领导，这三个将领受一位总司令指挥，而后者则又听命于起义委员会。每一个师的将领管辖若干区长，每一个区长又管辖若干段长；每个段又分设几个小队。

在将领的人选方面，起义委员会看中了菲昂、热尔明、罗西诺尔和马雷萨尔。区长、段长和小队长也由这个委员会任命，他们应当在公布起义法令的时候，在为呼唤人民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警钟声、号角声和自由之友的呼声中，把人民组织起来。

要紧的是在每个段里都要派遣若干开明的民主派，他们负责向人民讲解起义法令的条款，指出这个法令的正义性和好处。

人们希望通过起义来掌握劳动阶级，而在起义以后建立一支旨在反对专制制度并跟该制度的武力相抗衡的人民军队。人民军的各纵队应当分头向立法议会、督政府和总参谋部挺进，同时还应当朝各个部长的别墅进发，以便协助共和派逮捕那些篡夺民权的家伙。

那些战斗经验最丰富和装备最精良的区段，应当把自己的人马派往储藏武器和弹药的仓库，首先是前往格雷涅尔营和文森营；

① 见第二十二号文件。

这两个营地的人数至多不过8,000人，人们认为，这些士兵是准备跟人民联合在一起的。

为了加速这一联合的实现，人们打算采取有力的措施和说服手段。演说家们应当提醒这些士兵记起政府的罪行和他们对祖国的责任，妇女向他们呈送花束和冷饮，老残军人们则呼吁他们追随自己的榜样。在这一切都不奏效的情况下，那就要设法堵塞街道，并且用搀有硫酸的开水痛洒这些军队，用石块、瓦片、石板、砖头等乱砸他们。

其余的人民军应当用来把守巴黎的出口，用来维持各人民部队之间的联系，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严禁一切反人民的集会，切断贵族阶级的通讯，防止一切行劫企图，以及执行起义机关的种种命令[①]。

对于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例如象造成牧月不幸事件的那些情况，如果不事先采取应对措施的话，那么事业的成功希望是渺茫的。在这些情况中，缺乏粮食是无比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不能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下去。因此，起义委员会想方设法向人民可能集合的所有地方充分地供应粮食。而且，也正是主要为了这个目的，起义委员会才决定在行动一开始，就向每一个区段派遣那个曾在热月9日进行活动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三名，由他们负责夺取贮藏在一切公私仓库中的食品，立即供应给需要粮食的起义者，同时还要当场给穷人提供答应给他们的首批救急物

① 如果把有秩序地分配住宅和衣服跟抢劫混为一谈，那是错误的。抢劫行为跟改善生活绝不相容，因为它会给社会带来难以恢复的损失，会引起新的不平等现象，会保持甚至加剧道德败坏现象，并且会给建树良好的法律制造困难。平等只能通过法律程序来建立。

资。

给予穷人住宅和衣服

为了使人民对这次新的革命有感性认识，为了巩固他们的热情，起义委员会打算在起义期间公布两个决定，根据这些决定，穷人将立即得到衣服，其费用由共和国负担，并且将在同一天搬进富人的住宅。至于富人，则仅仅给他们留下绝对必要的住房①。

惩治叛逆者

了解一下起义委员会所设想的人民审判是必要的。起义委员会想把主要罪犯即两院和督政府的成员交付人民审判。这些人罪恶昭彰，应处极刑，以儆效尤。

但是，人们希望这种事例能够给人留下既体现严厉的裁判又体现宽厚的公心的印象。于是决定，让身受其害的起义人民听取关于每一个被告的罪行的详细介绍，同时号召他们赦免被告当中的一些人，这些人或是由于误入歧途而情有可原，或是生活方式简朴和大众化，或是由于在起义过程中曾经对平等事业作出显著的贡献，因而可以宽恕他们的政治错误②。在委员会里还有这样一种意见，根据这种意见，应当把受审判者埋在他们的宫殿的废墟

---

① 见第二十三号文件。

② 见第二十四号文件。

里，以便让这些残骸使子孙万代永远回想起对平等敌人的正义惩罚。

一切进攻和防御措施都应当通知区代表和委员会准备委任的将领①。

起义的顺利完成，势必导致新秩序的建立；在这方面，事先打下一点基础，以便为制订最紧迫的措施作准备，乃是明智之举。这个问题已在起义委员会认真考虑之列。

我们已经看到，在跟山岳党人联合之前，起义委员会是如何地打算依靠起义人民来建立新的政权及其行动准则的；跟山岳党人的联合势必引起情况的变化；此外，由于山岳党人态度暧昧而产生的不信任情绪，也引起另一些变化。

只要人们相信专制制度将会被对平等抱着最纯真的爱的领导者所代替，那么，战胜专制制度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是必须有一批其理论、品格和生活方式完全跟他们所要建立的制度的精神协调一致的人。

在这方面，起义委员会相信，使它感到鼓舞的那种精神将完全为新的国民议会所接受，而这正是它能够向人民作出的最大的保证，即保证在最近期间建立起平等的制度和人民的宪法。

山岳党人的暧昧举止迫使人们采取新的防范措施

但是，在作出重新召开由一部分代表参加的国民公会的决定后，起义委员会就认为自己有责任防止人民受新政权的违法侵

① 见第二十五号文件。

权之害。它对山岳党人的谴责，充分说明它远远没有完全信任他们。

这些国民公会代表新近的表现，给原有的不信任情绪增加了新的因素。使起义委员会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代表们力图用种种阴谋诡计来拖延实现关于补选新代表的建议；他们在商讨问题时表现得高傲不逊，用贵族的狂妄口吻把恢复人民的权利称为白白地让步。

此外，委员会还了解到，他们正暗地采取种种手段来规避已经协商好的条件，以便使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山岳党人手里。委员会确信这些人不可能办出好事来，甚至认为任何细小的行动，只要可能使权力落到这些人的手里，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这不啻是用另一种专制制度来代替原有的专制制度。

因此，委员会也考虑到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迫使重新就任的国民公会代表履行他们的诺言，并且不让他们给建立真正的和巩固的平等制度制造障碍。在推翻专制制度方面，密谋家只想依靠人民的力量；他们是靠真理的力量获得人民的支持的；也正是在真理和人民的支持之下，他们才决定粉碎新的阴谋。

有关起义的各项命令应当获得人民批准

尽管在起义法令中已经规定让一部分国民公会代表重新行使权利，但是，起义委员会仍然希望这部分代表的职权应在起义人民明确表达其意志的情况下予以恢复，并希望庄严地宣布由它已经商定的关于补选代表的法令，而且由人民亲自指定应当补充的代

表。此外,委员会还希望由人民来做这样几件事:下令立即恢复热月9日事变以前的公职人员的职务;批准一切有关起义的法令;下令迅速执行起义委员会关于分配给穷人住宅和衣服的决议;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伟大的法令①公布以后,直接建立起新的国民公会。

为此目的,起义委员会责成其代表们尽一切力量做到:在专制制度被推翻以后,立即把全体公民召集到开会地点,在那里,委员会要向人民报告它为了摧毁束缚整个民族的新的枷锁而做的一切工作,并且请求他们提出他们认为为拯救共和国所必需的法令。在这个伟大的场合下,准备由委员会的一位成员作一次演讲,演讲辞已经拟好,并应经过讨论②。

关于起义委员会参加新政权问题的讨论

起义委员会就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周详的讨论。那就是要决定一下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如何参加管理新的政权。委员会打算:决不吞吞吐吐、拐弯抹角地跟人民说话,要给予人民的最高权力以最大的尊重。为了使起义获得彻底成功,如果它感到自己有必要临时行使整个国家权力的话,那么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请求获得这种权力。但是,由于先前一切类似这样的制度都被否定了,因此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考虑是否设法让起义人民建立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由这个机构敦促新的国民公会去采取立法措施,而它则把这个国民公会的法令付诸实现;或者把这样一件重要的事

① 见本书第124—125页。

② 见第二十六号文件。

情交给国民公会考虑，如果这样做更为有利的话。

不论起义委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它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新的革命取得成功，上述的机构是否应当完全由它的成员来组成。

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我只能在这里报导一下委员会在比较其可能采取的几种方案的利弊时所抱的若干想法。

首先考虑到的是：把具有首创作用的起义委员会变为一个常设的并且必须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力的机构，这种作法可能会使人怀疑起义委员会的成员怀有野心和个人打算。大家担心，类似这样的流言蜚语，由于容易被人偏听偏信、不胫自走，这就会对起义委员会委员的行动起阻碍作用，耽误它去做自己所要做的好事；而且有人要问：密谋家参加到新的国民公会中去，依靠他们的紧密团结和所取得的信任，是否足以把他们整个事业的精神灌注到法律中去，并且把那些称职的公民安置在最高的职位上。

另一方面，起义委员会看到，很少有人既具有原则的纯洁性，又具有为实现这些原则所必需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它感到，如果不去关心那些有勇气开创事业的人把事业完成，那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它又担心那些势必跟它竞争的人采取两面派手法。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考虑后，我们的密谋家大致决定：让人民颁布一道法令，以便把创制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完全委托给他们。

有许多草案没有完成，有不少工作由于叛变而中断，这次叛变把时势所造就的民主派领导人全部出卖了，从而满足了贵族分子的复仇愿望。关于这次密谋的介绍，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密谋家们的全部意图，还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作一定的说明：他们对于国家在起义以后的状况的看法；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以及他们想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个目的。

对起义以后的巴黎情况的看法

各种各样的贵族分子会对这样一次激进的革命感到心惊胆战，广大的劳动者和穷人则为出现那么多的群众性变革而欢欣鼓舞，新的国民公会①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产生的。这个国民公会要根据它的几乎全部成员所主张的原则和团结在它周围的人民的愿望，来建立起巩固的平等制度。

除了国民公会外，起义委员会在起义以后上任的行政官员的支持下将负责执行——至少是临时地——那个让人民行动起来的法令的各项条款。根据这个法令的规定，巴黎人民将立即从他们的又脏又乱的小屋搬到有益于健康和设备齐全的住宅里去，穷人们将分配到衣服并且无偿地收回他们典押在当铺中的物品。

同时，为了保障人民的粮食供应，将实行认真的监督；在重新恢复的民众集会上，将向公民们解释这次新的革命的各项原则；广大的人民自卫军，将会制止住坏分子的活动，并促进一切被认为有助于巩固新制度的活动。

至于要把力量发挥到什么程度，不可能事先精确地规定出来；密谋家打算不惜任何代价夺得优势；并且下定决心：要么取得胜利，要么就葬身于祖国的废墟之中。除了蓄意反抗以外，严厉手段仅限于惩治篡夺民权的首恶分子和逮捕一些危险的人物，这些人

① 这个国民公会应由170名左右的代表组成。

的名单事先已根据起义委员会的命令编好。

除了为摧毁新贵族逐步建立起来的体系而必须采取的准备措施外，还应补充一些最适于使巴黎革命扩展到整个共和国，并在国内建立起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的措施。

外 省

起义委员会从其成立时起，就注意抓外省和军队这两个方面。它在各地散发自己的文件；各地的民主派都了解它的计划，并且准备跟它配合。在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那里有一部厚厚的通讯薄，其中登记着民主派实力雄厚的地区和一些最可靠的人士的姓名。从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中可以了解到：革命者正在放弃使他们互相产生隔阂的种种不同观点，并且一致联合在真正的平等派周围。

至于军队，委员会知道，在热月 9 日以后，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在压制军队中那种被他们称为无政府主义和叛逆精神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也没有忽略，共和三年宪法使所有的部队怨声载道；它还了解到，士兵们难以忍受那些在热月 9 日以后复职的军官们的指挥，并知道，在军队的领导人员当中，还有一部分人跟它保持通信联系，其中有不少人仍然强烈地倾向于民主原则①。此外，它还满有把握地指望得到由督政府派到共和国军队中去的若干国民公会代表的协助[94]。

再者，完全可以想像到，巴黎的榜样将推动全法国人民，而且，对真理的认识使得这种推动将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为了在

① 这些人没有沾上在意大利、瑞士、埃及、德国和西班牙掠夺战利品的坏名声。

士兵当中传播这种认识——起义委员会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一点上——，就必须派遣特派员到士兵当中去，向他们发表文告①，这些文告在内容方面跟通知法国人民关于他们获得解放的消息的文告是一致的。

平等的立法和过渡的法律

委员会在专心致志地策划如何推翻专制制度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平等制度的最终法律和借以逐步实现这种制度的法律的研究。当一部分密谋文件被查获时，关于委员会这项重要工作的报告纪录和草案，正藏在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那里，那个地方没有被警察发现。遗憾的是，在一种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几乎所有这些文件都被毁掉，我所能利用的仅仅是保存在另一个地方的几篇残稿。借助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稿以及若干当事人对事实和讨论情况的回忆，我要简略地、尽可能真实地介绍密谋家的目的和意图。首先我要论述一下他们想逐步地引导法国人民去建立的那种公民政治制度的实质；然后再介绍一下他们想用来培养法国人民适应于上述制度并引导他们去建立该制度的一些过渡性质的机构。

一切财产都属于人民所有

从起义委员会想要巴黎人民颁布的那道法令中，应当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制度②。这个法令首先包含有这样的思想，即认为私

① 要了解这些文告的精神，可参看作为第二十七号文件的那个文告。

② 见本书第124—125页。

有制绝非源自自然法，而是由世俗法杜撰出来的，因此，它可以象世俗法那样被改变或取消。其次，在这个法令中还提出这样一种原则：凡集中在国内的一切财产，都属于一个占有者，也就是确定不移地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享有这些财产的支配权和用益权。

宣布这些真理，当然会使人民群众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所遭受的痛苦和奴役，是旧制度带来的必然后果。但是，如果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让这些真理产生对人类有益的实际结果，那么宣布这些真理只会成为一种令人辛酸的玩笑。

由于认识到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财富进行分配并对创造这些财富的劳动进行调节的权力属于社会，并认识到这种分配的不平等是使各民族蒙受种种不幸的无穷无尽的根源；因此，社会应当设法一劳永逸地消灭这种不平等现象。

所要决定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从改变或彻底消灭财产权方面寻找消灭这些不幸的办法。

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密谋家们根据什么理由决定把消灭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事业的最终目的；他们又如何打算通过财产共有和共同劳动的办法——这是永远消灭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根除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偏见和不幸的唯一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在古代和革命时期的伟大人物的教训和范例的开导下，在不久以前法国所表露出的情绪的鼓舞下，他们立意使法国人民具有另一种风尚，使他们变为热爱祖国、奉公守法的人民，使他们不仅在国内幸福、而且在国外受到热爱、尊敬并被奉为楷模。

人人都有幸福生活的权利，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私有财富将会消失，财产权将被取消，代替它的是每个人都象社会组织的其它一切成员那样享受同样的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神圣的权利将成为一切制度的原则，这种权利的保障，则在于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担负一部分为保证社会的生存和繁荣所必要的劳动义务；这种义务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原因是自然法赋予所有的人以享受同样的幸福的权利。

为生活所必需的农业和手工业

公民的最必需和最重要的职业，是那些保证他们衣、食、住，并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对象的耕耘土地、建筑房屋、制造家具和纺织布匹的职业。由于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宜于生产同样的食物，因此，为每个区安排最适合于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最有利于达到富裕和平等的生产和劳动，是公共管理机关应当主要关心的事项之一。

公民的划分

正如并非所有的土地都能够同样地丰产一样，人也不能够同时卓有成效地从事几种劳动。为了使社会能够从它的每个成员的平等而适度的劳动中收到它所期待的全部效益，为了通过劳动的

技能来减轻劳动的难度，就必须区分各种不同的行业，必须使每个人从事各自的职业。例如，以冶炼金属为业的人，就不应当去搞木材加工、纺织等等。因此，在财富和劳动公有化的制度下，有必要把公民划分为若干类；其中每一类公民，都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和最高的平等原则，由法律为他们规定一种专门的劳动。

划分应当从公共教育开始

这种划分应当从公共教育院（关于这种教育院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中开始。在这些教育院里，管理人员让受教育者从事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每一项劳动都按照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学生，在配备学生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和爱好。

富裕——共同劳动的目标

除了年老病残者外，任何人都不得规避上述的共同活动。这种活动的伟大目的是：供给所有的人以充裕的生活必需品，为他们提供不为社会道德所排斥的娱乐。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娱乐，应严加禁止。

劳动是由法律调节的一种职能

在我们所介绍的那种制度下，为保证人民的生活和娱乐所必要的劳动，是由法律调节的一种职能。这种职能永远不会蜕变为

令人厌倦的劳动，不会引起人们丝毫的痛苦，不会使任何一个公民比其他人负担更重，并且由于养成劳动的习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由于劳动的乐趣，以及由于社会舆论对劳动的赞赏，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感召和激励而去从事劳动。

这样，当大多数人从事耕耘、播种、收割、贮藏的时候，有一些人便修建住宅、公共建筑、道路、码头和运河，另一些人饲养家畜，还有一些人则制造丝、麻、皮革或对这些材料加以利用，制造家具、马车、海船或是冶炼金属等等。

繁重劳动的持续时间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在照顾弱者的同时，将通过社会舆论的鼓励和公职人员进行表扬的办法，激励身强力壮的人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这样，所有的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体力和所担负的劳动的繁重程度，平等地担当起劳动的义务。

减轻繁重的劳动

由于担心劳动性质的不同会使从事某几种劳动的人突出地感到劳动过于沉重，人们产生如下想法：(一)有必要借助于科学来减轻人的劳动，办法是发明新的机器和改进旧的机器①；(二)繁重的劳动最好由所有强壮的公民来轮流担负；然而，人们自信，这种繁重劳动所造成的不快，可以通过健全的教育和依靠机械、化学来逐步地加以消除。

① 只有在公有制度下，使用机器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那时候机器将会减轻人的负担，同时将大量地增加优良的必需品。而今天，机器排挤大量的手工劳动，夺走了许多人的面包，它只为少数贪得无厌的投机家的利益服务，不断地扩大他们的收益。

也许，应当把绝对必要的劳动划分为轻松的和繁重的两种，而每一个公民必须既担负一种轻松的工作，又担负一种繁重的工作。也许，同样正确的是按照另一种办法来决定公民的分工——按照年龄进行分工，从而使劳动的繁重程度可以跟人们精力盛衰的情况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衡量平等的尺度，与其说是劳动的强度，毋宁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大小。

公正地、普遍地分配劳动，仅仅保留那些为公共利益所必须的管理性职业，更为合理地使用牲畜，不断改进机器和工具，这样将产生为人类造福无穷的两种后果：(一)有效地利用一切土地，增产真正必须的物品，(二)消灭游手好闲的现象，从而大大地减轻每个人的劳动。

享受的平等

由于人人都同样地致力于耕种土地和产品收获，因此，人人分享由此而产生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自然把这些财富跟人类的生存和幸福结合起来。

为了使社会安宁不至于被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所扰乱，就必须把由土地和工业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品保藏在公共仓库里，这些产品将在对公民负责的官员的监督之下，在公民之间实行平均分配。

假如按照这种公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公社或地区的话，那么它的管理工作就会极其简单①，因为在这

① 如果把国家的雄厚的资财按照国内部族的多寡而分为若干份的话，那么每个部族只能通过交换其多余产品的办法来获得它所必需的物品；至于那些由于土地贫瘠

个地区中的居民仅仅对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享有权力。然而在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并由那么多人来保障国家的实力和长期生存的幅员广袤的共和国里，国家的每个地区的财富，都归全体人民所有，每个地区的人民，都对共和国其他所有地区出产的粮食和其他产品享有同样的消费和使用的权利；拥有剩余产品的地方应当把产品供给那些缺少必要的产品的地方。由于这样，当管理一个幅员广袤的社会时，也就产生了某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会给那些在管理工作上考虑欠周的人带来莫大的困难。实际上，一切只不过在于在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情况下实行简单的计算，同时，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一切粮食供应免受贪婪之害，从而再也不必担心会象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那样由于上级官员的贪污和下级人员的盗窃而不断地造成损失。

在一个幅员广袤的国家里实行公有制的好处

然而，实行公有制的地区越大，就越能够保障每一个局部地区避免各种各样物资的匮乏。另一方面，从这种广泛与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物资交流当中，势必产生一种幸福、友爱和忠诚的感情，这种感情将是那样地普遍和强烈，以致可以估计到，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能够入侵这个国家、能够摧毁在这个国家里稳固地建立起来的平等制度。

和气候失调而没有剩余产品的部族，则会饱受饥馑之苦。这样一来，人们想要培养的普遍友爱和广泛互助的风气，将会消失殆尽，而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精神，马上会在这些公社的往来关系中占上风，从而很快就会使公民的内心重新燃起旧日的贪婪之念。

财富的平等分配

象这样一个由那么多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的人们组成的联合体，还需要有另一种职能，如果没有这种职能，共和国各部分之间的牢固的友好联系就会断绝，而且一个地区的剩余物资也就无法为本地区和其他地区所利用。这种职能是：调运农产品和工业品，把他们从供过于求的地区运送到供不应求的地区。这种职能有两个方面：(一) 最高管理机关要把国家所拥有的全部物资跟国内每个地区的需要进行权衡比较，指定哪些物资应当调运，应当从哪些地方抽调，并且应当运到什么地方去；(二)这个管理机关的下属人员要监督并执行这种调运工作。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关采取什么办法来轻而易举地促进它各部分之间的不断联系；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这样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贫瘠地区的居民——他们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然而总是贫困不堪——，便可以使他们的痛苦得到部分的减轻，他们可以享用从那些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

至于谈到调运工作，起义委员会认为：社会应当把这项工作不仅看做供应粮食所必需的一种方法，而且看做可以使每个人了解祖国的美丽，了解祖国的各种机构，了解那种应当通过法律在国内建立起来的平等制度的好处，从而加深每个人对祖国的热爱的一种机会。因此，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们希望，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轮流地担任这项工作，以及担负运输工作的通讯、传令等项职

务。

本书的读者们在读到这几页时，应当想到在我手头上没有那些包含着密谋家的最机密的想法的文件。因此，我无法详细介绍他们所要建造的那个大厦的每一部分，而只能尽量凭我的记忆和我所能收集到的若干片段的材料，叙述一下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案。

对 外 贸 易

我们已经养成那么多的不良习惯，并无意中形成了名目如此繁多的需要，因此，推想起来，我们就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输入若干法国所不能生产的原料，至少需要输入各种不同气候条件所提供的药物原料。

由于人民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所有者，因此，只有人民才有权跟外国人就交换他们之间的剩余产品进行谈判。然而，进行这种性质的谈判只能委托给那些负责任的官员，以免重新遭受私有制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危害并使国家受到新的腐蚀。由此可见，跟外国人的贸易联系，应当在共和国最高管理机构的领导下进行。①

用 益 权

从以上叙述中还可以得出，凡是在建立起公有制的地方，每一

① 当社会的成员由于利益的不同和对立而分裂时，社会就会腐化。因此，当一个国家里有一部分人的要求跟全体人的公益不能协调时，这个国家也就会堕落。

个公民对任何一件物品，都不享有称为财产的那种权利；他只对行政官员真正地交给他们支配的物品享有使用权和用益权。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财产权① 始终属于共和国所有，后者在任何时候都支配着那些还没有在使用中消灭了的物品。

一旦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就能够通过人人所从事的劳动和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利益，来确保人们的需要。人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贪图财富，一切引起对未来的担心的原因将会消失，使文明人内心痛苦不堪的忧虑和悲伤的绝大部分根源将会消除。靠自己的劳动为生或者没有多少财产的人，往往有两种烦恼：一是害怕年老力衰而陷入困境；二是替自己孩子的命运担心。而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这些烦恼将不复存在。

老年人和丧失劳力者

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每一个由于丧失劳力或是体力衰退而在劳动上有困难或是不能从事劳动的人，都享有过幸福生活的权利，享有免除劳动并受到更好的照顾的权利，这两者是相辅而行的。所以，在公有制下，让老年人和丧失劳力者得到休息和照顾，便属于社会的主要义务之列。然而，共和国要在老年人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利用这些经验来激励年青人的上进心；老年人的经验应当起维护道德和法律、审议习俗并维护美德的作用。

---

① 也就是绝对占有和任意支配的权力，jus utendi atgue abutendi（使用权和占有权——译者）。

看来，这些制度所起的效果之一，将会对公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以致使热爱祖国成为公民的主要感情。立法者可以通过教育的手段来使一切家庭和亲属间的感情都从属于这种主要感情。他可以使这种感情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会产生全体法国人民真正友好团结的幸福和惊人的结果。这种想法是我们的密谋家们所津津乐道的，而且是他们的全部计划的精髓。我记得，在一次就家庭关系的优点和缺点而举行的讨论会上，有人公开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如果做父亲不具备高尚的道德，那就不该让他的孩子们取他的姓。

使老年人的晚年过得更加美满会有助于巩固青年人的道德；这种相互依存的幸福，加上完全由社会负担的公共教育所起的令人愉快的效果，就会使祖国的实力由于人口的增长——没有任何道德因素会阻止这种增长——而不断强大。

人口增长的有利条件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都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公有制消除了妨碍两性之间进行更为频繁的接触的种种原因；这种制度会给我们带来从未感受过的精神上的安宁，会使人们由于从事心情舒畅和丰富多彩的活动而身强力壮，会杜绝奢侈和闲逸现象从而增加对人人有用的产品。

这种制度较诸古代制度的优越性

古代最杰出的立法者，也正是通过类似的办法来使他们的同

胞们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自由和幸福。特别是莱喀古士，他几乎达到了自然所指定的那个社会的最终目标。但是，古人所实行的人权，也许还有那种不公正的利己主义，使他们的一切制度贯穿着一种不人道的作法，这种作法跟我们的密谋家们的制度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密谋家们的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一些人享受自由，不会象希腊和罗马那样，引起另一些人遭受奴役。

居民的重新分布

自从财产的不平等使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劳动，而另一些人则过奢侈闲逸的生活时起，在农村里留下的人便不多了；这些农村居民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但是却经常被过度的劳动弄得筋疲力竭。在城市里聚集了过多的居民，他们集中在城里，如果不是为了任意挥霍农村居民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就是为了依靠穷侈极欲的富人和臃肿庞杂的公共管理机关来谋取闲逸的生计。

随着逐步向平等制度接近，社会必然会看到，这种对道德和人口起瓦解作用的居民大量集中的现象将消失。那些按理应当从事劳动的人，将重新投入劳动，从而减轻那些劳动负担过重的人们的劳动；那些工于技艺的人们，将会使供养他们的人们的生活丰富多采；由于管理机关的简化，大量的职员将被裁减，从而使大批的人去从事农业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由此可见，在那时候，要保持一种建立在每个人一丝不苟地履行其真正的义务的基础上的制度，就不能容忍人口拥挤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使人们的行为易于逃避公众的监督。

大城市的衰落

将来不再有首都，不再有大城市[1]；全国将不知不觉地布满了乡村；这些乡村座落在最有益于健康和最舒适的地方，在这些乡村之间，有纯粹为了公共利益而修建起来的道路和四通八达的运河，

---

① 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那么大城市的存在便是社会的一种病态和国内发生动荡的确凿无疑的征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富有的商人构成一个核心，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人；这些人由于寄食于前者，于是便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迎合他们的口味，顺从他们的怪癖，助长他们的恶习。

城市里的人口越多，奴才也就越多，荡妇也就越多，饥肠辘辘的作家也就越多，诗人、音乐家、画家也就越多，爱耍小聪明的人也就越多，演员、舞蹈家、牧师、掮客、盗贼以及形形色色的小丑也就越多。

由于一些人经常提供服务来换取工酬，于是便造成一些人惯于掌握大权和发号施令，另一些人则惯于卑躬屈膝和仰人鼻息。后者亦步亦趋地摹仿前者的习气、派头、举止和傲慢态度，并且在那些没有他们走运的人们面前摆出高人一头的样子。无论是前一种人或是后一种人，都蔑视真正的幸福，他们希望成为——尤其是想装成——有钱有势和享有特权的人物。

豪华的宫殿，宽阔的花园，贵重的家具，漂亮的马车，无数的奴婢，喧闹的客厅——这一切所谓的大城市的装饰品，都对那些受它们吸引的人们的思想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东西更加助长了它们的占有者的妄自尊大，使他们把不占有这些东西的人们看作自己的敌人，而后者则在嫉妒和贫困的不断推动下，极力想剥夺前者所占有的一切，为自己所处的屈辱和贫困的地位一雪心头之恨；另一方面，不占有这些东西的人，要么就被贪欲和仇恨引入歧途，要么就变得卑鄙和下流，从而成为野心和专制的支柱。这一切无论对于享受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或是对于追求这些东西的人来说，都是真正的不幸，因为当一些人被无聊和疑虑所折磨的时候，另一些人却由于对他们所想像的财富产生嫉妒之心而不胜烦恼，据他们看来，掌握这些财富的人都是一些幸运儿。

到大城市来寻欢作乐、追求奢华生活和名誉地位的人，可以不从事劳动，他们把大自然摊派给每个人的那部分劳动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样一来，那些居住在乡村里的人所担负的义务，便超过了自然的限度，对于他们来说，农业劳动和必要的手工劳动，也就显得更加繁重和苦不堪言。苦难有增无已，以至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几乎与发配苦役的犯人无异，终于为人所不齿和嫌弃。每一个农民都把眼睛盯着大城市，只要一有机会，便奔往城市寻找他所想入非非的财宝。一旦打定了这种笨主

交通十分方便。

简单朴素的住宅

可以想像，由于一切都服从于平等制度的最高法令，豪华的宫室将被有益健康、舒适便利、清洁卫生的住宅所代替，这些住宅的

意而跑到那里去，就不得不在那里生活下去。于是出现了一些诱惑人的事例；于是大群的人即使做坏事也受不到谴责；于是人们的感情受到感染；于是那些令人厌恶的行为渐渐地被看成是高雅的举止和办事的能力；于是人们很快就把金钱和掌声置于义务和美德之上；于是人们乞灵于奉迎和油滑的手段，从而使自己变得虚伪和欺诈成性，他们一旦走运，就会登上那个象是幸福、其实并非幸福的高峰，并且成为许多没有头脑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后者沿着一条失算和幻想的途径迎面奔向不幸。

然而，在财富、享乐和糜烂的生活方式的吸引下而聚集到大城市里来的竞争者越来越多，以致大多数人只挣得微薄的工资，他们由于操劳过度而精力衰竭，儿女成群则使他们不堪荷负，于是他们便沦落到那群令人目不忍睹、黯然神伤的不幸者的行列中去，这种不幸的人在大城市里比比皆是。

由于农业和生活所必需的手工业是社会的真正的哺育者，因此，很自然地应当要求人们生活在可以从事这两种行业的地方，他们应当耕种土地，或是给农民提供种种便利和休息条件。

除了不平等所直接带来的种种不幸以外，国家的庞大、行政的集中、捐税的繁重、公债的荷负、生活的奢侈以及宫殿的浮华，都又额外地带来了许许多多跟大都会结了不解之缘的灾难；在这些大都会里，——用让·雅克的话来说——，妇女不知何为贞洁，男人不知何为气节。

这种人口密集的情况越严重，意味着财产和生活条件的不平等现象越悬殊；随着这种不平等现象而来的是困苦的加深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加剧。因此，在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要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克服更多的障碍。

人们所抱怨的往往是神父的欺骗、军人的残暴、侍臣的两面三刀以及密探的诡计多端，而我们则宁可抱怨那种万恶的不平等现象，因为正是不平等才使这一切成为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大群由于习俗、机构和法律关系而互相嫉妒、仇视和斗争的人，怎么能够不通过欺骗和恐吓手段来使他们之间维持一种和平的假象呢？

在这些由不平等而造成的大都会里，革命分子也得到锻炼；这些大都会在那么多的场合下起了专制制度的工具作用，而在某些场合下也可以成为自由的策源地；它们可能有助于切实地建立起真正的秩序，只要明智之士能够领导运动，并且懂得随后消灭那里的堵塞和臃肿现象。

分布十分匀称协调，令人心旷神怡，并且有利于维持公共秩序。

庄严雄伟的公共建筑

随着宫殿的消失，茅屋也不存在；房屋将变得简朴，只有公共仓库，半圆形剧场、马戏场、水库、桥梁、运河、广场、档案馆、图书馆、特别是供行政官员开会和人民行使其最高权力的地方，仍然在建筑上保持庄严雄伟的风格并在艺术上具有高超群绝伦的色彩。

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任何事情都不应当被贤明的立法者所忽略；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里，任何东西都不应当跟平等原则相抵触，因为这种原则是它的目标、纽带和力量。只要公民们一尝到平等的甜头，那么平等就会马上渗入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家具和衣着

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衣着和家具。对于个人幸福和维持公共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的是，使每个公民习惯于把自己的同胞看作是平等的人和兄弟，使每个公民在任何方面都丝毫看不到即使是表面上的优越的迹象，看不出任何权势和卑躬的征兆。平等和朴素并不排斥美观和整洁；不同的花色和式样可以标志不同的年龄和职业；一个公民在工场中所穿的衣服可以跟他在开会和节日时所穿的不同，女孩子的穿着可以跟妇人不同，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公职人员和军人也应当有各自的特殊的服装，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人们这样做。

在这方面，起义委员会认为：一切都应当从有利于健康和身体发育出发，而不应当追求时髦和标新立异；委员会还希望法国人民能够选择一种跟其他各国人民不同的服装。

改革的幸福后果

要想很好地体会这次伟大的变革的好处，本书的读者们应当反复地记住起义委员会借以论证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并策动自己把这个事业坚持下去的那种思想。委员会认为：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眼光放在这样一个阶级身上，这个阶级的人由于拥有财富、善于空谈、自命不凡、游手好闲、狂妄自大而受到公众的注意，并且自诩为民族的出类拔萃的部分，然而应当看到，当社会机体向新生活过渡时，这个阶级的人必将吃不少苦头；我们当中那些由于教育不良而沾染上种种恶习的人，有朝一日将会为自己的堕落大吃一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想到我们的绝大部分同胞陷于那种筋疲力竭、贫困痛苦和饱受奴役的处境，如果想到有钱人的每一种娱乐都无不要求我们的同胞付出痛苦和贫困的代价，那么就不难相信，重新回到平等制度去，就可以避免无穷无尽的忧伤，就可以为造福同胞开辟广阔的天地，尽管在这样做时也许不一定要那么大造声势，然而这也绝不是一小撮腐化堕落、胡作非为的人的牢骚怨言所能左右得了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为了他们本人的真正幸福，为了其他一切人的幸福，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应当重新引导他们培养起更为理智的感情。

非生产性的活动

为维持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应由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们平均分担，这种劳动是法律要求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履行的义务。然而，在人的一生中有很长一段空余时间，这段时间可能使人精神萎靡和苦闷无聊，这是必须加以防止的。合理而自由地利用这段时间，关系到公民的幸福，从而也关系到社会的自由、繁荣和长存。巩固神智、增强体力、自觉地堵塞一切堕落的渠道，使生活的每一刻都无限美好，激发人们崇尚道德，使祖国成为它的儿女们的唯一适宜的居处，这些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立法者在普遍推行一些能够自由自在地填补上述空余时间的活动时所能带来的伟大后果。

但是，如果想在存在着罪恶制度的地方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将是徒劳的，因为在那些地方，贪求财富成为国家的主要动力，占有财富的能力则被列为一个人的光荣的品格；如果有人试图把贪婪和欺诈的精神带到这样的工作中，那么这些工作很快就会受到极端蔑视，而那些致力这样的工作而不惜耽搁自己的事情的人，则会被人看做傻瓜，他们的好心肯定不会得到好报的。

良好的道德

上述工作的目的在于：锻炼身体、陶冶精神、教育青年、普及教育、学会使用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尊奉神明、纪念伟人、组织公共游戏、筹备节日庆祝活动、改进有用的工艺、研究法律、从事管理工

作和举行人民会议;与其他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活动不是为维持人的生存所必要的,而且大部分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从事这些活动应当是自觉自愿的,不能有任何勉强。为了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结果,立法者应循循善诱地引导公民自由选择这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杰出的政策是:通过教育、示范、说理、舆论以及兴趣的吸引来改变人心,使人的心里除了促使社会更为自由、幸福和长存的想法以外,永远不会有其他想法。当一个民族达到这种地步,便具有良好的道德。到那时候,人们会心情愉快地完成最繁重的任务,自觉地服从法律。对天生的独立性加以约束将被看作是好事,合理的建议将不会遭到反对,在政治机体内部将存在着利益、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在起义委员会被强行解散的几天以前,该委员会曾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研究这一部分新制度,使我感到莫大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把这次会议的全部情况向大家介绍。为了尽可能完成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我要叙述一下在我的记忆中所留存的全部事迹,但是我并不想把记不清楚的地方填补起来,原因是我担心会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委员会的思想。

教育——道德的源泉

根据密谋家们的计划,置于共和国的直接监督之下的公共教育,乃是道德的铸模;因此,道德在社会里将会得到巩固,因为年轻人在社会上所接触到的,正是他们从幼年起就学会热爱的那种感情、观点和习惯。关于这种教育,我将在介绍完整个思想大厦以后

再回过头来谈谈，因为社会教育应当成为这个大厦的永恒的基础。

不能分配的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为维持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工作，应当在不同的劳动者阶级之间实行分配。然而，为了维护自由，还有另一些工作同样需要号召全体公民去承担，这些工作的目的是管理和保卫共和国。

管理公共事务和保卫祖国是全体公民的事情

起义委员会认为：只有全体公民参加制定法律，能够肩负管理社会的任务，并且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社会才能有自由和平等。

一个通晓管理艺术的阶级的危险性

委员会说：如果在国内形成一个阶级，只有它才通晓社会学、法律和管理原则，那么这个阶级很快就会依靠它在智力上的优越、特别是利用它的同胞的愚昧无知，找到使自己出人头地和享受特权的秘密。他们夸大自己的职务的重要性，从而很容易让人把自己看成为祖国所不可缺少的保卫者。这个阶级在利用公益的名义来掩盖其卑鄙勾当的同时，却照样向它的不够清醒的同胞们侈谈自由和平等，后者所遭受的奴役，由于表面上看来是合法的和自愿

的，因而更为残酷。

行使立法权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事情

对于国家来说，仅仅有基本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法律不能把一切都预先规定出来，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能适用；为了使我们的制度的精神维持不变，为了适应不能预见的场合，通常需要有新的法律。

何况，凭借自己的经验来改进工作乃是人的天性；为了全面地实现社会的最终目的，就必须不断地通过法律把人们的经验总结起来用于社会管理。

只要国家需要一种永恒的立法权力，只要这种权力——正如我们行将看到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全体人民当中，那么共和国的奠基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使全体公民能够行使这种权力，也就是说，使人民有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主人。人民在一般问题上所作出的英明决定，既不会跟平等相抵触，又不会跟社会幸福相抵触；然而，其所以如此，仅仅是由于存在着名符其实的平等。

从这项基本任务中产生出全体公民应从事的三种活动，这些活动由于其目的的重要性，由于它们要求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及由于它们能够提高人们的智力，将使人们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得到美好的点缀。这三种活动是：捍卫和宣传社会制度和法律的原则，从事学习，从事锻炼。

我将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负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主管部门的情况，还要谈到为青年所规定的制度；在这里，我仅仅谈一谈从

公共教育院(每个青年都必须在那里受教育)里培养出来的青年人的使命问题。

为享有选举权而应具备的年龄和能力

在一切社会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制定法律的权利,因为正是法律赋与社会以生命并使它向前发展;在法律制定以后,便产生公职人员的职能,他们负责执行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意志。要想有效地运用上述权利,要想确切地执行上述职能,则非有受过教育、富有经验和明智通达的人不可。因此,根据起义委员会的计划,立法者应当规定出一定的年龄限制,凡是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人,都不得参加行使最高权力和担任公职;同样的问题是:凡无法证明自己具有能力的人,都不能行使公民权。但是,由于顾虑这种规定会成为一种借口,从而把过多的公民排除在行使其最高权力的会议之外,委员会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况且,委员会还抱有这样一种信心,即一旦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利益的复杂性和对立就会消失,调节公共事务的艺术就会简化,以至很快就能够为一切人所掌握。

对于法国青年,当他们走出教育院以后,并不是冒失地把他们送到选民会上去。人们打算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出席这种会议,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旁听席位,为的是让他们了解讨论的方式和程序,并且习惯于会议的严肃气氛和规矩。人们还希望当青年人在社会上获得这种最高尚的人权以前,应当出席可以让他们每个人发表自己意见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将听取精通法学的人士的发言,并深入研究共和国推荐给他们的书藉。

此外，他们必须经过一段野营生活，并且在服兵役之后，才能够享有选举权；青年人将始终受到祖国的关怀，祖国永远不忽略青年人未来的使命，祖国将经常地让他们了解它的恩情、它的法律以及他们应尽的义务。

取得公民权必须经过人们的同意

委员会认为：把所有凑巧地诞生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不经过他们的任何讨论，一概列入公民的行列，从而臆断他们已经同意这样一件对他们一生具有如此重大影响的事情，这样做是一种很坏的习惯。据委员会看来，大家服从由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的法律，应当是一种明确而自由的意志的正式表达的结果。

因此，委员会主张通过一种隆重的仪式，来正式地确立社会与公民、公民与祖国之间的相互义务。

那些经过法律所规定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阶段的适龄青年将在规定的日子出席公民会议，向会议申请把他们列入名册。经会议讨论以后，便有人向他们解释社会公约的实质，该公约所赋与的权利及其向申请人提出的义务；并且要求他们表明自己是否同意按照他们所听取的、而且在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中所了解的条件而成为法兰西社会的一员。凡是表示不同意的人，都要永远被驱逐出共和国；这些人应当被护送到边境，并且供给他们足以维持一定时日的生活必需品。

至于其余的人，他们要与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签订一个庄严的契约，然后获得标志他们的新身份的种种待遇。在由公职人员

给他们换上公民服装以后，他们便以法国公民的身份受到人们的祝贺，他们的名字被登入公民名册，并向人民庄严地宣读；接着，发给每一个新公民一套军装和全副武器，在武器上刻有每个人的名字；这是为了使他们顾忌到丢失武器会沾污自己的声誉，从而促使他们在战斗中更加勇敢，鼓舞他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保卫祖国所委托给他们的事业。

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民会议

每一个公民从被编入公民名册时起直到逝世为止，都要不断地出席人民行使其最高权力的会议。从我打算对起义委员会的有关政权形式(这应当是它的成就的最终结果)的理论所进行的阐发中可以看到，这种会议的目的在于：

讨论、通过或否决人民代表向人民提出的法令；

讨论由一定数量的公民或其他一些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提出的法律；

审议并公布由全体人民通过的法律。

政府的组成及其活动

在我对起义委员会的有关政权形式的理论所进行的阐发中，还要介绍一下跟行政官员的选举、就职和行使职权有关联的活动。

重要的是，要使这种活动变得令人称心如意。我们的改革者

希望通过下列办法来达到这点：让人们接受教育，让人们经常不断地回忆平等制度使法国人民摆脱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灾难，使我们的法律、风俗和舆论对于从事管理国家大事的人表示出尊敬和爱戴。

民众集会是休息和竞赛的场合

人们将尽力利用艺术、庄严、秩序和自由所能提供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来装饰举行上述集会的地点。然而，目前这种集会由于往往被各种利益的对立所引起的混乱的状况弄得乌烟瘴气，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现象将会消灭，此外，如果我们还想到，政治制度的极端简化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容易地估计到这种集会的好处，那么我们就会坚信：一旦建立起真正的平等，这种集会就必然成为人们感兴趣的对象，成为人们为了休息和从事有利的竞赛而进行活动的对象。

每个公民都是一名士兵

保卫祖国，防备外国人随时可能进行的侵略，这是明智的法律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国内制度再好，也无法使无战斗力的人民免受不讲信义、好战成性的邻国的侵犯。

如果说，武器对于共和国是有用的，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通常只把武器委交给一部分垂涎战利品和爱好虚荣的人，让他们利用这种武器去满足个人野心和专制制度的利益，

去反对其他人的自由，那么武器对于共和国是极端有害的。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胡作非为，正确的办法是把武器交给全体公民，使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样善于使用武器。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使共和国避免遭受上述的危险，而且还有使它更受邻国尊重的好处；同时，这种办法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可以使公民习惯于遵守法纪，并且可以使他们忍耐疲劳，不怕苦和不怕死，因而更富有生命力。

教育儿童热爱祖国和真正的荣誉

因此，一旦儿童成长起来，就让他们习惯于军事训练。当我谈到关于儿童的早年教育的时候，我将叙述人们想采取什么办法去培养他们的毅力和勇气。在这里，我仅仅指出这样一点：按照委员会委员们的想法，在这方面的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只有在把年轻人培养成服从纪律、在行军中惯于吃苦耐劳、充满对祖国的热爱和热切地愿意为祖国服务以后，才让他们参加社会生活。

青年人经常驻扎在国境上

新制度在加强人民的防御能力的同时，同样培养他们与外国人民平等相待和痛恨征服的感情。一个从事农业的民族，既不拥有金钱，生活也不奢侈，他们的士兵就是公民，他们尝到了平等、自由和富裕的甜头，这样的人民，不愿意也不可能拿起武器去压迫邻国人民，或是当为了自己而进行战争时把战争延长。

但是，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并不能使我们的人民免受邻国的

滋扰和征服者的侵犯，所以他们应当时刻戒备。他们的由全体有能力的公民组成的军队，应当毫不延缓地惩罚那些胆敢进犯的侵略者。可是，如果把侵略者阻挡在边界上，使国家免受入侵的蹂躏，并给予人民以拿起武器的时间，那岂不更好？因此，委员会认为，在当时欧洲的局势下，应当让法国青年经常驻守在共和国的国境上，直到理智和自由取得新的成就为止。

在进入关于军事训练这一章之前，必须概略地介绍一下国民军的建立及其实力与活动。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军应当由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法国人组成，法律应对服役和退伍年龄作出规定。

军事制度

全体公民被编为若干实力相等的部队，他们只要一听到祖国危急的呼吁就可以立即进军。在服兵役期间，专门有一段时间是用来训练服从命令的；长官由人民委任，任期有限定①。起义委员

① 据我看来，终身的军衔制是危害社会自由的最大祸害之一，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才会在法律的废墟上出现某种专制制度。军官本来也是善良的公民，但由于永远把自己置于普通士兵之上，便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利益脱离人民的利益；他们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会把自己为祖国服务当作牟取荣誉、财富和权力的资格；他们只是象人们操一种职业一样来掌握武器，其结果是在国内培养起一个贵族集团，这个集团的一切都依靠它的首领们，为了取悦这些首领们，它便宣扬盲目服从的理论，极力压制其下属的思想，甚至不让他们想到自己的权利。

为了专制制度的利益而设法使人民相信：战争只有让那些把打仗当作自己的专门职业的人们来进行，才能够取得胜利。这是一种已被经验驳倒的谬误。自由的本性所包含的力量，要比任何兵法更为强大。团结一致和组织有方的人民，永远足以制服冒然蠢动的敌人，并且能够选拔出年老而有足够经验的负责人来指导他们的军事行动。

会的若干委员认为，提请文职人员担任最高的军事职务，是有好处的。关于这种见解，我们将在谈到政府的时候再加论述。

军事制度所产生的活动

在和平时期，军事机构设法使公民们受到吃苦耐劳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使人们的体质增强、精神焕发，并且为人民的娱乐和竞技开辟广阔的天地。

为了下列目的，将经常举行会议：

把新的保卫者列入名册；

选举将领并公布当选人；

执行军事行动；

参加赛跑、赛马、游泳等项锻炼活动；

组织大型的野营；

颁发奖品和进行表扬，以表彰勤劳和勇敢的行为。

全民入伍易于实行

迄今为止，军事职能始终令人愉快地充实人们生活中的一部

难道斯巴达人有永不撤换的军官吗？难道歼灭了薛西斯的无数大军的希腊人，是永远由某些将领来领导的吗？难道罗马在其全盛时期有终生任职的指挥官吗？难道瑞士人，荷兰人和美国人，不正是依靠由农民和牧民组成的军队，赶走了他们的压迫者的训练有素、惯于盲从并由职业军官指挥的军队吗？一小撮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科西嘉人，却不断地击溃了热那亚贵族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在长时期抗击了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最后，当法国大踏步地向自由迈进的时候，它正是依靠毫无经验的士兵和新的将领，依靠奇迹般的勇气，抗击并打败了欧洲所有的霸主的军队。

分空闲时间，也就是一部分不用于必要的生产活动的时间，因此，军事职能并不妨碍生产活动的分配和协调。然而，一旦战争爆发，这种职能就成为维持社会生存的首要工作，因为，这时候社会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

掌握最高管理权的执政机关，应当呼吁公民们起来共同防御，如果当时没有必要让全体公民参军，则按法律的规定，指定一些公民入伍。

在共和国各地，名册、武器、军需品以及军事训练，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号召全体人民入伍，不会比出动一团人更难。有哪一个民族具有这种威力来抵抗敌人呢？

可是，当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拿起武器而离开家园，致使生产劳动中断或缩减的时候，就会出现日用必需品匮缺的现象；只有明智的政府，才能在日常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寻求对付意外事件的预防措施。

意外事件及其预防措施

意外事件不仅限于战争的破坏和工作的中断，还有一些事件是人们所不能预料和防止的，诸如水灾、旱灾、冰雹、以及依靠人工保持肥沃的土地由于经常发生革命而颗粒不收。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类似这样的事件就会经常使繁荣的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尤其使一切善良的人感到悲痛的是，歉收之所以使劳动者阶级极度贫困、陷入绝境，并不是由于真正缺乏粮食，而是由于在歉收时，对工人劳动的需求降低，工人无力购买有钱人把价格哄抬起来的

粮食，而在丰年，只有富人才能够囤积粮食。

然而，按照正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有福共享，有难同担。当出现生活必需品匮缺的现象时，使人感到到处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让人们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之前，必须采取在通常的地力和人力的条件下所能实现的一切预防措施。

毫无疑问，全体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大大地超过社会的需要，因为在现行社会制度下，有那么多的人游手好闲，有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变为废物。要应付意外事件，只要把丰年的剩余产品收集和保管起来就可以了。目前，这些产品几乎全部被胡乱浪费掉了，这就助长了人们的骄傲、虚荣和不良的嗜好，从而使我们变得凶狠和不幸。

最高管理机关很容易了解关于产品的产量和需要量的情况，从而能够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保证各地当前的粮食需要和供应将来的不时之需。

目前，统计数字很少有精确的，因为凡是认为自己囤积越多就愈不受灾难影响的人，都极力采取虚报手段使自己的财产逃避公共的赋税。但是，在祖国的统一的所有制代替了私人占有制的地方，每个人只有在共和国富裕而且能够掌握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劳动果实的条件下，才能够对自己的前途放心，因此，同样一种顾虑思想在今天仅仅促使人们去为自己打算，而到那时候则会促使人们亲近、团结、互助以及开诚布公地互通有无。据起义委员会说，只要衡量一下全盘局势，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私有制的建立，几乎把社会制度的好处破坏无遗，只有在私有制消灭以后，每个人才会感到自己和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

目前的管理技术由于那么多的利益冲突而显得困难重重，而在实现财产公有以后，则会变成一种连我们今天最不能干的商人也能够胜任自如的计算技术。

共和国可以依靠在产品丰足的时候贮藏得满满的大型仓库来应付不测事件。只要一出现外敌入侵的危险，就能够从这些仓库中调拨出必要的给养供给武装起来的人民，并把这些给养运送到他们集合的地点。

在现存制度下，准备战争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如何指挥武装人员的行动，而在于如何征集他们和维持他们的给养。

即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战胜萎靡不振的情绪和利己主义的反抗，要募捐金钱和保证拥有各种各样的食品，也仍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募捐者是怀着遗憾的心情来施舍的；而在食品供应方面，如果直接采购，就会由于粮价突然上涨和职员们的难以避免的盗窃而使代价高昂不堪；如果通过供应商去收购，那么这班人的永不知足和善于掩饰的贪欲，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的。

有时候，对外敌压迫的恐惧，至少会在一定时间内激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从而有利于募集额外的捐献；可是，在反抗外敌入侵方面所采取的手段，往往给农业和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使人们怨声载道。

军队的给养

在我们的密谋家所规定的政治制度中，这一切困难都会消失。由于粮食准备停当，武装部队随时都可以开赴边境，而丝毫不需要

削减公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因为武装部队的人数维持不变，所以他们的需要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增加。

非常的资源

当战事有必要重演的时候，由于必要劳动的数量和消费者的人数没有减少，而一部分公民却不得不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其结果会造成粮食不足，这可能成为不幸和混乱的原因。

在这时候，采取平等的新原则会提供新的资源。由于从事战斗的公民的负担已无可复加，所以通过重新分配公共义务的办法，给没有拿起武器的人增加劳动负担，乃是公平的事情。即使在最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人民的最大的负担也不过是每天多从事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劳动。密谋家时而激昂地说道：但愿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采取简单易行的方法就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

防范肆意发动战争的措施

如果由于看到人民能够这样轻易地组织起来并发挥自己的力量，就断定这样的人民会永远弄得四邻不安，那是错误的。相反，应当认为，这样的人民会自己制定出准则，以防止轻率地和不公正地发动战争，并且指导战士在交战期间的行为。

看来，这样的人民只是为了反抗敌人入侵或是支援受到不公平压迫的邻国，才进行战争的；他们对自己富饶的土地所提供的丰

富的物产感到心满意足，在他们当中没有穷人和骗子，这样的人民，怎么可能为了那些被他们视为累赘的产品而跟邻国发生争执呢？这些从事农业、生活简朴、心情舒畅、恪守本国的习俗与法律的人民，是跟掠夺和征服格格不入的；他们的商业制度永远不会让他们跟素不了解的异族商人发生纠葛①。

在起义委员会里有人认为：一切进攻性战争应当为法律所禁止，法律应责成军队在共和国的国境内等候敌人的进攻。委员会中还有人希望：为了防止国民作为战胜者而大发横财、以致腐化堕落，就要禁止个人占有战利品，每个士兵所缴获的东西都应当送交公共仓库。

可是，所有的人都毫不掩饰这样一种看法，即防止在战争中胡作非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教育使人人从内心中对受奴役的民族的财富不存染指之念。无论是在行军中或是在战斗中，这些来自公民的士兵，除了热爱平等与祖国以外，不存在另一种感情；除了祖国的法律外，不存在另一种指南。

---

① 和平是仅次于自由的最宝贵的东西，因此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拿起武器，才是有益的和正义的。否则，即使最顺利的战争也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而且对于胜利者本身来说也是灾难的根源。

历史教导我们，辉煌的战功往往就是专制制度的基石。由于下列种种原因，穷兵黩武的精神更有必要用法律和道德风尚来加以约束：征服和掠夺会使公民腐化堕落，会使战败者悲观失望并促使他们起来报仇，会使社会舆论把骑士式的和野心勃勃的行为引以为荣，会使那些叛逆的长官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会把在服从法律的借口下而使士兵们就范的专制制度强加给祖国。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巧妙地煽惑他们的轻举妄动投入战斗的同胞去追求黄金和名誉，并利用他们的这种欲望到处散布腐化堕落的情绪，排斥美德，狂妄地自封为受他们奴役的人民的救世主，并且在对人道主义玷污，对一切宗教思想加以嘲弄以后，竟厚颜无耻到利用神明和正义来庇护自己的罪恶的权力。

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

密谋家把自己对共和国的热爱跟对人类的热爱结合起来，他们的一切方案实质上都在于为人类谋幸福。他们的愿望一旦实现，那种应当在公民当中占统治地位的平等和正义思想，就势必成为共和国对待外国人的行动指南。他们希望法国人民把自己看作伟大的人类社会的一员，用自己的智慧和范例来为保障普遍和平作出贡献，并使自然赋予一切人的权利在所有的地方都受到尊重。

那种以管理和保卫国家为目的的活动，其意义的重大，实在不亚于旨在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因为如果没有前者，就不可能维持国内制度和防止外来的危险。此外，这种活动应当成为大家的义务，否则，它就会立即终止以公共利益为其唯一目的。

我想要分别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活动，对于保障社会的自由和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由于这种活动并非出于行政命令，而是出于自觉自愿，由于它们能够把人们的愉快心情变为涌现美德的源泉，由于它们能够加强人们对于祖国的感情和热爱，因而它们也就更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

公民经常举行集会的好处

委员会希望，共和国的公民共同去做他们所应做的一切事情。它认为，有了大量的道德高尚的公民，就能克制利己主义的私念，令人更加感到有互助的需要，并有利于巩固每个人内心中的这样

一种愿望；只要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受到普遍的赞扬。

怎样进行休息呢？每个人只有在跟其他人一同分享乐趣的时候才感到快乐，这才完全符合平等的精神。因此，自由的人民经常举行集会，而受奴役的人民是根本不举行这种集会的。一个国家中的人民所能享受的幸福是大是小，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究竟是重视公共娱乐呢？还是与世隔绝，对人民大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呢？

在一个英明的立法者的领导下，自然的、生活的和社会的事件都可以同样地成为教育和消遣的机会。他可以借助于其中一些事件使公民们注意到神明的创造和社会制度的奇迹，也可以借助于另一些事件来颂扬伟大人物的高尚品质并鼓励人们去摹仿他们。他时而激发起人们的勇气，时而使人们心中燃起对平等的热爱。并且，他不断用崇高的目标来充实人们的思想，以防止人们受邪恶的欲望和念头的腐化和侵蚀。

四种会议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起义委员会曾经把人民会议分为四种。第一种会议是为了行使最高权力、进行判决和管理，关于这种会议，我已经谈过一些，还要在介绍管理形式时继续阐述。第二种是我已经介绍过的关于军事制度的会议。第三种会议完全是为了解决教育问题，我将在论述有关教育和智力发展问题时加以介绍。最后，第四种会议，委员会打算用来保持和加强法国人内心中对高

尚品德的热爱。关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思想，我将尽力作简短的描述。

庆　祝　会

委员会从注意公民生活中的最辉煌的事件入手，并认为，使所有这些事件都成为举行民间庆祝会的内容，是符合它的制度的精神的。结婚、婴儿的出生、送孩子进教育院、青年人开赴边境、以及他们从边境回来、被接受为公民，诸如此类的事件，都可以在法国各地举行隆重的民间庆祝活动。

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送战士上前线 迎接战士的归来、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祖国的保卫者、给最勇敢的战士授奖，这一切都可以作为举行另一种庆祝会的内容。这种庆祝会能够使人们精神振奋，保持旺盛的斗志。

批　评　会

按照委员会的计划，还有另一种会议，这种会议是为了培养人们具有希望受到舆论表扬和害怕受到舆论指责的心理。在规定的日期，在这种会议上要对公民的，而且主要是对行政官员的表现进行某种批评。我们已经知道，把青年人列入公民名册，是必须经过人民同意的；同样，授予老年人以光荣头衔，或是给予死者以荣誉，也都要经过人民同意。

据委员会看来，老年人应当在管理共和国方面起重大作用，他

们应当对人们所讨论的问题进行启发，注意风俗习惯的遵守情况，最后，还要对青年的教育进行指导。他们穿着特殊的服装，在举行公共集会时坐在专门的席位上，凡是向人民提出的一切建议，都首先由他们来裁定。他们应当保留有重要的职位并对批评起主要的影响作用。由于他们生平没有不检点的行为而博得后辈的充分爱戴，他们便能够防止公共讨论受年青人的轻率和急躁情绪的影响。

对公职人员的评议

我们的密谋家还想建立一种对所有任期已满的公职人员实行评议的制度；任何一个公职人员，只要他原任管理工作不为人们所称许，便不得就任新职。

对死者的评议

为了使享有最高荣誉的公民始终有所盼望或有所顾忌，人们考虑把古埃及的一种风俗移植到法国来，按照这种风俗，应当对死者的生平进行评议，以决定是否给予他们以光荣的殡仪。

良好公民的遗骸，埋葬在风景优美、并有艺术点缀的地方。人民为最高尚的人建立纪念碑，在碑上铭刻他们的姓名和事迹，这就为教育下一代和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开辟了广阔的场所。这些神圣的墓地由老年人负责管理，他们将以身作则，启发全国人民对这些优秀人物怀有应有的敬仰心情。

纪 念 日

为了纪念那些对平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最有意义的事件，应当规定相应的节日。让人民了解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时代背景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利弊，这就等于给他们在本国历史、道德和政治方面上了一课。从而使人民懂得如何识别那些会使共和国之舟由于不慎而撞沉的暗礁。

游艺和戏剧

人们还希望把上述一些事件搬上舞台。如果真的这样做，立法者就能够利用一切诗歌、音乐、舞蹈和绘画来使他所要宣扬的感情深入人心。他可以借助于舆论的赞赏来表彰勇敢、敏捷、节制、谦虚、热爱劳动以及其他种种体力上和精神上的优良品质，因为这些品质是平等与自由的装饰和支柱。

据委员会看来，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里，凡非全体人民所能享受的娱乐，都应当加以取缔；它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种不受严肃的评判员监督的随心所欲的杜撰，会立即滋长严重违背公益的恶劣品行。

神明与灵魂的不灭

共和国的一切制度及其所缔造和所保护的共和主义风尚，都

应当以宗教思想为其最终的重要支柱，这种宗教思想的种子应当通过法律和教育传播到所有人的心灵中去。法兰西共和国不承认神的启示，因此不准备采纳专门的宗教仪式；但是，它要使平等成为唯一符合神意的教义，这种教义的好处应当在人民的盛大集会上加以宣布，从而在善良公民的心灵中深深地烙下了对永恒的幸福的希望①。

共和国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据起义委员会看来，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在它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中维持一种潜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将把共和国的各个部分紧密地集合在一起，使它的每部分都绝不认为自己可以跟其余部分完全隔绝，互不依赖，以及对后者的命运漠不关心，而是意识到自己的繁荣是跟其他部分的繁荣密切相关的，并且只有依靠统一的意志和共和国的行动才能保持和增进自己的繁荣。

在任何一个幅员比较广阔的国家里，都有一些富饶的地区和

① 在委员会中有人认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是会真正地关心维持对神明和灵魂不灭这种教义的信仰的[95]。这是因为——据他们看来——，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让公民们意识到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法官对他们内心的思想和人所不知的行为作出法律所不能及的裁判，并且使他们确信，忠于人类和忠于祖国必然会得到永恒的幸福。至于祭奉仪式，他们希望仅仅在对社会公约表示尊重、捍卫平等以及庆祝若干公共节日时举行。一切所谓神的启示，应当随同种种必须逐步清除的病害根源，由法律加以排斥，而在这种局面还没有出现之前，可以容许每个人有荒诞的自由，只要社会秩序、博爱和法律权力不受任何干扰。这就是在法国革命时期平等的主要保卫者的宗教理论，罗伯斯比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英勇地捍卫这种理论而遭到血腥迫害。无神论者的荒唐、阿贝尔派的谬误、丹东派的道德沦丧、吉伦特党人的内在的高傲、保王党人的阴谋诡计、还有英国的黄金，这一切在热月9日使法国人民以及全人类的希望趋于泯灭。[96]

一些贫瘠的地区，前者的土地可以提供大量的剩余产品，后者的土地则甚至难以维持其居民的需要。在公有制度下，显然需要把两者的利益联系起来。但是，怎样才能够防止那些得天独厚的公社把自己跟自然条件不好的公社的联系看成是一种负担，从而违背自然法而坚持要享受一种比其他公社富裕的生活呢？

新型人民的奠基者也许会看到，从这种可能出现的违反秩序的现象中会产生一种要求扩大或缩小本地区的土地的动机。也许，这样一种现象可以通过调节产品的办法来加以防止，也就是每一个公社都能够从其他公社取得某种产品。但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互助互利并认识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来加以维持的，因而可能是持续不断的。当共和国南部的居民认识到，北方居民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时——后者给他们提供种种享受，守卫着祖国的要地，并且使他们之间通过道德风尚和法律的交融而产生了友好的感情——，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心胸豁然开朗；他们会对这个社会制度赞叹不已，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千百万人共同协作，极力使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于是他们确信，为了他们所珍视的这个平等制度的本身利益，他们必须冲破自己公社的界限，因为平等制度包括整个共和国的幅员①。

① 作为社会基础的实际的或默认的契约，必须包含这样一个内容：把个人的一切力量和能力化为公有；不然，这种力量和能力从一开始就分配不均，从而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害。从这种基本契约中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土应当完全成为占有这些领土的人民的首要财产，无论这种领土的面积多大；而人民是不希望一些人的条件比另一些人优越，他们在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必然要通过公平分配的办法，来弥补在同样地进行劳动的情况下所获得的产品的不均的缺陷。

公民之间的联系

能够产生和维持上述感情的最恰当的办法，莫过于在全国各地居民之间建立经常的联系。这种联系将大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热情，使他们能够看到人人有表现出的那种为祖国服务的热忱。目前，商人们为了发财致富，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断钻研，精益求精。但是，他们所洋溢的这种热情，将由于私有财产的取消而烟消云散；因此，凡不愿意把自己的共和国封闭于一个城市之内的立法者，就应当用一种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的纯洁动机来代替这种热情。运输粮食、转达命令、执行管理职能和进行战争，都会使大批的居民走遍全国。但这还不够，除了这种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进行的联系外，还应当有一种纯粹源自于追求精神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快乐的联系。看来，要保持和让人们热中于进行这种联系，莫过于经常举行各种丰富多采的公共庆祝会了。

庆 祝 会

每一个公社，每一个省分，都有自己专门的庆祝会；其他一些带有比较普遍的性质的庆祝会，只能在共和国政府的主持下举行；最后还有一些庆祝会只在若干地方轮流举行，从而使这些地方光荣地受到举国的瞩目①。

① 神明、伟大的自然现象、有益的工艺、美德、造福人类的政治革命以及为人类服务并为人类增光的伟大人物，这些主题，都应当通过这些庆祝会而使人民铭记在心，关于这些主题的初步概念，已经在国民公会的法令中加以规定，这个法令是根据罗伯斯比尔所作的关于宗教思想这个值得纪念的报告通过的。

建立政权的必要性

起义委员会的成员认为:通过诸如此类的制度,就可以巩固地奠定自由,同时,通过逐步地移风易俗的办法,就可以使法国人成为幸福、团结、可爱、受人尊敬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但是,如果改革家们不想出一些办法来防止他们的创举受暴力的袭击和被腐蚀,并且使这种创举不断臻于完善,那么他们的努力将会功亏一篑。

无论制度是何等的明智,只要立法者不给这些制度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力量方面提供真正有效的保障,那么,这些制度就会崩溃,而它们所建立的平等也就随之消失。在这方面,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把所有个体力量联合为一股伟大的共同力量,这股力量将随时使那些背离公共利益的人服从公共利益:这就意味着一个政治组织的建立。

立法权属于人民

然而,如果这种力量不是直接来自人民,而是从属于一种跟人民的幸福与自由相抵触的意志,那么这种力量本身将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因此,宣布民族意志和法律,应当是人民的事情。所以,起义委员会也就想让人民通过宣布自己的意志的办法,来维持伟大的平等原则。

无论最初设想出来的制度是多么的明智,它们都既不能够预见到社会的一切危险和一切未来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够适应社会

可能处于的一切形势。因此，如同一切政治组织那样，我们的共和国需要不断地立法，因而需要一种永恒的立法权力，我们看到，这种立法权力只能属于人民。在奠定维护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起义委员会打算做到：使人民的最高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受侵犯，也就是在没有真正得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不把任何一种义务强加给他们，使人民能够很容易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并在探讨问题时能够发表一切令人满意的成熟意见。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确定人民的组成成分，确定应当通过什么方式来促使人民表达其意志和了解根据他们的意志所作出的决议，并且确定应当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来迫使公职人员服从人民的意志。

我要叙述一下起义委员会有关民众的权力的草案，在这方面我将尽时间的间隔所能允许的程度，并且借助于我的唯一能够依靠的薄弱的记忆力，来尽可能忠实地追述这些草案的内容。而在这样做以前，我要指出，所有这些草案都是为了保证实现 1793 年宪法所包含的并使该宪法具有鲜明特点的一个基本原理：**人民审议法律**。另外，我还要指出，我绝不是把这些草案当作最后的定案来加以介绍的。

委员会认为，人民是在同一种政治法律下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整体。由于大自然使每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决定于权力的平等，因此，在人民内部即使有一个人的待遇不平等，也必然立即会在他们当中播下混乱和分裂的种子。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居民，凡是已经达到智力发育成熟的年龄，并且表示愿意居住在国内和服从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所颁布的法令，就成为公民和享有

立法权的成员。

外 国 人

当我介绍起义委员会关于对外贸易的观点的时候，曾经指出委员会打算把对外贸易交给公职人员去领导。委员会不仅想通过这种作法来坚定不移地捍卫财产公有制的原则，而且企图借此消除有害的事例的传播，因为这些事例能够使道德力量和对平等的热爱——这是一切人的权力与幸福的保障——受到削弱。这样，就要在法国与它的邻国之间设置铁丝网来进行隔离。但是，这种屏障并非不可逾越的；对人类的热爱，要求向下面这样的人打开方便之门：不幸的自由之友和愿意了解法国制度的各国的善人君子，以及那些饱受奴役并诚心诚意地前来我们的共和国寻求平等和幸福的人①。

对于那些试图把外国的歪风邪气带进国内的人，应无情地加

① 这种对外国人采取的预防措施，绝不是出于一种试图跟他们隔绝的恶意，而是出于愿意尽可能好地履行各国人民相互之间应尽的人道与友爱的义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义务是，责成一个民族帮助其他民族恢复并捍卫其自然权利。起义委员会认为，法兰西共和国应当履行这项义务，首先向全世界提供一个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制度的光辉范例。据它看来，这样一项伟大的善举，是不能依靠武力来实现的，这是由于武力进攻势必引起征服和统治的思想，而且友爱的呼声跟战争的后果——暴力是极不协调的。为了使上述准备向全世界展示的伟大范例得以实现，就必须认真地从新的社会制度中排除一切足以延缓或阻碍树立这种范例的东西，并且毫不容情地把那些由敌国政府在慈善事业的幌子下不断地派到法国来的外国人从法国国土上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蓄意在制造不和并建立乱党；此外，共和二年的经验迄今令人记忆犹新，人们不会对这种人不加防范的。在其他国家还没有采纳法国的政治原则之前，法国就不能够跟这些国家建立完善的关系；这时候，法国只能把这些国家的风尚、机构、特别是它们的统治形式，看作是一种危险。

以驱逐,决不姑息;对于那些好奇的人,应当严格考验并严加监督;而对于那些诚心要取得公民权的人,在他们领取国民证书、从而得以享受公民权之前,应当经过一个很长的和要求严格的预备期,这点应当由法律明文规定。

对于居住在广阔领土上的广大人民来说,要想通过召开一次全体公民会议来一下子确定全民族的意志,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要采取一种统一的、便利的办法来规划全体人民所分布的各个地区,并且要寻找一种便捷的办法把各地人民的愿望进行对比,避免出现大家所不承认或嫌恶的东西。委员会认为,这个目的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机构来实现:

1. 人民最高权力会议;

2. 中央立法者会议;

3. 民意维护团。

前两种机构是由 1793 年宪法确立的,至于第三种机构,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作为一种辅助机构而设立。

人民最高权力会议

为了组织人民最高权力会议,必须把共和国划分为若干区,区的大小应以便于召集这种会议为准。在每个区内应设置:

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人民最高权力会议;

由这种会议任命的元老院;

由这种会议选举出来的主席和秘书;

供召开人民会议用的舒适美观的圆形剧场;

档案库;

负责召集会议和维持会场秩序的官员。

中央立法者会议

按照1793年宪法规定,中央立法者会议由人民所直接推举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出法案;另一方面是颁布法令,以保证法律的实施并对政府实行指导和监督。上述宪法条文和起义委员会草案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在某些场合下,立法者要对自己的意见负责。

民意维护者

民意维护团是一个新机构,其任务是汇集人民最高权力会议所颁布的法令,并且宣布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意志。

此外,人们还打算把这个机构变成一种独特的法案评议会,其任务在于监督那些滥用颁布法令的职权的立法者,使其不能对立法权有所侵犯。

我记不得,是否曾就民意维护者的人数及其任期作出决定。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大家曾经商定要促使人民通过立即表决的办法,从参议院中产生民意维护者。

法律的制定

在上述种种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就要考虑采取两种办法来制

定法律：由中央立法会议产生法律或者由每一个人民最高权力会议产生法律。

在前一种场合下，中央会议应把它所拟定的草案和说明材料发给人民最高权力会议。人民讨论的结果则应转达民意维护者，后者通过公布每个地区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所投的票数来宣布民意①。在后一种场合下，任何一个人民最高权力会议都可以提出新法律和废除旧法律；如果这种提案是由大多数人民提出，那么民意维护者就要把这样一点通知立法者，后者负责制定人民要求实现的法律，并将其提交全体人民批准。

防止立法者会议违法侵权的保障

如果发生立法者会议蓄意侵犯人民最高权力的情况，即该会议颁布一些跟现行法律相抵触的法令的话，那么民意维护者就有必要采取行动，唤起人民实行制裁。对于这种行动，在委员会中存在着意见分歧，至少也存在着不明确的见解。因为尽管所有的人都承认有必要设立屏障来防止大权在握的立法者会议轻举妄动和图谋不轨，但是大家在民意维护者所应享有的权限问题上却有不

① 根据1793年宪法的规定，只要经过半数以上省份的十分之九的初级议会的默许，便等于全体人民一致同意。这项规定是为了使人民不至于被过去频繁的会议弄得筋疲力竭，但同时也是先于这个宪法公布的人权宣言所保留的私有财产权的后果。随着这种权利被取消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人民只顾私事而不问公事的这种危险就会消失。这样一来，要证实人民是否表示同意，确实比较困难，因为过去往往把沉默看作是同意，而沉默乃是愚昧无知和人们玩弄罪恶手法的结果。在平等已经使立法程序趋于简化的国家里，还害怕政治会议过多，是不正确的。况且我们必须考虑到，凡不是就公共问题作出决定的法令，都不成其为法律。

同见解：一些人认为民意维护者的干预应当仅限于向人民发出呼吁，另一些人则主张，最好是赋予民意维护者这样一种权力，即在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作出决定之前，使那些遭到抨击的法令停止生效。

立法者会议的权力的划分

在这方面，一切都不明确，所能明确的只是真正地害怕中央会议的违法侵权，从这种顾虑中也就产生了把这个会议划分为两个部分的方案：一部分仅限于制订法律；另一部分则通过自己所颁布的法令来领导和约束政府，它的职权受民意维护者限制。

立法机关分散的好处

不难看到，把最高权力分散到那么多的会议中，要比把它集中在一个机构中的好处大得多，因为后一种机构很容易沦为宗派集团和花言巧语的玩物。而在这样一种使法律的产生以前要经过许多次讨论的制度下，就不必再担心会出现人们所归罪于民主制度的那种出尔反尔和草率从事的现象了。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制订法律的办法比其他一切方法都更为可行，因为它是建立在纯朴的风尚和统一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由于设置了上面所提到的参议机构，从而使它成为防止人为的错误的一种最可靠的保障。

人民应当避免犯错误

根据自然法，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如果使自己的行

动从属于任何一种意志，或者在任何时候承认某个人物高于自己，都势必会使自己受到损害。人民的真正有关立法的决议，是基于正确的意图作出的。但是，由于人民是由许多人构成的，它就有可能犯错误。因此，无论是从慎重考虑或是从它本身利益出发，都要求它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防止自己的错误。

正因为这样，如果说剥夺人民行使最高权力的权利，剥夺人民的发言权，或者对人民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法案进行专门的批准，这些都是跟人民的不可分割的权利相抵触的话，那么，维护人民的这种权利，保证让他们作出明智的和正确的决议，教育人民并向他们献计献策，便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参 议 院

起义委员会是从自然法中找到这种支柱的，同时，委员会遵循古代立法者的先例，也从老年人的经验和阅历中找到了这种支柱。委员会希望，人民最高权力会议只有事先听取它的参议院的意见，才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讨论。参议院的职能仅限于提出建议，而在提出自己的建议后，参议员便同公民们一道投票。人们已经看到，民意维护者是从参议院中产生出来的，问题在于要从参议院中产生元老院，元老院的唯一职责是，通过提出建议的办法来启发中央立法者会议。

参议院的初创

但是，没有任何人不了解这样一点，即这样一个机构只有随着

时间的推移才能够发挥其效益。人们感觉到，习惯势力有朝一日会使老年人倾向于平等制度，而在目前，这种势力则使他们醉心于传统的君主制度的幻想，执迷于宗教谬误，屈服于私有制特权以及接受奴化道德的概念。

人们打算成立的参议院，应当成为平等和民主风尚的维护者，而我们的大多数年老的人，既不了解平等，又不懂得民主风尚。此外，这些机构首先应当成为新制度的宣传者，然后才能够成为这种制度的捍卫者。

因此，起义委员会打算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让最有道德、最富有热忱、对新制度充满热爱的公民参加参议院。这些公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选定一些最受本地区人民器重的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作为助手。

不可侵犯的原则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了解：据起义委员会看来，自由与幸福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护平等并使公民忠于奠定平等的各种制度，而不取决于公共权力的分配。他们的共和国既是一种国家机构，又是某种权力结构，无论是前者，或者后者，它都包含一些连人民自己也不能触犯和修改的基本原则，因为只要一触动它们，社会就会立即瓦解。这些原则首先是严格的平等，其次是人民的最高权力。这些原则的不可侵犯性，应由法律庄严地加以规定。法律应当明文规定，当一部分公民无视上述规定而自认为有权奴役另一部分公民时，人们有权进行抵制和反抗。

对宪法的修改

除了上述自然法的两个基本原则以外，其他一切都服从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修改和改变他们所确立的权力。为了尊重这种理论，并且防止共和国可能由于阴谋和动乱而陷入危险，最好定期召开人民最高权力会议，讨论宪法，当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修改意见时，应当委托少数明智人士如期提出人们所要求作出的改革方案。此外，最好由专任的委员定期研究国内情况，这些委员们一旦发现流弊，就应当建议人民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杜绝。

享受平等权利的人民只需要少量的法律

要想估价按上述方式所建立的立法权力的优越性，首先必须提到这样一点：在消灭了私有制的人民那里，没有私有制所引起的种种罪恶，没有贸易、货币、税捐、财政制度、民事诉讼和贫困现象，从而也就不需要如今使欧洲文明社会深感痛苦的大量的法律。

领导农业和有用的手工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

在结束关于最高权力机关的介绍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最高领导权，应列为该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法

律所制定的一般条规，应由中央会议加以解释，并由行政机关付诸实施。下面我们就向读者介绍行政机关。

行 政 机 关

如果为使人民的意志永昭于世，已经采取了种种具有预见性的措施，如果那些负责草拟和宣布人民的决议的代表们幸而不能够用自己的意志来取代民意，那么剩下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指定一个履行民意的政权机关，以便使行政官员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够迫使人民服从除法律意志外的任何意志，并且使行政官员的行为成为良好风尚和效忠于祖国的永久的典范。

为了使民意受到尊重，行政官员应当得到举国上下的支持，但是，一旦他由于失误和渎职而违反民意，他就只会遇到种种困难与障碍。

一个好的行政机关应具备的条件

这样一个行政机构取决于它委派其成员的方法和人数；取决于他们的职务的划分和任期的长短；取决于对他们是否实行监督，取决于是否要求他们述职；是否对他们实行奖惩；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民族风尚以及公民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国家法律的自觉遵守程度。

对1793年宪法的补充

起义委员会认为，1793年宪法中有关执行委员会的条款是很好的，尽管还有不足之处。它很赞赏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限于执行法律和法令，以及在法律和法令没有得到执行的情况下应当追究执行委员会的责任的规定。它赞同该宪法对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所作的划分，前一种职能属于执行委员会，后一种职能属于法院。它还赞成宪法规定高级公职人员的人数及其任期。但是，起义委员会认为，必须采取一种办法来对这些高级公职人员的表现进行考察，对他们的每一失职行为进行处理，必须规定适当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表扬和批评，并且必须规定出便捷的途径来对被指控为背叛人民的代表和高级公职人员进行追究。

各级管理机关的性质和目的

在起义委员会所设想的制度下，安全、国防和人民的生存本身，都坚决要求主要执法者所作出的决定能够迅速而完整地一直传播到共和国最边远的地区。因此，应当有一条长长的链条环绕全国，这条链条的每个环节都能够节节响应自上而下的震动。这些环节就是下级的公职人员；设置这种官员，是为了启发全国各地的公民去了解他们的真正利益，是为了能够关心法律上所规定的人民的种种需要。

由此可见，在共和国里，上自执行委员会，下至使管理者与国

民保持联系的公职人员有着各级的具有不同程度职权的行政管理机构。

同样也有，各级专门的司法机关，这些机关是自下而上的，从负责确定并侦察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直到在一切地方维护立法的统一性的最高法院。

一些公职人员负责领导生产劳动并调节劳动所得的财富的公平分配，另一些公职人员负责维持公民之间的协调一致；一些人关心国家的防务并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英勇豪迈的种子，另一些人则对违法者实行法律的严厉制裁；一些人扶持弱者和开导误入歧途的人，还有的人则通过对自由、庄严、高尚情操与生活乐趣的宣扬来源源不断地为热爱祖国提供新的养料，使这些思想在集会上和公众庆祝会上深入人心。

要把这个制度的一切细节都一一加以介绍，不但要占去很多的时间，而且也没有用处。这个制度的基础是1793年宪法所奠定的，这个宪法一方面建立了法庭，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中介的行政机构和市政机关，这些机关还辖管一些负责国民经济的公职人员。

把民政职能跟军事职能结合起来

上述的市政机关应当跟一种军事制度结合起来，这种制度应由市政机关负责建立并监督。人们希望军队中的最高职位由民政人员来担任，据他们说，这是为了使战争永远只按照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去进行，使任何冲突都不可能发生，使人们得以减少对于将军们的野心的顾忌。

我想让明智的读者自己去领会在上述各项原则基础上产生的分门别类的权力形式，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下，人们究竟打算用什么办法来把那么多的公职人员纳入法制的范围。

事实上，国家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公职人员。况且，在某个方面，每一个公民也就是一名实行自我监督并监督他人的公职人员。毫无疑问，有着五花八门的公职，公职人员也就多得不可胜数了。

由于职能的总和是由人们为了衣、食、住、教育、学习以及领导和保卫人民所必要的一切活动构成的，因此，简单说来，每一个公民都是或曾经是一名公职人员。在人人都参与执行的那种职能和法律赋与公职人员的那种职能之间差别在于，后一种职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领导和保护别人；我们把这种职能称为社会职能。

公职人员的花费不高于普通公民

然而，没有必要为公职人员人数众多而惶惶不安。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必须参加他们所领导的那种劳动，他们领导劳动，除了身体力行以外，别无其他感召办法。他们还可以从由于年龄关系而免于负担繁重劳动那一类人当中抽调。对于共和国来说，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花费，都不应高于一个最平凡的公民。

朴实的风尚是公职人员忠诚的保障

这种社会制度的一个奇迹是：当一个公职人员负责把伟大的人民的法律在一部分人民当中加以运用的时候，只要他严格贯彻

这些法律，他就会受到这部分人民非常的尊敬和爱戴，而只要稍一违反这些法律，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这种奇迹只有在那些朴实的风尚使全国各部分人具有同样的意识并感到有共同的利益的地方才能够实现。而起义委员会所作的努力，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社会公职的阶梯

据委员会看来，人民是他们的公职人员的缔造者、监督者和支持者。为了避免人民由于轻信他人而懊悔，委员会特别注意这样一些法律，根据这些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利用人民的投票来攀登高位，除非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对平等制度十分热爱并且是由同一类公职的低级职位逐步提升上来的。看起来这项规定跟行使委员会所认为的必须给予人民以无限自由的最高权力并不适应。但是，它却具有只能让年龄上已经成熟的人担任最重要的职位的好处，这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保持改革的精神，而这种改革要取得全面的胜利，只有在人们克服了虚荣、狂妄和贪婪，以及公民的道德和风尚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在改革初期只能把职权委交给革命者

在这里，很自然地要重新提起我们在介绍参议院时所提出的想法。上了年纪的人，虽然有朝一日能够捍卫已经建立起来的平等制度，但是，就建立这种制度而言，他们是无能的和危险的。建

立真正的共和国只能由人类和祖国的大公无私的朋友来做，他们的理智与勇气超过了他们同时代的人。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能够塑造公民和公职人员的精神，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只有最明智和最热情的革新者才能够建立共和制度。

因此，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开始的时候完全由最优秀的革命者组成的社会机构，只能够通过彻底地实行宪法，根据社会复兴的进度来逐步地更换其成员。

我希望，任何人读到这里，都能够对我们的密谋家的政治原则以及他们试图把这些原则运用于法兰西共和国而采取的方法，有足够的了解。

逐步前进

我认为，没有人会想这样来嘲弄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幻想挥动一下魔杖，用一道仿佛能够创造奇迹的法令来实现这些政治原则。他们并不隐瞒自己有待克服的障碍，但是他们相信自己所策划的改革是建立有生命力的和巩固的共和国的唯一方法；他们从社会精神的发展、从革命分子的重新活跃、从民主人士的联合[①]、从人民的极端不满情绪以及忠诚的公民的英勇气概中看到，在发动并逐步地巩固他们所奠定的革命方面，具有足够的因素。

教育——实行改革和保持改革的手段

在人们为了反对虚荣和贪婪、为了培养新的风尚、为了充分发

① 阿贝尔派和罗伯斯比尔派在同一旗帜下联合起来。

扬人民所固有的好品质而设想出来的各种手段中，有一种手段虽然生效较慢，但只要负责改造国家的人们善于充分加以利用，却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手段就是教育。

掌握在改革者手中的教育，能够彻底改变民族的面貌，使热爱祖国和自由平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种伟大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进一步通过教育而臻于完善、巩固以至万古长存。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教育：首先把它看作共和国成立后所掌握的一种教育，然后把它看作是掌握在改革者手中的一种复兴手段。

在一定的年龄，我们的情感和理智会受我们所感到新奇的一切东西的影响而不断起变化。我们的教育所要发挥的作用也就在于此；教育会使我们成为好人或坏人，成为公民或强盗。

社会应当领导教育

由于社会的自由、幸福和繁荣只能取决于其成员的感情和力量，所以十分清楚，凡是一切可能对其成员的教育产生任何影响的东西，社会完全有权利直接进行监督。其所以应当这样做，是因为这将决定它未来的命运。

男 女 有 别

人的性别的自然区分，要求产生两个教育部门：一个是男孩子

的，另一个是女孩子的。社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大自然在两性之间所作的划分，提醒我们不能不加区别地对不同性别采取同样的教育办法，否则就要违反自然法则。此外，为了保持个人的精力，重要的是使爱情的发展能够减缓，而男女的混合则会加速这种发展。可见，最好是对不同的性别分别进行教育。

根据起义委员会的观点，教育应当是国家的、公共的和平等的①。

国家教育

国家教育，也就是在法律的指导下和公职人员监督下的教育。教育应当成为改革的辅助手段，应当起支持和巩固共和国的作用，而共和国则是它所必须灌输给青年的道德风尚和知识的唯一裁判者。另一方面，教育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把博爱的感情深深地铭刻在所有人的心里，这种感情是跟那种排他性的和利己主义的家庭制度格格不入的。

公共教育

公共教育，也就是同时让一切儿童在同样纪律的条件下生活。

① 米歇尔·勒佩尔蒂埃[97]其所以享有盛誉，不仅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鲜血来巩固新生的共和国，而且由于他是从革命时起就提出国家教育、公共教育和平等教育的计划的第一个人。这项计划不失为其制订人的道德的永恒标志，但是，它却不得不跟私有制这个真正的"潘朵拉的匣子"所大量出现的一切灾害实行调和。因此，它势必瞻前顾后，委屈求全，从而使它的优越性大受限制。勒佩尔蒂埃主张让儿童从5岁到12岁接受公共教育。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里。这使人不得不担心，在这样的年龄里所获得的尚且稚弱的印象，难道不会在错误的观点和不良事例的影响下而磨灭殆尽？它们是肯定会对青年人产生影响的，从而会把青年人推进恶习和偏见的漩涡。

重要的是让青年人从幼年起就懂得把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的同胞，懂得跟别人同甘共苦，并且仅仅以他人的幸福为幸福。公共教育机关应当是大国民公社的缩影，而一切善良公民，都应当跟大国民公社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平 等 教 育

教育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人人同样是祖国的亲爱的孩子，是因为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在不平等制度下势必受到破坏的幸福，是因为从教育的平等当中应当产生最广泛的政治上的平等。

教育应由高级机关来领导

为了对起义委员会在这方面的草案有所了解，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由担任过共和国要职的元老们组成的最高机关，这个机关通过其下属的公职人员来领导全部教育机构，通过从它本身当中选派出来的检察员来保证法律和它的指示的执行；而且，它还拥有培养师资的职业学校。

对儿童的关心

在委员会所设想的社会制度中，一个人从生下来起祖国就应当掌握他，而且永远也不抛弃他，直到他死亡为止。祖国从一个人生命的最初时刻起就照顾他，供给他牛奶，关心他的生活，排除一

切可能损害他的心身健康的东西，防止他受虚伪的温情的侵蚀，并且用慈母般的手把他领到国家的教育院去，使他在那里得到一个真正的公民所必需具备的美德和知识。

人们打算在每一个区建立两所教育院，一所是男孩的，另一所是女孩的。这些教育院最好是建立在空气新鲜的农村，远离城市和靠近河流的地方。

男女两性的天生差别

男子天性活跃好动，应当供养祖国和保卫祖国，女子则应当为祖国提供健壮的公民。女子在体力上较男子为弱，有怀孕的不适反应和分娩的痛苦，并且往往随着这些痛苦而来的还有种种疾病，同时由于妇女的天赋魅力对异性具有如此巨大的支配力量，从这些情况来看，女子适宜担任比较起来不那么繁重和不那么嘈杂的工作；女子似乎具有能够平息人们感情的冲动、减轻人们的痛苦和特别重视德行的天赋。由于这些不可消灭的差别，男女两性的教育是不能够完全一样的。现在我们先来谈谈男子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

根据起义委员会的观点，国家教育应当达到三个目的：

(1) 使身体有力而灵活；

(2) 使心灵慈善而坚毅；

(3) 使才智得到发展。

身　体

公民的健康和体力，是共和国的幸福和安全所主要依靠的条件。它们是通过器官的活动和消除动物官能失调的种种原因来取得和保持的。因此，劳动、锻炼、以及生活上的节制、简朴也就成为必要。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因此他们应当学会从事最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各种手艺，养成能够适应最艰苦的活动的习惯，以及能够过最朴素的生活。军事训练、跑步、骑马、摔跤、拳斗、舞蹈、打猎、游泳，这都是起义委员会为未来的一代所准备的娱乐和休息。它希望，国家教育院将消除怠惰和懒散的风气，而软弱无能和荒淫无耻将永远找不到通向法国青年的心灵的道路。

教育院的设施

人们所设想的教育院，其场地房舍的多寡，应以充分容纳各种不同年龄的学童为准：在一个地方设置公共食堂；在另一个地方设置各种工场，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工场里学习他所爱好的技能。一方面，有广大的农业场地，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青年人时而在从事农业劳动，时而象军队那样地宿营；另一方面，有供运动用的体育场，还有供学习用的梯形教室。

心　灵

我们的青年所从事的日新月异的活动，其结果应当是培养他

们的感情，使之符合于国家的原则。青年应当学会把他们所看到的美好的东西归功于主宰一切的祖国，把他们的健康、幸福和快乐归功于祖国的神圣法律的作用。由于一直共同生活在一起，青年人终于会把自己的幸福跟别人的幸福融合在一起，同时由于青年人不受私心和利欲的侵蚀，并且还通过耳濡目染和切身经验而深刻体会到祖国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就会把为祖国服务的愿望和博得祖国的嘉奖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动力。

要采取一切办法来防止青年人产生高人一等和养尊处优的想法。在这些风尚纯朴和安谧宁静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起对金钱和权势的贪欲。在这里，对平等和正义的热爱是年轻公民首先接受到的东西，教育机关不断地以可爱的祖国的名义向他们进行道德教育，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具有道德方面的修养。

工艺美术

一定的工艺是社会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的完善秩序，要求其成员具有各方面的知识。

能否让人的才智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幻想的天地中漫游？能否允许以美化和改进为借口而把无穷无尽的人为需求、不平等、纷争以及虚伪的幸福观引入社会？或者，对工业加以一定的限制，把一切不是共和国的福利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教育院中排除出去？

为了使自己的同胞们摆脱那种奢侈无度和令人萎靡不振的只不过是反映等级差别的享受的折磨，我们的委员会一致决定：教育院中的工艺美术劳动仅仅限于制造人人都能够很容易地得到的用

品。它希望在家具和衣著上的所谓讲究将为农村的简朴所取代。它认为，秩序和整洁实为人类心身所需。重要的是，居于一切之上的平等原则将会把奢侈浮华之风一扫而空，而正是这种风气助长了那些奴性十足的人们的可笑的虚荣心。

才智与科学

在思辨知识方面，起义委员会的成员们由于受古代先哲的启发和现代若干真正的哲学家的开导，并且深信，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卑微的事情莫过于炫耀和吹嘘自己；因此，他们希望：让伪科学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去拒绝履行社会义务，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助长狂妄自大的情绪，没有可能把纯洁的心灵引入歧途和用那种跟社会幸福迥然不同的个人幸福来满足人们的欲望。

他们认为，在废除私有财产的同时，必须废除那种卷帙浩繁的法学，因为这门学问使研究它的人和它自命维护其利益的人都感到失望；他们坚定不移地决定取缔任何神学探讨，并且意识到，废除工资会很快医治好我们的卖弄才智和滥出书籍的毛病。

他们说，公民的知识应当促使他们热爱平等、自由和祖国，应当使他们能够为祖国服务并保卫祖国。由此可见——他们接着说——，必须使每一个法国人都会讲、读、写本国的语言，因为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共和国里，文字是各地之间进行联系的唯一可能的工具，况且由此还可以获得其他的知识；必须使每个人都懂得数学，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被指定去保管和分配国民财富；必须使每个人学会正确地进行思考，学会简要而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必须

让所有的人都懂得历史和法律，其所以要懂得历史，是为了了解共和国所结束了的苦难和它所带来的幸福；而学习法律，就是为了使每个人了解自己的义务，并且有能力担任公职和在国家大事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地形测量、共和国的自然史和统计学，以便对于他们所赖以庇护的祖国实力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并且对于使一个庞大的机体的各部分协调一致地为每个人谋幸福的社会制度的好处有正确的了解。为了给节目增添光彩，所有的人都必须擅长舞蹈和音乐。

这就是起义委员会打算让法国青年受的教育的概况。它之所以重视这样一种教育，是因为它把这种教育看作是社会平等和共和制度的最巩固的基础。

由于通过这种方式使青年人习惯于劳动，使他们学会从事农业和必要的手工业，使他们获得有益的知识，青年人便不知不觉地成为全体公民的希望和慰藉，全体公民的劳动由于青年人而大为减轻；在公共节日里，青年人还会带来令人愉快和动人心弦的娱乐。

愈是注重家庭教育，父权也就愈强。然而，法律从父亲手里剥夺掉的那部分个人权力，将通过社会的共同力量成百倍地归还给他们。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参议院，必须在每一个地区对教育院实行监督。在他们的领导下，妇女们也要对女子教育实行监督；女孩子也由社会来共同培养，直到他们出嫁为止。

女子教育

为了使我们的全体公民都健壮而勤劳，必须保证那些天生要

给国家生育公民的人具备良好的体格。因此，必须让他们的身体受到劳动和体育的锻炼。密谋家们认为，运动和劳动是共和国教育的伟大手段；随着私有财产和等级差别的消失，这些手段将有助于减少卖弄风情的倾向，并抑制爱情的发展。

他们还认为，应当安排女孩子从事最轻微的农业劳动和工艺劳动，因为劳动是人人应尽的义务，此外，它还能够克制情欲，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需要和乐趣；女孩子应当是贞洁的，因为贞洁可以保持健康和增进爱情；他们要热爱祖国，因为他们应该用这种爱去感化男子；所以他们还要参加学习，因为学习能够使他们对祖国法律的明智赞美不已；他们应当学会唱民族歌曲，因为这种歌曲会使我们的节日增加光彩；最后，他们应当在大庭广众之下参加青年人的游戏，以便使这种初步的爱情活动充满天真和愉快的气氛，并且使这种气氛成为日后婚姻的先兆。

我不可能把这样一个新机构的所有细节都谈到，因为关于这个机构，连起义委员会也只不过有个粗略的计划；何况，了解这样一点也就够了，那就是普遍的、平等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的公民；这种公民由于具有把一切事情做好的习惯并把促进如此可爱的祖国的幸福当作一种乐趣，因而能够忘我地为共和国服务。

军 事 训 练

在委员会所设想的制度下，青年人从教育院出来后，就要转到建立在靠近边境的营地去。在那里，他们应当不断提高军事技术，随时准备击退外来的侵犯。在那里，他们生活在共同劳动和共同

享受的条件之下，他们可在劳动、操练和简朴的生活中培养起必要的品质，从而使他们返回家园后就能享受公民的权利。

根据密谋家们的意见，诸如此类的初步尝试的成功，也就决定他们的改革方案的成功。他们认为，仅此一点就足以巩固平等并完成革命，因为它将证明我们这代人所无法求全责备的共和主义道德和观点的存在。

教育会议

为了更好地维护新法令的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原则，应当举行教育会议。在这种会议上，允许每一个公民向公众阐述道德与政治的要义，并且跟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在这种会议场所附近，当局应建立印刷厂和图书馆。

出版自由

在这种制度下，印刷文字是最有效的交往手段，是防止人民主权被篡夺的最好的屏障。只要有印刷文字，分布在一个广袤国家里的公民便能够就所提出的法案深思熟虑地发表意见，就可以逐步地改善社会制度，就可以揭露野心家的阴谋诡计。

但是，一旦私有财产被废除和一切金钱利害关系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手段来从报刊上得到人们所能期待的种种帮助，而同时不至于重新看到平等的正义性和人民的权利又成为问题，共和国又被置于无休无止、弊害重重的讨论之下。

在出版自由方面，起义委员会探讨了以下各点：

1．任何人不得发表跟平等和人民享有最高权力的神圣原则直接抵触的观点；

2．任何就国家制度及其管理形式所发表的书面言论，应当在人民最高权力会议或一定数量的30岁以上的公民的要求下复印并分发给所有的图书馆；

3．禁止发表任何无中生有的攻讦性作品；

4．任何作品，只要民意维护者认为它的发表可能对共和国有好处，就可以复印并散发。

在谈到教育的问题时，我们已经看到，起义委员会有意反对对工艺的求精和对科学的研究，以免把柔弱的风尚、虚伪的幸福观、危险的榜样以及滋长骄傲和虚荣的动力引进共和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它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在委员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工艺和科学带来的好处

他们有时候说，工艺的进步可以减轻必要的工作，可以使水陆交通更加便利，并且给社会娱乐增添新的内容。

他们还说，工艺如果没有科学为其创立理论并指引其实践的话，会成为什么东西呢？在科学的帮助下，疾病时而得以治愈或是防止；科学教导人们认识自己；科学防止人们陷入宗教狂热，鼓舞人们起来反对专制制度，使人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多采，使人们具有高尚的情操。

从工艺和科学中产生的恶果

但是，从另一些方面进行考察便可以看到，工艺的精细会使人滋长奢侈，使人厌恶朴素的风尚，爱好娇生惯养和轻浮作风。值得担心的是，对于那些致力于科学的人来说，他们的真才实学或徒负虚名的学识，难道不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他们使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头和摆脱共同劳动的资格吗？而他们的显示自己学识渊博的见解，难道不会渗透着他们的虚荣心，从而使他们借助于花言巧语骗取那些学识较少的普通人的信任，以至终于干起侵害后者的权利的有害勾当吗？除了这些思想顾虑之外，还要加上让·雅·卢梭的一种见解，他说，道德和自由从来不跟艺术和科学的繁荣携手并进。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好几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归咎于工艺和科学的种种恶果，多半是由于想从中牟利的贪欲所促成的，因此，一旦公有制度建立起来，消灭了贫困，人的贪欲再也没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仿效者便会大为减少，这些恶果也就可能随之而消失。在讨论中人们曾提出以下几点，但并没有就此作出任何决定：

1．任何知识都不能给人以摆脱共同劳动的权利；

2．应当授权公职人员保护并扩展人类的知识宝库；

3．对于显示出巨大才能的青年，从教育院出来以后，要派送到上述公职人员那里，以便让他们继续受教育。

反对意见

起义委员会所努力追求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轮廓，便是如此。从反对委员会的意见来看，有的认为它的方案不正确，有的认为这些方案不可能实现。说它不正确，我们在这本书中有可能让我们的读者自己去判断；至于说它不可能实现，这是那些对于任何轻微的改革都加以反对的人的迂腐之见，那么我们只须提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凡是对共和国最初两年的法国的情况有正确了解的人都始终确信，当时法国人民对平等事业的忠诚和对自己的领导人的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至在法国没有一项民主措施不是被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所采纳的。诚然，人民这种难能可贵的情绪由于可怖的热月 9 日事件而有所消沉[①]，然而这种情绪在起义委员会活动期间以至很久以后仍然大有表露。此外，使人民这种内在的情绪受到压抑的因素一旦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会立即充分地迸发出来。对于一种激进的改革来说，障碍并不来自多数人；所有的障碍都源自于某些人的堕落，因为这些人找到了如何把自己应担负的那部分劳动转嫁给别人的窍门。你只要迫使这些人住嘴，所有其他的人都会赞成你和支持你。

可是我要再一次指出，委员会远远不是想在起义以后第二天就给我们带来事实上的平等；尽管它决心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加快平等制度的彻底建立，然而它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规定出建立平等

① 这个事件的后果极为恶劣，因为它使许多一度具有无比英勇气概的人们，对祖国和全人类的幸福失去信心。

制度的日期。它意识到必须根据社会舆论的进步和我们将要介绍的那些初步措施所产生的效果逐步前进。哪怕它只能够把教育制度巩固地树立起来，那么它也就为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①

① 共和四年的民主人士所没有能够在法国实现的事情，不久以前由一位慷慨的人士通过另一些办法在不列颠岛和美国试行。苏格兰人罗伯特·欧文，曾经自己出钱在本国建立起几个以平等分配物质财富和平等劳动为基础的公社，后来，又在美国建立各种类似的机构，在那里，好几千人在完全平等的甜蜜制度下和睦地生活着。

在这位人类之友的建议下，建立在伦敦的那个合作社，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传播公有制度原则并以实例说明这些原则的切实可行而工作。

巴贝夫曾试图把许多人联合在一个大公社内，而处于不同条件之下的欧文，则希望在国内大量建立小型公社，这些公社以后通过一条总的线索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巴贝夫希望他的朋友们掌握最高权力，他打算通过这种权力的影响来实现他们所策划的改革。欧文则希望通过宣传和示范来取得成就。但愿他向全世界表明：在没有权力机关的帮助下，明智能够带来多么大的幸福！而主要的是，但愿他不至于蒙受这样的痛苦：眼看着自己的崇高的努力遭到失败，他的不成功的试验为平等制度的敌人提供了一种论据，使他们可以以此来证明，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受到疯狂情绪的蛮横反对的社会秩序，从而使这种秩序的出现看来只能是文明国家中一场剧烈政治动荡的结果！

人们对于欧文的制度提出许多反对意见，这些意见也同样是反对巴贝夫的制度的。我们把这些意见列述如下，同时附以答辩，以说明它们是无足轻重的。

第一条反对意见。人与人之间的体力差别，不允许在分配劳动和消费品方面建立完全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却是公有制度所追求的目的。

答：在这里，平等应当以劳动者的能力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衡量，而不应当以劳动强度和消费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在体力上能够举起10磅重的东西的人，跟一个力气比他大5倍、也就是能够搬动50磅重的东西的人同样地劳动。一个极度口渴的人要喝一大瓶水才能解渴，但是他所感受的乐趣并不比一个不那么口渴而只要喝一小瓶水的人更大。我们所谈的公有制度的目的，是在享受物质财富和从事劳动方面实行平等，而绝不是在消费品的数量和劳动者的任务方面实行平等。

第二条反对意见。同一类产品——例如水果、青菜、乳制品、肉类、饮料等等，由于其质量不同，就会在分配方面带来实际的不平等，从而产生妒忌和争吵，使社会变为充满纷争和敌意的场所。

答：人们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想法，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用我们自己这样的被不良制度弄得爱好虚荣、多疑善妒和互相敌视的人，来推想在充满友爱的制度下培养起来的人。认为人们天性就爱互相妒忌、互相敌视、并且尽管在拥有大量的水果和鲜花的情况下还会为果子的美味和花儿的芳香而争吵不休，这种设想是对自然的创造者的侮

九

起义以后所采取的初步措施

起义者在胜利以后首先关心的事情，是取得人民的好评，在全国各地把权力交给忠于新的革命原则的人，不让平等制度的公敌有时间策划他们势必要进行的阴谋活动。

辱。只要剥夺掉人们的私有财产，那就会制服他们的最有害的情欲，就会把他们之间互相危害的手段几乎完全消灭掉。何况，在这里所谈到的那些小小的不平等，难道不可以采取抽签或轮流分配的办法来使它们显得更难以觉察吗？在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平等不是数学的恒等式；平等不会由于小小的差别而受到破坏。在斯巴达，健全的思想和平等、协调的精神克服了一切微小的困难，即使在今天，在人口多的家庭、寄宿学校和军营内，也没有被这些困难弄得惶惶不安。

第三条反对意见。由于社会负责供给每个人的需求，没有任何人感到需要为了自己生存而从事劳动，而人的天性是好逸恶劳的，于是人人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从而使任何劳动都不可能进行。

答：凡是体格好的人都需要活动，为了消除寂寞，他们要找工作做。人之所以厌烦工作，是由于工作过多或是由于工作只使他们感到沉重。而在公有制度下，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在那里，人人都从事工作，从而使每个人的劳动都尽可能地减轻。

除了上述的积极性原因外还必须补充：人人都必须从事劳动这种信念已经确立，社会舆论把懒汉引以为耻，以及严厉的法律将如同今天惩罚强盗那样地惩罚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第四条反对意见。基于同上原因，再也不会有任何精神的和工业的进步。

答：人们为了追求微薄的工资而不得不生产的那种毫无价值的产品，只有那些爱好虚荣、游手好闲的人看来才有价值，这种产品将永远消失。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毫无疑问，对于那种旨在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和改善一切人的命运的学习和研究，将是另一种情况。人们将会以更大的热情从事这种研究，这是由于人们在这方面一般都有空闲的时间，社会的推崇鼓励人们去做，理智所赋予的荣誉感也吸引人们去做，而这种荣誉感在任何时候都是伟大的事业和真正有用的发明的动力。

第五条反对意见。这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公有制度，会把公民社会变成一座修道院，从而给自由带来危害。

答：僧侣无论是拥有地产或是一贫如洗，都不从事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而在巴贝夫和欧文的公有制度下，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服务。僧侣是不结婚的，而在公有制度下，人们并不排斥婚姻。僧侣盲目地服从其长老，而在公有制度下，人们

告法国人民书

为此目的，委员会批准了拟定一份告法国人民书的计划，该文件由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执笔，当他刚写出头几行的时候，就被专制制度的帮凶逮捕了①。在这份文告里，要向人民列举许许多多无耻地侵犯平等和公民权利的罪行；在这份文告里应当指出，那些引

只服从大家制定的、而且只有大家才能够修改和废除的法律。游手好闲的僧侣凭空念诵毫无用处的祷文，而在平等制度下，人们通过真正的行善来举行唯一的无愧于神明的祭仪。最后，僧侣被迫把自己的一切行动纳入一种清规戒律，而生活在公有制度下面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从事短时间的劳动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愿望来支配自己的时间。

在公有制度下是否比在私有制度下更加尊重人们的行动自由呢？为了断定这个问题，只要考虑这样一点就够了：在私有制度下，大多数居民必须从事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他们经常在不同程度上被剥夺掉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可能，甚至在法律仿佛保障他们享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而在一个全体人民每天只劳动3—4个小时的国家里，人们所享受的自由，当然要比在一个为了让五分之一的人穷奢极欲地生活而使五分之四的人不得不从事10—12个小时的劳动的国家里更多。

第六条反对意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生活，会把社会引导到野蛮状态中去。

答：人们通常所说的野蛮状态，是由于没有科学艺术、加上举止粗野和性格粗暴而构成的。但是，这一切绝不是巴贝夫和欧文所设想的那种公有制度的必然后果。在公有制度下，真正能够促进社会的幸福与巩固的那些科学研究和工艺，不但不会受到排斥，反而会在人们的共同关心之下，在社会舆论的赞扬以及人们有空闲时间来从事这些工作的情况下受到鼓励。由于科学和工艺不再为贪婪和虚荣服务，它们将会抛弃一切不真实的和对大家没有好处的东西。另一方面，公共教育和经常进行互济互助会产生友爱的感情，这种感情能够使人们举止温良并有助于克制暴燥的性格。随着私有制的必然恶果——贫穷和堕落的消灭，社会上将不复存在那种使社会变成一个战场，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狱的阴险和虚伪的行径。人们将会变得慈善而不矫揉造作，自豪而不粗暴无礼。随着公有制度的建立，我们必将寻找到永久的幸福，实现真正的和完美的文明，而绝不会重新堕入野蛮的境地。

① 这几行的内容是："救国起义委员会公告。人民已经取得胜利。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你们自由了……"执笔人刚写到这里就被打断并遭逮捕。

起了革命但还没有被革命所根除的社会灾难，其根源完全在于不平等和由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罪恶；这份文告应当向全国人民指出巴黎人民的义举是他们所应当仿效的榜样，文告应当响亮地号召法国人民去实现平等，并且庄严地担保他们享受平等，而这需要几个月时间的沉着、英勇、忍耐和服从。

在这份文告里还应当把起义的巴黎人民的法令①宣布为立法的原则，同时要确认 1793 年宪法是新的政治制度的最近成果。对于这个宪法，只需要作若干补充并事先建立起一些机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连最民主的宪法也往往会变成没有灵魂的躯壳，成为各个政派的众矢之的。

下面是这份文告所要包括的若干条文：

立即解除一切民事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宣布如任何人胆敢行使这些机关的职权，将不受法律保护；

立即恢复各省、区行政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以及市政府、革命委员会、和平法庭和刑事法庭，应当使这些机构完全恢复到共和二年热月 9 日以前的样子；

指示该时期在上述机关中供职的全体公民，除受法律限制者外，立即重新担任原职；

凡在担任某种公职时中饱私囊者，一经查获，当即褫夺一切公职，处以极刑；

在全共和国范围内颁布起义法令；

将该法令中第一、二、十八、十九各条在全共和国范围内付诸实施；

① 见本书第 124—125 页。

封存所有国家金库；

对于从事农业劳动和生活必需的手工业劳动的公民，只要他们所占有的东西仅仅供本人和其家庭需要，应从共和四年风月1日起豁免其一切直接税和工商业税。

先前所规定的直接税总额，应采取累进办法在有钱人之间实行摊派；

这种直接税应征收实物；

国家财产的租金应以实物支付；

在每个公社建立公共仓库，并在离开边界驻军20里约① 的地方，建立起大型军火库；

号召全体公民捐献衣服给祖国的保卫者；

指示各市政府注意不让任何一块地方荒芜；

为了人民的利益，对于土地占有者不按国家规定进行耕耘的土地，应予没收；

禁止出售国家财产；

立即在全共和国范围内取消用货币来支付任何薪俸；

供应给公职人员以生活必需品，但必须证实他们对这些物品的需要；

对于祖国保卫者的贫苦家属、以及一切老年人和没有生活能力的穷人，也同样地供给生活必需品；

劝说有钱人自动地向不可违抗的正义要求让步，为了使祖国避免内讧和使自己免除一系列的灾难，他们应当仅限于享有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慷慨地把自己的多余东西捐献给人民；

① 里约(Lieu)，法国古里，约合4公里——译者。

对于那些在一定期限内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已经转向真理和祖国的人，应不追究其以往反对平等的一切言行；

凡截至共和二年热月 8 日被关在监狱的人，如果不听从劝说——即不愿意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仅仅享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话，应当重新关进监狱，否则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

凡在热月 9 日以后颁布的有利于叛逃者或被指为叛逃者的法令，以及有利于阴谋及其继承人的法令，一律作废；

逮捕一切在热月 9 日以后杀害或嗾使杀害共和国人士的人。

以上只不过是起义委员会所设想的伟大的改革的开端；这也就是通过强制的途径使社会的权力转到人民手中。

为了在起义以后能够继续对所形成的决议保持有利的影响，起义委员会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实现它想要建立的最终立法制度提出了极待实行的准备措施。我将要粗略地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若干内容。

总 特 派 员

应当刻不容缓地向各省和军队派遣总特派员，这些特派员不是从新的国民公会代表中产生，他们拥有广泛的权力，负责调动共和派的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并视情况的需要采取严厉或宽大措施；他们有撤销职务、解送法院以及奖励犒赏的权力；他们在就职之前应当宣布自己的财产状况，他们的行为应当向一个专门的法庭负责，这个法庭是为了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和惩治他们当中的渎职人员而特地设立的。

模范学习班

人们认为在起义政权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开办一个模范学习班，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各省按照一定的手续选派公民前来学习新的革命的原则，接受改革家的思想的熏陶，并且学会通过感化群众的办法来贯彻那些有助于改变国家面貌的法令。

社会精神与人民协会

总特派员负有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启发和联合共和主义者，特别是促使他们支持起义领导人的观点和思想；总特派员应当通过自己的明智的措施、满腔的热情、毫不利己的品德，以及无可非议的生活方式来吸引共和主义者。作为真正的使徒，他们应当把平等的火炬送到所有的公社去，特别是送到他们应当开辟的人民协会中去，以便使他们的观点能够为立法者的改革措施开辟道路。

革命法令

在起义委员会行将被取缔的时候，有5个革命法令草案提交它讨论，这些草案是：

管理法令草案；

军事法令草案；

教育法令草案；

经济法令草案;

民族节日法令草案。

管理法令

实施管理法令，是为了慑服那些企图重演1793年5月31日以后使共和国沾满鲜血的事件的人。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在国内建立兵营、实行全民武装和重建国民自卫军。凡是对改革的彻底成功不感兴趣的人，应当剥夺掉他们的一切权力。同样地，任何人如果不通过有用的劳动来为社会服务的话，就应当把他从这个社会清除出去。最后，为了利于总的计划的完成，还打算利用那些不满分子的力量，这些不满分子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从这个计划中寻找唯一的生路。①

军事法令

军事法令实施的结果，应当使不能够继续在教育院中受共和主义教育的青年受到一种共和主义教育。这个法令的条款很多，其中有:

每一个法国人，从20至25岁这段期间，应当在军队中服役;

任何人如果当一名普通士兵不满……年，便不能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

在每一个部队里，长官是可以定期撤换的，下级人员要参加对

① 见第二十八号文件。

他们的长官的任命;

军饷不再用货币支付;

共和国应当每日都把军粮分配给军队中每一个成员;

共和国应当给全体祖国保卫者平等地提供住处、衣着、照明、取暖、洗衣以及其他给养;

军事人员的口粮供应办法与公职人员相同;

祖国保卫者在其长官的领导下，按照规定的条例，共同地生活;

禁止抢掠行为;每一个祖国保卫者在行军之前,应当把他通过正当方式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切东西,都交给部队主管人员;

军事人员在完成极端繁重的任务后,应当得到较优厚的给养;

违抗命令者判处死刑;

将军和军官,如有盗窃、酗酒、强奸、赌博、蔑视法律和虐待下属等违法行为,也处以死刑;

在军队中安排劳动、学习和庆祝节日;

共和国应对卓越的行为实行褒奖;

每一个公民都要参加武器的使用和队列变化的训练。

教育法令

教育法令是为了立即执行我们已经讲过的那个计划。实际上,对于还没有养成固定的习惯、可以接受人们所希望给予的一切教育的孩子们,是没有必要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

在这方面,全部困难在于说服某些持反对意见的家庭,以及物

色足够数量的、能够以改革精神来领导教育院的人材。

对于克服前一种障碍，人们寄希望于：共和主义者的影响、人们为传播平等原则所表现的热情、平等原则的传播所必然给贫苦阶级带来的立即改善生活的措施，以及这种措施保证给孩子们带来明显的好处。

至于教育院的领导人应具备的才智和品德，人们打算借助于模范学习班来加以保障。在这些学习班里，要花足够的时间来培养出能够使人民接受新制度并有能力主管青年人的培训场所的人材。

起义委员会认为，使青年人和士兵热爱平等的风尚，那就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经过若干年以后，几乎全体国民都由这些年轻人和士兵组成了。然而，为了使他们从国民教育中所获得的良好倾向不至化为乌有，为了使他们进入社会后不致于遇到跟这种教育的效果格格不入的制度，最好是同时开始消灭私有制的观念，使这种观念的消灭跟年轻人和军人在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进行。这就是委员会的经济法令所要达到的目的。

经 济 法 令

这个法令包括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它将使它所涉及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财政以及公共工程获得新生。

如所周知，委员会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伟大而完善的公有制度。但是，委员会将避免在它取得胜利后第二天就通过

颁布一道法令来建立这种制度，并强迫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来参加这种制度的建立。任何个人暴力，任何变革，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都应加以禁止并受到惩治。委员会认为，立法者应当采取身教的办法，使全体人民出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去废除私有制。

然而，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够使那么些由于好逸恶劳、追求享受、爱慕虚荣而堕落的人，去接受那种曾经遭到他们如此强烈反对的简朴生活呢？委员会回答说：通过法律来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钱人如果抱着自己的财产不放，那么他们的生活既不会富足，也没有乐趣，而且得不到任何的尊重。它接着说：我们要做到使劳动者在从事最适量的劳动的情况下，不领取工资，而能够享受一种光荣的、稳定的富裕生活。这样，受偏见和陈规束缚的公民，其眼界就会豁然扩大。到那时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由于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来获得共和国所便宜地、免费地供应的生活必需品，由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花费在备耕、种植以及捐税上，他们再也没有可能过那种吃喝玩乐、呼奴斥婢的生活。这些人必须担负繁重的累进税，无职无权，没有任何威望，受人歧视，在国内只不过是一个受嫌疑的外国人阶级，他们要么就抛弃自己的财产流亡国外，要么就赶快亲身参加和平的、普遍的公有制度的建立①。

起义委员会接着指出，要号召那些小业主、小本商人、短工、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一切由于我们制度的罪恶而不得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穷人跟我们走。但愿他们为人类而新生；但愿祖国立即

① 为了正确了解这一切，必须立即读一读经济法令（见本书所附第二十九号文件）的有关片断。

保证一切诚心诚意为它贡献自己的才能和劳动的人过上舒适稳定的生活，使他们摆脱贫困和私有制所引起的种种担心和忧虑；我们今后要建立一个大国民公社，划给它广袤的土地，把全部不动产都归并给它，其使用权属于国家或公社；凡是对国家忠心耿耿并愿意贡献出自己全部财产的人，应当有绝对的权利享受人人所享受的幸福；我们要注意使这种幸福真正地和迅速地得到实现；要防止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用诡辩和夸大之词来干扰这种幸福；迫使一切权力机关按照平等的精神来行事；接受所有真正向往平等的人投入祖国的怀抱；根除骄傲自大还可能在人民面前显示其虚荣的一切根源；使黄金变得比粪土更不如；我们要勇敢地打响第一枪，让追求幸福的天生愿望和得到公众热情支持的理智不断地完成这一如此崇高的事业吧！

这种准备工作一旦完成，那么只有公有制度的参加者才能体现国家的利益。然而，一切都促使起义委员会倾向于这样一种想法，即通过不断地吸收祖国的保卫者参加这种制度；把不参加这种制度的人死后的财产归公；以及实行这种改革以后所必然引起的社会舆论的可喜转变来迅速地使公有制度遍及全国。义务与强制将毫无险阻地被鼓励、示范以及为必然的力量所取代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候，有产者这个字眼对于法国人来说，将变得粗鄙而不堪入目。

民族节日法令

在谈到人民会议时，我们曾经提到民族节日和委员会打算确

立这些节日的原则。委员会的这种思想，也贯穿在它被强行取缔的不久之前所讨论的一个革命草案中。

这种节日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休息日都应当是一个节日。委员会认为，不断地使公民保持高涨的情绪，通过让他们热爱自己节日的庆祝仪式、游戏和娱乐来培养他们对祖国的感情，消除在任何闲暇之时的寂寞，以及通过经常联系来使共和国各部分之间保持友爱的感情，这一切对于平等的事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据委员会看来，这些制度——首先是经济法令所要创立的制度——的巩固，关系到革命能否完成和人民能否充分行使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人民能够安安稳稳地享受平等的一天，也就是他们能够充分地行使 1793 年宪法所规定的审议法律的权利的一天。

循序渐进地实施宪法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只能按照道德风尚提高的程度来把最高权力逐步地移交给人民。在实行改革期间，参议员应当利用自己的职权，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调节大多数人的影响作用，以防止人民遭受旧习惯势力和坏人的阴谋诡计势必给他们制造的种种动乱和危险。

许多细节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所能记忆的只是一些最突出的线条，以及有关宪法与相应的制度如何同时地、逐步地向前发展的明确的概念。大家不难觉察，起义委员会本身既不能预见客观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又无法事先规定出改革者为完成其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谁能够估计那种恐怖的情绪所发泄出来的全部反抗力量有多大呢？谁能够预见共和国的外部敌人会把他们用来反对这种新的改革的力量增加到什么程度呢？毫无疑问，这种改革要比以往任何改革更引起他们的痛恨。要作出这样的估计和预见，取决于民主的社会舆论能够多么快地重新获得其往日的影响。

只有这样一点可以肯定：从密谋家的众所周知的思想方法来判断，对外的军事行动，如果出于征服和统治的野心，或者出于商业的妒忌心，那就连一天也延续不了。

密谋家们的被捕

所有这些不无某种英勇气概的努力，都由于格里泽尔的叛变而付诸东流。法国的压迫者，借助于这个叛徒的阴谋诡计，于共和四年花月 21 日早晨逮捕了这次密谋的大部分领导者①。

巴贝夫和邦纳罗蒂在一个房间里彻夜不眠地策划起义和改革事宜，他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被捕，一些文件也同时被抄走。同时，达尔蒂、热尔明、艾利迪（迪第埃）、德鲁埃等人在杜福尔家中被

① 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辉煌的意大利战役，这个战役为一个胆大妄为军人铺平了取得最高权力的道路。从那时候起，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对自由的热爱开始让位于对战功和征服的热爱，这就是后来使他们备尝辛酸痛苦和全面遭受奴役的最直接的原因。从一切现象来看，我们所叙述的这次密谋假如获得成功，那就会把政权从那些在热月 9 日上台的软弱、腐败的人们手里夺回来，从而使共和国恢复其早年的活力。可以设想，这样一来，法国人民就会摆脱使他们受害非浅的专制制度的阴谋，就可以遏制拿破仑的野心和避免远征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结成联盟的各国国王，从那几次远征的恶果中得到偌大的好处，他们假惺惺地应许给予人民以自由，嗾使许多国家的人民——这些人民曾被革命的雷鸣声所唤醒但却由于遭受掠夺战争的苦难而变得凶恨——起来反对法国人民，从而使法国人民重新受他们的旧主子的奴役。

捕，他们在那里集会商定举行人民起义的日期。内地军手持武器来协助这次对民主制度的声讨，至于巴黎人民，人们使他们相信这只是在逮捕强盗而已，他们无动于衷地看着密谋家们被投入监狱。不久以后，他们试图打碎后者的镣铐，但没有成功。

注　释

〔1〕 巴贝夫案件有65个人受审，其中18个人是缺席审判。旺多姆审讯从1797年2月20日(共和五年风月2日)开始，同年5月26日(牧月7日)作出判决。这些人被指控为图谋恢复1793年宪法，根据共和四年芽月27日法令规定，犯这种罪的要判处死刑。巴贝夫和达尔蒂被判处死刑；邦纳罗蒂、热尔明、卡森、勃朗多、布恩、莫鲁阿、曼涅斯埃等7人，由于情节较轻，没有判处极刑，而被判处流放；其余55人，其中包括德鲁埃(此人在审判之前潜逃)、瓦迪埃、阿马尔、菲利克斯·勒佩尔蒂埃、安东尼尔、罗贝尔、兰代、罗西诺尔、菲昂、里科尔、兰涅罗、杜布雷依父子以及其他人等，都被宣判无罪。

〔2〕 热尔明，沙尔——骠骑兵上尉，在热月反革命政变时被捕；1895年，跟巴贝夫在阿拉斯监狱中结识，后来成为巴贝夫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热尔明被流放后，于1804年回国，以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莫鲁阿——工人，巴黎第十二区(圣马赛郊区)巴贝夫主义者代表。卡森—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担任兵工厂的检察员，第八区代表。克罗德·曼涅斯埃——革命前是一名园丁，1792年8月10日后是巴黎公社委员会委员；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是巴黎警察局领导人之一；他是第二区巴贝夫主义者的代表，在搜捕时侥幸脱逃，旺多姆审讯时受到缺席审判，后来被塞纳省法庭宣判无罪。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根据雪月9日颁布的政治犯名单，要把他流放，可是他又一次逃避了这种迫害。勃朗多虽然受到审判，但是这个人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格里泽尔其所以诬告他，为的是想败坏巴拉斯的名誉，因为勃朗多与巴拉斯过从甚密。

〔3〕 这次审讯有速记记录并已出版，即《最高法庭对德鲁埃、巴贝夫等人的审判的法庭辩论材料》，根据巴黎速记记录稿整理，国家印刷所印刷发行。邦纳罗蒂死后，他的档案材料由他的朋友波德曼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位共和民主党人——泰斯特和瓦埃·达让松收藏。波德曼是帝国时期秘密社团的成员，他曾打算为邦纳罗蒂撰写传记。这些档案材料在1910年藏入巴黎国立图书馆。

〔4〕 在原稿中，邦纳罗蒂用了“教派”这个词，但他指的是政治集团。

〔5〕 1792年12月—1793年1月，国民公会审判了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表决中，366名代表主张把他处死，319名代表则主张把他监禁并放逐。吉伦特党人关于延期执行判决的提案，被大多数代表否决(380票对310票)。判决于1793年1月21日执行。

〔6〕 邦纳罗蒂在这里所指的是米拉波伯爵、拉法叶特侯爵、拉美特兄弟以及其他一些贵族代表人物，这些人在革命初期曾在制宪议会中起领导作用，但是不久以后就暗地或是公开地投入敌人的阵营。

〔7〕 关于卢梭的思想对巴贝夫的影响，这甚至可以从革命前夕巴贝夫跟杜布瓦·德·福舍(1785—1788年任阿拉斯学院的秘书)的通信中看出。巴贝夫在书信中谈到自己对“让·雅克的无限的信仰”。对巴贝夫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忏悔录》这两部著作。巴贝夫对《社会契约论》有较多的批判，尽管他对于这部

著作中的某些思想评价很高，特别是关于英国议会制的思想。巴贝夫还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马布利的东西。他在1791年秋写给库柏(立法议会委员)的信中，曾经追忆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阅读马布利的著作的情况。1794年，当巴贝夫把他的报纸改名为《人民护民官报》的时候，他指出他的护民官制度跟罗马的护民官制度"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他跟马布利一样，把罗马的护民官制度誉为"曾经多次拯救罗马自由的最好的机构之一"。

〔8〕 在邦纳罗蒂的档案中，保存有他所编的古代和当代"伟人"名单。这份名单有下列人物的姓名：米诺斯、摩西、毕达哥拉斯、莱喀古士、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吉斯、提庇留、盖·格拉古、耶稣(被誉为"人民与平等之友，财富、专制与迷信之敌")、托·莫尔、莱顿城约翰("在蒙斯特建立了财产共有制")、卢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所蒙受的种种不幸，大多源自于私有财产")、马布利、罗伯斯比尔("他想限制财产权，……法国革命跟他同归于尽")、圣茹斯特、库东、巴贝夫("平等制度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达尔蒂、乌选("费拉德尔弗社的创始人")、马勒("虽身陷囹圄仍挺身起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米歇尔·勒佩尔蒂埃。

〔9〕 加·邦·马布利著《论立法或法律原则》，1776年阿姆斯特丹版。看来，巴贝夫在革命之前就读过这本书并从中受到巨大影响。他在旺多姆审判时所发表的辩护词中，曾经引用了这本书。

〔10〕 把公民划分为能动公民和被动公民这种思想，首先是西哀斯在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的两个星期以后)在立宪会议中提出的。同年8月31日，莫尼埃在报告中提出了财产资格的草案，这个草案剥夺掉很大一部分公民的权利。立宪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虽然由衷地赞同上述提案，但是也还没有下定决心投票赞成那些跟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直接抵触的条款，因为那个宣言只不过在5天之前刚刚通过。10月5—6日的民众行动，使他们下了决心，立宪议会在1789年10—12月间公布的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财产资格，并把公民划分为能动和被动两种。凡年满25岁的男子，在当地(县城)至少居住一年，所缴纳的税额等于当地3日工值者，才算是能动公民。要当选为"选举人"，所纳税额应相当于当地10日工值。要当选议员，所缴纳的直接税至少须等于一"银马克"(约54利弗尔)并拥有若干地产。在当时2,600万法国人中，能动公民只有4,298,360人。在立宪议会中，反对财产资格的只有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几个代表。在立宪议会之外，在巴黎和全国各地，财产资格的实施，引起了民主革命派特别是马拉的强烈的抗议。《人民之友》抨击实行财产资格限制的立法，指出它是旨在扶植新的贵族阶层——富人贵族。早在1789年11月的《伦敦通讯》和1790年《毕卡迪通讯》中，巴贝夫就激烈地反对实行财产资格限制。

〔11〕 1791年6月20日夜至21日，路易十六携眷逃出巴黎，但是过了一昼夜便在靠近国境线的一个小地方(瓦伦)被邮政局长德鲁埃(后来同巴贝夫案件有牵连)所扣押。这位被囚禁的国王的逃跑和押回，在首都和全国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对王朝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哥德利埃俱乐部领导的。7月15日，制宪议会中的右翼多数派，不顾罗伯斯比尔以及其他代表的反对，通过一个决议，极力替路易十六开脱，把这个国王的逃跑说成是有人企图"绑架"国王。

〔12〕“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指1791年7月17日镇压哥德利埃俱乐部所领导的民众示威，当时群众正集合在一起签署一份要求剥夺国王的权力和召开新的制宪议会的请愿书。通过7月17日事件，大资产阶级终于成为反革命力量，它走上了用武力镇压人民的道路。7月17日事件后，马拉、罗伯斯比尔、丹东以及其他民主人士都不得不隐藏起来，他们号召人民继续进行斗争。马拉在《人民之友》上直接了当地提出，只有举行“全民族暴动”才能得救。

〔13〕雅各宾俱乐部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最左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都认为在瓦伦危机时期提出成立共和国的要求，未免为时过早。但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这项要求竟然由一些比较温和的人士提出来，这些人当中有孔多塞、布里索、邦维尔、杜沙特勒侯爵等人，看来，他们的幕后人是拉法叶特。这个“贵族集团”(用邦纳罗蒂的话来说)的这种表现，深为最进步的民主人士所怀疑。巴贝夫当时在索姆省，不了解巴黎内部所存在的分歧，他是以一个坚定的共和派的姿态出现的。

〔14〕1791年冬至1792年春，吉伦特党人加紧鼓吹对奥地利作战，当时王室党羽也力图通过对奥战争来实现其反革命计划，这时候，罗伯斯比尔及其志同道合的人士，起来揭露了战争鼓吹者所追求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罗伯斯比尔警告说：这些人“想挑起一场装模作样的战争”，以便通过这场战争来扼杀革命。他不断识破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及其狐朋狗党试图利用战争来实现其反革命计划的阴谋。事实上，在法国向奥地利宣战以后(1792年4月20日)，法国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指挥官和许多贵族军官故意在军事行动上给敌人以种种可乘之机。这正如罗伯斯比尔所预见的那样，国内反革命帮助了国外反革命。

〔15〕1790年8月，驻扎在南锡的夏托维尔瑞典兵团发生哗变。当时统帅麦茨部队的布依叶将军攻克南锡，对士兵实行残酷镇压。有20人被绞死，41人被流放服苦役。1792年，这41个人被释放，在他们回来那一天——4月15日，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16〕纳尔榜，路易(1755—1813)，伯爵，在吉伦特派的支持下，1791年12月任军事部长。纳尔榜曾派遣跟吉伦特派有密切联系的屈斯丁将军的儿子，带着秘密使命去谒见布劳施威格公爵。纳尔榜建议公爵来统率法国军队，打算随后利用军队来驱散议会并巩固王权。8月10日事件以后，纳尔榜侨居英国，后来在拿破仑手下任职，深为拿破仑所赏识。

〔17〕维尼奥(1753—1793)、加代(1755—1794)、拉波·德·圣太田(1743—1793)、布里索(1754—1793)、哥尔萨(1752—1793)、孔多塞(1743—1793)、朗热内(1755—1827)、卢韦(1760—1797)、巴巴鲁(1763—1793)——这些人都是吉伦特派的领导者，他们在王朝被推翻以后，便反对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后来成为公开的反革命。1793年6月2日，由于人民起义的胜利，国民公会下令逮捕29名吉伦特党人代表，其中包括上述这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逮捕时潜逃，并试图在外省举行反对雅各宾党派政权的叛乱。邦纳罗蒂在这里所列举的吉伦特党派的领袖，除了朗热内和卢韦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隐藏起来并在热月反革命时期又回到国民公会，以及孔多塞在狱中自杀以外，其余的人都先后根据革命法庭的决定被处决。

〔18〕 迪穆里埃,沙尔—弗兰斯瓦(1739—1823),将军,革命前替路易十六在国外担任密使,参加革命后仍然跟宫廷暗中勾结,先是跟米拉波接近,后来又跟吉伦特党人接近。1792年3月,迪穆里埃参加吉伦特党人的政府,起先当外交部长,后来成为北方军队指挥官。1793年3月,迪穆里埃跟科堡公爵进行谈判,他把自己要解散国民公会和恢复帝制的计划告诉后者,并且答应把比利时让给敌人。他企图向巴黎进军,但遭到挫折,便投靠奥地利人去了。

〔19〕 屈斯丁,德·亚当—菲力普(1740—1793),伯爵,将军,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从1792年起,曾先后统率过孚日和莱茵地区的部队;开头打了几场胜仗,1793年吃了败仗。他跟吉伦特党人接近。由于被指控有叛国罪而被处死。

〔20〕 拉美特,德·亚历山大(1760—1829)、沙尔(1757—1832)、提奥多尔(1756—1854)、奥古斯丹(这个人在政治上没有起作用)——他们都是兄弟,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亚历山大和沙尔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制宪议会的成员,裴扬俱乐部的领导人。提奥多尔是立法议会的成员。亚历山大和沙尔的政治影响最大,他们在1791—1792年间跟巴纳夫和杜波尔并列为当时就已经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在王朝被推翻以后,他们都侨居国外。

〔21〕 拉法叶特,玛丽—约瑟夫(1757—1834),侯爵,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制宪议会的成员,国民自卫军的统帅,他在革命初期威望很高,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化,越来越向右转,后来干脆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1792年8月10日事件后,他企图向巴黎进军,但遭到失败。在波旁王朝复辟和1830年七月革命时期,他又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22〕 米拉波远在1790年1月就为宫廷效劳。保存在路易十六的"铁柜"里的文件和后来发表的跟德·拉·马克伯爵的通信,都充分说明他的叛卖行径。第一个起来揭露米拉波的是马拉,尽管当时米拉波的声誉还很高。

〔23〕 为了挽救王朝的覆灭,吉伦特派的领袖维尼奥、让松内、加代等人在1792年7月跟路易十六进行谈判(通过路易十六的侍从蒂耶里和宫廷画师波扎)。加代还跟国王和王后秘密会见过。在审判国王时期,吉伦特党人尽一切力量去挽救国王的生命,特别是他们打算把国王送往美国。

〔24〕 在立法议会中占优势的吉伦特派,千方百计地想解散巴黎公社这个革命的市政府。巴黎公社是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前夕由各区代表组成的,它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王朝。8月30日,立法议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解散巴黎公社和重新进行选举的决定,公社不服从这个决定。立法议会在它本身解散之前,一直在反对巴黎公社。

〔25〕 1792年9月2—3日是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日子,当时普鲁士人在攻陷伦威和包围凡尔登后,向巴黎推进。首都的人民群众,担心会在巴黎出现反革命叛乱,便处决了一部分关在监狱中的反革命分子。巴黎公社监察委员会在告法国人民书中宣称:"一部分关在监狱中的嗜血成性的阴谋分子,已被人民消灭。采取这一正义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在人民出去迎击敌人的时刻,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来钳制潜伏在巴黎城内的卖国贼集团"。

〔26〕 由于在巴黎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吉伦特党人力图利用外省来跟首都对

抗，因为他们在外省受到在财产资格选举法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资产阶级行政机构的支持。许多吉伦特党人主张把法国变成象美国那样的联邦，主张建立“南方共和国”，并且把首都从巴黎迁出去，等等。“联邦分子”这个绰号便由此而来，这个绰号是雅各宾派给吉伦特派起的。吉伦特派在 1793 年 5 月 31 日—6 月 2 日事件之后，在各省发动了反革命暴动。

〔27〕 里昂暴动开始于 1793 年 5 月 29 日，是由吉伦特党人组织的。这次暴动的领导权后来落到保王分子德·普雷西伯爵手里。吉伦特党人在土伦的暴动始于 7 月 12 日。8 月间，该市落在英国人手里，路易十七开始称帝。

〔28〕 1795 年 8 月 22 日由热月政变分子把持的国民公会所通过的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财产资格选举制，并且采用了当时制宪议会已经放弃的两院制。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五百人院和元老院。后者没有立法创制权，但是五百人院所通过的法律应由它批准。执政权交给由 5 个人组成的督政府，这 5 个人是由元老院按照五百人院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拔出来的。

〔29〕 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他的宣言草案以后，巴贝夫立即给予该草案很高的评价（见巴贝夫在 1793 年 5 月 7 日给肖美特的信及其未完稿《无套裤汉的立法》）。后来，在 1796 年 2 月，巴贝夫在最后几期《人民护民官报》中的一期上写道："1793 年 4 月 21 日罗伯斯比尔博得人民的掌声并使人民欣喜若狂，因为他把财产权规定为每一个公民可以享受法律为其所保障的一切财富的权利，而这种权利要受到如下义务的约束，即要尊重社会其他一切成员的权利，不得危害他们的安全、自由、生存与财产。这个定义也就是我的宣言，对人权和公民权利所作的这种诠释，绝非虚伪之作。"

〔30〕 邦纳罗蒂所转引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由罗伯斯比尔提出的，后者曾在 1793 年 4 月 21 日雅各宾俱乐部会议和 4 月 24 日国民公会会议上宣读该宣言。

〔31〕 在罗伯斯比尔所提出的《人权宣言》的最后定稿中，关于财产权这一点作了重大的修改。财产权被阐释为一个人有权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劳动果实和企业果实。巴贝夫坚决地谴责这种修改，他在《人民护民官报》上写道："罗伯斯比尔的人权宣言只是作了这个重大的修改后，才出现在 1793 年宪法的开头部分。不言而喻，经过这种歪曲以后，它便不再成为我的宣言了"。

〔32〕 雅各宾党人的 1793 年宪法由国民公会于 6 月 24 日通过，并在六七月间——也就是跟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残酷的战争时期——由各省初级会议批准，但它没有付诸实施。8 月 12 日，前来巴黎庆祝 8 月 10 日纪念日和庆祝宪法公布的初级会议代表们，全体出席了国民公会，他们认为共和国处境危急，要求推迟实施宪法，保持国民公会及其所属各委员会的权力。1793 年 10 月 10 日（共和二年葡月 19 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代表救国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法国建立革命临时政府，直到缔结和约时止。1793 年 12 月 4 日（共和二年霜月 14 日），国民公会又通过革命政府组织法令，规定了政权机关的结构和执行法律的程序等等。国民公会所通过的这些有关革命政府的法令，奠定了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形式。

〔33〕 邦纳罗蒂所用的完全是革命历法。国民公会在 1793 年 10 月 5 日和 11 月

24日颁布法令，规定共和国的新纪年和新历法。把共和第一年的第一天定为1792年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12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也是从这一天算起，每个月以30天计(即三旬)。剩下的5—6天充作假日，称为无套裤汉日。各个月的名称如下:葡月(9月至10月)，雾月(10月至11月)，霜月(11月至12月)，雪月(12月至1月)，雨月(1月至2月)，风月(2月至3月)，芽月(3月至4月)，花月(4月至5月)，牧月(5月至6月)，获月(6月至7月)，热月(7月至8月)，果月(8月至9月)。罗伯斯比尔在共和二年雨月18日所作的报告，也就是1794年2月6日的报告，而罗伯斯比尔在共和二年牧月7日的演说，也就是1794年5月26日的演说。

〔34〕 邦纳罗蒂对阿贝尔派所作的这种评价，是跟巴贝夫的观点一致的。1796年2月巴贝夫在写给一位巴贝夫运动代表人物，前阿贝尔分子约瑟夫·波德松的信中写道:"我并不在这里研究阿贝尔和肖美特是否无辜的问题。即使他们是无辜的，我仍然要为罗伯斯比尔辩护。象肖美特那样的头脑不清、追求荣誉、自命不凡……的人，只能被罗伯斯比尔视为企图从他手里夺取领导权……的人。我想，任何人只要看到，这些令人可笑的竞争者即使抱着最善良的愿望也会把事情弄得一败涂地，就会说:把这些令人可憎的妖精跟他们的善良愿望……一道清除掉吧！据我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2,500万人的命运不应该受几个可疑人物的行动所支配"。早在1793年，巴贝夫就批判阿贝尔派在宗教政策问题上的立场。

〔35〕 邦纳罗蒂在其关于法国革命的札记中列举了"热月9日阴谋的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其中列有:西哀斯、勒贝尔、梅兰·德·提翁维尔、帕尼斯、巴拉斯、杜里奥、康姆邦、弗雷隆、班达波尔、莱奥纳尔·布尔东、罗维尔、兰代、梅兰·德·杜埃、埃夏塞里奥、塔利昂、古庇约、费罗、勒让德尔、拉科斯特、居弗鲁瓦、勒关特尔、富歇、杜布瓦-克朗塞、瓦迪埃、阿马尔、卡尔诺、皮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乌兰、贝尔等人。

〔36〕 1793年10月3日，国民公会决定逮捕75名吉伦特派代表，因为他们签署了一份反对5月31日—6月2日事件的抗议书。由于许多报刊把75名代表误刊为73名，因此人们都说是73名代表，邦纳罗蒂也引用了73名这个数字。这些代表当中有一些人在逮捕之前逃往南方，投靠叛乱分子。罗伯斯比尔曾一再表示，除参加背叛组织的那部分吉伦特派代表外，不同意把这一帮吉伦特党人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根据国民公会在共和三年霜月18日(1794年12月8日)的决议，这帮吉伦特党人又恢复了代表权力。

〔37〕 指的是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从1794年6月起，热月政变分子就在这两个委员会中占多数。从获月15日(1794年7月13日)起，罗伯斯比尔不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38〕 库东，乔治(1755—1794)。著名的雅各宾党人，立法会议委员，属极左派，国民公会代表，救国委员会委员，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之一，罗伯斯比尔的亲密战友和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在反革命政变之前，库东和圣茹斯特一道在救国委员会里，与热月党人阴谋家展开斗争。热月10日，跟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一道被处死。

〔39〕 勒巴，菲力浦-弗兰斯瓦(1764—1794)，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代表，公安委员会委员，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和战友；曾任国民公会派驻军队的特派员，起了很大的作

用。热月 10 日，跟罗伯斯比尔一道被处死。

〔40〕 罗伯斯比尔，奥古斯丹-邦-约瑟夫(1763—1794)，麦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弟弟，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国民公会派驻军队的专员。被热月党人处死。

〔41〕 大卫，雅克-路易(1748—1825)，法国著名的艺术家，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公安委员会委员，罗伯斯比尔的拥护者。热月 9 日反革命政变后被监禁，后被赦免；在拿破仑执政时期当了拿破仑的宫廷画师。

〔42〕 共和三年芽月 12 日(1795 年 4 月 1 日) 和牧月 1—2 日(5 月 20—21 日)，出现了巴黎郊区最后两次群众革命行动，这些行动旨在反对取消限价 (共和三年雪月 4 日) 后粮食供应状况的急剧恶化，并且反对热月党人把持的国民公会的反革命政策。芽月 12 日，示威群众冲入国民公会，要求“面包与 1793 年宪法”。牧月行动的组织性和决心，都比上次强得多。为了镇压群众的暴动，巴黎从 1789 年以来第一次调入了军队。牧月 3—4 日，四万军队包围了圣安东郊区并解除了该区居民的武装。在芽月和牧月事件发生后，有六十多名国民公会代表和数以千计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活跃分子被捕。

〔43〕 在罗伯斯比尔被处决后不久，右翼热月党人便要求镇压所谓左翼热月党人，即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委员，首先是巴雷尔(1755—1841)、皮约-瓦伦 (1756—1819)、科洛·德布瓦(1750—1796)和瓦迪埃(1736—1828)。共和三年雪月 7 日，成立了一个调查上述人士活动的委员会。风月 12 日，国民公会决定逮捕他们。芽月 12 日事件以后，这四个人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奥列隆岛。牧月以后，科洛·德布瓦和皮约-瓦伦被押往圭亚那，科洛死于该地。巴雷尔于共和四年获赦。在巴雷尔的回忆录中，对邦纳罗蒂作了十分亲切的回忆，他和瓦迪埃直到 1830 年七月革命之前一直侨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与邦纳罗蒂过从甚密。

〔44〕 真名与化名对照表是根据邦纳罗蒂在 1836 年 5 月 3 日写给布朗特尔·奥勃莱恩的信编制的 (见本书下册附录)。在表内并没有列出邦纳罗蒂书中所有的化名人物的真名实姓。

〔45〕 比东即德邦——巴贝夫主义者救国秘密督政府的成员。洛让·德·多里麦尔，即小尤利安，马克·安东，是国民公会成员尤利安·德罗姆之子，任救国委员会代表，担负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南特和土鲁斯两省，深得罗伯斯比尔的信任。热月 9 日事件后被捕，跟巴贝夫一道关在普列西监狱，释放后起先参加巴贝夫运动，任《人民护民官报》编辑。1796 年起退出巴贝夫运动，参加拿破伦军队，在意大利和埃及服役；1813 年被捕，随后任《百科全书述评》编辑，转而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菲昂，让-约瑟夫(1755—1818)，比利时革命者，列日市长，曾参加出征比利时，获将军衔，随后跟法国军队一道撤走；1796 年，比利时被兼并后，以列日市代表身份被选入五百人院；1798—1799 年间，曾参加各种雅各宾派组织。在发生“定时炸弹”事件后，于 1801 年 1 月被拿破仑放逐。西蒙·杜布雷依——罗伯斯比尔的秘书，木匠莫里斯·杜布雷依之子，革命法庭的成员，罗伯斯比尔曾住在他家里；父子两人都在旺多姆审判案中受牵连，但宣判无罪，西蒙·杜布雷依后来跟富歇发生联系，成为警务部门的情报人员。索姆

波，即波德松·约瑟夫(1765年生)，职业是首饰匠和雕刻师，热月9日之前，是巴黎第一区警务委员和法官之一，跟阿贝尔派过从甚密；"选举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起草关于恢复巴黎政权机关的选举制的请愿书（热月30日），为此被逮捕。他是瓦尔勒和巴贝夫的朋友，巴贝夫在1794年对波德松的被捕提出抗议。费盖·克罗德——第十一区巴贝夫主义者代表，热月9日政变前为巴黎警务委员之一；牧月起义的组织者之一，1799年雅各宾俱乐部的参加者，在雾月18日政变后随即被流放。拉·提尔姆，即迈耶——原马赛革命法庭主席。里瓦格尔，即格拉维埃——里昂革命运动的活动家，跟沙利叶亲近，巴黎法庭的著名成员。布恩·马杜兰——巴黎长裤汉运动的活跃人物，5月31日—6月2日运动的参加者，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任市场区的和平法官，热月9日后在雅各宾俱乐部替卡利叶辩护，在旺多姆审判案中被缺席判处流放；在该案复查时，塞纳省刑事法庭宣告布恩和曼涅斯埃两人无罪。在发生"定时炸弹"事件后，被流放到昂儒昂岛，死于该地。辛特拉尔，即特林沙尔——革命法庭陪审员，为贯彻风月法令而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之一，热月9日后立即被捕。格拉图，即古拉尔，1795年跟巴贝夫、热尔明一道关在阿拉斯监狱；出狱后任天文台区警务委员，从而给运动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尤利安·德赞尔姆——巴黎兵工厂的负责人之一。邦纳罗蒂提到的有关巴贝夫运动的其他许多参加者，都没有确凿的资料可供查考。

〔46〕 古戎·亚历山大(1776—1795)，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1794年春，在短时间内任内政部长，继而任外交部长；罗姆·沙尔—茹贝尔（1750—1795）——雅各宾党人，检察官的儿子，革命前在俄国，任斯特罗冈诺夫先生的家庭教师，国民公会成员，革命历法的创作者，曾在军队中担任要职。苏布兰尼(1753—1795)——雅各宾党人，贵族出身，革命前任军官，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1793—1794年，以共和国军队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过前线。杜鲁瓦（1748—1795）——雅各宾党人，革命前是僧侣；立法议会成员，属极左派，国民公会成员，共和国军队中的人民代表。布尔博特（1773—1795）——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军队中的人民代表。以上6人曾促使或同情热月9日政变，但很快就发现了热月党人的反革命意图，承认了自己行动的错误，并领导了所谓的"顶峰"——把国民公会中"最后的山岳党人"联合起来。他们由于牧月1日事件而被判处死刑，在狱中用匕首一一自刎，其中苏布兰尼、杜鲁瓦、布尔博特3人身受重伤，未死，被送往断头台处决。普利耶尔（马恩省），比埃尔-路易，著名的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救国委员会委员；阿尔毕特，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委员，以上两人在牧月事件中受牵连，在审判前逃亡。比沙尔和霍勒斯蒂埃——山岳党人代表，也在牧月事件中受牵连，前者被判处流放，后者被认为罪证不足，根据公安委员会的命令送回监狱服刑。

〔47〕 共和三年牧月5日(1795年6月23日)，布哀西·丹格拉代表委员会所作的有关新宪法的原则的报告中宣称："最后，你们应当保障富人的财产……绝对平等是一种空想……我们应当由最优秀的人物来管理，最优秀的人物就是最关心维护法律和最有教养的人；这样的人，除了个别以外，你们只能在拥有财产的人们当中找到……一个由财主来管理的国家，就会有社会秩序……如果你们无保留地把政治权力给予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就会使我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暴力震荡中"。

〔48〕 共和八年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政变。

〔49〕 比埃尔-安图昂·安东尼尔(1747—1817)，侯爵出身，立法会议委员，1792年8月被派往拉法叶特军队中任特派员；在吉伦特党人审判中任陪审员主席。热月19日被捕，同日释放，然而采取反对政变的立场。曾主编《自由人报》。他参加了巴贝夫的秘密督政府，虽然，看来他对共产主义改造纲领持否定态度。他在花月最早几次逮捕中的表现，受到巴贝夫的批评(见巴贝夫在1796年12月16日致艾琴的信，载苏联《历史问题》，1961年第1期，第114—115页)。在旺多姆审判案中受牵连，被宣判无罪。在督政府后期，积极参加一切旨在恢复雅各宾组织的活动。雾月18日后受到迫害。在复辟时期，维护波旁王朝的利益。

〔50〕 勒佩尔蒂埃(费利克斯)(1767—1837)，米歇尔·勒佩尔蒂埃的兄弟，国民公会成员，伯爵出身，从革命一开始起就参加革命，巴贝夫的密友，巴贝夫在临刑前，曾嘱托他抚育自己的长子。看来，他曾资助巴贝夫出版报纸。在起义胜利后的代表机关内，他被内定为索姆省和卢瓦尔省的代表。在旺多姆审判案中被宣判无罪。积极参加1799年雅各宾俱乐部的活动。雾月18日政变后，立即受到迫害，并因"定时炸弹"爆炸事件被流放到奥列隆岛两年。二十年代期间住在布鲁塞尔，跟邦纳罗蒂保持密切联系。

〔51〕 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人叛乱的借口，是那道关于国民公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必须再度当选的法令。为了镇压叛乱者，热月党人的国民公会除了依靠波拿巴统率的军队以外，还企图利用左派分子；例如，建立了由圣安东郊区居民组成的三个营队，这些营队由共和派军官领导，并取得"1789年爱国者"的称号。

〔52〕 在规定有财产资格限制的新宪法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选举，导致立法团中右翼势力的加强。在过去的国民公会成员中，最温和的人士重新当选。新选出来的三分之一成员几乎全都是暗藏的保王党人。国民公会在宣布了选举结果后，便建立起一个由塔利昂领导的非常委员会，打算提出撤销这次选举的问题。

〔53〕 巴拉斯·保尔(1755—1829)，热月党人，督政府领导人之一。世袭贵族出身，子爵，巴拉斯参加了革命，成为雅各宾党人，被选为国民公会代表。1793—1794年间，巴拉斯以国民公会代表的身份在马赛、土伦等地活动，跟弗雷隆一道进行大量的盗窃、受贿、滥用职权等等勾当。作为一个看风使舵的投机者，一个国库盗窃者和贪污勒索者，巴拉斯极力讨好罗伯斯比尔，可是，当他有充分根据预料到罗伯斯比尔将给他以打击时，他便成为反革命热月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在雅各宾专政垮台之后，他是热月党反动派的首领之一，随后成为督政府的成员。

〔54〕 蒂博多·安图昂-克列尔(1764—1854)，热月9日后，是国民公会右翼最反动的领导人之一。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任省长，伯爵；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任参议员。他是所有国民公会成员中最后死亡的一个人。

〔55〕 在国民公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大赦的法令(共和四年雾月4日)，这个法令仅仅不适用于旺代暴动的参加者、叛逃者和未经宣誓的神甫。大赦主要涉及那些在热月9日后被逮捕的人物。巴贝夫早在大赦之前——葡月26日就被释放，邦纳罗蒂则在葡月17日(1795年10月9日)获释。

〔56〕 卡尔诺·拉扎尔-尼古拉-马热里(1753—1825),专业是军事工程师,大数学家,立宪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救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从1794年起,在救国委员会中成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反对者;他是热月党人,随后是督政府的成员,拿破仑的部长。参加督政府的首届成员,除巴拉斯和卡尔诺外,还有拉雷韦伊埃-莱波、勒贝尔、勒图尔纳。

〔57〕 巴贝夫出生的确切日期为1760年11月23日。

〔58〕 关在阿拉斯监狱并在狱中跟巴贝夫进行通信联系的共和党人当中,有科舍、塔富鲁和土洛特(圣奥迈尔人)。这些人后来在旺多姆审判案中受牵连,但被判无罪(见L.雅可勃:《跟巴贝夫的通信》,载《法国革命历史年鉴》,1934年。)。

〔59〕 建立"平民的旺代"的想法,巴贝夫最早是在阿拉斯监狱期间提出来的。在写给热尔明的仍然保存下来的一封信中,巴贝夫主张在某一个中心地点巩固下来,从那里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巴贝夫释放后,便在头几期《人民护民官报》上号召人们在某一地点或"86省的每一个省"建立起"平民的旺代"。

〔60〕 雾月18日政变和执政制度建立后,便开始对雅各宾党人和巴贝夫主义者进行迫害,沙佩尔和弗兰斯瓦·杜弗尔一道被捕并于1800年被处死,罪名是策划暗害拿破仑(见F.迈松:《雾月政变后雅各宾党人的阴谋》,载《拿破仑研究杂志》,1922年)。

〔61〕 达尔蒂的自传札记在1841年由沙尔·拉比特发表,其中内容与邦纳罗蒂所述完全相符。

〔62〕 沙利叶·约瑟夫(1747—1793),里昂雅各宾派领导人,跟最民主的人士联系密切,主张实行限价、建立革命军队,对富人课税,等等。里昂的吉伦特党人,在1793年5月29日组织暴动,解散了由沙利叶所领导的市议会。7月16日,沙利叶被处死,尽管事前国民公会特别是马拉曾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沙利叶的遗体迁入先贤祠,在热月反革命期间又从那里被抬走。

〔63〕 共和四年果月23日夜至24日间(1796年9月9—10日,数百名巴贝夫主义者企图潜入格雷涅尔营的驻地,指望得到士兵的支持。督政府事先获悉这次行动的消息,并有意识地加以挑动。早有准备的军队,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屠杀。20人死亡,132人被捕。法庭宣判了32个人的死刑,其中包括贝特兰以及3名原国民公会成员——雅沃格、雨盖和居塞。

〔64〕 阿马尔(1755—1816),雅各宾派,律师,国民公会代表(伊最耳省);救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策划热月9日政变,事后憣然悔悟,宣称"我为曾与罗伯斯比尔共事而感到骄傲;人民当时有面包。人们想把他说成是嗜血成性的人,但后人将会作出判断的。"(库钦斯基:《国民公会成员辞典》)他在旺多姆审判案中受审,但宣判无罪。后来脱离政治活动。

〔65〕 迪第埃·让-巴蒂斯特(1755—1816),职业是钳工;革命法庭的陪审员,跟罗伯斯比尔亲近。在热月反动时期,则跟巴贝夫接近;救国秘密督政府的联络代表。在旺多姆审判案中宣判无罪。在帝国时期参加秘密社团,于1807年被捕。

〔66〕 克列曼·让-巴蒂斯特-昂利,革命初期是大学法律系学生,7月14日和8月10日起义的参加者;在推翻王朝以后,是被派赴各省的24名专员之一;主教宫中央委

员会的成员之一，该委员会曾领导5月31日—6月2日的运动；巴黎省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热月9日后被捕，在巴什、布硕特和巴黎雅各宾专政的其他著名人物的案件中受牵连；在大赦后，跟巴贝夫接近；1799年参加曼涅日俱乐部；由于得到吕西安·波拿巴的庇护，免受迫害；在波拿巴统治时期，早在1813年就当上蒙托邦的关卡总监的职务。

〔67〕马尔桑，吉约姆-西蒙（1768年生），革命前和革命初期当兵；8月10日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793年春，要求国民公会处死迪穆里埃；5月31日前夕，是主教宫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巴黎省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热月9日后，跟克列曼一道被捕，在巴什案件中受株连。1795年被赦免；参加巴贝夫主义的运动。巴贝夫打算在起义胜利的情况下，让马尔桑和克列曼领导巴黎省的行政。曼涅日俱乐部的参加者。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应被流放，但他隐蔽起来，直到1804年，还受监视。

〔68〕就巴贝夫而言，他除了在热月9日以后最初一个阶段里反对罗伯斯比尔以外，总的说来，是完全同意邦纳罗蒂这一评价的。早在1791年，他在跟库贝通信中，就曾推测罗伯斯比尔是暗地拥护"土地法"的。1796年，他在《人民护民官报》中写道：不要"自以为是地反驳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关于在革命时期确定真正平等的计划的创议，因为在罗伯斯比尔著作中数以百计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平等寄以真诚的希望"。

〔69〕对耶稣的这种评价完全跟巴贝夫的观点背道而驰。巴贝夫在他没有发表《耶稣·基督新史》的手稿中，对卢梭和阿贝尔把基督当作新社会学说的捍卫者的观点进行尖锐的批判。他写道："我毫不容情地攻击我们哲学家们所敬畏的这个主要偶像，迄今为止，他们只敢对他的随从、伴侣进行攻击……基督既不是无套裤汉，又不是真诚的雅各宾党人；既不是明哲之士，又不是理性论者；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立法者"。

〔70〕艾隆·路易—尤利安—西蒙（1748—1795？），革命前是海员；曾任闭塞船船长；在革命时期，参加过所有主要的民众运动：7月14日，10月5—6日；8月10日。曾把马拉隐藏在自己家里，公安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牧月起义后被捕，跟巴什、布硕特、奥杜恩、克列曼、马尔桑等人一道受审。雾月4日大赦后获释，不久去世。

〔71〕风月法令（1794年2月26日，3月4日），是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通过的。法令规定成立六个委员会来审理"嫌疑犯"案件，以便确定是否把他们送交革命法庭、流放或释放。前两种人的财产应予没收，并分配给贫困的爱国者。风月法令实际上遇到雅各宾派中的资产阶级右翼派系的反对，因此没有付诸实施，直到发生热月反革命政变。在保存下来的一封信里，达尔蒂坚决要求加入其中的一个委员会。

〔72〕巴贝夫·维多利亚（1766——？），原姓兰格列，她是亚眠一个五金工人的女儿，当过女佣人，1782年跟巴贝夫结婚。她勇敢地分担巴贝夫的一切苦难。巴贝夫在世时和逝世以后，她都一再遭受迫害，包括1801年"定时炸弹"爆炸案和1808年马莱将军的第一次密谋败露之后。

〔73〕德鲁埃·让-巴蒂斯特（1763—1824），1796年从奥地利施皮尔贝格要塞释放出来，以交换路易十六的女儿。回国后他宣称，如果那几年他在法国的话，他会追随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他继巴贝夫之后被捕，在巴拉斯帮助下越狱，逃往印度。当知道旺多姆审判案中自己被判无罪后，便从加纳里群岛回来，他在那里曾参加反对纳尔逊

的斗争。1799年加入雅各宾俱乐部；在拿破仑统治下任郡长；复辟以后，要逮捕他，他隐藏起来，直到去世。有8年时间，他在麦肯一个当地保王党人的家里当园丁。

〔74〕 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根据罗伯斯比尔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关于信奉“神明”的法令，该法令第一条宣称：“法兰西人民承认神明在上、灵魂不朽。”当策动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时，人们力图利用这道法令来诋毁罗伯斯比尔。邦纳罗蒂在评论瓦迪埃和巴雷尔的时候指出：“瓦迪埃竭尽全力来嘲笑这道法令……他指责罗伯斯比尔企图借助宗教狂热来登上王位”。邦纳罗蒂的评论发表在阿·马迪埃所作的《邦纳罗蒂评巴雷尔和瓦迪埃在热月9日的作用》一文中，见马迪埃著《罗伯斯比尔研究》一书，1958年巴黎法文版。

〔75〕 1793年10月5日关于共和历法的法令，把月划分为旬，规定新的日名，其中第十天——旬日(décade)，用以代替星期日。根据关于信奉神明的法令规定，旬日应当安排节假日。在督政府时期，硬性规定旬日为节日，代替星斯日并下令教会神甫只能在旬日节做礼拜。

〔76〕 邦纳罗蒂个人对拿破仑深有了解，他在科西嘉岛的时候就已结识拿破仑。1793年，他跟拿破仑一道在土伦附近，当时他就对拿破仑贪图权欲产生不好的看法。后来，拿破仑本人在回忆邦纳罗蒂时说道：“他本可以成为我在意大利非常有用的人。他在巴贝夫的密谋中败坏了自己的声誉。葡月13日后，我查封了先贤祠协会，这个党派想把我这个巴黎卫戍部队司令官干掉。我当时就对邦纳罗蒂声明，我绝不打算为他丢掉自己的脑袋。”见贝特兰：《圣赫勒拿岛日记 1816—1817》1951年巴黎版，第177—178页，同时可参看贝特兰：《圣赫勒拿岛日记 1818—1819》，1959年巴黎版，第225、295页中写道：“葡月以后，他成为巴贝夫分子。我叫他，他傲慢地回答我。我说：‘好哇！你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要砍掉巴黎司令官的脑袋。这对我不合适，我要把你们送交军事法庭，把你们枪毙’。”

〔77〕 共和四年花月，对巴贝夫和运动的领导人进行逮捕。同年果月，处决了格雷涅尔营事件的有关人物。共和五年果月18日，以巴拉斯为首的部分督政府成员，慑于补选后保王党人实力的加强，进行了政变。49个省的选举结果被撤销，53名代表被流放。卡尔诺和巴泰勒米被撵出督政府。在被流放的人物当中，包括警务大臣科逊和逮捕巴贝夫的德松维尔。在应予流放的代表名单中，有布哀西·丹格拉、科德鲁瓦、昂利·拉里维埃、杜莫拉尔、卡米尔·若尔当、巴斯托雷、萨拉丹、西梅翁、波塔利斯、罗维尔。共和六年举行补选后，左派分子占了上风(在巴黎的中选代表当中，有许多人跟巴贝夫主义者有联系，诸如安东尼尔、菲昂将军、克·费盖等人)，共和六年花月22日，决定对全体代表的资格进行审查，到共和六年牧月1日之前，有几十名新当选的代表被撤销资格(罗·兰代、菲昂等人)。

〔78〕 共和三年芽月27日(1796年4月16日)法令规定：取缔一切政治集会，凡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要求解散立法议会或督政府者、要求恢复1793年或1791年宪法者、要求恢复“土地法”者均判处死刑。

〔79〕 共和三年热月8日(1796年3月28日)，马耶代表提出一个建议，凡会员人数超过如下规定的政治社团，一律取缔：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会员人数超过60人

者：在人口 2 万以上的城市，会员超过 40 人者；在人口 5 千以上的村社，会员人数超过 20 人者。

〔80〕 马雷萨尔·西尔文(1750—1803)，作家，诗人，戏剧家。从世界观来看，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1781 年，发表了《法兰西的卢克莱茨》；1781 年，发表《从大洪水中抢救出来的书》；1788 年，发表《纯洁人作品选》。这些作品尖锐地反映了无神论的观点。革命前，由于发表这些作品而受迫害，被撤去马扎里尼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在卢斯塔罗死后(1790 年)，任当时最左的报纸之一——《巴黎革命报》的主编，在该报上捍卫"土地法"。他是实行共和历法的倡议者之一；写了许多革命的赞美诗、歌曲和剧本；在一系列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始终不断地积极宣传无神论。由于格里泽尔不知道马雷萨尔的名字，他才没有被卷入旺多姆审判案。1803 年 1 月在蒙鲁日逝世。巴贝夫早在 1793 年就跟他相识。1794 年，马雷萨尔参加了要求释放巴贝夫、停止对巴贝夫起诉的营救活动。西·马雷萨尔的哲学和无神论的观点，肯定对巴贝夫起过影响。

〔81〕 万涅克，1793 年 5 月 31 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斯德区段部队的指挥官。共和三年芽月 12 日，代表示威者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说。在旺多姆审判案中受审，后被宣判无罪。1799 年，积极参加雅各宾派—巴贝夫主义者运动。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雾月 18 日以后，由于"定时炸弹"爆炸案件而被流放。

〔82〕 《人民侦察兵，或 2,400 万被压迫者的捍卫者报》，巴贝夫参加编辑过这份报纸，共发行了 7 期。《自由人报》的编者是安东尼尔，该报不断更换名称，一直出到雾月18 日政变时止。

〔83〕 塔利昂·让-拉姆贝尔(1769—1820)，热月党人政变的最积极的活动者之一。曾参加 1792 年 8 月 10 日起义，国民公会成员；他装扮成一个极端的雅各宾分子，早在到波尔多执行任务期间就采取种种办法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当看到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罗伯斯比尔的镇压时，他便成为热月 9 日反革命阴谋最活跃的组织者之一。作为不择手段的贪赃枉法者，作为毫无原则的沽名钓誉者，作为穷凶极恶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塔里昂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反革命的一个主要头面人物。勒让德尔，路易(1756—1797)，职业是肉商，曾参加攻取巴士底狱，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员，后来成为雅各宾派分子，国民公会成员，著名的丹东分子，跟其同谋者一道临刑时逃脱。热月 9 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随后参与镇压雅各宾派。弗雷隆·路易-斯坦尼斯拉夫(1765—1802)，革命初期站在左派立场上，是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一个有影响的会员，《人民演说家报》的编辑，1792 年 8 月，马拉还称他为"人民之友的名副其实的同志"，国民公会成员，雅各宾派分子。然而，弗雷隆的真面目以后才暴露出来。1793—1794 年间，弗雷隆以国民公会派赴马赛和土伦的代表的身份，进行贪污盗窃活动，为了掩盖这些活动，他在进行镇压时使用了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有害的残酷手段。在被救国委员会召回以后，弗雷隆成为热月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热月以后，他是反革命匪帮"金色青年"的领导人，开始以同样凶残的手段来镇压他往昔的雅各宾派同志和 1793—1794 年革命斗争的参加者。梅兰·德·提翁维尔，安图昂-克里斯托夫(1762—1833)，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雅各宾派分子，国民公会派驻军队的代表，热月 9 日反革命政变的参加者，毫无原则的贪赃枉法者，通过种种非法手段给自己积攒大笔财

产；热月以后，对雅各宾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勒贝尔·让-弗兰斯瓦(1747—1805)，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雅各宾派分子。从雅各宾派内部斗争时起，就是丹东分子，后来成为积极的热月党人，热月以后，进入公安委员会，对雅各宾派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后来当上督政府的主席。关于巴拉斯，见第注〔53〕。由于这个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革命事件，在保王党人的心目中，他们被看作"弑君者"而威信扫地。最后，这些人都是在革命的年代中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新贵，他们也不愿意跟旧的地主阶级分享任何东西，塔利昂、弗雷隆和其他热月党人，满怀妒意地盯着保王党人和其他旧时政治集团的阴谋不放，他们既不想把权力让给后者，更不想让旧王朝复辟。

〔84〕 布瓦西·丹格拉(1756—1826)，热月9日前，属国民公会中的"沼泽派"；在政变后起积极作用；在立法议会中，是君主主义多数派的领导人之一；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是参议员、伯爵；在波旁王朝时期，是贵族院成员。拉里维埃·昂利(1761—1838)，吉伦特党人；热月以后回到国民公会，要求逮捕各政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1797年进入五百人院，是反动的多数派的领导人之一；果月18日政变后隐蔽起来；跟阿图瓦伯爵有勾结，在波旁王朝时期才回到法国。杜莫拉尔·约瑟夫——文森特(1766—1819)，在格勒诺布尔市当律师，立法议会代表，支持拉法叶特，五百人院委员，果月18日后，被流放到奥列隆岛，后来为帝国服务。若尔当·卡米尔(1771—1821)，1793年曾参加里昂反革命暴动，随后侨居瑞士、英国，1796年回国，被选入五百人院。拉雷韦伊埃-莱波，路易-玛利(1753—1824)，制宪议会代表，国民公会成员，投票赞成处决国王，1793年6月2日，在反对逮捕吉伦特党人的抗议书上签名，以后，在整个雅各宾派专政期间隐蔽起来，热月9日后回到国民公会，1795年，被选入督政府。波塔利斯·让-艾蒂安-玛利(1746—1807)，职业是律师，在革命期间没有起多大作用；1793年12月被捕，1794年释放；被选入元老院，在那里崭露头角。在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期，为拿破仑·波拿巴服务，1802年，被任命为四名国务参事之一；曾参加制订《拿破仑法典》。巴斯托雷·克罗德-艾曼努埃-约瑟夫-比埃尔(1756—1840)，伯爵，后来是侯爵；1789年，任巴黎省的代理检察长，立法议会委员；保王党人，在王朝被推翻后逃亡国外，在热月反动时期返回法国；五百人院成员；在帝国时期任参议员，在复辟时期，是法国的贵族。西梅翁，约瑟夫-热罗姆(1749—1842)，伯爵；从革命一开始起就采取敌视革命的立场，曾参与反对雅各宾政府的联邦分子暴乱；热月以后回到法国；五百人院成员；后来，先后为帝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服务。有关蒂博多和朗热内，请分别参看第注〔54〕和第〔17〕。

〔85〕 伊纳尔·马克西门(1750—1825)，革命前是企业主；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吉伦特党人，以扬言要消灭巴黎而闻名；在热月反革命期间回到国民公会；五百人院成员；南方白色恐怖的组织者之一，同谋者为卡德鲁瓦(1751—1813)，后者在果月18日后被流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回来。罗维尔·德·封维埃尔(1746—1798)，侯爵出身，国民公会成员，热月反革命集团的最没有原则性的代表人物之一；热月党人国民公会所属公安委员会的委员，对雅各宾党人和无套裤汉进行迫害；果月18日后，被流放到凯恩，死于该地。

〔86〕 1795年春，在牧月运动被镇压以后，法国南部掀起了白色恐怖的浪潮，这是在卷土重来的吉伦特党人和叛逃国外的分子领导之下策划起来的。在里昂、土伦、马

赛、埃克斯等地的监狱里进行了屠杀，制定了过去"恐怖分子"的名单，以便将他们消灭，等等。吉伦特党人伊纳尔在埃克斯号召说："如果你们没有武器，就拿棍子；如果没有棍子，就把你们亲人的骨头挖出来，朝着恐怖分子打去"。

〔87〕 里科尔(1759—1818)，革命前是公证人；代表瓦尔省参加国民公会；跟小罗伯斯比尔和萨利切蒂一道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役；跟邦纳罗蒂过从甚密；在旺多姆审判案中被宣判无罪；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在雾月18日后以及马莱将军案件中都遭到逮捕；在"百日"期间支持拿破仑。阿里诺热，即兰涅罗(1752—1829)，国民公会的巴黎代表；牧月起义以后和巴贝夫案件时都曾被逮捕；在旺多姆审判案中被宣判无罪；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遭到迫害。舒迪厄(1761—1838)，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成员，国民公会派到军队的代表；芽月12日以后和在巴贝夫案件中都曾被捕；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侨居荷兰；"百日"期间回国，复辟时期又被驱逐，在七月王朝时期返回法国。雨盖(1757—1796)，革命前是神甫；后来被选为宪政派主教；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代表；8月10日，以议会厅专员的身份逮捕了路易十六，并把他送到坦普尔；芽月12日后被捕；后被赦免；在格雷涅尔营冲突期间，在巴黎郊区被捕；虽然起诉人要求把雨盖流放，但他却被判处死刑。雅沃格·克罗德(1759—1796)，梭讷和卢瓦尔省在国民公会的代表；国民公会派驻圣太田的代表，在那里对富人实行坚定的课税政策，因格雷涅尔营事件被处死。

〔88〕 芽月27日(1795年4月16日)法令规定，凡鼓吹"恢复王朝或1793年宪法……，以土地法名义掠夺或瓜分私有财产"者，一律判处死刑。

〔89〕 警备团在牧月起义后(共和三年获月9日)成立。编制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队。花月4日，督政府获准将该团调入军队。花月9日，因不服从该调令而引起骚动。花月10日(1796年4月30日)，下令解散该团。巴贝夫主义者的起义计划，是跟指望依靠警备团有关系的，因此在骚动一开始，即在花月11日，秘密督政府就立即召集军事代表开会。

〔90〕 罗西诺尔·让-安图昂(1759—1802)，巴黎工人——手饰匠。参加攻占巴士底狱和1792年8月10日起义。1793年，在旺代指挥军队。他作为从平民行列中提拔的第一个将军，招致国民公会中温和派的疯狂攻击，以致被撤去指挥职务。牧月后被捕。巴贝夫主义者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旺多姆审判案中被宣判无罪。1801年，由于"定时炸弹"案件被捕，在流放后死亡。

〔91〕 兰代·罗贝尔(1746—1827)，律师，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代表。从1793年4月到1795年，任救国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内主要处理经济问题。支持热月9日政变。牧月起义后被捕。在旺多姆审判案中被宣判无罪。雾月18日以前，当过财政部长，但时间不长；拿破仑当权后被撤职。以后仅仅从事律师职务，直到去世。

〔92〕 花月15日、格里泽尔向卡尔诺进行口头告密，卡尔诺建议他立即提出书面告密材料。花月17日，卡尔诺向督政府提出一份245人的逮捕名单，其中包括巴贝夫、热尔明、德鲁埃、阿马尔、罗·兰代、杜布瓦-克朗塞、勒佩尔蒂埃、邦纳罗蒂等人。

〔93〕 邦纳罗蒂指的是塔利昂和弗雷隆。关于巴拉斯试图利用巴贝夫运动的情况，巴贝夫在第42期《人民护民官报》上这样写道："巴拉斯和其他的人企图通过局部

运动来摆脱自己的政敌——罗维尔派、伊纳尔派、朗热内、布瓦西·丹格拉。然后他再回过头来对付民主派。不，我们不要局部运动！人民只能搞全局性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摆脱头面人物的影响"。巴拉斯曾协助德鲁埃越狱。卡尔诺和拉雷韦伊埃-莱波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邦纳罗蒂的说法。参看罗宾盖的文章：《巴拉斯与巴贝夫》，载1896年《巴黎评论》。

〔94〕 在督政府公布的巴贝夫案件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在起义胜利后，打算派萨利切蒂到意大利军队去，授以全权，"逮捕叛逆将领"。为此，萨利切蒂向督政府作了解释。

巴贝夫在外省的支持者当中，我们可以举出阿尔蒙维尔——工人，原国民公会代表。1796年春，他以自己和达尔蒂的名义，从督政府那里弄到一张征用谷物的签证，巡回于兰斯、阿登、安纳等省，在那些地方张贴并散发传单。

〔95〕 在这个问题上，邦纳罗蒂发表的观点只能代表他个人。邦纳罗蒂的这些观点，巴贝夫是完全不赞同的，更不用说那位坚定的无神论者西尔文·马雷萨尔了（他也是巴贝夫主义者的督政府的参加者）。

〔96〕 邦纳罗蒂在关于热月9日原因和瓦迪埃-巴雷尔的作用的评论中，发表了跟罗伯斯比尔的《论宗教》完全相同的观点："法国需要……把明智的宗教和良好的立法结合起来……道德沦丧——这是还需要打倒的最强大的敌人……建立真正的共和国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国民公会的纯洁和美德。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才颁布一道法令，它阐明神明存在、灵魂不灭，规定信仰自由和民族节日。这也是那些旨在反对无神论宣传者、反对以无耻行为沾污自己的代表们的法令的意义所在"。

〔97〕 勒佩尔蒂埃，德·圣法尔若，路易-米歇尔（1760—1793）：贵族，1785年起任巴黎议会议长；大财主。从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革命。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的成员；1792年参加雅各宾派。曾制定国民教育计划，规定5至11、12岁的儿童在公立学校中受普遍的、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个计划手稿是在勒佩尔蒂埃死后才交给罗伯斯比尔的，深受罗伯斯比尔的赞赏，在他的建议之下，勒佩尔蒂埃的计划才呈送国民公会讨论。）

在国民公会审判国王的法庭上，勒佩尔蒂埃·德·圣法尔若赞成处决路易十六，为此受到报复，于1793年1月12日被保王党分子刺杀。作为反革命恐怖的第一个牺牲者，勒佩尔蒂埃·德·圣法尔若成为最受尊敬的雅各宾派革命烈士之一，革命政府把他跟马拉、沙利叶并列起来纪念。